CSSCI来源期刊(2019-2020)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复印报刊资料来源期刊
全国高校社科名刊

ISSN 1001-5973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二〇二〇年第四期（总第二九一期）

2020 4

社会科学版
SOCIAL SCIENCES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Since 1956 (Bimonthly)
(社会科学版)
1956年创刊（双月刊）
2020 年第 4 期 （总第 291 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商志晓

副 主 任： 王志民　张文新　万光侠（常务）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光侠　王　宏　王　玮　王　卓
王志民　毛　锐　任建兰　李松玉
李宗刚　李海鸥　李掖平　杨存昌
杨守森　时晓红　张文新　张宗斌
岳海涛　夏同水　徐继存　高峰强
高继文　商志晓　葛书林　程奇立
魏　建

主　　编： 李宗刚

副 主 编： 时晓红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双月刊)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用绘画语言进行灵魂的剖析

——论裘沙、王伟君的《阿Q正传二百图》…… 杨剑龙(1)

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著作评析…… 王卫平(12)

“南方”的重构与先锋的续航

——兼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 …… 刘　艳(25)

论《江南三部曲》的失败叙事及其认知结构 …… 马治军(39)

□　文艺学研究

从“文本阐释”到“自我阐释”

——王阳明经典阐释学思想的实践性品格…… 李春青(48)

诠释学与作为本体论的文学阅读事件…… 李建盛(60)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 王立胜　周　丹(70)

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与当代启示…… 张士海(78)

本刊基本参数:CN37-1066/C*1956*b*A4*160*zh*P*￥15.00*2000*14*2020-04

□　政治学研究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及其完善和发展

——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为视角 …… 魏淑君(88)

□　历史学研究

傅斯年与山东龙山文化研发关系述论 …… 马亮宽(97)

□　心理学研究

童年期儿童同情与同伴侵害:应对策略的中介效应…… 董会芹　张文新(108)

□　经济学研究

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与对策

——来自山东的实践经验 …… 曲顺兰(119)

□　语言学研究

我国语言产业研究现状分析(1993—2019)

——基于文献计量学视角 …… 彭　爽(129)

□　社会学研究

地名发展、移民变迁与乡愁记忆传承

——基于山东省自然村地名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宋全成(143)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Vol.**65 **No.**4(**Serial No.**291)

MAIN CONTENTS

Analysis of the Soul Carried Out in the Language of Painting
——On Qiu Sha and Wang Weijun's 200 *Pictures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 Yang Jianlong(1)
Analysis of the Works on the Studies on Mao Dun in the New Century …… Wang Weiping(12)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 and Pioneering Continuation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Titmouse* By Su Tong
…… Liu Yan(25)
Narration of Failures and Cognitive Structure of *Jiangnan Trilogy* …… Ma Zhijun(39)
From "Text Interpretation" to "Self Interpretation"
——Practicality of Wang Yangming's Classical Hermeneutics …… Li Chunqing(48)
Hermeneutics and Literary Reading Events as Ontology …… Li Jiansheng(60)
O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 Wang Lisheng,Zhou Dan(70)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ctober Revolution …… Zhang Shihai(78)
Superiority of the System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Its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 Wei Shujun(88)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 Sinian and Shandong Longshan Cul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Ma Liangkuan(97)
Children's Sympathy and Peer Aggression: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rategy
…… Dong Huiqin,Zhang Wenxin(108)
Paths and Recommenda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Promote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Experience from Shandong Province …… Qu Shunlan(119)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dustry Research(1993—2019)
——Based on Bibliometrics …… Peng Shuang(129)
Development of Place Names, Immigration Change and Nostalgic Memory Inheritanc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of Place Names of Natur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 Song Quancheng(143)

英文校译:李玉麟

本 刊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社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编辑部上述声明。

本刊不收取任何形式的赞助费、版面费。

用绘画语言进行灵魂的剖析
——论裘沙、王伟君的《阿Q正传二百图》*①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 裘沙、王伟君夫妇的《阿Q正传二百图》从生活中寻找素材,从研读中把握精神,从艺术中创造形象,以对鲁迅小说的理解精心地为小说人物造型。他们以炭笔素描展现雇农阿Q悲哀的人生,在光与影的映照中呈现连环画的沉郁风格,在夸张变形中凸显阿Q被欺凌的生活窘态,在同情怜悯中绘出阿Q的苦难和不幸,在沉思和反省中展露阿Q精神胜利法的弊端。对蒙克、珂勒惠支、杜米埃等西方艺术大师技法的吸收,对陈洪绶、陶元庆以及我国民间美术的借鉴,使该作品成为鲁迅小说《阿Q正传》图像阐释的世纪压轴之作。

关键词: 裘沙;王伟君;阿Q;炭笔素描;图像阐释;《阿Q正传二百图》
中图分类号: J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4-0001-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01

在20世纪以图释文的画家行列中,裘沙、王伟君夫妇应该是以图像阐释鲁迅思想着力最大、时间最久、作品最多的画家。裘沙、王伟君夫妇自1972年画《又为斯民哭健儿》之后,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从事与鲁迅相关的美术作品创作,已创作的美术作品超过2000余幅。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说:"'与鲁迅有生命相遇是要有缘分的',画家裘沙一辈子阅读鲁迅、研究鲁迅,以绘画的方式让更多人感悟到鲁迅思想的真谛,他的作品给人一方沉思的空间,他便是这'有缘人'。"②裘沙曾在病重时拟了自己的墓志铭:"这是一个用自己的一生,真正认识到鲁迅的意义,将自己毕生精力献给鲁迅事业的人。"③在裘沙、王伟君夫妇创作的众多与鲁迅作品相关的美术作品中,1982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阿Q正传二百图》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达到文与图相互补充紧密结合的高峰"④,成为20世纪鲁迅小说《阿Q正传》图像阐释的压轴之作。

一

谈到《阿Q正传二百图》时,裘沙曾说:"我创作《阿Q正传二百图》的生活基础,主要是解放前近二十年的家乡农村生活,因为我的故乡和绍兴仅一山之隔,所以风土人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⑤裘沙1930年4月出生于浙江省嵊县崇仁镇,原名裘伯浒。1948年7月,裘沙在嵊县中学高中毕业后,参加中华全国木刻协会木刻函授班学习。1949年9月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 **收稿日期:** 2020-03-23
作者简介: 杨剑龙(1952—),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88)的阶段性成果。
②许莹:《与鲁迅"对话"——记画家裘沙、王伟君》,《文艺报》2015年10月26日。
③张楠:《魂系鲁迅的裘沙夫妇》,《炎黄春秋》1992年第1期。
④葛浩文:《探索与突破——为〈裘沙画集〉出版而作》,《人民日报》1987年11月19日。
⑤王朝闻、裘沙:《关于鲁迅文学作品插图问题的五封信》,《美术》1981年第9期。

学习，得到林风眠的教诲。1951 年春，《中国青年报》报社到杭州招聘，裘沙应聘成为《中国青年报》报社的美术编辑，并担任美术组组长。王伟君于 1932 年 12 月出生于杭州书香门第，15 岁在西湖艺术研究院跟随油画家倪贻德学画，1949 年 5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美术工作，随解放军南下大西南，1951 年 3 月转赴朝鲜战场，成为抗美援朝志愿军中的一名文艺兵。1953 年回国后进入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学习，后又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深造，1956 年毕业后分配到团中央中国少儿出版社工作。1957 年 7 月 13 日，由画家黄胄做月老，裘沙与王伟君在《中国青年报》报社举办了婚礼。



《阿 Q 正传二百图》封面

当年，裘沙被打成“右派”，年底被发配到山东省莒南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其夫人王伟君随行。在务农的间隙，裘沙常常为农民画肖像、绘素描。一年后，裘沙、王伟君夫妇携儿子裘小鲁回到北京，裘沙回《中国青年报》报社工作，此时期裘沙曾经为几本书作插图。① 王伟君先后在中国少儿出版社、中国少年报社、《万年青》外文杂志社任美术编辑。“文革”期间，裘沙被发配到河南省潢川团中央“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苦闷与寂寞中，裘沙、王伟君夫妇以阅读鲁迅作品的方式排遣内心的压抑和郁闷。

1973 年初，裘沙带儿子回北京治病，抽暇以鲁迅冒着生命危险为被国民党杀害的杨杏佛送殓一事为画题，创作了《又为斯民哭健儿》的画幅。从此，裘沙、王伟君夫妇开始了以图释文的鲁迅研究与美术创作。裘沙结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后，开始搜集和编辑鲁迅照片，1976 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鲁迅照片集》，收入 102 幅照片。在“文革”中，他们读鲁迅的小说，感受“文革”中阿 Q 式的“革命”。“他们深为鲁迅先生非凡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所震惊，深信今后中国一定会再有改革，深怕阿 Q 似的革命党还将涌现，将继续给中国社会带来无尽的灾难。因此决心把《阿 Q 正传》这部杰作形诸画面，以期引起更多人的治疗和警醒。”②1977 年冬天，裘沙自费去绍兴搜集素材，住在马鞍公社，画了诸多风景风俗素描，尤其是在集市上邂逅了一个名叫长生的中年农民，其神态气质简直就是一个活着的阿 Q。1978 年，裘沙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1981 年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兼职教师。裘沙夫妇的创作得到了冯雪峰、萧军、江丰等前辈的关心与帮助，也得到了楼适夷、王朝闻、钟惦棐等名家的肯定与扶植。1979 年 12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裘沙、王伟君、裘大力插图的鲁迅散文诗集《野草插图本》。1981 年 9 月 15—29 日，在全国纪念鲁迅诞辰 100 周年之际，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鲁迅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裘沙“鲁迅文学作品插图展览”。“展出期间，裘沙同志的画受到许多美术界前辈、鲁迅研究者、文学家和著作家，以及广大观众的热情赞赏。”③画展在全国六大城市巡展。1983 年底，裘沙因病住院，与死神擦肩而过。裘沙出院后，在北京市少年宫工作的王伟君决定提前离休，这样既可以照顾裘沙，又可以专心投入艺术创作。1981 年《美术杂志》第 9 期选载裘沙、王伟君《阿 Q 正传二百图》17 幅，1982 年《阿 Q 正传二百图》正式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连环画报》2011 年第 9 期选载 50 幅）。1986 年，裘沙、王伟君夫妇应邀去日本举办纪念鲁迅逝世 50 周年的“鲁迅之世界”画展，引起强烈反响。日本作家井上靖说：鲁迅的同乡、中国画家裘沙先生呕心沥血领会并用绘画表现了鲁迅

①栖梧老人：《二七回忆录》，裘沙绘图，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 年；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裘沙插图，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 年；雷恒保等：《黎明前的战斗》，裘沙插图，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 年。

②张新：《魂系鲁迅之世界——记画坛伉俪裘沙、王伟君》，《山东画报》1999 年第 12 期。

③史继中：《裘沙作鲁迅文学作品插图展览简介》，《学习与研究》1981 年第 5 期。

的世界,画家抓住了作家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人物群像。看了这些绘画作品,使我产生了一种去重读鲁迅作品的冲动,我甚至感到自己以往对鲁迅的观念被打破了,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强烈。① 1986 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裘沙、王伟君夫妇绘画的《裘沙画集 鲁迅的世界》、竹内好翻译的《阿 Q 正传》绘图本。在对鲁迅作品以图释文中,裘沙、王伟君夫妇完成了《裘沙画集——鲁迅文学作品组画》《鲁迅之世界全集》《鲁迅散文·诗野草》《鲁迅论文·杂文 160 图》《鲁迅小说·呐喊》《鲁迅小说·彷徨》《鲁迅散文朝花夕拾》等 30 余种创作②,几乎涉及鲁迅大部分作品。在国内外举办纪念鲁迅专题个人画展 30 余次。法国理论家米歇尔·鲁阿在裘沙、王伟君伉俪的《〈鲁迅之世界全集〉序言》中评价道:"《鲁迅之世界全集》不仅是裘沙和王伟君一生围绕鲁迅作品而创作的水彩画、木炭画、速写和其他绘画艺术的画集名称,而且是对鲁迅真实的内心'世界'忠实而感人的再现。每一个鲁迅的阅读者,只要在他的书中听到过那撕破夜空的愤怒'呐喊'与呼唤 ,都会在心里产生共鸣。起码我是这样感受的。两位书画的艺术创造之所以具有神奇的艺术魅力,关键在于准确。"③

二

以绘画呈现阿 Q 的形象,最初缘于"文革"期间。裘沙回忆"文革"时说:"红卫兵们的大破四旧和康生们的从中盗窃古砚古画,自然使我联想起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的革命勋业来。他们到静修庵去砸'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又给尼姑头上以很多的棍子和栗凿,而庵里却因此不见了宣德炉。'造反派'不准'保守派'革命,而'保守派'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又去给一些人扣上什么帽子,不准他们革命。这和假洋鬼子只准自己去'革命'而不准阿 Q 革命,而阿 Q 则不准小 D 革命又如出一辙。一场浩劫,使多少人亮出了阿 Q 相。"④在"文革"中,裘沙、王伟君重读鲁迅作品,并从中获得精神力量。"重读鲁迅作品使他们猛醒。一场浩劫使多少人都显出了阿 Q 相,无论是革命的,还是被革命的。……因此决心把《阿 Q 正传》这部杰作形诸画面,以期引起更多人的治疗和警醒。"⑤1977 年冬天,裘沙离开北京自费去绍兴搜集素材,住在马鞍公社。裘沙画绍兴的街镇速写,绘绍兴的河埠头、店铺、骑楼、石桥。裘沙赶集时,遇到一衣衫褴褛者被人按倒在地,有人在旁边起哄。等此人爬起身时,裘沙发现一个活生生的阿 Q 就在眼前。于是,裘沙就一直跟踪这个名叫长生的农民,在马鞍公社接触长生的 11 天,阿 Q 形象在裘沙脑海里活了起来。"长生帮助裘沙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一个从外形到内心世界都活脱脱的阿 Q,长生帮助裘沙

①杭间:《艺术向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年,第 96 页。

②裘沙、王伟君插图本:《野草插图本》(与裘大力合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裘沙画集 鲁迅の世界》,东京:日本岩波书店,1986 年;《阿 Q 正传》(竹内好译),东京:日本岩波书店,1986 年;《裘沙画集——鲁迅文学作品组画》,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7 年;《鲁迅之世界全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年;《鲁迅之世界全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鲁迅散文诗·野草》,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年;《鲁迅论文·杂文 160 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年 ;《莒南之忆 我们的第二故乡》,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年;《鲁迅散文全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年;《鲁迅小说·故事新编》,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年;《鲁迅散文·朝花夕拾》,桂林:漓江出版社,2010 年;《鲁迅小说·呐喊》,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年;《鲁迅小说·彷徨》,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年; 裘沙诠注:《新诠详注文化偏至论》,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 年;《鲁迅杂文·华盖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年;《鲁迅杂文·坟》,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年;《鲁迅杂文·热风》,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年;《鲁迅杂文·华盖集续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年;《鲁迅杂文·而已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 年;裘沙:《陈洪绶研究:时代、思想和插图创作》,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年。

③[法]米歇尔·鲁阿:《〈鲁迅之世界全集〉序言》,顾忆林译,《河北学刊》1998 年第 1 期。

④杭间:《精神的延伸——裘沙夫妇的"鲁迅世界之图"》,《书摘》2000 年第 3 期。

⑤张新:《魂系鲁迅之世界——记画坛伉俪裘沙、王伟君》,《山东画报》1999 年第 12 期。

更深刻地理解阿 Q，使他更有把握地用视觉艺术准确地独特地再现鲁迅的世界。”①从生活中寻找素材、从研读中把握精神、从艺术中创造形象。楼适夷在裘沙鲁迅画册的序言中说：“通过您的这些绘画，我看到您对鲁迅的思想和艺术，是经过深入学习和严肃思考的，不但从您的经历和体验中，非常熟悉鲁迅所写的生活环境与历史时代背景，您还具有一颗赤热的心，用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和力量，去理解，去热爱，去认识鲁迅笔下的人物和他必然走向的道路。阿 Q 岂只是令人悲悯的人物，他使我们见到满身斑剥的创伤，这样的创伤不仅仅存在于阿 Q 身上，也存在于我们随时随地所接触到的人们的身上，甚至在自己的身上，或多或少显明地铭刻着。使我们感到怆痛，感到忧郁。”②

在《阿 Q 正传二百图》中，裘沙、王伟君夫妇以炭笔素描的方式绘画，以他们对鲁迅小说的品读和理解，精心为小说人物造型。裘沙、王伟君夫妇画笔下的阿 Q，更多带有平凡普通的雇农形象特点：偏于瘦弱的身躯，翘起的大鼻子，有点倒挂的双眉，眯缝的小眼睛，短短的下颌上一张撅起的厚嘴唇，宽大的脑门上稀疏的头发，脑袋后拖着一根细细的黄辫子。两位画家以夸张笔触，绘出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小镇雇农阿 Q 的形象，他们是以“平平常常的普通的雇农形象”③进行刻画的。裘沙在《写在〈阿 Q 正传二百图〉出版之前》中说：“阿 Q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没有土地，没有家，没有固定的职业，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他有农民的质朴和愚蠢，但没有一般农民那种对小块土地的留恋，也没有宿命论的重压，没有那种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逆来顺受的坚忍，他在未庄人们的眼中，是一个不安份守己的‘痞子’。面对赵太爷之流对他超经济的剥削（不仅使他只剩下一条万不可脱的裤子，而且连他当小偷得来的赃物也不放过），和精神上的奴役，他并不甘心屈服，然而也无力反抗，只好求助于荒诞可笑的精神胜利法了。”④日本学者野间宏评点说：“画家用皮包骨头的脸庞，毛发稀疏的秃头，锐利的三角眼，还有那一双由于劳动而长得比一般人又大又长的手来刻画他。他那双偶而用来庇护自身，时而搭在头上，时而支着腮，偶而被反手束缚时呈现出掌心的凹痕的手。”⑤裘沙、王伟君夫妇描绘赵太爷的形象：长衫马褂，肥头大耳，洋溢着蛮横与霸气，满脸横肉的脸上一个骄横的大鼻子，两撇飞扬跋扈的八字胡，浓眉下是一双凶狠的眼睛。裘沙、王伟君夫妇描绘假洋鬼子的形象：西装革履瘦削颀长，短发披肩道貌岸然，鼻梁架眼镜，手挥哭丧棒，戴宽边礼帽。裘沙、王伟君夫妇在细致研读文本、深入体验生活中，为小说人物造像，在炭笔速写的黑白对比中，努力抓住人物性格特征，呈现出他们画笔下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高焰在评价裘沙、王伟君伉俪的《阿 Q 正传二百图》时说：“《阿 Q 二百图》的成就，不在幅数多，而在于对原著理解的准，对生活观察得透、



《阿 Q 正传二百图》第 10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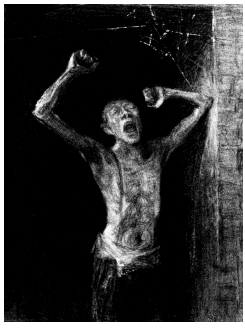
《阿 Q 正传二百图》第 112 图

①袁兵：《受痛苦者渴求美、创造美——记画家裘沙》，《文汇月刊》1986 年第 10 期。
②楼适夷：《不是序言——日本岩波版裘沙作〈鲁迅的世界〉画册序》，《鲁迅研究月刊》1991 年第 5 期。
③裘沙：《写在〈阿 Q 正传二百图〉出版之前》，《学习与研究》1981 年第 3 期。
④裘沙：《写在〈阿 Q 正传二百图〉出版之前》，《学习与研究》1981 年第 3 期。
⑤[日本]野间宏：《鲁迅的文学精神》，裘沙、王伟君：《鲁迅文学作品组画》，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7 年，第 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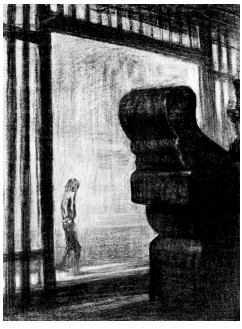
思考得深,把握人物的个性、气质,相互关系以及面貌、体态的特征,用绘画语言进行了灵魂的剖析,发人深省。"①法国学者勒内·于格在《图像的威力》中说:"美术家总是在画中通过对画面因素的选择而揭示自身:通过其注意力的流露,将它集中于何处,引向何处,画家便暗示了内心的倾向。"②可以说,裘沙、王伟君夫妇在为《阿Q正传》人物造像时,把自己对于作品的理解、对于人物性格的把握浸透在画笔中了,由此可以窥见画家伉俪的内心倾向。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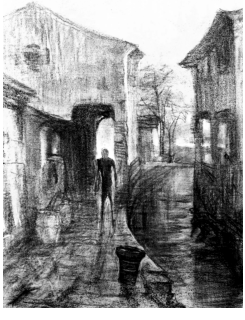
与丰子恺的毛笔简笔画、郭士奇的漫画、顾炳鑫的套色版画、沈原野的线描画、程十发的水墨彩绘、赵延年的木刻版画所采用的创作手法都有所不同,裘沙、王伟君创作《阿Q正传二百图》采用了炭笔素描方式作画。炭笔素描是最古老的绘画方式之一,古希腊就用碳化的柳枝、葡萄枝、胡桃枝做成炭笔绘画,适合于人物描摹和速写,能够产生黑白对比强烈的效果。素描是以某种单色线条和明暗调子表现物象的绘画手段,强调客观地表现对象的本质特征、形体结构和空间位置等。裘沙、王伟君夫妇以大胆的构想,用炭笔素描的方式,在传承中国传统素描手法的基础上,运用西方具有透视特征的素描绘画方式,展现阿Q悲哀的人生。王伟君谈到其创作时说:"我们画阿Q时,感到阿Q像个朋友时时在自己身旁,和他一起感受着他一生遭遇的大不幸。这样进入了角色,肯定他什么,批判他什么,就分明起来,批判也是带感情的。我们的创作,从来都是有感触地画,有生活地画,有感情地画。画完阿Q死去的那张,一种凄凉之感,使人久久不能入睡。"③将阿Q作为一个普通朋友进行刻画,感受阿Q遭遇的大不幸,同情与怜悯阿Q的不幸人生和悲惨遭遇,这也使得裘沙、王伟君夫妇笔下的阿Q更具个性特征。画家将小说第二章描写阿Q生活状态的一段文字拆解为10幅画面,精心描绘阿Q的生活。第1图"阿Q没有家",瘦骨嶙峋赤裸上身的阿Q打着哈欠,从寄寓的土谷祠里走出,阿Q的一条细辫子耷拉在胸口,黑黝黝的土谷祠门楣角上,挂着一张蜘蛛网。第2图"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从土谷祠内描绘门口阿Q踽踽独行瘦弱的身影,通过土谷祠内香案巨大的一角,突显阿Q的渺小与无助。第3图"也没有固定的职业",描绘阿Q在河边拱廊前石板路上孤独的身影。第4图"只给人家做短工",描绘阿Q在富家门口站着吃饭,阿Q背后是富家门口的一条"向阳门第春常在"的对联,画幅右下角是几只撂起来的箩筐。第5图"割麦便割麦",描绘阿Q在河畔的麦地里赤裸着上身弯腰割麦,画幅右边的田埂上是茶罐与茶碗,河畔站着一个送茶的女子,河对岸一株老柳树后一排瓦屋。第6图"舂米便舂米",描绘阿Q在屋内舂米的背影,在一



《阿Q正传二百图》第1图



《阿Q正传二百图》第2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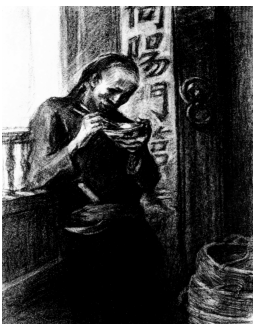
《阿Q正传二百图》第3图

①高焰:《时代哺育的,献给时代的——介绍裘沙和王伟君合作的鲁迅著作插图》,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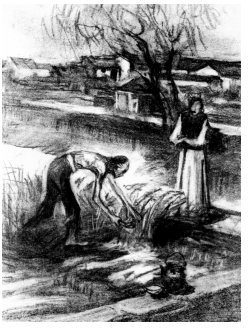
②[法]勒内·于格:《图像的威力》,钱凤根译,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③高焰:《时代哺育的,献给时代的——介绍裘沙和王伟君合作的鲁迅著作插图》,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7页。

扇窗下的石臼前，赤裸着上身卷着裤腿的阿 Q，一根细辫子拖在脑后，在聚精会神地舂米。第 7 图“撑船便撑船”，描绘阿 Q 站在乌篷船头，赤裸着上身双手撑竹篙撑船的身影，船后是横跨河面的一座石桥，画幅右边是连绵的民居瓦屋。画家几乎将每一句都描绘成一幅画，将阿 Q 的勤劳能干形象地呈现出来，为阿 Q 不公平的遭际和悲惨命运奠定了基础。第 43 图描绘“你那里配姓赵”，画幅以夸张变形的手法，画出赵太爷打阿 Q 嘴巴的大手掌，赵太爷义愤填膺的面容，阿 Q 不知所措猥琐怯懦的表情，让遭遇“莫须有”罪名的阿 Q 令人怜悯。第 73 图描绘阿 Q 遭秀才举大竹杠追打，阿 Q 向吴妈求欢遭到拒绝，义愤填膺的秀才举大竹杠向阿 Q 头上打去，画幅上前面是抱头鼠窜的阿 Q，后面是举着大竹杠骂人的秀才。第 178 图描绘阿 Q 被捕，画幅上的阿 Q 双手被绑在背后，身旁几个荷枪实弹戴大盖帽的兵丁，一盏马灯照出了阿 Q 恐怖迷惘的表情。第 195 图描绘阿 Q 被押上法场，画幅中囚车上的阿 Q 双手被反绑，上身套着白色的囚衣，背后插着一块夺命牌，前面有一兵丁开道，阿 Q 身后是几个戴大盖帽荷枪实弹的兵丁。画家以十分同情和怜悯的情感描绘阿 Q 的苦痛与不幸，展示出阿 Q 这个乡镇雇农的不幸人生与悲哀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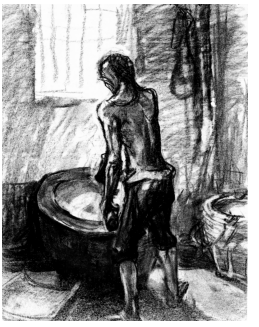


《阿 Q 正传二百图》第 4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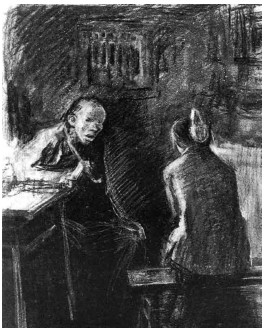


《阿 Q 正传二百图》第 5 图

从东西方素描的传统来看，中国古典素描的传统大多采取线描的方式，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并不注重透视，也忽略光与影的表达，呈现出一种平面的展示。西方的素描注重透视法，强调光与影的呈现，呈现出一种立体化的形塑。法国美术理论家勒内·于格说：“光的作用在造型中是卓越的，在画面的心理内容表现中也不逊色，它指导画面心理内容的解释。”①光在造型中有着表达心理内容的功效。裘沙、王伟君的《阿 Q 正传二百图》，也常常以光线表现心理内容，在光与影映照中呈现连环画沉郁风格。如第 69 图描绘阿 Q 与吴妈在厨房聊天。画幅上左首的桌上有一盏油灯，画幅右边是坐在条凳上吴妈的背影，油灯的光勾勒出条凳的轮廓，也勾勒出吴妈苗条身影和脑后梳的发髻以及吴妈身前灶台的影子。画幅左首是坐在桌前抽烟的阿 Q，油灯的光描摹出阿 Q 的面影和捏旱烟枪的右手膀，让整个黑黝黝的厨房有了一些亮色。如第 92 图描绘阿 Q 与小 D“龙虎斗”后分手。画幅的前面是两个戴乌毡帽看客的背影，画幅左首是挤出人群的阿 Q，身后是挤作一团的看客们，画幅右上方是落荒而逃的小 D，画家让光线投射在阿 Q 身上，其淡色的衣裳和愤然的面影，与深色衣裳和乌毡帽的看客构成强烈反差。如第 89 图描绘阿 Q 知道小 D 谋了他的饭碗唱“我手执钢鞭将你打”，画幅中心是在小巷中举着旱烟枪的阿 Q，他快步走着唱着，光线从背后射来，将阿 Q 的影子投在小巷的青石板上，阿 Q 的身旁和身前几只被惊动的鸡，扑棱着翅膀惊慌地逃窜。如第 126 图描绘闲人



《阿 Q 正传二百图》第 6 图



《阿 Q 正传二百图》第 69 图

①[法]勒内·于格：《图像的威力》，钱凤根译，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 年，第 57 页。



《阿 Q 正传二百图》第 196 图



《阿 Q 正传二百图》第 43 图



《阿 Q 正传二百图》第 136 图

们打探阿 Q 的底细,画幅展现茶馆里茶客们向阿 Q 打探底细,画幅中心是坐在茶桌前的阿 Q,他的左脚踏在条凳上,坐在对面戴乌毡帽的茶客弓背向阿 Q 打探,阿 Q 身后是一戴乌毡帽茶客的背影,光线从左侧茶馆的门口投射过来,阿 Q 的脸面、膝盖和对面茶客的肩头,都被光线照亮。如第 196 图描绘被押上法场的阿 Q 发现了人群中的吴妈,前面是被押解在牛车上的阿 Q,后面是几个戴大盖帽荷枪实弹的兵丁,一头壮硕的牛拉着车,画幅左侧的看客人群中有穿对襟装梳发髻吴妈的身影,从右侧过来的光线将阿 Q 的白色囚服、牛的犄角、吴妈的面影,罩上了几分亮色。在该连环画中,画家的炭笔素描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压抑沉郁的风格,再现了阿 Q 身处的时代和社会氛围,也突出了阿 Q 人生的悲剧意味。

法国理论家米歇尔·鲁阿在谈到裘沙、王伟君的《阿 Q 正传二百图》时说:“阿 Q 画像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张侧着的脸,痛苦但自尊,幼稚中透着机灵,那一巴掌的痕迹还清晰可见。”①在该连环画创作中,画家在写实为基础的构思中,常常以夸张变形来凸显阿 Q 被欺凌的生活。如第 11 图描绘赵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画幅上的赵太爷身着长衫马褂,右手捧一水烟壶,左手背在身后,撅着八字胡,一副志得意满状,身后是他的颀长的文童儿子,在画幅右侧是阿 Q 回望的身影,画幅右下角是一条摇尾乞怜的黑狗。如第 19 图描绘阿 Q 忌讳他头上的癞疮疤,画家以特写的手法画阿 Q 的头和脸,夸大突出阿 Q 额头上的癞疮疤,绘出了阿 Q 的厚嘴唇、坚挺的鼻梁和愤懑的眼神。如第 21 图描绘阿 Q 说“你还不配”。画家用夸张变形的方式描绘阿 Q 的头像——撅起的厚嘴唇、翘起的朝天鼻、眯缝着的眼睛、宽大的额头、大大的招风耳、一只手点着头上的癞疮疤、耷拉在胸前的一根细辫子,绘出了阿 Q 的自尊自大。如第 43 图描绘赵太爷不准阿 Q 姓赵。画家在此幅画中,又将赵太爷画得十分高大,尤其是用夸张变形的手法,绘出赵太爷那只巨大的右手,将阿 Q 绘得瘦弱渺小,可见这一巴掌下去,阿 Q 如何受得了。如第 65 图描绘阿 Q 觉得大拇指和第二指之间特别滑腻。画家以近似于蒙太奇的方式,以特写描画阿 Q 捏着两个指头的手,在旋转的线条中出现小尼姑清秀的脸庞,昭示阿 Q 性意识的萌动。如第 136 图描绘未庄的鸟男女们跪求阿 Q 饶命。画幅左侧是赤裸上身踌躇满志接受跪拜的阿 Q,右下角是几个向阿 Q 跪拜磕头的鸟男女,画家以极度夸张的方式描绘白盔白甲的革命党,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画幅,白盔白甲的革命党如同庙宇门口站立巨大的金刚,横眉怒目挥舞着一把宝剑。夸张变形手法的运用,突显了人物的性格和心态,强化了画家对于人物和情节的阐释。

谈到《阿 Q 正传二百图》时,裘沙曾说:“我见过阿 Q 式的人物,见过他们怎样舂米,怎样割

①[法]米歇尔· 鲁阿:《〈鲁迅之世界全集〉序言》,顾忆林译,《河北学刊》1998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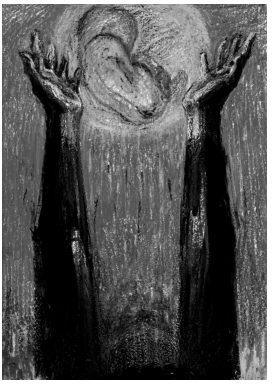
麦，怎样在小酒店里调笑，怎么在戏台下拧妇女的大腿，以至怎样在临刑前叫喊‘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等等。十年浩劫，又使我对阿 Q 走投无路、一步步走上绝路的遭遇感同身受，同时又憎恶阿 Q 似的以报私仇、谋私利为目的的‘革命党’。我遵照鲁迅先生的教导，不以旁观者的立场来看阿 Q，画阿 Q；不以滑稽和哀怜为目的；努力使自己成为阿 Q 的知音，同时又严酷地解剖他身上的毒瘤，希望由此而开出反省的道路来。”①裘沙、王伟君夫妇在构思和描画中，努力从阿 Q 知音的角度把握和描绘，在《阿 Q 正传二百图》的创作过程中，以炭笔素描展现雇农阿 Q 悲哀的人生，在光与影的映照中呈现连环画的沉郁风格；在夸张变形中凸显阿 Q 被欺凌的生活窘态；在同情怜悯中描绘阿 Q 的苦难和不幸；在沉思和反省中展露阿 Q 精神胜利法的弊端。



爱德华·蒙克绘画《呐喊》

四

连环画研究专家李允经在谈到裘沙、王伟君绘画时说：“也因为追求最佳的艺术表现效果，他们将艺术视野扩展至古今中外，贪婪地向一切艺术遗产和民间艺术学习。这样，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对蒙克、珂勒惠支、杜米埃等西方艺术大师技法的吸收；同时，也能看到对陈洪绶、陶元庆以及我国民间美术的借鉴。”②



《阿 Q 正传二百图》第 136 图

裘沙、王伟君夫妇在美术创作道路上博采众长，不仅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传统，更借鉴域外画家的创作手法。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是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他的绘画受到法国印象派的影响，具有浓郁的悲伤压抑的情调和强烈的主观色彩。“蒙克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挪威著名画家，被誉为 20 世纪表现派绘画的先驱。他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带有强烈悲剧意味和感情色彩、描写人类真实心灵的美术作品。蒙克所描绘的世界，是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他刻意表现死亡、忧郁和孤独，描写上世纪末的艺术家在充满矛盾与痛苦的现实中，其孤独的心灵对人生产生的怀疑和焦虑。”③蒙克描画人类复杂的精神世界、悲剧意味和独特的表现方式，为裘沙、王伟君夫妇所赞叹、所接受，蒙克画作《呐喊》奇特的造型和动荡不安的线条，《绝望》忧伤的表达和阴郁深沉的景色，《焦虑》“活着走向死亡”的展现，版画《生之不安》《峡谷》《恐怖》等黑白强烈对比和粗犷的线条，都给裘沙、王伟君以启迪，尤其是他们在以色彩绘画鲁迅作品插图时，常常可以看出蒙克绘画的影子。



珂勒惠支画作《德国儿童在饥饿中》

德国画家珂勒惠支在素描、版画、雕塑等多个方面有所建树，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描画被侮

①王朝闻、裘沙：《关于鲁迅文学作品插图问题的五封信》，《美术》1981 年第 9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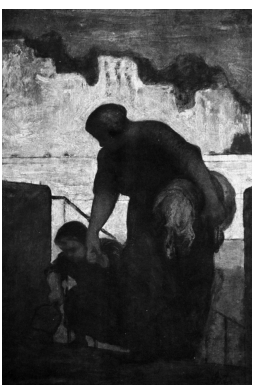
②李允经：《鲁迅的、民族的、现代的——裘沙、王伟君画展观后》，《美术》1996 年第 9 期。

③陈洛加：《蒙克画风·序》，[挪威]爱德华·蒙克绘，王剑等编：《蒙克画风》，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 年，第 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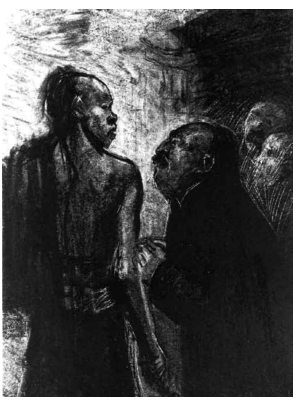
辱被损害者的悲哀、愤怒。她的笔下大多涉及饥饿、流离、疾病、死亡,也有呼号、挣扎、奋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了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浓的同情,把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①“珂勒惠支是版画与素描的天才,她的石版画、铜版画都是在独具匠心的素描基础上创作的。珂勒惠支现存的素描大多是为版画而作的习作或草图,但每幅作品又都是极富感情色彩的素描佳作。”②因此,珂勒惠支的画作被誉为黑白艺术的悲悯诗篇,珂勒惠支在创作中完全拒绝色彩,既不画静物和风景,也不绘美女和人体,她的画作充满了渗入骨髓的悲情。鲁迅说:“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③她的画作《德国儿童在饥饿中》以几个捧着饭碗瞪着大眼睛乞讨的瘦弱孩子的形象,绘出了饥饿中儿童的凄惨与悲哀。她的画作《无家可归》以三个栖息街头无家可归者的形象,绘出了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她的画作《面包》以两个饥饿孩子形象和弯腰饮泣母亲的背影,绘出了生活的艰涩和母亲的无奈。珂勒惠支粗犷的炭笔线条和生动的形象勾勒,影响了裘沙、王伟君的绘画创作,我们能够从他们素描粗犷的笔触和对平民的关注中体味出对珂勒惠支艺术手法的借鉴。



《狂人日记》插图



杜米埃画作《洗衣妇》



《阿Q正传二百图》第22图



陈洪绶《水浒叶子》
一丈青扈三娘



陶元庆设计许钦文
小说集《故乡》封面

法国画家杜米埃是19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讽刺画大师,他的画作执着于对贪官政客的讽刺、对平民百姓的讴歌。“杜米埃出身是平民,一生都同人民密切地联系着。他的作品反映了法国普通人的思考和愿望,号召他们进行斗争,歌颂了他们的英雄主义。”④他在巴黎时常去画塞纳河畔的风光、河畔的洗衣妇、三等车厢里的乘客、田舍间抱孩子的男女,在幽默的笔触中呈现人性的面貌,把他的情感和关爱放在贫苦者处,使人产生怜悯之情。“他的绘画技巧,若细细地研究

①转引自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张光福编注:《鲁迅美术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7页。

②张辉、黄音:《珂勒惠支》,张辉、黄音编:《现代素描十人集》,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③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肖振鸣编:《鲁迅评点古今人物》,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1页。

④[苏联]卡里季娜(Н.Калитина):《杜米埃评传》,杨成寅等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第1页。

起来，带些浪漫色彩的风味。他的版画，用笔十分轻妙，笔触大胆而有力，他用了素描般的很少的笔致，而表现出一种雕刻的肉体和轻逸的风趣。波状的线条，黑和白的强烈的对比，非常和谐，这是他独特的色彩用法，能收到一种惊人的实效。”①他的《洗衣妇》对河埠头牵着孩子上岸洗衣妇的刻画，他的《三等车厢》对车厢里平民百姓形象的描绘，他的《带孩子的洗衣妇》对挎一篮洗好的衣服、带着孩子的母亲形象的描画，都呈现出杜米埃绘画的平民色彩。裘沙、王伟君在绘画中对底层民众的关切、对女性形象的描绘，都受到杜米埃的影响。

陈洪绶是明末清初书画家，擅长人物画，线条简洁流畅，构图丰富古雅，努力凸显人物个性，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堪称一代绘画宗师，其代表作有《水浒叶子》《博古叶子》《九歌图》《〈西厢记〉插图》等，画艺画技为后学所师承。裘沙对陈洪绶有专门研究，其 2004 年出版的《陈洪绶研究—— 时代、思想和插图创作》，对陈洪绶的《九歌图》《〈西厢记〉插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等分别作了专题研究。裘沙评价陈洪绶说：“总而言之，陈洪绶《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之图，……无论从紧密结合的组画整体来玩味，还是一幅一幅地分开来单独欣赏，都很成功。可以说，结构的完整、形象的微妙、内涵的深刻、一以当十的艺术魅力，已经达到以少胜多、别人无可企及的高度。”②在连环画的构图与线条的描绘等方面，裘沙、王伟君的绘画都明显传承了陈洪绶的艺术风格。

陶元庆是现代画家，精于国画和水彩画，也擅长西洋画，师从丰子恺和陈抱一等名家，被誉为新文艺书籍封面设计第一人。他博采众长，融国画、西洋画于一炉，在鲁迅的引导下在艺术设计方面颇具独创性。他曾为鲁迅的《彷徨》《朝华夕拾》《坟》《中国小说史略》《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工人绥惠略夫》《唐宋传奇集》设计封面和装帧，也为许钦文的《故乡》《毛线袜》《回家》《赵先生的烦恼》《蝴蝶》《幻象的残象》《鼻涕阿二》《一坛酒》《无妻之累》等设计封面和装帧。鲁迅曾经评价陶元庆的画：“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尤可以看见他对于笔触，色采和趣味，是怎样的尽力与经心，而且，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又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然而又并不由于故意的。”③陶元庆绘画的中西合璧、创新意识，都给予裘沙、王伟君夫妇的绘画以启迪。

钟惦棐在评说裘沙的绘画时指出：“裘沙开始用木炭作画，很明显地先后受到法国画家杜米埃和德国画家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ilwjtz）的影响，珂勒惠支粗犷的用笔，和一颗郁结而爱抚的心，无疑深刻地影响了裘沙的绘画风格。所不同的，是他更以对描写对象的崇敬，而变化着自己的画风。这崇敬，使他不事浮华，但也不免由此而束缚着自己的想象力，或者说流于拘谨。”④钟惦棐指出了裘沙在学习借鉴中努力形成自己的绘画风格。

日本学者野间宏谈到《阿 Q 正传二百图》时说：“裘沙先生和王伟君先生，把那黑色、那白色，那变化万千的白点、黑点，线和面加以立体的构思，刻意追寻、体味鲁迅的创作意图，把握了这与天空一样广阔与大地一样深沉的文学精神和革命精神，准确地发现了阿 Q 这一形象自身所产生的诗韵，并将其用于对阿 Q 的姿态、形象的描绘上。”⑤虽然裘沙、王伟君夫妇连环画中存在阿 Q、

①王仲章：《西洋艺术家事典》，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173 页。

②裘沙：《陈洪绶研究——时代、思想和插图创作》，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年，第 51-52 页。

③鲁迅：《〈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张光福编注：《鲁迅美术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44-45 页。

④钟惦棐：《呼唤真诚》，裘沙、王伟君：《裘沙画集 鲁迅文学作品组画》，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7 年，第 8 页。

⑤[日本]野间宏：《鲁迅的文学精神》，裘沙、王伟君：《鲁迅文学作品组画》，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7 年，第 4 页。

赵太爷形象前后不够统一、画面过于粗疏不够细腻的缺憾,但是从鲁迅小说《阿Q正传》图像阐释历程来说,裘沙、王伟君夫妇的《阿Q正传二百图》以其炭笔素描的方式,构成了其连环画的独特阐释,成为鲁迅小说《阿Q正传》连环画图像阐释的世纪压轴之作。

Analysis of the Soul Carried Out in the Language of Painting

——On Qiu Sha and Wang Weijun's 200 *Pictures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Yang Jianl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For their 200 *Pictures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he couple, Qiu Sha and Wang Weijun, sought materials from life, grasped the spirit from studying, and created images from art. They elaborately shaped the characters of Lu Xun's novel *The True Story of Ah Q* through their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ir charcoal sketches show the sad life of the hired farmhand named Ah Q, present the strong gloomy style in light and shadow, highlight the bullied life of Ah Q in exaggeration and distortion, draw out the suffering and misfortune of Ah Q with sympathy and compassion, and reveal the disadvantages of Ah Q's method of spiritual victory in meditation and introspection. Their absorption of the techniques of great masters such as Edvard Munch, Kathe Koilwjtz, and Honoré Daumie and their reference to Chen Hongshou, Tao Yuanqing and Chinese folk art made their work the grand finale of the centur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 of Lu Xun's *The True Story of Ah Q*.

Key words: Qiu Sha; Wang Weijun; Ah Q; charcoal sketches; image interpretation; 200 *Pictures of the True Story of Ah Q*

责任编辑:孙秋英

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著作评析*

王卫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116081)

摘要: 有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茅盾研究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90年代的"下滑",到2000年前后"跌入低谷",新世纪20年依然"相对沉寂"。这种看法实则似是而非、轻率武断。通过详细梳理新世纪20年来的茅盾研究著作可以发现,茅盾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史料发掘、文献整理成绩斐然;普及读本、学术专著扎实推进;作品(包括翻译作品)、年鉴、书系、学术史的出版均有突破。这着实难能可贵,也值得总结和珍视。虽然它在学界的影响力减弱了,但这也许正是学术研究的常态回归。沉稳、持续的发展,证明了茅盾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而全面的自我总结和深刻的自我省思,也发现了其自身不足,从而找到创新和突破口。

关键词: 新世纪;茅盾研究;《茅盾全集》;《茅盾文集》;茅盾学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4-0012-13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02

引言

新世纪已走过20年,这20年(2000—2019)的茅盾研究需要梳理。总结经验,不断自我反思,增强自省意识,为研究者提供数据,为下一步研究提供借鉴,是非常有意义的。业内人士一般认为,茅盾研究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以后,到90年代"下滑"①,到2000年前后"跌入低谷"②,到2014年依然"相对沉寂"③。这种看法实则似是而非、轻率武断。仅从公开出版的茅盾研究著作(包括研究资料、普及读物、年鉴、书系,以及众多的学术专著)来看,事实并非如此。21世纪以来的20年,研究茅盾的著作有着可观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多样性的态势,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当我们详细梳理新世纪20年茅盾研究著作以后,这种茅盾研究下滑的观点就不攻自破。

一、史料研究、文献整理成绩斐然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史料、文献、实证受到了研究者格外的重视——从"以论代史"到"论从史出",从重方法到重资料,甚至有淡化思想,凸显学问的

* **收稿日期:** 2020-06-09

作者简介: 王卫平(1957—),男,吉林长春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沈冬芬在《一个时间问题献疑——从"茅盾学"大视野试谈茅盾研究起点的一点浅见》中说:"由于随之而来的茅盾运交华盖,茅盾研究下滑"。见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11辑),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2012年,第632页。

②钟海波、李丹在《2000年春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中说:"与会代表对茅盾研究近年跌入低谷,形成共识,对此大家各抒己见。"见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8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444页。

③钟海波、冯超在《茅盾研究回顾与前瞻学术讨论会暨中国茅盾研究会理事会综述》中说:"本次会议(2014年7月在西安召开)对冲破当下茅盾研究相对沉寂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0期。

倾向,注重掌握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创新突围的表现。这种状况在茅盾研究中也显现出来。一些基础性的文献整理、资料编辑、普及读物、年鉴、年谱、书系等均有新成果,可谓成绩斐然。

(一)茅盾作品包括翻译作品的出版

首先,是新版《茅盾全集》的编纂和出版。由茅盾之子韦韬授权,中国茅盾研究会原副会长、茅盾研究资深专家钟桂松担任主编的新版《茅盾全集》于 2014 年 3 月由黄山书社隆重推出。这是继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茅盾全集》之后又一套《茅盾全集》版本。新版《茅盾全集》在原版《茅盾全集》的基础上加工、补充而成,共 42 卷。与原版本相较,新版本增加了多幅珍贵照片;新收入了茅盾生前未正式发表的、没有收入原版本的笔记、手稿等;新收入了原版本没有收录的、茅盾在古籍注释方面的文章;新收入了原版本在当时因有顾虑而没有收录的茅盾在政治运动中违心所写的批判其他作家的文章;将原版本中同一专题的文章由分散编入改为集中编入;将原版本的"补遗"按内容和写作时间分别编入全集的各卷中;改正了原版本中的一些错漏。可以说,新版本是规模最大、收集最全的《茅盾全集》,为广大读者的阅读和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新版《茅盾全集》借鉴采用了老版的许多内容,其出版后记中也承认:"本版《茅盾全集》的很多工作都是在人民文学版《茅盾全集》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新版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应像老版那样在每一卷版权页标上该卷校注者和审稿人的名字"①。此外,钟桂松还编了《茅盾文集》(全 10 卷),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5 年 12 月出版。

其次,2012 年 1 月,桐乡市档案馆隆重推出《茅盾珍档手迹》,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由《走上岗位》《人民是不朽的》(翻译的苏联小说)《文论》《诗词》和《红学札记》等组成。该书作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全国重点档案编研出版项目,皇皇五大卷,精装设计,精美无比,实为珍藏强档。这项工程的完成,首先应感谢茅盾之子韦韬。他把家中尚存的珍贵的茅盾档案资料,经过整理,全部无偿捐给了家乡——桐乡市档案馆。档案馆研究人员根据这些资料,经过精心整理、研究、编纂,得以出版这套《茅盾珍档手迹》。全书用精美的钢笔字、精细的毛笔字隽秀书写,着实让人敬佩茅盾的书法功夫。该书出版后,反响强烈,先后有多篇介绍和评论文章发表,均给予高度评价。

再次,2005 年 10 月,韦韬主编的《茅盾译文全集》(10 卷)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茅盾从 1917 年到 1949 年在各类报刊上翻译发表的外国小说、诗歌、剧本、文论、政论文以及翻译出版的科普著作单行本等,成为研究茅盾翻译成就的重要文本。该书 2013 年 5 月再版。

(二)有关茅盾的回忆、文献、书信、资料的编辑出版

2001 年 8 月,龚景兴编的《二十世纪茅盾研究目录汇编》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汇集了 20 世纪的茅盾研究目录。2004 年 1 月,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编辑的《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这是茅盾和朋友们的通信集。"该书共收从 1959 年到 1980 年 21 年间茅盾与 49 位友人的 360 余封信,计 36 万字。其中茅盾友人给茅盾的 220 余封通信是初次发表。为了便于读者对通信内容有清晰的了解,该书同时收录了茅盾致朋友的 140 余封信件。"②2004 年 2 月,韦韬和陈小曼编著的《我的父亲茅盾》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魏建:《不求名利,只问耕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4 月 10 日。

②胡洪亮:《〈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出版》,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 9 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第 320 页。

该书从政治生涯、文学追求、亲情、友情等方面回忆和介绍了茅盾的一生，是了解茅盾、走近茅盾的好资料。2008 年 6 月，韦韬和陈小曼著的《父亲茅盾的晚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着重叙写了茅盾一生的最后 15 年，即从“文革”爆发到 1981 年离世的经历，是研究茅盾晚年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的第一手资料。除文字叙述外，该书还配以众多珍贵的茅盾以及家人、亲友的工作照、生活照，以及茅盾的手迹、手稿，还有茅盾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告别、悼念茅盾的照片，珍贵难得。2010 年 12 月，由陈毛英、张蓉主编，西泠印社出版的《茅盾致陈瑜清书信》，收集了保存至今的 68 封书信。2014 年 7 月，金韵琴编著的《茅盾晚年谈话录》由上海书店出版。该书的编著者是茅盾的内弟媳（也是著名茅盾研究者孔海珠的母亲），她 1975 年在茅盾家中做客半年，与茅盾朝夕相处，谈话频繁。这本谈话录就是根据她所记的日记整理而成，还收有茅盾写给她的 25 封信以及孔海珠撰写的《我的母亲与〈茅盾谈话录〉》。这些都是研究茅盾晚年的重要文献资料。

（三）茅盾研究史、研究年鉴、书系等的出版

在 2000 年春季召开的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李继凯就呼唤《茅盾研究史》的写作，指出：“茅盾研究已有 70 多年的历史，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已取得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格局。但其中也存在着明显的遗憾，如迄今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完整和厚重的《茅盾研究史》。”[①]李继凯的呼唤刚刚过去一年，钟桂松著的《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就问世了。这并不是因为钟桂松听到李继凯的呼唤后积极响应，而是在此之前就默默准备，用两年多时间撰写这部研究史，从而确保它在 21 世纪初问世。这是茅盾研究史的开山之作，尽管在此前已有邱文治、韩银庭编著的《茅盾研究六十年》（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0 年），但它还不是严格意义的研究史。因此，钟桂松的这部研究史具有首创之功。凭着他多年研究茅盾的功底和造诣，钟桂松清晰地描绘出 20 世纪近 80 年茅盾研究的发展历程、脉络和格局，分为 7 个阶段即 7 章进行描述和品评。资料的翔实、持论的公允、态度的温和是本书的特色。吴福辉在《序》中说：“研究史的写作，主要在于资料的翔实、全面和对资料评定眼光的准确、生动、犀利。两个方面缺一不可。”[②]用这个标准衡量钟桂松的这部开山之作，实事求是地说，该书在资料方面做到了翔实，但在有些方面还不够全面，不够细致。对所论及的研究成果做到了理解、尊重、宽容，但评定的眼光还不够深邃、犀利，有关研究成果的缺点、局限分析不够，有的研究成果还有所遗漏。

地处茅盾家乡的浙江传媒学院高度重视茅盾研究，不仅于 2015 年 1 月成立了茅盾研究中心（校级科研机构），凝聚了茅盾研究的新生力量，发表了许多令人欣喜的茅盾研究新成果，而且还积极策划、编撰了《茅盾研究年鉴》，迄今已出版了三卷，2012—2013 年卷（张邦卫、赵思运、蔺春华主编，现代出版社 2014 年 12 月出版），2014—2015 年卷（赵思运、蔺春华、张邦卫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 10 月出版），2016—2017 年卷（赵思运、蔺春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7 月出版）。这三卷年鉴很好地梳理了 2012—2017 这六年间茅盾研究的成果，并进行了精心的挑选、甄别，在体例上分为四编：大事记、重要论文、论著评介、论文摘要及索引（2014—2015 年卷还有“茅盾文学奖研究”一编），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茅盾研究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功不可没。

①钟海波、李丹：《2000 年春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 8 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年，第 449 页。

②钟桂松：《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 页。

2014 年 7 月,由钱振纲、钟桂松主编的《茅盾研究八十年书系》在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收录了 1931 年以来已公开出版的茅盾研究著作 46 种,新出版的著作 3 种,即李继凯的《“师者”茅盾先生》、李广德的《茅盾及茅盾研究论》、崔瑛祜的《左翼文学论争中的茅盾》,共计 49 种。这是一套规模宏大的茅盾研究书系,虽不是茅盾研究著作的全部,但大体涵盖了截止到 2008 年的多数茅盾研究单行本。特别是初版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茅盾评传》和《茅盾论》等已较难寻找,因此,再版更显出它的价值和意义。

此外,还有金宏达主编、钱振纲编的《茅盾评说八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年版),它可以和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邱文治等编著的《茅盾研究 60 年》(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0 年出版)遥相呼应。这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评说书系”之一种,体现了整套书博采史料、多元声音、反映学界风云、具有人文情怀的总体精神。该书分为“忆念”“钩沉”“争鸣”“论列”“研究综述”五个板块,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茅盾传略和茅盾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全书力图把茅盾评说 80 年,浓缩在一本书中,具有一定的覆盖性。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很难在一本书里较为全面地反映 80 年茅盾研究的历史和研究成果,许多学者的高水平论文、专著都没能收入,留下了难以避免的遗憾。

二、普及读本、学术专著扎实推进

除茅盾作品、文献资料、年鉴书系的编辑出版外,茅盾研究著作的出版更是扎实推进。这是茅盾研究的重头戏,显示出很高的学术水准。据笔者统计,新世纪 20 年国内出版茅盾研究著作 50 多部(包括普及性的著作)。这个数字即使与新时期前 20 年相比也没有明显的下滑,应该仅次于鲁迅研究的著作,在“郭、巴、老、曹”研究著作之上。这些茅盾研究的著作,涉及茅盾生平、经历、思想、精神、人格、创作、批评、理论、研究史等方方面面。

(一)普及著作不可小视

普及方面的著作既包括解读茅盾的作品,如潘艳等的《解读〈子夜〉》(京华出版社 2001 年)、孙中田等的《〈子夜〉导读》(中华书局 2002 年)、王科的《〈子夜〉全新解读》(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程光炜的《解读茅盾经典》(山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年)、孔令德的《茅盾乡土作品选析》(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年)等,也包括介绍茅盾各个历史时期生活、经历和家人的,如钟桂松的《与茅盾养春蚕》(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 年)、《茅盾:行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大象出版社 2004 年)、《茅盾和他的儿女》(东方出版社 2007 年)、《茅盾的青少年时代》(海燕出版社 2013 年)、蔡震的《茅盾的青少年时代》(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陈小曼的《茅盾》(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沈卫威的《茅盾》(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年)、新疆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茅盾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王士杰的《乌镇·茅盾》(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年)等。这些著作,有的注重作品阐释,有的注重资料发掘,兼具学术性、通俗性、史料性,对于大众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了解茅盾、理解茅盾的作品起了重要作用。比如,王士杰的《乌镇·茅盾》以故乡、故居为支点,撑起茅盾的人生履历和身后的纪念,全书分为老家故居、乌镇的茅盾、时代的茅盾、永远的茅盾等四部分内容,线索清晰,图史互动,以简驭繁,雅俗共赏。

(二)生平、传记研究成果丰硕

21 世纪以来,茅盾的生平、传记研究收获颇丰。先后有郑彭年的《文学巨匠茅盾》(新华出版社 2001 年)、钟桂松的《茅盾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余连祥的《逃墨馆主——茅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钟桂松的《延安四年》(1942—1945)(大象出版社 2009 年)、刘屏的

《茅盾画传》（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孙中田的《图本茅盾传》（长春出版社 2011 年）、钟桂松的《茅盾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商昌宝的《茅盾先生晚年》（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4 年）、钟桂松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等。余连祥的《逃墨馆主——茅盾传》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种，用 10 章 20 万字的篇幅描述茅盾的一生，颇有新意。该书称传主为“逃墨馆主”，颇有意思，作者在第 6 章作了说明。它源自 1931 年 1 月，郑振铎将已完成的《子夜》部分篇章，以《夕阳》为题编入《小说月报》第 23 卷新年号，署名“逃墨馆主”。因“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被炸毁，新年号未能问世，《子夜》的连载计划也就落空。对于署名“逃墨馆主”，茅盾在回忆录中说：“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杨，则归于墨。杨即杨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杨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杨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①显然，“逃墨馆主”意在表明茅盾是“逃墨（黑）追红”的。作者用“古典化”和“平常心”塑造出一个真实可感的茅盾形象。通过充分占有史料，认真考证出传主一些尚未清楚的问题，不美化、也不亵渎传主。比如，充分占有史料，通过详细考辨，证实了茅盾是主动脱党的，从而推翻了以前的“叛党说”和“被动脱党说”。再比如，通过对秦德君回忆录的细读、辨析，参照韦韬、陈小曼的回忆文章，证实了秦德君的“莎乐美”情结。这些都是本书的新意所在。

孙中田的《图本茅盾传》和钟桂松的《茅盾评传》是两本厚重、扎实、丰满的茅盾传记。两位作者虽是属于两代学者，但都有 30 年以上的茅盾研究经历，在此前都有茅盾传记出版，都有丰富的资料占有。孙中田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茅盾研究的资深学者，国务院审批的博士生导师。他对茅盾及其创作有过深入的研究，本书用图文结合的方式记述了茅盾一生的光辉业绩和高风亮节，对茅盾重要作品的解说得体、到位，全书以厚重见长。钟桂松是茅盾家乡的研究者，对浙江山水、吴越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在写作此书前，已经有十几部茅盾研究的著作问世，包括茅盾传记，这使他在有关茅盾生平、经历等文献、史料的占有和掌握上无与伦比，再加上他对浙江山水、历史、文化、人文了然于心，就使其《茅盾评传》的撰写具有了双重优势。这在本书的第一章“江山之助”中就鲜明地体现出来，“吴越文化的浸淫”“水乡乌镇的滋养”“平民大家庭”的环境、“以母亲为中心的女性世界”——这一节节的标题把读者带到了江南水乡，把传主置身于江浙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的语境中，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该书正是以史料的丰富、描述的细致取胜，篇幅也比《图本茅盾传》长。不少史实、史料、轶事、细节等都是其他版本的茅盾传（或评传）所没有的。在评价上，以客观、公允、宽容见长，只是在经典文本的介绍、解读和阐释上稍显不足。

钟桂松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和商昌宝的《茅盾先生晚年》各自选取了茅盾一生中的早期和晚期展开研究，都有着不平常的意义和价值。茅盾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是钟桂松几十年来一直在思考的课题，商务印书馆的十年是茅盾一生起步的十年。正如钟桂松在本书的《自序》中所言：“商务印书馆，在茅盾一生中至关重要。没有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就没有革命家沈雁冰，也没有文学巨匠茅盾，更没有他为中国革命和人类文化做出的重大贡献。没有商务印书馆工作和学习的十年，就无法想象后来的沈雁冰（茅盾）。”该书在茅盾入职上海商务印书馆 100 年之际，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出版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茅盾先生晚年》是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策划的“名人晚年书系”之一，商昌宝是茅盾研究的青年学者，后起之秀，近几年多有茅盾研究的文章见诸报刊。这本书，按照作者的立意，主要不在续写茅盾传记（晚年），而是对茅盾的

①余连祥：《逃墨馆主——茅盾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47 页。

晚年进行分析、评论和反思。所以,它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编年式地描述茅盾晚年的经历和所走过的道路,而是选取几个时间节点,抓住几个实例和关键问题,如1949年元旦、思想改造的轨迹、在政治风浪中的表现、难以为继的创作、亲苏、反美等,由此透视他作为文化部长、政协副主席这样一个公权力者以及新文学家、文化精英等身份的深层心理。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其中可能涉及到的批评甚至讥讽,也不是针对其个人道德、品格的成见,而是一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针对昔日的'公仆'、公众人物给予民主的监督和评议,或者也可说是对其进行一种'长焦距'的'历史透视'。"①作者在描述历史事实过程中的评议和历史透视,不时地彰显作者的思想锋芒,这也许是本书的精彩处。但批评性的反思甚至反讽未能做到"了解之同情"②。

(三)整体研究、综合研究大气厚重

首先,这在山东学者的研究中鲜明、突出地体现出来。丁尔纲的《茅盾:翰墨人生八十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是一部带有传记性质的整体研究、综合研究的力作。该书既"穷本溯源"了茅盾的国学、西学、传统、现代等思想文化渊源,又追踪、论述了茅盾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活动。丁尔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茅盾研究的资深先辈学者,曾参与发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茅盾研究会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多部茅盾研究专著问世,其中,41万字的《茅盾的艺术世界》和66万字的《茅盾评传》都堪称茅盾研究的"扛鼎"式的鸿篇巨制。翟德耀也是茅盾研究的前辈学者。他的《走近茅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虽然是一本学术论文合集,但正如朱德发所评,该著"紧紧围绕几个专题展开",是"一本有份量的书。"书中的研究涉及茅盾早期的新女性观、婚恋观、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理论贡献以及作品中时代女性的文化、心理透视;茅盾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观、早期译介外国文学的特点、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关系;茅盾与新文学的民族化建设;茅盾的散文与历史小说创作等诸多问题。该书微观、中观、宏观研究兼而有之,充分体现了研究者取精用宏、求真务实的精神。朱德发在序言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本书在总体上"显示出相当高的学术水准、新颖的思想风貌和明睿的智慧风采以及锐意求新而又严谨扎实的治学作风"。③ 书中的文章当初在学术刊物发表时,在茅研界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其中多篇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该书出版后,有多篇书评予以肯定。2014年,翟德耀又在《走近茅盾》的基础上,完成了作为《文苑踏青》三部曲之一的《茅盾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篇幅由原来的22万增至35万字。该书由6个专题组成,既有茅盾总论、茅盾文学思想论,也有茅盾创作论、茅盾研究论,延续了《走近茅盾》的稳健扎实、圆熟老道的文格和文风,被评论者称为"厚重之作"。朱德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德高望重,卓有成就,在茅盾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树。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与翟德耀等合作出版了《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新世纪以来,他的《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对茅盾研究多有涉及,比如,高度评价茅盾在民族化、现代化这两大中国文学坐标上所作出的独特贡献,是高屋建瓴的力作。上述成果,后来均被收录于10卷本《朱德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的第1卷和第7卷中。

其次,桑逢康的《大家茅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看似传记,实则是文学巨匠茅盾的创作论、作品论。桑逢康是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高手,曾写过《郁达夫传——感伤的旅行》《郭

①商昌宝:《茅盾先生晚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11页。

②魏建:《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③朱德发:《〈走近茅盾〉:一本有份量的书》,《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

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郭沫若全传之一)》《现代文学大师品评》,都是力作,影响颇大。他的《大家茅盾》是作者 1992 年出版的《茅盾的小说艺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扩大、充实,作了增、改、删,变成了新版的《大家茅盾》。全书以 50 万字的篇幅,对茅盾的小说、散文、剧本作了全景式描绘,重在作品分析,并较多引用原文,通过对作品具体细致的分析,使茅盾的艺术成就、风格特点清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书中还说明茅盾等新文学作家所选取和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一种很好的创作方法,曾经创造过辉煌的业绩,至今并未过时。这一点更具有当代意义。

蔺春华、赵思运等著的《21 世纪语境下茅盾的多维透视》(现代出版社 2014 年版),是浙江传媒学院茅盾研究中心和桐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编撰的“茅盾研究丛书”之一。它是一部由多人完成、涉及多个领域、体现多维透视的综合研究成果。全书分为四编:茅盾的人格解析、茅盾的艺术成就、茅盾的学术贡献、茅盾文学奖研究。作者站在新世纪高度,就这四个主题展开深入、细致的解析,体现了多维性和丰富性。第一编将茅盾放在广阔的政治舞台,从文学与政治间的挣扎、与王蒙进行比较、晚年心境的揭示、对鲁迅的误读等方面,完成对茅盾精神人格的阐释,不为贤者讳;第二编通过对《蚀》《野蔷薇》《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子夜》等作品的各自新颖角度与方法的解说,体现茅盾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是对老课题的新解说;第三编“茅盾的学术贡献”;通过典型个案论及了茅盾的古典文学研究、对《楚辞》的神话学阐释以及现代戏剧批评观;第四编对茅盾文学奖历年的获奖情况、获奖作品以及作家、媒体等作了论述。总之,书中内容较为丰富,体现多维。但作为论文集性质的专著,特别是由多人完成,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缺乏体系性、内容的连贯性和内在的逻辑性,尽管编成四个板块,而实际内容还是显得“散”,缺乏整体的学术思想和统一的学术见解。

再次,王嘉良的《理性审视: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茅盾》(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是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作者历时 5 年,完成了这部 32 万字的精品力作,无疑是新世纪茅盾研究的重要收获。该书有作者自己特定的研究视角,即围绕对茅盾的“误读”引发深度思考,将茅盾置于 20 世纪中国复杂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审视和分析。这在作者看来至关重要,因为“作家评价的历时性差异,常常来自不同时期文学或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亦受制于人们审视文学问题采取不同的评判标准”,“以往对茅盾的评价出现强烈反差,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偏离历史文化语境,割裂历史,孤立地、抽象地谈论文学问题和学术问题”。① 这就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全书以 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为切入点,以对茅盾进行正本清源式的阐释为突破点,以还原一个真实的、复杂的茅盾为落脚点。作者用理性审视的态度,重新审视了茅盾的文化选择、政治态度、文学观念、创作方法、文学范型、作品类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作者的深层次解说,厘清了被历史表象遮蔽的许多复杂现象、重要问题。这种还原式的阐释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此外,还要说到钟桂松的新著《茅盾:却忆清凉山下路》(黄山书社 2018 年版)。这是作者近年来茅盾研究最新成果的结集,其内容诚如作者在“序”中所说,“涉及茅盾人生道路的起起伏伏,也涉及茅盾一生交往的方方面面”,还有茅盾在日本、在延安、在桂林的经历,以及茅盾的家世研究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该书资料翔实而丰赡,读来既增长知识,又拓宽视野。

(四)艺术研究凸显本体

从写作艺术、艺术美学、审美理论、创作风格等艺术和美学层面研究茅盾,新世纪以来也有重

①王嘉良:《理性审视: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茅盾》,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 2、3 页。

要收获,它更能凸显文学研究的本体特征和文学特性。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陈桂良的《茅盾写作艺术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曹万生的《茅盾艺术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龄出版社 2004 年)、王嘉良的《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性——论茅盾的创作艺术与审美理论建构》(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年)、庄钟庆的《茅盾的文学风格》(泰国留中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等。《茅盾写作艺术论》系裴显生主编的"21 世纪写作学文库"之一种,从写作学、文章学视角把握文学大师茅盾的写作实践和写作艺术,给读者展示了文章大家的完整形象和独特意义。这是以往研究中所少有的。《茅盾艺术美学》是作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出版的《理性·社会·客体——茅盾艺术美学论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的修订再版。当年的初版本由叶子铭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今天看来,修订本依然是填补茅盾美学思想研究空白之作,仍然后无来者。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 12 章,全面论述了茅盾美学思想的基本框架、理论贡献、得失长短,发人所未发,道人所未道,有创见,有批评,不为贤者讳。修订本除修订外,还增加了上篇的第四章"茅盾与中西文化及当代中国:艺术美现实论",突出茅盾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性——论茅盾的创作艺术与审美理论建构》是王嘉良的力作。在专著方面,早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出版过《茅盾小说论》《茅盾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主编并撰述)《诗情传达和审美构造》等。进入 21 世纪,先后有《艺术范型与审美品性——论茅盾的创作艺术与审美理论建构》《理性审视: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茅盾》等著作,前者分为"艺术范型"和"审美理论建构"两大方面,分别从理性化叙事、经济视角、现实主义创作范式、社会剖析范型以及由此形成的"茅盾传统"进行了深刻论述,揭示了它对中国新文学的"范式""范型"意义以及深远影响,这正是茅盾创作的价值所在,也是本书的认识高度所在。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分别从审美创造论、审美批评论、创作主体论、文学思潮论、小说、散文美学论,以及文化思想渊源展开整合性论述,试图揭示茅盾创作范型的理论支撑,从而厘清茅盾在现实主义审美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这样,本书就具有创作研究、理论研究双重价值。庄钟庆也是新时期茅盾研究的重量级学者,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茅盾的创作历程》《茅盾的文论历程》《茅盾史实发微》,奠定了其在茅盾研究史上的杰出地位。新世纪的这本《茅盾的文学风格》,分"作品篇""文论篇""源流篇",阐述了茅盾作品、文论的风貌和风格。

(五)比较研究成绩不菲

这个阶段的比较研究主要涉及茅盾与鲁迅、老舍、沈从文、郑振铎、瞿秋白的比较等;也有将"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位作家放在一起进行描述的;还有的将茅盾放在中国左翼文学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进行审视等。李继凯的《全人视境中的观照——鲁迅与茅盾比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是一部有份量的著作,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经修改而成,鲁迅研究名家王富仁为之作序并给予充分肯定,孔范今、吴小美、黄曼君、刘纳等现代文学研究资深专家也都给予高度评价。该书采用"全人视境和全人比较"的方法,回避"酷评",选择"慎评",从"全人研究"走向"全人比较研究",对鲁迅和茅盾进行相当全面深入的考察、比较和评析,突出比较研究的全面性,认为鲁迅是新型文化的开路派、前卫派,茅盾是新型文化的建构派、稳健派。书中还批评了当今流行文化对鲁迅、茅盾及文化精英的"围剿"或消解,揭示了鲁、茅"沉重型"的人生样态及其当代意义。王德威的《写实主义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是论述 20 世纪 30 年代写实主义三位代表作家的著作。全书包括"概论"和"结论"共八章,有两章集中探讨茅盾,研究茅盾"历史的建构与虚构""茅盾的小说政治学"等问题。对茅盾及其小说多有拷问和反驳的口吻,虽有一些见解,但较难做到公平公正。作为西方汉学家,其基本倾向与夏

志清的观点有渊源联系。程光炜的《文化的轨迹——“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先后有两个版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 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的起讫时间是 1949—1976 年，后者是 1949—1981 年，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的修订再版。程光炜是论著等身的重量级专家，对现代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均有建树，成果甚丰，影响巨大。这本著作是他思考、回答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之间如何转型的结晶。在他看来，眼下许多中国当代文学史，显然没有把“鲁郭茅巴老曹”等文学大师在当代的思想、文学活动和研究情况考虑在内，给予一定的笔墨，这就使上述的转型有某种突兀之感。这样，本书向人们讲述了这六位经典作家在 1949 年以后的人生境遇、接受、经历的复杂、难言和曲折。作者有意避开写大论文、作大学问的严正、庄重，而是从一个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和细部切入，试图触摸历史的原形态。鲁迅的堂吉诃德式困境、郭沫若的歌德之道路、茅盾、老舍的现实主义之困境、巴金、曹禺的激情主义之受阻等都是通过小故事、小事例呈现出来的，具有以小见大的功效。阎浩岗的《茅盾丁玲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看似两位作家的比较，实则是两位作家研究的合集。不过，在“上编”“茅盾小说研究”板块中，贯穿了鲜明的比较意识，几乎每一章都是在比照中研究茅盾，比如茅盾与沈从文创作方法之比较、社会剖析派与西方的渊源、《虹》与《青春之歌》的互文性比较、茅盾与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贫困叙事、与 20 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等。该书视野开阔，角度出新，创新观点迭出。李明的《茅盾与中国左翼文学论稿（1930—1936）》（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将茅盾放在中国左翼文学中，详尽论证了茅盾与左翼文学的关系、对左翼文学的贡献。将茅盾放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中进行审视，是周景雷著作的特点。周景雷的《茅盾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近 30 万字。作者把茅盾放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在与现实主义、左翼文学、乃至与中外文化渊源的联系中来考察和研究茅盾，从而探讨茅盾的独特性。书中还具体比较了茅盾与鲁迅、茅盾与瞿秋白、茅盾与郑振铎等。该书是一部将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得较好、具有历史感、具有覆盖面、有份量的专著。

（六）其他专著可圈可点

在一些具体研究领域，也有可圈可点的专著。在茅盾小说研究方面，陈建华的《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是一部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的专著。这可能源自作者既是复旦大学的博士，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还在香港的大学任教，因此，其研究的路数与大陆迥然有别。正如该书的内容简介所言，该书对茅盾的早期小说《蚀》《虹》以及《创造》等短篇进行研究，通过文本细读与复杂历史脉络的联结，着重分析女性形象塑造与进化史观、叙事结构的关系，从革命与都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妇女解放与性别政治等视角对作品及其女性形象作出新的诠释。文本细读与跨学科批评的结合是本书的突出特点，指出了茅盾在时代女性形象塑造上的“陌生化”成就及其渊源，读来饶有兴味。梁竞男、康新慧的《茅盾小说历史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是梁竞男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的结项成果，全书 35 万字，张中良作序。这部著作的特色在于，力图在历史主义的视域下来解读茅盾小说与国民革命、“五卅”运动、“八·一三”事变、政治分野、文化视域等的密切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茅盾的一部部长篇小说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出茅盾小说的历史价值。这一点，在以往评价中并未得到深刻揭示。李城希的《〈子夜〉的艺术世界及周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是继 20 世纪 90 年代孙中田的《〈子夜〉的艺术世界》之后又一部专门研究《子夜》的专著。全书四章，25 万字，曹顺庆、王保生分别作序。其中，前言和第四章的主体内容作为两篇文章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第一章探讨了《子夜》的多重文化主题以及审美意义的开放

性、形象群及其形象构成、形象群的来源、塑造方法、艺术意义等问题;第二章研究的是《子夜》的细节及细小问题,如吴老太爷之死、阿萱的形象、交际花的身体表现等;第三章探讨的是《子夜》与通俗文学的关系。认为《子夜》从审美表现内容到人物形象再到意识结构与通俗文学如《海上花列传》之间有着明显的相通之处,并作了详细的列举。在作者看来,《子夜》与黑幕、侦探、才子佳人等通俗文学作品都有密切关系。这是更为新颖的看法,以往似乎没有过,的确是新鲜的。不过,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些牵强,值得讨论和争鸣。

在茅盾的文学批评研究方面,周兴华的《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变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是新世纪以来研究茅盾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是作者博士论文的扩充。在以前,研究茅盾文学批评的专著已有庄钟庆的《茅盾的文论历程》、丁亚平的《一个批评家的心路历程》等,前者侧重纵论,后者侧重心路历程的探索。周兴华的这本论著则着重探讨茅盾文学批评中的"矛盾"现象,上编"同体异象",纵向考察"矛盾"的表征,包括功利之"重",学理之"轻"、前后不一、厚此薄彼、"门内"与"门外"、两极言说等。中编"内外冲突",探讨茅盾文学批评的"显"与"隐"、复调意味的言说、意义的强调与美的缺失、理性的困惑与矛盾的表达等。下编"前因后果",分析"矛盾"的成因与价值重估,重点是对茅盾文学批评中"矛盾"的发生学分析。书中还认为,茅盾的文学批评经历了"用心摸索渐入艺术之门"到"倒退走向艺术门外"的历程,以进入左联为界,后期的"艺术感悟能力日渐退化"。这种对茅盾文学批评的过低评价、否定评价使不少评论者"不敢苟同""不可思议"甚至认为是"痴人说梦"。①

在茅盾人格研究方面,丁尔纲、李庶长合著的《茅盾人格》(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是这方面唯一的著作。作为茅盾研究的两位先辈学者,他们怀着对茅盾的敬意、甚至崇拜,述说茅盾的人格魅力。全书共七章,分别从茅盾人格的形成以及思想品格、道德品格、政治品格、创作品格、学术品格、编辑家评论家品格展开具体论述。从具体的章节看,有些内容是否属于人格的范畴似乎大可商榷,作者将茅盾在政治、创作、评论、学术等方面的所有的正面的品格、特点、表现都放在"人格"的框架下,也就把"人格"的内涵泛化了。当然,如果不这样综合、泛化,也较难构成专著的规模和格局。

三、自我省思与创新突破

通过以上对新世纪 20 年茅盾研究著作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茅盾研究成果并不少,此外还有这里没有总结的大量的茅盾研究论文。从中可以看出茅盾研究并不是"相对沉寂",也不是"下滑",更不是"跌入低谷",而是平稳、持续地发展,这正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没有人为的制造热点,没有"放卫星",没有"酷评"和"恶搞",而都是以"慎评"的态度作各自的学术研究。虽然它在学界的影响力弱了,但这也许正是茅盾研究的常态体现。人们往往怀念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茅盾研究的轰轰烈烈,但那有特定的时代原因和时间节点。1981 年茅盾逝世,"盖棺定论"提到日程,而党和国家的最高规格、最隆重的悼念和高度评价直接推动茅盾研究的成长和对茅盾文学业绩的崇高评价,茅盾研究出现了高峰和辉煌。然而,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任何一个学术研究对象都不可能总是处在高峰或辉煌,而是起伏消长,呈现的是一条曲线。新世纪 20 年的茅盾研究,虽构不成高峰,但从学术著作到科研立项,从普及读物到研究资料,这个时段的茅盾研究,

①沈冬芬:《近六七年来茅盾研究(论著部分)述评》,中国茅盾研究会编:《茅盾研究》(第 12 辑),新加坡市: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社,2013 年,第 273-286 页。

可以说是沉稳扎实的时段，是视野开阔、多方透视、多元发展的时段。其中，不乏严厉的批评，也不乏学术新见。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都是本着探讨和解决学术问题，即使是严厉的批评，也都是摆事实，讲道理，力图给自己的观点找到根据，从而使自己的看法能够自圆其说。比如，关于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变奏、关于茅盾晚年的尴尬、独立思考的缺失、“正能量”的缺乏、《子夜》与《海上花列传》的明显相通、与才子佳人、黑幕、侦探小说的密切关联等。这些观点，我们可能不赞同，不认可，但不能不允许它们存在，只要它们不是恶意的诋毁和人身攻击，就应该尊重、珍视，这是应有的学术气度和胸怀，也是对学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

从新世纪 20 年的茅盾研究著作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老学者笔耕不辍，像孙中田、丁尔纲、王嘉良、钟桂松、李继凯等资深学者都有可观的、令人赞赏的茅盾研究专著，既实现了对茅盾研究的创新突破，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挑战超越；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像商昌宝、梁竞男、李城希等都是茅盾研究的新秀，显示出茅盾研究后继有人，也预示着茅盾研究的发展后劲。梳理近 20 年茅盾研究的著作，不能不特别提及茅盾研究的资深学者、著名茅盾研究家钟桂松。多年来，他勤奋刻苦，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茅盾研究著作 20 部，其中 21 世纪以来就有 14 部，令人叹为观止。这些著作既有学术性的，也有普及性的，还有学术性和普及性兼而有之、紧密结合的，涉及茅盾生活和创作的方方面面。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业绩。钟桂松可谓茅盾研究史上的“劳动模范”。这些著作几乎每一部都有丰富的史料作支撑，很多史料在当时以至后来都是鲜为人知的。不少著作具有填补空白性，比如《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悠悠岁月——茅盾与共和国领袖交往实录》《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等，具有开创之功。

应该说，21 世纪以来的学术生态并不令人满意，甚至存在严重的问题。比如，项目化驱动，使研究课题越来越走向宏观、宏大，大而化之，甚至空洞无物。同时，项目化追求和驱动，也迫使研究者从选题到观点刻意求新，为创新而创新。一方面，这使有些研究貌似创新，实则缺乏学理依据和研究价值。这种学术生态，不利于像茅盾研究这样传统老课题的发展和推进。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老课题、名家、名著的研究较难出新，也迫使研究者在选题上不得不从本学科的中心滑向边缘，于是，悬置名家，搁浅经典，研究的陌生化、边缘化、碎片化自然显露出来。这也不利于茅盾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下，茅盾研究能取得如上成绩，着实难能可贵，我们应该珍视。

总结过去，是为了现在和将来的发展。看到不足，才能更好地前行。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有值得思考、值得研究的问题和空间。应该说，像茅盾这样的作家研究，和鲁迅研究类似的是渐次走向“高原”，面对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影响的焦虑”将愈加强烈和明显，创新和突破将变得越来越艰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研究冷清、成果减少也属正常现象。但这不能成为满足现状的理由，因为创新是学术的生命，研究、探索未知仍然是学者的责任和使命。研究道路虽越走越艰难，甚至窄化，但仍需奋力前行，仍需创新开拓。

茅盾研究的新发展、新开拓，从专著方面来说，我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对茅盾所开创的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以及所形成的艺术范型、范式和人们对它的接受和影响值得进一步梳理。以往，王嘉良、李标晶、王中忱、汪亚明等学者对此已多有研究，但仍需继续拓展。要以回到基础、回到原点、不忘初心的姿态对茅盾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独特内涵、特征、价值、意义、影响究竟怎样进行还原式的、实证式的研究。人们说，现实主义是开放的，是说不尽的，无论中西；现实主义也是有多种品格、多种风格的，无论古今。那么，茅盾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是可以穷尽的，还是说不完的？是过时的，还是经典的？他的现实主义和中外其他作家的现实主义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近几年，在文学理论和批评界有一

种重估现实主义的鲜明倾向,人们重估《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呼吁要重建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精神。那么,茅盾的现实主义在我们重建现实主义的路上有没有启示和借鉴意义?是不是前车之鉴?这些都需要在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格局中,在与现代、当代文学的联系中好好地辨析一番,总结一番。

第二,对茅盾翻译研究尚需突破。茅盾不仅是作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是翻译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均有建树,洋洋 10 卷本的《茅盾译文全集》就是明证。其内容异常丰富,有中短篇小说、散文、剧本、诗歌、文论、政论、科普著作等,译文所涉及的国别有美国、俄国等 3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名作家。就总量来说,《茅盾译文全集》与《鲁迅译文全集》大体相当。鲁迅研究家王得后说,研究鲁迅的人是非读《鲁迅译文全集》不可的,因为鲁迅一生致力于翻译。同理,研究茅盾的人也应读茅盾译文,因为茅盾一贯重视翻译,在翻译理论、翻译思想上有颇多建树,如关于直译、转译、复译,关于翻译的标准、原则、方法等都有精辟的论述。以往,我们对茅盾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茅盾翻译特点和成就的总结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体现在研究论文上,但从专著层面系统、全方位地梳理还是个空缺。比如,茅盾学习和精通外语的情况、茅盾翻译文类的系统梳理、涉及的国家、民族、语种的情况、翻译选择的用意和目的、翻译文本的特点、效果和影响力如何,等等。期待着这方面研究专著的问世。

第三,茅盾年谱、研究年鉴、研究史的编撰还可加强。几年前,钟桂松在文中就曾提出"希望有一部完备的《茅盾年谱》",虽然"现有万树玉本、查国华本、唐金海本,这些'年谱'对推动茅盾研究都有积极贡献,有开创、开拓之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史料的出现,在时间上和内容上有不少地方需要增补"。① 笔者完全赞同。虽然唐金海、刘长鼎主编的《茅盾年谱》在篇幅上已达 136 万字,但由于编撰较早(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内容驳杂,撰写仓促,错误较多,再加上近 20 多年新资料、史料的发掘,的确应该修订、补充。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也是需要认真和体现真功夫的研究工作。我们欣喜地看到,蔺春华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茅盾年谱长编》已成功获批,不久,这部新的年谱长卷就可问世。茅盾研究年鉴的编撰,浙江传媒学院的学者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希望向前追溯,向后延伸,形成完整的年鉴体系。茅盾研究史的编撰,目前虽有邱文治的《茅盾研究六十年》和钟桂松的《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且后者是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但都属"初论之书",应该在钟桂松的《二十世纪茅盾研究史》的基础上,编撰出新的茅盾研究史来,将新近 20 年的研究纳入其中。研究史和文学史一样,可以有多种,可以有不同观点、不同体例、不同侧重的研究史,这样,才能呈现出茅盾研究的全貌,这也是需要花大气力的,来不得投机取巧。

第四,茅盾的接受、传播史的研究也有可为。在接受、传播学的视域下搜集、整理相关史料,包括茅盾作品的版本、版次、印刷数量、改编、大众接受及其形式、海外翻译、收藏,等等。这方面既包括内地的接受、传播史,也包括在中国的港澳台地区和东西方各国的接受、传播史,将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结合起来,可以写出有价值、有意义的著作来。

结语

新时期以来,茅盾研究 40 年,可以说,前 20 年轰轰烈烈,有热点,有争论,也有酷评和轰动效应。后 20 年扎扎实实,研究渐趋沉稳。从热闹到沉静,正反映了茅盾研究以及其他许多研究领

①钟桂松:《关于茅盾和茅盾研究的几个问题》,《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5 年第 4 期。

域的正常学术历程和发展走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茅盾研究的发展态势，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晴雨表，一个典型个案。新世纪 20 年的茅盾研究，与其说是“相对沉寂”，不如说是常态发展。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获得了充分的理由和例证；在这 20 年，新、老学者笔耕不辍，普及、提高并行不悖，史料研究和学理阐释并驾齐驱，共同营造了茅盾研究的新格局。研究的不足和尚需拓展的空间仍将激励研究者继续探索、孜孜不辍。

Analysis of the Works on the Studies on Mao Dun in the New Century

Wang Weipi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81)

Abstract: People in the academia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studies on Mao Dun has witnessed the glory of the 1980s, the “downturn” of the 1990s ,“hitting rock bottom” around 2000, and still “relative quiet” in the 20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This view is somewhat plausible, rash and arbitrary. However, it does not stand when we carefully analyze the works on the studies on Mao Dun in the recent 20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Looking back on the 20 years of the studies on Mao Dun, we a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fruitful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exploration and document arrangement, steady progress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reading books and academic monographs, breakthroughs in the publication of works (including translated works), yearbooks, book series, and academic history. This is indeed commendable, and is worth summing up and cherishing. Although its influence in academic circles has weakened, this may be a normal state of academic study. The stead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es the influence and vitality of Mao Dun. The comprehensive self-summary and deep self-examination have found the shortcomings, and thus found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s.

Key words: new century; studies on Mao Dun; *Complete Works of Mao Dun*; *Collected Works of Mao Dun*; Mao Dun studies

责任编辑：孙秋英

“南方”的重构与先锋的续航
——兼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

刘　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 《黄雀记》被认为是苏童的“标签”之作,续写着“香椿树街”写作母题与重构“南方”叙事美学。与其以往青春成长主题小说相比,时代的变化、转折与青春成长叙事的钮结,是理解小说的关键。“丢魂”与“捆绑”具有高度的象征化和丰富的隐喻色彩,丢魂和碎片化的社会现实,仿佛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遍的心理症候和时代精神肖像。在原有写作母题和叙事美学基础上,苏童完成自我克服和超越而继续提供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较为清晰的情节线和反线性因果逻辑关系的叙事并呈,作家继续摸索自我与世界与现实的关系,意象密集、诗意的代入、破译图像而生的画面感等,共同生成无可言说的小说质地;以及建基于人性复杂性和突破公共文学观之上的作家的“自我放逐”文学观,与自由的“小说王国”的构建——都标示着作家先锋续航的写作能力和《黄雀记》作为经典作品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 “香椿树街”叙事;南方的重构;无可言说的小说质地;“自我放逐”文学观;先锋续航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4-0025-14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03

《黄雀记》[①]最初刊于《收获》2013年第3期,后出单行本——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苏童认为是自己的“标签”之作,“香椿树街的故事我写了很多年,围绕这个地方我也写过一些不成熟的作品,《黄雀记》是香椿树街系列中最成熟、最完整的一部长篇小说,我个人认为,它也是我的香椿树街写作的一个重要标签”[②]。虽然作家的说辞不应该被研究者和评论者过于地迷信和笃信,但苏童似乎应被视为一个例外,他对创作有着自己很多精到的见解,他的评论其他作家的文章也总是能够摸得作家作品的“命门”,比如他评论王安忆的《长恨歌》[③],他的创作谈和与研究者评论家的文学对谈,等等。所以,评论家程德培在评论苏童《黄雀记》的时候都禁不住说:“我更坚定了一种看法,苏童是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一位自我阐释时常超越他人阐释的作家。”[④]由之,苏童的自我评价——《黄雀记》是自己“香椿树街系列中最成熟、最完整的一部长篇小说”和“香椿树街写作的一个重要标签”——恐怕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一个观点了。

一、“香椿树街”写作母题与“南方”的重构

“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一直被目为苏童创作的两个显明的地理标签,确切地说,苏童创

* **收稿日期:** 2020-04-12
作者简介: 刘艳(1976—),女,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编审,博士。
①该文所引《黄雀记》引文,参见苏童:《黄雀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
②行超:《苏童:写作是一种自然的挥发》,《中外交流》2015年第8期。
③苏童:《王琦瑶的光芒——谈王安忆〈长恨歌〉的人物形象》,《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5期。
④程德培:《捆绑之后——〈黄雀记〉及阐释中的苏童》,《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

作了大量的悬浮于“枫杨树乡”乃至“城北地带”“香椿树街”的文本故事。苏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造的当然是香椿树街……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①。“香椿树街”已经远远不是南方城镇上的普通的小街，苏童的“香椿树街”故事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和文本世界，也引起了研究者一直的关注和饶有兴味的统计。研究者在 21 世纪初就已经意识到，“香椿树街”已构成庞大家族的小说叙事，给读者脑海中形成影影绰绰的印象，这是一条南方城镇上的街道，但就像沈从文笔下“湘西”、莫言所写“高密东北乡”、迟子建建构的“白山黑水”“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一样，是纸上的寓言世界，“一个空间和年代的标记”。

“香椿树街”文学叙事，在近 20 年前统计就有六七十万字的体量，在苏童小说中至少占比三分之一。从《桑园留念》（1984）开始，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南方的堕落》，到 90 年代初的《刺青时代》和以及《城北地带》，苏童一直在继续着“香椿树街”文学叙事的写作。苏童自称这是他的“自珍自爱之作”。数量丰赡的以香椿树街故事为主题的短篇小说，加上一些长篇的篇章，香椿树街的人物出现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像小拐、红旗、美琪、王德基、彩袖、春耕、锦红等；打上了香椿树街地域印记的或面孔模糊或特征清晰的人物，各色小市民、市井人物、成长中的男孩和女孩、散发着青春成长荷尔蒙的香椿树街少年，等等；苏童小说文本中的香椿树街，于生活日常中又凸显着各种古怪、不寻常甚至是稀奇的事件，香椿树街的景致是既日常又特别的，“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的灵魂……”②，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城市边缘地带的特有景观。所以说，在当代的作家中还没有哪一个能够像苏童这样如此丰富地书写出一个城镇生活的风俗图画，当代的图画。据张清华统计，截止到 2001 年，苏童写“香椿树街”的故事，已经有六七十万字的样子。③ 而到了 2014 年左右，据研究者统计，以“城北地带”和“香椿树街”为主要背景的“南方”文学叙事，由近 300 余万字的小说文本组成。从最初的成名作中篇小说《妻妾成群》《红粉》，以及《1934 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到长篇小说《城北地带》《我的帝王生涯》《蛇为什么会飞》《河岸》《黄雀记》等，还包括大量杰出的短篇小说，除极少数作品外，基本上都以“城北地带”和“香椿树街”为背景。④

苏童小说中以“香椿树街”为主体的“南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南方呢？与现实故乡相比，恐怕更是一个文学原乡和精神原乡。王德威早在 1998 年就说：“苏童擅写过去的时代，更善于把当代也写成了过去，实在是因为他因循约定俗成的文学想象，赋南方予‘旧’生命。”⑤在王德威看来，枫杨树与香椿树构成了巴赫汀所谓时空交错的地缘背景，擅写“南方的堕落”和父老们“颓败的行径”，是王德威的结论。而后来的研究者也在思考苏童重构一个外乡人和本地人双重视角下的文学“南方”的意义。苏童用绵延了 30 余年的有关“香椿树街”和“城北地带”的小说叙事，以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回力球鞋少年、纸马少年，等等）眼睛的逼视，以及有关家族历史，暗含着

①傅小平：《苏童：充满敬意地书写“孤独”》，《文学报》2013 年 7 月 25 日。

②苏童：《自序七种》，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陈晨编选：《苏童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45-46 页。

③张清华：《天堂的哀歌——苏童论》，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陈晨编选：《苏童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355 页。

④张学昕：《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文学评论》2014 年第 3 期。

⑤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陈晨编选：《苏童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年，第 317 页。

暴力、逃亡、死亡和欲望等种种人性的故事书写,勾勒出了一条文学“南方”的文化经济和人文历史的脉络——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迄今已近百年。这条脉络里,凸显着“南方”浓重印记的人物的命运沉浮和精神心理变迁。围绕香椿树街小说叙事,彰显出一种“南方”精神特征和地域文化特性的文本氛围。苏童以小说对“南方”不断重构,在不断“重构”南方中进行着先锋的转型和续航,可以说苏童对于“南方”的重构,逶迤至今。为苏童小说文本所不断重构的“南方”,被认为是近长江流域和以江浙为中心或地域特征的“江南”。在地域上“江南”或许可确切为:包括了苏、松、杭、太、嘉、湖地区。盛唐、南宋以降,强烈的阴性文化色彩和诸多地域因素,在文化地理上“完成”并形成了迥异于北方以及其他地域的文化症候和生活气息。①

在王德威看来,城北的香椿树街:“这是苏童纸上的第二故乡,绝大部分小说的发生地点。城北地带是个龌龊肮脏的区域,前清曾是厂狱行刑的所在。主要的街道香椿树街空负虚名,一棵香椿树也没有。”②苏童自己也说:“我从来不认为我对南方的记忆是愉快的,充满阳光与幸福的。我对南方抱有的情绪很奇怪,可能是对立的,所有的人和故乡之间都是有亲和力的,而我感到的则是与我故乡之间一种对立的情绪,很尖锐。在我的笔下所谓的南方并不是那么美好,我对它怀有敌意。”苏童一直持有“敌意的南方”的叙事美学。隔空望去,他小说中的人物之间总是有着一种隐隐的紧张关系。《河岸》里库文轩、库东亮父子,《城北地带》里王德基、小拐父子,等等,彼此之间皆充斥着紧张与隔阂的关系。

这种暗含着紧张和隐隐的敌意的人物关系,在《黄雀记》里面继续着。小说里,不仅保润有着以往“香椿树街”少年青春期特有的敏感、自尊与自卑,而且三个主人公保润、柳生和仙女之间的敌意同样存在,贯穿小说始终。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保润都会去一次鸿雁照相馆去跑腿取祖父每年照一次的“遗照”——误取了一个少女的照片,“她不笑,微微地咬着嘴角”,“正用一种忿忿的谴责性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包括保润”。保润在柳生帮助下,第一次约会仙女去看电影,但保润只有一辆自行车,而没有罗医生那样的摩托车。保润负气,猛蹬自行车想甩开仙女时,仙女风一样向他追了上来。“她跑得很急很快,呼呼地喘气,书包里不知什么东西琅琅作响,那张狭小精致的脸孔被细雨淋湿了,闪烁着一圈愤怒的白光。她的表情以及奔跑的姿势,像是要奋勇缉拿一个可恶的罪犯。”然后竟然动手了,两个少女少年都被各自不同却又是共同的羞辱感、愤怒和怨恨所裹挟,仙女用书包打保润,保润还击以装水的可口可乐瓶子。两个人当时的感觉可能都是被柳生骗了——他们的约会,是柳生用“骗”来撮合的。仙女的确是气坏了,她“脸上有一种夸大的复仇的表情。因为剧烈的运动,她幼小而结实的乳房在衬衣下逸出动荡的曲线,那曲线上也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仙女对保润的这种明确的、却又不知所来何由的表现,更像是青春期少女少男负气的心理和行为,从此一直贯穿小说始终。而且不止是仙女与保润彼此之间,仙女对待其他人,对井亭医院的病人,对驯马师瞿鹰,对令她意外怀孕的庞先生,对待香椿树街的民众,尤其是对待曾经趁她被保润绑缚而强奸她的柳生,都有一种隐隐的敌意或者明显的敌意。保润与柳生之间也有敌意。与保润相比,或者说保润眼里的柳生,帅气开朗,见过世面,家里有钱,有高自己一等的形貌……两个年龄相仿的少年,在一个(保润)绑、一个(柳生)强奸,然后绑的人被强奸的人和受害者仙女嫁祸的“罗生门”式的事件中,真正的敌意就一直在保润和柳生之间滋

①张学昕:《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②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陈晨编选:《苏童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18页。

生、角力直到最后的膨胀——最后保润出狱，与柳生、仙女一番纠葛，柳生娶妻婚礼后，保润去闹柳生的洞房，喝多了酒，三刀捅死了柳生。

《刺青时代》《城北地带》等小说都是典型的“香椿树街”叙事系列小说。其中《城北地带》曾经被视为“香椿树街”叙事的总结篇。《黄雀记》显然将此又向现实推进了一步——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香椿树街南方的故事、历史变迁及社会现实纳入进来。不仅《城北地带》里达生与美琪的青春与成长主题在《黄雀记》里继续延续着，而且苏童较从前更加贴近和全面地去拥抱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现实，续写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此前的《蛇为什么会飞》（2002）曾被视为苏童第一部直面现实的长篇小说，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当年的先锋派作家苏童的转型之作，但小说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表现仍然难免有浮光掠影之嫌，王宏图也直言批评界对这个作品反应较为冷淡……与《蛇为什么会飞》相比，《黄雀记》在表现现实方面，是在“香椿树街”文学叙事的道路上，以“南方的重构”来更加贴近和拥抱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生活。

《黄雀记》写作是有着现实缘起的。苏童自言自己所熟悉的一个腼腆的街坊男孩，意外卷入一起轰动一时的青少年轮奸案，而青少年时期他在上学路上总会看到那个独居老人瘫痪在床以及臭气熏天的场景……这些来自现实场景的触媒，使他得以塑造保润、祖父等形象并以围绕这些人物的故事，将社会生活中种种现实予以展现。短篇小说《伞》中春耕和锦红的故事，几乎可以看作是《黄雀记》中柳生和仙女故事的同题异构。类似的情节也见于《城北地带》红旗对于林家少女美琪的强奸，等等。相较于苏童当年历史小说《碧奴》《武则天》《我的帝王生涯》等，家族小说《1934 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及至较晚近的长篇小说《河岸》，凡是较近社会现实的写作，多是聚焦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生活，而《黄雀记》却是走出了苏童一直顾盼流连六七十年代的心心念念，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八九十年代，以及向当下延伸的中国现实。在《河岸》中库文轩、库文亮父子身上，都没有承载《黄雀记》中这样显明的时代变迁的底色。“上部”“保润的春天”，也有时代的春天之喻，映照的却是“中部”“柳生的秋天”和“下部”“白小姐的夏天”，在“白小姐的夏天”里更是别添了仙女前往深圳曾为弄潮女、置身商品经济浪潮的经历和故事。时代转折在三个年青人的成长叙事中，与苏童以往的青春成长主题小说相比，都显得格外重要。时代的变化、转折与青春成长叙事的钮结，是理解小说的关键，也让我们看到了苏童在对历史、家族故事和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面影的无限怀旧中，他写作那依然有点浪漫，却拉开了已然被启蒙、被活力与困惑纠结着的八九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幕布。

二、“丢魂”与“捆绑”，现实的隐喻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勃兴一时的先锋派文学，曾经在形式实验的极致追求中，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叙事游戏的空间。而先锋派文学处理不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也几乎一直为人所共识乃至受到指摘。先锋派文学可以被视为是文学对曾经的对文学反映现实关系的颠覆。新的时代和社会现实，让作家不得不重新寻找二者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余年，中国社会生活日新月异，全球化浪潮和商品经济浪潮之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种种社会问题伴生着各种社会乱象和精神困境，如何将之加以文学表达？现实主义书写是可选的一径，而先锋派文学的代表作家，如何领取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反映新的社会现实？如何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既突破自己惯有的艺术风格，又不强行与自己原有的风格割裂、贸然尝试陌生的写作领域？在遵循自己的天性和艺术禀赋的同时，如何寻找合适的方式表现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转型？这可能是所有的当年

的先锋派作家,包括苏童,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同是当年先锋派作家余华的《第七天》,被视为以新闻素材、现实图景拼贴的方式来在小说中作“现实植入”。苏童并不喜欢过于贴近现实的文学,他主张文学应“离地三公尺的飞翔”:“所谓离地三公尺的飞翔,这是我所想象的一个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离地三公尺,不高不低,有一种俯瞰的距离。”①《黄雀记》中,苏童用了隐喻的方式,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试图对现实作更加深刻、文学性与现实性兼具的介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经历全球化的历史趋势。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尝和摸索时期,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等统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表现旧有的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与商品经济大潮及全球化历史趋势影响下的中国南方小城?像有的研究者借用王德威在其专著《历史与怪兽》中的概念,把“历史和‘再现历史’的两难”视为现代性进程中“历史暴力”的辩证呈现,认为王德威式的“怪兽性”论述更适合于现实与历史纠缠下的文学叙事,并认为形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写作中独特的“当代性”风景。而且认为“怪兽”的形象谱系从 80 年代李国文、余华等作家的作品里,一直延续到了苏童的《黄雀记》里的祖父等主人公身上。② 与其以“怪兽”论来表现这样的历史巨变和时代变迁,倒不如看取巨变的时代面影中人的精神困境,精神困境的极致便是人物呈显或轻或重的“精神分裂”的状态——人物的丢魂、或明显或不明显的疯癫状态以及小说里对井亭医院的设计和处理,这些都是《黄雀记》所提供的重要意象,也是《黄雀记》象征和隐喻现实的一种文学表达方式。

祖父的“丢魂”具有高度的象征化和丰富的隐喻色彩。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疯人数量激增,驱逐疯人成为很多种流放方式中的一种。或许是受西方文学中表现疯癫书写传统影响,当代小说中也有可以寻到的疯癫人物谱系。而有的评论者像张定浩,也直言当代小说中有着对于精神病院的美好想象,成为诗意想象和桃花源的代名词。③ 的确,《黄雀记》中祖父的“丢魂”使祖父具有了疯癫的特征,并进而被“放逐”到精神病院井亭医院——那里有更多的“丢魂”的人。祖父不止是小说文本世界中隐喻色彩最强的人物,祖父的“丢魂”恰恰是历史和现实撞击下的产物,祖父这个几乎是香椿树街最老的老人,勾连起了已经逝去的那段历史。由于怕后辈不能很好地张罗自己的葬礼,祖父在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要去摄影师姚师傅那里拍一张照片,理由是祖父自己觉得自己脑子里有个大气泡,说破就破,自己的命也说走就走的。正是由于拍照,引起儿媳妇粟宝珍的激烈反对和战斗状态,在她看来,“祖父每拍一张照片,就是给小辈挖一个坑,祖父的遗照越来越多,儿孙们不孝的泥滩便越来越深”。家庭矛盾中,祖父的照片又被照相馆弄丢了,为祖父补拍了三张照片,就是这第三张镁光灯闪光的时候,让祖父认为自己脑袋里的气泡破了——丢魂。魂丢了,就要去寻找。

绍兴奶奶为祖父出谋划策如何找魂,祖父讨要到了最后的良方——他记起自己曾埋起一只手电筒,里面有祖先的两根尸骨。绍兴奶奶提醒他通过祖先的尸骨,可以找回自己丢了的魂。装有祖先尸骨的手电筒既然埋了,就要挖出来。公然的挖掘受到了阻挠,祖父残存的智慧告诉他,“为了让香椿树街的街坊邻居容忍他的探索,必须投其所好,适当地使用心计”。拥有着残存智慧的祖父,把挖祖先尸骨,巧妙置换成了“掘金”——在香椿树街街头掀起了一股掘金热,形成

①郭琳:《苏童谈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离地三公尺的飞翔》,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08-15。

②徐勇:《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4 年第 2 期。

③张定浩:《假想的煎熬——对苏童〈黄雀记〉的一种解释》,《上海文化》2013 年第 7 期。

“尸骨派”和“黄金派”。“祖父挖掘手电筒的路线貌似紊乱，其实藏着逻辑，他无意中向香椿树街居民展现了祖宗的地产图。”“人们在各自的屋檐下生活工作，早就淡忘了从前土地的历史，未料到祖父突然冒出来，以一把铁锹提醒他们，你们的房子盖在我的地皮上，你们吃喝拉撒，上班工作，都是在我的土地上。祖父扛着一把铁锹在半条香椿树街上走来走去，所经之处，历史灰暗的苔藓一路蔓延，他的脚步无论多么谨慎，对于沿途的居民或多或少是一种冒犯。”香椿树街居民已经淡忘的革命前史和资本前史，被祖父寻找祖先尸骨以找回自己丢失的魂魄的挖掘运动唤醒，付出毁掉了香椿树街一条绿化带的代价，“一场由心血来潮或蓄谋已久的谎言引发的‘地道战’无意间画出了早已被历史/时代遗忘的香椿树街的‘阶级地形图’：对祖宗骨殖/血缘/传统的寻找却首先寻出了祖宗的地产/资本的地理与历史”①。此前的《河岸》还是把一个少年的成长叙事，特地又放到了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其说是陈述历史与现实重压下的个人记忆，不如说是展现历史的光影与阴影拖曳之下的个体生命的生长与打开方式。《黄雀记》中仅仅是以祖父丢魂找魂这样一种方式来回望历史，不止隐喻了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裂痕、抵牾造成了祖父的丢魂。祖父的丢魂，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分裂、一种疯癫，现实让祖父丢魂，找魂又不意间指向了那段历史，而这疯癫既指向了在小说中那缕逝去的历史的云烟，又将祖父引向集中了更多失魂之人的井亭医院。

祖父因为将香椿树街一条绿化带毁了个干干净净，加上儿媳粟宝珍的不能相容——粟宝珍被祖父每年拍一张遗照就是“暗示儿孙不孝”的想法和思维所折磨。相较于保润、仙女、柳生彼此间隐隐的敌意，小说中的人物似乎也多持有一种偏执的思维，这在评论者张定浩看来，人物的偏执思维非常有助于将故事情节在刻意聚焦的矛盾中迅速推进。这可能更多是小说家的假想和虚构，生活本身本不如此。其实，祖父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丢魂了，坚持不懈地深入挖掘，并将挖掘工作开展到了精神病院井亭医院里，也是一种固执的偏执思维。偏执思维何尝只存在于《黄雀记》中人物身上？其实存在于生活中每个现实人物身上。小说家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偏执抽离，集中体现在小说中人物身上。在井亭医院，有更多的偏执到极端和丢魂的人。井亭医院里住着各种精神病患：坚持挖掘和遭到医院“严禁挖掘”坚决抵制的祖父，住着特二床的千万富翁郑老板，因为财富来得太快，得了妄想症总以为有人要追杀自己，郑姐安排 30 个小姐给弟弟开生日派对狂欢，引得相邻也是居特护病房、那位“特一床”康司令受不了这些狂欢和噪音袭扰而拔枪开枪惊魂……丢魂和疯癫是《黄雀记》的重要意象，极具象征和隐喻色彩。

张定浩认为井亭医院与他见过的现实中的精神病院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现实的精神病院，病人既没法挖掘，也没法儿开生日派对，更不可能能够用枪、看不惯就拔枪而射。真实的精神病院，被认为是所有的病人按照病情被分配到不同的病区，按时服药、接受治疗，甚至接受电击。而像精神病人随意地走动，被认为有悖常理；像跟收养她的爷爷奶奶住在井亭医院围墙下的铁皮屋里的仙女小时候，似乎也不大可能总是遇到四处散步的病人并且与之各种玩耍……这样的想法没有什么错儿，但是谁也不能说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精神病院里，一定不会有《黄雀记》小说中的情节和细节。但作为寻找心灵和灵魂的秘密的长篇小说，小说家更加瞩意的，或许是如何寻找希望和失望的根源，以小说家的想象和方式介入现实和抵达精神的彼岸。有了祖父将挖掘行为坚持不懈进行到井亭医院的行为，才会有了保润的捆绑技术，其他病床的病人也需要保润帮忙捆绑，才会给他展示自己捆绑技艺的机会，并无形中让保润以之为豪、更加钻研和苦练捆绑技

①徐勇：《以象征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论苏童〈黄雀记〉的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4 年第 2 期。

术。也才会有小说后面保润和仙女相约在水塔,争执之后,用莲花结把仙女捆了个结结实实,才会发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这个小说的主要故事情节。保润被栽赃陷害入狱,柳生逃脱法律惩罚,仙女帮着诬陷保润,等等,才会推动小说发展出后面的情节……如此清晰的情节线,不能不归功于保润的“捆绑”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成为小说最重要的象征意象和隐喻。

没有祖父的丢魂和坚持不懈的挖掘行为——毁掉绿化带和井亭医院的花木,保润就不会练成他那俨然已经出神入化的捆绑技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仅仅因为保润捆绑了仙女,就导致了仙女被柳生强奸——彻底改变了保润、柳生、仙女三个人乃至其家人的命运。而在祖父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同时具备“丢魂”和“被捆绑”两个特征。尽管井亭医院和香椿树街上都活跃、生活着大量丢魂和思维偏执的人,尽管丢魂和疯癫已经俨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病象和心理症候,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祖父”这个人物还是将丢魂、捆绑(更确切说是被捆绑)凝聚于一身,丢魂和捆绑高度聚焦于祖父这么一个人物形象身上。正是由于祖父对祖先骨殖寻找而发生的挖掘运动,才勾连起了祖宗的历史和资本的前史,小说以祖父的丢魂、找魂来回望历史和反映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裂隙等,研究者们已经对此多有察觉。而且没有祖父的丢魂、找魂(疯癫的行为方式),就不会有祖父与井亭医院的联系(那里有故事女主人公仙女、有发生强奸嫁祸事件的地点水塔,等等)。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对于《黄雀记》中“祖父”这个人物,已有研究还重视得不够、尚待挖掘。苏童在展现祖父的“疯癫”和刻画这个人物的时候,尺度把握十分巧妙与恰当。祖父疯癫,才会有执著地每年拍一张遗照的行为,和认为自己脑袋里有一个大气泡、破了自己就会死掉的想法——而坚持不懈地找魂和疯狂挖掘的行为。但是祖父又并不彻底疯癫,用苏童的话来说,他还有自己残存的智慧——他知道为了让挖掘顺利进行下去,他要谎称是在找丢失的手电筒里的金子,他还知道贿赂井亭医院的门卫看守,他很有自己的主张、坚持不听话而导致柳生那一次嫖娼未遂……马师傅父子三人和鲍三大捆绑押送逃回家的祖父回井亭医院时,“车上四个人清晰地听见了他的感慨,祖父说,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啊。”柳生想带祖父去看狱中的保润,途中面包车上:“祖父临窗四望,望见满眼新的风景,嘴里便发出声欣喜的感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真是日新月异啊!”①首先,一个完全疯癫的人,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其次,哪怕是作家有意这样设置,也绝不是苏童不懂得应该用人物的限知视角的缘故。祖父说出这样的话,让历史和现实的对接、表征现实的力度也就更大。未来的苏童研究和《黄雀记》研究,在研究和分析祖父这个人物形象方面,仍然大有可为。“祖父”是苏童奉献给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典型形象,意义尚待进一步挖掘。

三、无可言说的小说质地

《黄雀记》面世后,有评论者从其中那些让人熟悉的南方场景、南方元素和南方气息,而觉得《黄雀记》仍然是一部体现南方伤颓阴性气质和旧(南方)美学的所谓的“新作”。因仍然可见香椿树街的写作内容和地域标签,被部分评论者认为苏童仍然如先锋写作时,过多地依赖意识流、意象和象征主义等技巧,有缺乏创新和写作突破之嫌。众多的褒与贬,可以看出评论者对于苏童写作的风格化问题,对于苏童写作中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艺术真实与现实真实的关系,等等,还是有着认识分歧的。布鲁姆在《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一文中说,“作为批评家,我们只能进一步确证真正强有力预言家和诗人的自我正典化。我们不能随意虚构他们的正典化。”②布鲁姆认为

①苏童:《黄雀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年,第 116、139 页。

②[美]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吴琼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16 页。

什么样的作家与作品有资格晋身经典之列呢？“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①作家作品能否成为“正典”、文学经典而入史、进入文学史，布鲁姆认为是在于“陌生性”和“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苏童的香椿树街文学叙事和南方叙事美学，是一种有着苏童印记和标签的无法同化的原创性，《黄雀记》也在南方的重构美学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年先锋派作家先锋续航之后的新的无法同化的原创性，他所提供的“丢魂”和“捆绑”等大量的象征和隐喻现实的方式，以象征和隐喻的方式重新介入现实，无论是与先锋派作家的续航之作相比，还是与现实主义长篇相比，都具有属于苏童自己的原创性、陌生化。不能一味要求作家离开自己擅长的写作领域，强行进入陌生的、另外的写作疆域去反映和摹写现实。能在香椿树街叙事母题和南方叙事美学重构的基础上，从主题、形象、叙事等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将此前创作中的元素重组衍化和在新的社会现实里加以缀连了陌生化元素的再创造，这其实也就是正典、经典和新的原创性。

“意象”是苏童小说一直被关注和重视的元素。为王干、费振钟所首提（《在意象的河流里沉浮》，发表于《上海文学》1988 年第 1 期），葛红兵的撰文题目直接就是《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葛红兵在分析《妻妾成群》时，特意指出“一部《妻妾成群》就是一个意象集”，并认为“这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以意象性为基本特征的小说语式完全是苏童独创的”，“它接续了中国古代诗词戏曲的传统，接续了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传统，以一种书画同源的风格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空间”。《黄雀记》仍然充满了意象，捆绑、水塔、井亭医院、“耻婴”（后被叫作“怒婴”的红脸婴儿），等等；甚至包括祖父的丢魂、找魂，等等——小说中的物和人物的行动，都是意象。在《妻妾成群》等小说中，苏童被认为不关心故事，提供的是“一种意象化的叙事语式”。到了《黄雀记》，意象和意象化的叙事语式依然存在，但是似乎可见一些新的质素的产生和调和。

苏童擅长写作短篇小说是公认的，有评论家直接评价他是最一流的短篇小说作家。《黄雀记》也依然葆有苏童尤擅短篇小说的专长，整个小说拆开来，每一节几乎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精致的小短篇。程德培就曾经指出重视意象和画面的人，处理短篇非常容易，处理中长篇的叙事就要借助其他手段。苏童小说喜欢用季节给小说来定位，像《肉联厂的春天》直接写的就是春天，《妻妾成群》中人物命运也与四季轮回对应，《黄雀记》的“上部”“中部”“下部”分别是“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同样以季节来标示。但是小说实际上较之以前的反线性叙事、拆解线性叙事的文学叙事已经有很大的不同。这里的春天、秋天、夏天只是季节之喻，“保润的春天”里有柳生、仙女（后来的白小姐）的叙事，“柳生的秋天”里有白小姐、保润一家人的叙事，“白小姐的夏天”里也有柳生、保润的叙事，并走向了故事和三个人命运的结局。《黄雀记》的叙事在整体叙事线索上，已经较为遵循线性叙事顺序，上、中、下部也都是基本按线性时间顺序来叙事，而且整个故事可谓逻辑清楚，非常易于改编成影视剧。当然，《黄雀记》的逻辑清楚和有着清晰的情节线，与影视剧剧本讲究的虚构故事和迎合观众思维、只在寻求纯粹虚构的故事性还是大有不同。《黄雀记》的情节线和清楚逻辑，其实是建基于小说家繁复的空间叙事手段和无数的故事分岔、无限的叙事走向的可能性，最后又聚拢在小说结尾，不乏意料之外却有情理之中之感。意象和意象化的叙事结构、叙述语式，也是普通的影视剧剧本和现实性小说，所不能够具有的。

《黄雀记》更多青睐于线性叙事，情节线较为清晰可辨，与小说内部逻辑结构讲究象征与隐

①［美］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年，第 2 页。

喻并存的空间结构形式是并存的。祖父是处于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对话和对峙的交界点上的人物,连祖父用过的东西、祖父的一绺白发,都是意象。保润的父母拆了祖父的红木雕花大床,“一堆木头的奇形怪状,有的堆在地上,有的倚在墙上,想着些笨重的心事”。脸汗涔涔的保润的父亲,表情所带的歉意,“不知是向那张床道歉,还是向父辈留在床上的遗迹致歉”。保润抓到了一绺卷结的头发,又发现了另外一绺,但是保润无法确定,“那是祖父六十岁时候的头发,还是五十岁时候的头发,或者更早,是祖父四十岁时候的头发?”而且此处对保润面对红木床已经被拉走、失魂落魄呆坐阁楼上的这个细节的叙述,很有画面感,和满是伤怀衰颓的诗意。

《黄雀记》有着较为清晰的情节线的小说逻辑,但其空间叙事也很讲究,小说家在情节设置上并没有遵循严格的因果逻辑,在小说总体上遵循线性叙事原则的状况下,暗含反线性叙事、反因果逻辑的处理方法。这可以见出当年先锋派作家叙事处理和形式技巧的影子,但已经颇为讲究与现实的对接,完全毋需担心会有滑入叙事游戏之虞。保润因仙女和柳生的构陷而罹遭十年牢狱之灾,父亲死、母亲出走再不回归——家破人亡,本应是保润出狱找柳生和仙女复仇,分别杀死他们两个人或者把他们一起杀死。保润左臂和右臂的大臂上分别刺青了“君子”“报仇”,这让仙女仿佛看到一张通缉令、突然的窒息感袭来;保润对柳生一个大男人,其实同样也是惘惘的威胁和压力,读者的心理预期也是要看保润如何报仇……在保润的痕迹和影子出现时,对柳生和仙女都形成了无比大的压力和心理阴影,而在柳生和仙女看来,不期而相同的反应都是一个“逃”字。在他们心理感受里,自己都是要被保润复仇甚至是被保润杀死的,但故事走向却不是按照常理推进,而是在各种误导和分岔当中,将保润的目的一层层剥洋葱一样剥离开来和展示清楚——保润竟然只是要求柳生帮助他实现十年前那个夙愿——在水塔里和仙女跳小拉。就在读者要如释重负的时候,故事走向又岔到了柳生娶亲,保润喝喜酒而用刀扎死了柳生,保润和柳生对仙女的情愫和柳生的不选择仙女而另娶,都是在保润、柳生、仙女三个人彼此的关系、情愫和心理感受衍化中向前推进的——三个人彼此的情愫和心理的衍化,构成了小说叙述的深层动力。《黄雀记》的写作,不是按传统的戏剧性高潮所要求的立体可视金字塔式的空间结构来结构小说,而是不断地误导和拆解读者的预判,在故事分岔中,给读者设置种种悬疑式的空间结构,这个空间结构是迷宫式的,常常在每一条情节线上给出意料之外却是情理之中的故事走向和逻辑。

《黄雀记》中依然可见苏童小说中所体现的一个命题,苏童通过小说,继续摸索着自我与世界与现实的关系。苏童曾言世界是具庞大的沉重的躯体,小说家们绕之奔跑,为的是捕捉这巨人的眼神,描述它的生命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是对巨人的梦境作出各自的揣度和叙述……而苏童的“寻找灯绳”之说,也广为人知。“小说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我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灯绳,企望有灿烂的光明在刹那间照亮你的小说以及整个生命。”①《黄雀记》所展现的难以言说的小说质地,所透出的那些无可言说的小说质地,是苏童在小说叙事的迷宫中,依然在作着寻找灯绳的努力。这根灯绳,在时代转换的社会现实中、在新世纪里,映照着每个人生命的或光明或阴暗的角角落落。“丢魂”作为象征和隐喻,不只是祖父所独有的,柳生、仙女身上,郑老板姐弟、香椿树街居民等所有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宛若一种时代的症候。还不要说祖父对手电筒里祖先骨殖的寻找,就将香椿树街的居民分成了“尸骨派”和“黄金派”——这已经不是单个人,而是群体人的失魂和丢魂了。小说临近结尾,柳生对着白小姐忏悔自己,当年自己为何对她做出那种事?嘴里咕囔的话都是“当年怎么对你

①苏童:《寻找灯绳》,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陈晨编选:《苏童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做了那种事？他们都说我是丢了魂，我的魂不在身上，那年我们街上不是有好多人丢了魂吗？”丢魂和碎片化的社会现实，仿佛成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普遍的心理症候和时代精神肖像。而小说结尾的“耻婴”（后被称为“怒婴”）的意象，也被广为注意和诠释，有研究者就称，“正是这一饱含诗意的意象提升了整部作品的境界，和其他散布在文本各处的意象一起，将一抹辉煌的诗意赋予了这部作品”①。

有研究者（比如程德培）已经注意到意象是“对时间的冒犯，给线性秩序滋事”②，意象在对时间的冒犯和对线性时间叙事的近乎“寻衅滋事”当中，还与唯美、唯美主义以及诗意等，发生着内在的关联。意象介入小说叙事，同时也与诗意关联。《黄雀记》从构思来源，到具体的小说叙事，都清晰可见诗意的代入。《黄雀记》的写作缘起，苏童说道：“青少年时代，在我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有一个衰败的临街的窗口，在阳光的照耀之下，一个老人总是在窗子里侧对路人微笑。他的头发是银色的，面孔浮肿苍白，眼神空洞，表情看起来处于凝视与怪诞之间，他的衣服永远是一件旧时代的黑罩衫。我后来知道，那其实是一个垂死的姿态，老人不是站在窗后看街景，他一直瘫坐在窗后的床上，无法站立，也无处可去。”“这个瘫坐在窗边的老人，将他一生的故事，都埋葬在臭味和沉默之中了。”③再加上熟悉的街坊男孩意外卷入一宗轰动一时的轮奸案，便有了《黄雀记》小说的故事核。设想一下，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哀伤、凄清却不乏诗意的现实生活画面。葛红兵曾指出苏童的小说当中，意象帮助塑造了凄清幽怨的氛围，而且还构成了小说叙述的深层动力。意象其实同时也与诗意关联。苏童小说的诗意不仅体现在小说意象密集方面和那些小说场景的描画上，而且人物心理较量所衍化出的场景，常常并非激烈的戏剧性冲突，而是一种诗意和不乏哀伤复杂情绪相混杂的场景。彼此的心理错位，人物各怀心思想达成自己的目的而不得，结果总是出乎人物所希望的意外……《黄雀记》中这种诗意的小说语式和表现特征，几乎处处可见。

上部“保润的春天”里，保润拴着祖父，去找仙女讨债，作家没有急于进入叙事，一丛高大的蓖麻，几棵向日葵，油毛毡的顶棚上晾晒着一匾萝卜干，一只彩色的塑料风车，斜插在屋檐下，迎风旋转……老妇人瞥见香樟树下的祖父，误以为是祖父来挖魂儿，一把长竹条扫帚追了过去，结果是保润半新的裤子上留下了那把竹条扫帚的纪念。在仙女奶奶那里讨债失败的保润转而去找仙女的爷爷老花匠，老花匠按自己的理解，以为仙女欠了八块钱，保润强调是 80 元，老花匠被钱的数额惊着了，以为保润是在诈骗。“他们都认为自己掌握正义，正义与正义之间，恰好充满敌意，就这样，一次难得的谈判不欢而散了。”“老花匠背着喷雾器向着树林深处去，似乎有意躲避一个不知羞耻的恶棍。”保润追进树林，却不知自己是要继续身边，还是要继续索债。老花匠以为保润要捆自己，保润却是有好几次想缓和气氛，又不知从何说起；老花匠打算以喷雾器里的毒药来对付保润，保润目送惊起的白头翁鸟影远去时，忽然意识到自己与老花匠的纠缠毫无意义……人物的心理错位，衍化为外在的行为错位，心理与行为错位交互，让叙事脱离因果性叙事的必然逻辑，氤氲出复杂微妙的情境。苏童在虚构作品和表达现实之间，竟也能突破现实写作和叙事文学的诸多固有和既定模式，真实表达着那些复杂、微妙甚至有着哀伤的诗意情境，这难道不是苏童以前即具有、但是又不断带给我们新意和无法同化的原创性的正典之作吗？

诗意的场景，意象和心理活动错位等都可形成叙述的深层动力，清晰可辨的情节线和小说里

①王宏图：《转型后的回归——从〈黄雀记〉想起的》，《南方文坛》2013 年第 6 期。

②程德培：《捆绑之后——〈黄雀记〉及阐释中的苏童》，《当代文坛》2014 年第 4 期。

③苏童：《我一直在香椿树街上》，《长篇小说选刊》2013 年第 6 期。

各个场景充满画面感,这原本难以调和到一起的因素,在《黄雀记》里和谐存在着。苏童小说充满了画面感,是由来已久的。这与苏童自己迷恋图像和破译图像的偏好有关。在与人对谈时,苏童讲过:“很多人说我的小说容易出画面。我自己确实迷恋图像。”还说他自己 1987 年写《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时,“我的记录方式很奇怪,是图画配提示,当语言不足以表达创作所要表现的东西时,可以用图画的方式表达”。苏童有买画册尤其拉美画家画册的癖好。苏童曾说过:“破译图像是我的爱好,这样的爱好势必带到小说当中去,在我的小说中是一定存在的。”①小说的画面感和图像生成,也让《黄雀记》与其他现实生活题材写作的作品,有着很大的不同和辨识度。那些难以言说的小说质地,很大部分也都与这样的情境表达和场景描写有关。

> 河水有点脏,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工业油污,它们在阳光下画出一圈圈色彩斑斓的花纹。水上没有路,她先向河中央慢慢地试探,走几步,水已经没到她的胸前,她放弃了横渡河面去荷花弄的路线,退回来,贴着河边的石埠和房基走。凉鞋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了,河底的淤泥和垃圾咬着她的脚,有点黏,有点凉,更多的是疼痛。她怀疑自己在做噩梦,拧一下胳膊,疼,很疼,这不是噩梦,是真的,这是她人生中真实的一天,她必须从河水里寻找最后的一条路。②

她蹚过了裴老师家临河的窗口,试图去抓柳娟的晾衣杆,柳娟抱着晾衣杆,像抱着一支枪,严阵以待。整个香椿树街的居民都在拒绝她……她身上沾满烂泥和青苔,水下的青苔顺势又把她送回了水中。不做挣扎,也不再去抵抗河水的力量的白小姐,在水里出逃的景象,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 ……她不知道溺水是这么美好的感觉,天空很蓝,有几朵棉絮状的白云。她看见了自己绛紫色的魂,一缕一缕散开的魂,一缕一缕绛紫色的魂,它们缓缓上升,与天上的白云融合在一起。河水其实也很美好,水面上有一条宽松而柔软的履带,风的动力在推送这条履带,推她顺流而下。河两岸的房屋富有节律地闪过,一扇窗,又一扇窗,一个人影,又一个人影。杂货店破败的石埠上,一盆被人遗弃的绣球花在怒放,半红半绿的……(省略号为笔者所加)③

苏童自言自己对图像的迷恋,将其带入到了他的小说当中。“迷恋带来了虔诚,比如说一个院子里的一口井,我一定要把它写到你能闻到水井里的气味,你能摸到水里的青苔为止,对此我不厌其烦。”④上面两段画面感极强的文字将保润喝喜酒后杀了柳生、众人迁怒于白小姐的不吉和将之视为罪魁祸首、白小姐在香椿树街居民围拢讨伐当中水路出逃的窘迫之态等,展现得凄迷哀婉又不乏诗意。小说在现实描摹之余,氤氲而出难以言说的小说质地——这是《黄雀记》入史和成为文学史经典之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的先锋派作家,可以在新的世纪里既葆有原有的风格,又能以象征、隐喻和仍然意象密集、充满与破译图像相类的画面感和飞升出诗意以及难以言说的小说质地的独有特征,来介入和表征现实。

四、作家的自我放逐与小说的王国

多年前,苏童在与人对谈中说过一个问题,他的创作不太遵守“公共文学道德”。“文学中也有一个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的红线。我一直偷偷地钻过这条红线,钻出去写。判断好小说坏小说,公共文学道德在我这里不是一个判断系统。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试图脱离这个公共的文学观,或者我刚才所说到的社会进步观、崇高观。”苏童自言公共道德对他的写作不产生压力。“比如

①苏童、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 6 期。
②苏童:《黄雀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年,第 298 页。
③苏童:《黄雀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年,第 299 页。
④苏童、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 6 期。

我对人性的探讨，什么是阴暗，什么是灰色、堕落，在我这里都不形成道德上的美与丑，我的‘王国’我说了算，这不是自恋，是我们剩余不多的一份骄傲。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应该追求一种自我放逐、如果是成功的自我放逐，那并不是悲哀，反而是幸运。”①

《黄雀记》要记录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的社会生活和芜杂的、碎片化的现实，难免继续碰到“公共文学道德”的问题。苏童在《黄雀记》中依然秉持着他的写作是作家的自我放逐，作家小说的王国自己说了算的创作理念。《黄雀记》的叙事价值，依然能够在对于现实“离地三公尺的飞翔”当中，建立在那些无法克服和超越的人性困境当中，人物甚至不能以美和丑、好和坏来区分，几乎每个人身上都纠缠着复杂的人性，而这些反而将小说导向了更为接近它所要表达的社会现实的层面。尽管张定浩撰文中曾指出《黄雀记》中苏童是在饱受“假想”的煎熬，他也举例那诗意想象的乐园——井亭精神病院，存在太多与真实的精神病院相去甚远、甚至是完全不符合的细节和场景，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作家在自己的王国里，钻出公共文学道德之外的更多看得见看不见的“线”和界限的成功的僭越与尝试？

保润被柳生和仙女栽赃，虽然在左臂和右臂纹身了“君子”和“报仇”，白小姐偶然瞥见便陷入巨大的心理恐惧之中……读者也在此暗示和诱导之下，处于担忧保润做出复仇冲动之举的阅读焦虑——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阅读期待当中。但是小说的情节并没有按因果逻辑照此推理和衍化下去，而是不断地岔到另外的路径上去——保润出狱，分别找到柳生和仙女，只是为了实现当年在遭遇牢狱之灾之前，他在水塔约请仙女跳小拉遭拒绝的夙愿。柳生是当年强奸案的罪魁祸首，他对仙女有着既愧疚又爱恋的复杂情感。他会帮白小姐去跟瞿鹰讨债，他会帮白小姐去跟庞先生讨债和讨说法，白小姐面对庞先生庞太太起争执，自己都放弃讨要赔偿了，柳生还要抢夺庞太太的轮椅作为补偿……白小姐在车祸后想留下遗书死掉，是柳生陪尽笑脸和照顾，努力让白小姐打消赴死的念头。连白小姐走投无路时，安排她住进暂时空无一人的保润家，也是柳生想出的“馊主意”。柳生心里时时怀想的，是自己当年在水塔里对仙女犯下大错时，仙女那少女的影像……这一切的一切，无非是柳生对仙女既心怀愧疚，又心有爱恋，潜意识里还有弥补和赎罪的心理——当年的强奸犯柳生也并非是十恶不赦之人，他拥有着如此如此真实、复杂的人性，一如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或许比现实生活中的人，人性和道德上还要美好一些。现实中，多少罪犯、多少人性恶之人，对别人犯下弥天大错而丝毫无有悔过的心思和心理。

《黄雀记》对故事进程和走向的处理，非常用心且贴近真实的人性。邵兰英在知道儿子犯错之后，想尽了办法收买仙女、嫁祸保润，只为给自己的儿子柳生脱罪，甚至不惜脱去手腕上祖传的镯子给仙女，等于是被仙女讹诈了去……但是，关起门来，她对柳生的管教也是实实在在的，她要柳生时时刻刻夹起尾巴来做人，柳生也替保润一家人担起了照顾保润祖父的职责——这些都是悔罪的心理。柳生甚至去探视狱中的保润……但又在畏惧的心理中，马上将见到保润了，他却选择临阵脱逃。凡此种种，甚至可以说，《黄雀记》中尽管不存在二元对立的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阴暗堕落与光明乐观的显在调性……但是，这纠缠和交织了善恶美丑多重维度的复杂人性，才是真实的人性，才让小说如此真实地贴近改革开放 40 余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甚至可以说，《黄雀记》中可见苏童继续在对文学的公共道德越界之外，其实暗藏着一颗作家的悲悯之心，作家对于人性的理解和诠释，其实要比甚至是远比现实中的人性和暗黑，还更多积极和向善的层面。现实中，多少罪犯和恶人，施恶和害人之后，并不会有任何悔罪的心理，更不会去主动弥

①苏童、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05 年第 6 期。

补和补偿受害方,以期获得良心的暂安和罪感的纾解——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不甚赞同一些研究者和评论者认为《黄雀记》仍然徜徉于拟旧、灰暗、潮湿等香椿树街文学叙事的固有色彩和南方的旧美学。能将清晰可辨的情节线和复杂的人性,在小说世界里结合得如此好,如此并呈,实属搭建起了一个小说家的自由王国——艺术上不忘先锋却不断先锋续航的作家,在艺术上锲而不舍地追求着,先锋之后不断续航。所以有评论者才会说:“任何一种试图概括故事情节的尝试,都容易忽略小说世界中那蛛网般的复杂性,忽视人与人之间,人性中善恶爱恨是如何忽显忽见、或前或后、或正或斜地伸展。”①保润对仙女的情愫,始终在怯懦、自尊,畏缩、敌意,以及青春期荷尔蒙的主导下,充满着矛盾的、不确定性的、变化的甚至是惹人不愉与反感和厌恶的,有时又是让人怜悯的面向。保润想从仙女那里得到什么,好像又不确定自己究竟要得到什么,身体的欲望不断喷薄而出,而又不断被他压抑和掐灭……柳生对白小姐,更加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白小姐对柳生,由仇恨怨艾、各种不待见,屡遭柳生相帮,甚至也曾对柳生心生出期待。《黄雀记》临近结尾,“两个人的夜晚”一节,身怀有孕、身陷困顿人生境地的白小姐和柳生共度了一个夜晚,她甚至用一把剪刀提防着柳生。但次日她睡到九点多钟才姗姗下了阁楼,柳生为她熬了粥,为她洗了衣服在晾晒着。这时:

> 炉子上还留着小火,一锅粥冒着新米的香气,桌上有切好的咸鸭蛋,还有一盆榨菜丝。她坐下来喝粥,忽然觉得这个早晨,其实很好。她和柳生在一起,其实没什么不好。他们未经恋爱,未经婚礼,未经相处,竟然像一对恩爱夫妻那样默契了,他在天井里晾衣服,她在厨房里喝粥……她曾经以为驯马师瞿鹰会给她这幸福,她曾经以为庞先生会给她这幸福……到头来,承诺者已经不见踪影,为她准备早餐的男人,为她洗衣服的男人,竟然是柳生,这怎么不滑稽呢?(省略号为笔者所加)②

接下来,她询问和试探了柳生,但柳生选择可以做她的情人而不做她的老公,这里面不乏对她被人称为“公共汽车的”嫌弃——尽管小说家并没有明言,这所有复杂而难以捋清却如此真实地存在着的复杂的人性心理,让人如此地揪心和与人物同陷她(他)所处的困境,感同身受却又无可奈何。“《黄雀记》以其敏锐的触角,诗性的布局,一种镶嵌拼贴的手法,运用反讽戏仿的言说,曲里拐弯地走进变化中的文明进程。”③尽管不乏评论者表露出苏童《黄雀记》将仙女/白小姐的形象稍嫌符号化了一些,言其刻画不够细致。其实,苏童在写少女时期仙女的心理以及言行时,是细致入微的,那种显和隐,其心本善和少女的小缺陷小毛病并存等,都拿捏到了恰到好处,就仿佛面对一个让我们琢磨不定的青春期的少女,如此鲜活真实和贴近现实生活。白小姐并非大恶之人,她其实善良、卑微和有点爱慕虚荣,遭遇水塔强奸事件之后,一生的轨迹就此改变。她一直想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可是男人总是靠不住、给她各种伤害和辜负,将她一次又一次地抛回现实的窘境和人生的迂回之路。她在人生困境中,怀着已经被庞先生舍弃的骨肉,几乎接近穷困潦倒,虽然不失少女时期的自尊和骄傲,却糊里糊涂竟然会对当年强奸自己的柳生发生着情愫和情感期待……柳生却嫌弃她“公共汽车”的人生过往,选择了逃离。也正是这逃离,柳生的另娶,似乎不可避免又匪夷所思地导向了保润杀死了柳生。如果柳生娶了白小姐,保润倒未必会做出这样无可挽回的举动——将三个人再次投向无可挽回的人生境地。这一次,已远非当年的

①程德培:《捆绑之后——〈黄雀记〉及阐释中的苏童》,《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
②苏童:《黄雀街》,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278-279页。
③程德培:《捆绑之后——〈黄雀记〉及阐释中的苏童》,《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

嫁祸冤案，是真真正正的无可挽回了。

苏童在《黄雀记》里，在并不晦暗的小说叙事基调中，却写出了很多复杂而真实的人性。不断岔到别处的故事走向，各种的不期而至，小说的诗意和南方画面，常常氤氲而出让我们害怕的东西，莫名的害怕，忧惧……能够将哲学家谢林所说的那种应该隐藏起来却显露出来的东西——“令人害怕的东西”如此真实地呈现，不能不说是小说家能够离开公共的文学观，将自己自由放逐到“小说的王国”里的结果。挣脱了写作法则束缚的苏童，在《黄雀记》里又一次华丽转身。这个转身，既华丽又意义重大，它是当年名噪一时的先锋派作家在新的世纪里的先锋续航之作，它标志着先锋叙事与社会现实尝试握手与共识的可能性。苏童在香椿树街叙事的新的姿态里，提供了如此繁复的象征和隐喻：黄雀折翅，螳螂和蝉也陷入困境，似乎每一个人都难脱黄雀、螳螂和蝉的运命，小说打开了害怕、困境、焦虑，也并没有丢弃和扼杀希望……“半心半意的现实主义”和“信心十足的象征主义”在《黄雀记》里混合为一、握手言欢。苏童在《黄雀记》里完成了对业已习惯的写作领域的自我挑战和对旧有写作范式的再度超越。《黄雀记》昭示出一个当年的先锋派作家的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能力，也显示和昭示出苏童未来的写作之路和写作图景，值得期待。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 and Pioneering Continuation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Titmouse* By Su Tong

Liu Y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 Titmouse* is regarded as the label work of Su Tong, which continues to write the motif of Toon Tree Street and reconstruct the narrative aesthetics of the “south”.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novels with the theme of youth growth, the combination of time transition and the narrative of youth growth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novel. “Losing the soul” and “binding” have highly symbolic characteristics and rich metaphorical meaning.The disembodied and fragmented social reality seems to have become a common psychological symptom and zeitgeist portrai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writing motif and narrative aesthetics, Su Tong achieves self-overcoming and transcendence and continues to provide an unassimilable originality.The novel presents relatively clear plot lines and the narrative of the anti-linear causal logic. In addition, the writer continu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his self and the world and reality.The density of images, the substitution of poetry and the sense of picture generated by deciphering images all contribute to the ineffable connotation of novels. The author's view of “self-exile”, which is ba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public literary vie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e “kingdom of fiction”, which both indicate the writer's pioneering writing ability and the significance in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Titmouse* as a classic work.

Key words: narration about Toon Tree Street;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 the unspeakable texture of fiction; “self-exile” literary view; pioneering and continuation

责任编辑：李宗刚

论《江南三部曲》的失败叙事及其认知结构*①

马治军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要: 《江南三部曲》是格非在新世纪写作风格转变后的代表之作。作者回归传统叙事手法,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叙述了江南水乡一个家庭的百年历史。小说立足于对历史的思考,限制情节向"传奇"方向发展,在对众多人物的"性""暴力""疯癫"的显形叙事之下,采用隐性进程的叙事,将读者聚焦于他们理想实践的各种失败。小说中没有成功者,失败几乎成了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而其内容各不相同:张季元、陆秀米和谭功达虽然失败,但他们种种现代化的尝试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爱国之心的表达;王观澄、郭从年的理想实践虽然貌似成功,却最终走向理想本身的反面;谭端午陷入当代精神困境之中,却又以"拒绝跟随"的姿态,保持着微弱的理想之光。小说众多人物不同程度的失败既与他们对西方思想理解的不全面相关,也和他们对中国现实状况的不熟悉相关,其意义在于:当代精神价值的重建既依赖于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的切肤关怀,也依赖于他们对现代思想的全面了解。

关键词: 格非;《江南三部曲》;隐性进程;认知结构;失败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4-0039-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04

格非在新世纪出版的系列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似乎换了另一种写法,大量的平铺直叙使作品呈现出简约之风。与其之前的先锋写作相比,《江南三部曲》更值得反复细读。在既有《江南三部曲》研究中,人们或者把它看成对理想主义者"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追求乌托邦的理想与实践"②的叙述,或者把它看成对"乡村女子秀米如何辗转奋争于乌托邦理想建构的身心历程及其传奇故事"③的讲述,或者把它看成对"知识分子乌托邦梦想的""重述"④,也就是说,《江南三部曲》是一部关于乌托邦的小说。然而,作家的意图似乎不限于此,格非认为:"文学在任何时代,都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器,同时也是一种自觉反省的力量。"《江南三部曲》即是在一个并不复杂的叙事中进行历史思考的样本。对此,木叶认为格非的"乌托邦思考更多地体现在对百年知识分子的辗转及精神困境的持续探测"⑤。张清华说得更清晰:"这一家族人物的命运似乎表明,历史并非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只要通过'革命'的推动就一定

* **收稿日期:** 2020-01-10

作者简介: 马治军(1965—),男,河南渑池人,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生态文学理论的发展空间和实践路径"(2018BWX009)的阶段性成果。

②熊修雨:《理想主义与人性建构——论"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对乌托邦问题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③陈华文:《最是书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11页。

④项静:《在结束的地方开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9页。

⑤木叶:《先锋之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5、147页。

能够‘进步’；而反过来，那些积极献身于历史进步的人们，也并非一定会在这变革中获得自身的解放和价值的实现。”[①]批评家们看到了潜藏于文本之中的历史之思。鉴于此，本文拟从小说的叙事入手，从隐性进程中考察小说的失败叙事，小说的前两部在显性情节中植入一股失败叙事的暗流，直至第三部成为叙事的主流。以乌托邦理想为考察的立足点，小说的失败叙事有三种形态，而导致其失败的根源则在于，共同的思维方法和认知模式使小说人物不能把特定历史境遇中的理想再次对象化和历史化。

一、由隐而显的失败叙事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情节始终是叙事研究的中心。申丹认为在很多的叙事作品中都含有一种“隐性进程”的叙事，它是“一股自始至终在情节发展背后运行的强有力的叙事暗流”，和显性的情节“并列前行表达出两种不同的主题意义、两种相异的人物形象和两种互为对照的审美价值”，并继而指出，“在存在双重叙事进程的作品中，如果仅看情节发展，忽略隐性进程，就会片面理解甚或严重误解作品的主题意义、人物形象和审美技巧”[②]。《江南三部曲》由先锋写作回归到传统叙事，却在传统叙事中植入了一股叙事暗流。从显性叙事来看，小说叙述的是一个具有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家族史，陆侃的疯癫与离家出走，张季元反清被杀，花家舍土匪的火并，陆秀米的革命和革命失败后的“禁语”，构成“与时代梦想、社会剧变相互纠缠的传奇人生”[③]。尤其是张季元与梅芸的情欲放纵，张季元对陆秀米的暗恋，陆秀米被劫持被强暴，花家舍土匪的恶行与内讧都让这一显性叙事进程充满了对性与暴力的书写。作者对性与暴力的书写是近乎冷漠的，也是缺乏道德评判的，这在致力于历史反思的格非那里存在着明显的叙事悖论。这一悖论的合理解释只能是，性与暴力书写并非小说的真正主题。

事实上，在显性情节的背后，小说隐含着较少正面叙述的理想内容。它聚焦于理想实践过程和结果，凸显了小说的“失败”主题，延续了《欲望的旗帜》以来的“失败者的坚持”[④]，叙述了“失败的人，人生的失败”[⑤]，是一部“失败者之书”[⑥]。首先，从叙事节奏上看，《人面桃花》似乎有一个叙事的“败笔”。小说采用全知视角和顺时序的传统叙事方法，用占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来讲述陆侃和张季元的故事。相比陆秀米，他们只能算得上是次要人物，擅长故事营造的格非完全有能力把他们的故事植于陆秀米的叙事之中，从而使整篇叙事显得更精炼紧凑，也让故事的进程变得富于变化，但作者让他们最先出场，让读者知晓他们的故事之后再去阅读陆秀米的传奇，显然看中的不是它的故事维度，而是其功能指向，具体来说，就是陆侃的离家出走和张季元的反清失败起到为小说铺垫失败基调的功能。以他们不同形式的理想失败开篇，就像是在提示读者，失败几乎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历史宿命，随后出场的人物尽管都演绎了不同形式的传奇人生，但结局却似乎都不那么完美。其次，作者采用叙事延宕或叙事中断等策略，让陆秀米的人生叙事变得不完整、不顺畅。譬如，陆秀米在花家舍亲眼目睹土匪之间内讧的叙事较为完整，可随后陆秀米如何生下儿子？如何从土匪马弁那里逃脱？如何到了日本，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如何又回

①张清华：《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当代作家评论》2012 年第 2 期。
②申丹：《隐性进程》，《外国文学》2019 年第 1 期。
③格非：《人面桃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封底。
④季晔倩：《失败者的坚持———从〈欲望的旗帜〉到〈春尽江南〉》，《名作欣赏》2012 年第 27 期。
⑤胡伟：《失败的人，人生的失败——读格非〈春尽江南〉》，《社会科学论坛》2012 年第 8 期。
⑥刘新林：《失败者之书——从〈春尽江南〉说开去》，《文学报》2012 年 5 月 17 日。

到普济？这些信息,作者都没有交待,是小说叙事的永久性缺失。到了陆秀米革命的部分,叙事又显得散乱繁复,“小东西”的命运、丁树则的登门训导、长洲老婆子的上门寻仇、老夫人的死、大金牙的被杀等叙述挤占了很大空间,只留下最终起义失败的结局。这样一来,在陆秀米的人生中,除了花家舍的覆灭和起义的失败之外,其他叙事或者零散或者缺失。从第一部全篇的叙事进程来看,陆秀米是对陆侃与张季元失败的延续,小说以她和陆侃等人的人生故事,勾勒出了一个关于理想失败的叙事轮廓。

《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是《山河入梦》。如果不是《人面桃花》最后寥寥数语的交代,如果不是小说里仅有的几处对谭功达身世的回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成毫不相干的两部小说,让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的仍然是隐性进程的失败叙事。作为显性情节,小说始终围绕谭功达与白小娴、姚佩佩的情感纠葛,以及和县领导班子成员费尽心机的权力之争展开,“寓言般地呈现了个体在时代剧变中的曲折命运与精神求索”。谭功达日常生活里对情感的反应是迟钝的,这表现在与白小娴的恋爱中,谭功达满怀希望:“这时候,我若冲上去一把将她抱住,死不松手,她会不会闹将起来呢?”他根本不知道白小娴始终都是在敷衍行事。她之所以能来相亲,全部都是她叔叔白庭禹强迫的缘故。这也体现在与姚佩佩的接触中,谭功达始终是被动的,姚佩佩为了观察他的心思,便挑起了谭功达所买的泥人话题,“谭县长,听人说您上次在集市上,给我买了件什么礼物,怎么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送给我呀?”谭功达却没有觉察到她的情感波动,连想都没想就说:“剩下的那只好的,还在我家中床头柜上摆着呢。”[①]这个“既愚钝又善良”的谭功达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一直“执着于自己内心的理想世界”[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桃源盛景”[③]。这些对于白小娴、姚佩佩来说,显然是遥远而又毫无意义的,但从张季元、陆秀米的视角来看,谭功达的想法却是对其先人理想不折不扣的延续和继承。

如果说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作者有意放弃对人物性格的丰满性描绘,限制情节向“传奇”方向发展,目的是为了揭示理想失败的主题,那么到了第三部《春尽江南》,小说的主题则发生了变化,理想精神退去之后的结果成了它的新主题。如果说前两部小说的隐性进程围绕主人公的“失败”展开,那么在《春尽江南》中,这种失败叙事则作为显性情节,演化成了“个体人生在社会剧变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精神困境”。面对现实问题,谭端午是无能为力的,而在“精神困境”之中,他则“习惯了从堆积如山的书卷和纸张中散发出来的霉味”。一到下雨天,当他透过资料科办公室的南窗,眺望着院墙外那片荒草丛生的滩涂,眺望那条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以及河中劈波斩浪的船只,他都能感觉到一种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④]

谭端午调到地方志办公室,他的妻子讽刺他“正在那个小楼里一点点地烂掉”,可是他却已然遁入那“寂寞而自在的时光”。在“成功”人士庞家玉的眼中,在地方志工作就是人生失败的象征。而在心中已经不能激起任何微澜的谭端午那里,“发霉”的工作正好为他远离那些所谓的成功生活提供了借口,也只有在这样的生活中,他的精神虚空才能获得暂时的慰藉。这说明精神梦魇者谭端午心中仍残存着一种理想,他和绿珠关于“乌托邦”的争吵,他在花家舍学术会议上主动的自我疏离,都是其理想精神依存的某种印记。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春尽江南》“将感伤的审美格调,从叙事语调的层面沉淀到人物的生命肌理之中,以乌托邦的凭吊,映射了某种事关理想

①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封底、第 90、182 页。
②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作家》2007 年第 2 期。
③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14 页。
④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封底、第 44 页。

和慰藉的人文主义情怀”①。崇高变得平庸，激情成了放纵，革命成了与酒吧女子的暧昧，但“事关理想”的人文情怀并没有完全缺失。由此来看，把理想精神隐藏于内心的谭端午，与他的祖辈、父辈之间保留着似断还连的精神血脉，尽管这是一个失败的血脉。

综上所述，《江南三部曲》采用了两种叙事动力。前两篇小说中的失败叙事以隐性进程的形式演进，到了《春尽江南》，个体的精神困境成为主要的情节故事，但“精神困境”之所以会成为问题，主要还是借了个体内心理想精神不息这条隐性叙事衬托的原因。当然，小说的显性情节是重要的，但是要想达到“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叙事”来呈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②，仅依靠这一条情节线索显然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隐性进程的使用是必然的，不同层面的失败叙事不仅为作者思考历史提供了最佳的观察视点，而且借着“所有的成功者都是肤浅的，只有失败者肩负着反思的重任”③的责任伦理，作品便进入一个非同寻常的反思领域。

二、基于乌托邦理想的失败叙事

格非小说中的人物不乏失败者，《迷舟》中的萧旅长，《青黄》中的“我”，《敌人》中的赵少忠，《欲望的旗帜》中的曾山、张末，等等，都可归入失败者的形象系列。《江南三部曲》中的陆秀米、谭功达等人物的出现自然是对这一系列形象的承继，但也有新的延伸。意识到“我愿意代表的，或许仅仅是失败者而已”④的作者的自觉，体悟到“只有意识到痛苦和绝望，才能去发现人生的真谛”⑤的作者的思考，以及“透过物质层面去观察精神史的吉光片羽”⑥的作者的期待等丰富内涵的积极介入，均让这些新的失败者拥有了与以前不同的特点。

首先，横向移植乌托邦思想的探索。张季元是中国近代的革命者，他的思想中弥漫着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在未来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在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现代理性和进步史观的存在，尤其是对未来的构想。他相信理想不仅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现实，而且还能有效地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然而，张季元的革命最终失败了，他和薛举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陆秀米是普济的职业革命家，深受其父陆侃的影响：“她想把普济的人都变成同一个人，穿同样的颜色、样式的衣裳；村里每户人家的房子都一样，大小、格式都一样。村里所有的地不归任何人所有，但同时又属于每一个人。全村的人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一起熄灯睡觉，每个人的财产都一样多，照到屋子里的阳光一样多，落到每户人家屋顶上的雨雪一样多，每个人笑容都一样多，甚至就连做的梦都是一样的。”⑦为此，她不惜变卖地产来实践其理想，如亲任校长兴办教育，成立地方自治会，成立育婴室、书籍堂、疗养所、养老院，还卖家产、购武器、兴义旗，等等。遗憾的是，陆秀米造福家乡的种种努力最后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没人把自家的孩子送到育婴室，也没人去她的新医院就诊。后来的反清起义也“胎死腹中”，她自己则被监禁起来。作为陆侃的后人，谭功达的心中也有一个桃花源情结，他希望在梅城的规划中，不仅有鲜花、行人和汽车，还有一个可以“将梅城县的每一个村庄都连接起来”⑧的

①洪治纲：《乌托邦的凭吊——论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南方文坛》2012 年第 2 期。
②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封底。
③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 年第 2 期。
④格非：《创作谈》，《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 年第 6 期。
⑤格非、王小王：《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人类的心灵史——与格非谈他的长篇新作〈山河入梦〉》，《作家》2007 年第 2 期。
⑥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 年第 2 期。
⑦格非：《人面桃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41、234 页。
⑧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212 页。

风雨长廊。而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谭功达敢于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并突破重重阻力,建大坝、修水库、试验沼气、规划梅城。可叹的是,巨大的洪水冲垮了新建的普济大坝,淹没了两个乡村的土地,造成了多人的伤亡,谭功达被免去所有职务,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失败者。

张季元、陆秀米、谭功达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不同的革命历程和社会建设实践,但他们的失败又均源于共同的理想。张季元从国外无政府主义那里翻译了他的革命理论,陆秀米从日本引入了她的社会救助模式,谭功达从苏联经验中复制了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模板,这些理论、模式、模板实质上都是西方乌托邦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翻版,都想建设一个消灭剥削、消灭贫困、人人劳动、平等互助、物质丰富、财富公有的理想王国。不论是从柏拉图到 17 世纪的古典时期的实践乌托邦,还是启蒙以降的空间乌托邦,都是不及物的,都没有过真正实现的历史经验,但乌托邦思想又是一种人类应该如此的理想状态,"如果要从我们的世界中彻底消除超越现实的元素,那就会把我们引向一个'如实'的状态,这最终将意味着人类意志的腐烂。……随着乌托邦思想被放弃,人类将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并由此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①陆秀米们正是不愿"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他们才像唐·吉诃德一样把西方的乌托邦思想横向移植到现代化转型中的中国。他们虽然失败了,但在其失败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先进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

其次,纵向继承桃花源精神的失落。花家舍是《江南三部曲》中的一片神奇土地,无论是近代还是当代,这里似乎都能成为一个将要实现的大同之地。花家舍能有如此成就与两个人物分不开:近代的王观澄和当代的郭从年。王观澄原是同治六年进士,点过翰林院,中年后辞官,把花家舍经营成一方世外之地:"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春阳召我以烟景,秋霜遗我以菊蟹。舟摇轻飐,风飘吹衣,天地圆融,四时无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洵然有尧舜之风。就连家家户户所晒到的阳光都一样多。每当春和景明,细雨如酥,桃李争艳之时,连蜜蜂都会迷了路。"②王观澄身处内忧外患的危亡时代,先进知识分子都在积极设计着拯救国家的理想方案,以桃花源理想为核心的大同思想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方案。从旧文人走过来的王观澄自然成了大同思想的追求者和实践者,这让桃花源理想在近代有了某种隐喻的意义。郭从年原是 38 军的副师长,解放后无意仕途,"只身一人回到花家舍,做起了'山大王'",把这里经营得有模有样:"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式的木门花窗,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个竹篱围成的庭院,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远远望去,有些像忍冬,又有些像蔷薇。连庭院的大小和格局都一模一样。一条砖木结构的风雨长廊沿着山坡往上延伸,通往山顶的一座高大的烟囱。"③

可极具吊诡色彩的是,王观澄治下的花家舍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窝子,如此令人钦羡的生活最终变得烟消云散,王观澄也于一场内讧中死于非命。郭从年管理下的花家舍似乎比王观澄的大同世界更进一步地走向了现实,但花家舍公社的建设却是以人性的丢失为代价的。郭从年把一切都置于严厉的监督与管控之下,他成立了如卡夫卡"城堡"式的"101 机构",他在"每一个交通要道,包括广场、学校和邮局,都设立了铁瓯"④,每个人都在检举他人,却同时也被他人检举,形成了一种神秘、恐怖的专制氛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它造就的是整个社会成了一个看

①[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307-308 页。
②格非:《人面桃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115 页。
③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294 页。
④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358 页。

似和谐的监狱，幸福背后是严重的不自由及人性异化。”[①]以社会富足、共有共治、自由自在为理想的大同社会不知不觉中走向了它的反面。

再次，理想精神退藏于心的现实妥协。谭端午是上海某师范院校的硕士研究生。他心气高，有抱负，在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得第一却未被录取，便赌气放弃导师提供的上海工作，“不食周粟，不接嗟来之食，拂袖而去”。然而，就业并非易事，无论是“四处投递简历”，还是参加“用人单位的招聘会”，他“都没有获得面试的机会”。最后，当得知“没人愿意去”的鹤浦矿山机械厂招人时，他“心里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得答应试试看”。这应该算是谭端午研究生毕业后的再次受挫，如果说第一次受挫尚未触及到他的人生自信的话，那么去矿山机械厂就业则无疑给他带来莫大的失望，“百感交集之中，亲人般的情愫，哽在他的喉头”。更糟糕的是，矿山机械厂的工作并不适合谭端午，也或许是他认为秘书工作并非其理想所在，“他来到的这个鬼地方，似乎并不是就业，简直就是被劫持，跟蹲监狱没什么本质的差别”。于是，他决定重新换岗，在朋友的帮助下，调到了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尽管地方志办公室也并非理想之地，但不断受到现实打击之后的谭端午还是接受了这个“既不重要又非完全不重要的单位”。艰难的就业之旅使谭端午在现实的逼仄下一步步放弃抱负，直到在某一天明白“到了今天，诗歌和玩弄它们的人，一起变成了多余的东西”[②]，他便在现实面前妥协。他心中尽管还残存一点诗意，但却早已没有了远方。他虽然也会偶尔听听音乐，向妻子炫耀一下对于“牺牲”的解读，但遇到更多的则是“疑惑”。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作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仿佛它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仿佛它不是对自然的一种凌辱，而就是自然本身；仿佛它未曾与暗夜共生合谋，沆瀣一气，未曾让阳光衰老，让时间停止；仿佛，它既非警告，亦非寓言。[③]

这是谭端午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他一直在守着妥协的边界，既“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④]，也不让现实再侵入哪怕一步，他的思考虽然没有间断，但与年轻时充满理想的豪情相比，此时的思考已仅仅是“思考”，它只停留在谭端午瞬间的反应中，却很少再去触动现实的边界，更没有了实践的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的理想实践不断遭遇失败，但失败的内容并不相同。张季元、陆秀米的理想实践是基于拯救近代中国国家危机的现代尝试，他们敢于从平常人中脱颖而出，甘愿为改变社会牺牲一切，所以，他们的失败在更大程度上是不愿“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的失败。王观澄、郭从年的理想实践是基于中国传统桃花源思想的现代尝试，他们在花家舍的试验其外表上似乎已有大同社会的影子，但是在其内里则或者失于利益之争，或者失于人性的沦丧，均表明这是一场似是而非的理想试验。谭端午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的知识分子，无法在日益发展的当代社会中施展抱负，他不得不将理想退藏于心，以“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的姿态，来表达对现实的某种忧虑。

三、无法让理想“对象化”和“历史化”的认知结构

理想需要坚守，历史需要回顾，失败需要反思。《江南三部曲》是一部跨越百年的家族史，是一部众多人物都不约而同地坚守与追求的精神史，是一部理想实践的失败史。种种理想实践为

①姚晓雷：《误历史乎？误文学乎？——格非〈人面桃花〉等三部曲中乌托邦之殇》，《文艺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②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28、28、44、121 页。

③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348 页。

④格非：《春尽江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107 页。

何会走向失败?我们可以从陆秀米的实践展开讨论。

陆秀米的理想实践最初是从成立自治会开始的。很快,她就成立了普济地方自治会。那时的皂龙寺已经修葺一新,加固了墙体,刷了石灰,更换了椽梁和屋瓦,又在两边新盖了几间厢房。秀米和翠莲都已经搬到了寺庙中居住。他们在那座诺大的庙宇中设立了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和养老院。秀米和她的那些手下,整天关在庙中开会。按照她庞大的计划,他们还准备修建一道水渠,将长江和普济所有的农田连接在一起;开办食堂,让全村的男女老幼都坐在一起吃饭;她打算设立名目繁多的部门,甚至还包括了殡仪馆和监狱。①

这些公共设施是普济此前所不曾有过的东西,也是陆秀米之前不曾经历过的东西。陆秀米努力使它们在家乡变成现实,但"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养老院"究竟为何物,普济人并不理解,也不接受,甚至在这些公共事物面前表现出冷漠的态度。这其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陆秀米在对新社会图景认知上不成熟的一面,也就是说,只把作为结果的各类公共设施当作西方现代思想的物化形式本身来对待,似乎有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具体来说,陆秀米并没有将这种从日本引入的现代思想,加以适当的"对象化""历史化"和"语境化",所以,这种生活图景没有内化为普济人的精神自觉。换言之,对普济人来说,这些现代的公共设施无疑是一堆令人惊奇的"怪物",是与"我"无关的他者存在。由此可见,对陆秀米来说的这种"日本的"想象式的生活图景,还不具备在普济(甚或江南、中国)存在和生长的历史条件。卡尔·曼海姆认为每一种乌托邦思想的缘起都有滋养其自身的历史土壤,这意味着每一种乌托邦思想的兴起其实都包含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它们是为了解决那些现实情境的问题才出现的。每一种乌托邦思想在提供其历史有效性的同时,也同时体现着它的局限性。对于近代中国革命者来说,这种甄别能力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它意味着对西方思想的借鉴,必须从自己的问题语境出发,必须充分考虑到所鉴思想的局限性,必须将西方的思想置于当下中国的语境之中。只有如此,被再次对象化和历史化之后的西方思想,才可能具有在中国语境中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否则,就很容易陷入鲁迅所言"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中国则非也"②的历史困境之中。

陆秀米没有对西方思想做到熟稔的程度,似乎情有可原,可对生长于斯的家乡普济的现状也未达到熟悉的程度,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正是由于她对龙庆棠百变身份的一无所知,直接导致了其革命的失败。龙庆棠是"候补知州",又是"清帮头目徐宝山手下的安清道友会的头目,长期以来,一直把持着镇江、扬州的私盐和妓院"③。辛亥革命时,他又参加革命,被任命为"梅城地方共进会的会长"。就是他,不仅骗取了陆秀米家中的 187 亩田地,还向清廷出卖了她的革命身份,而带领官兵抓捕她的人正是龙庆棠的儿子。陆秀米与他频繁交往,却既不知他的社会根底,也不知他的丑陋人性,甚至她的仆人保琛不断提醒,也未能影响她对龙庆棠的信任。这一方面映衬出清廷的凶险,另一方面也说明陆秀米对革命的复杂性、艰苦性的估计严重不足,以至于在革命中犯了与上述简单化地看待西方思想相类似的错误。以此观之,陆秀米的失败是一种必然的失败,而且是一种全方位的失败,这是她不熟悉普济的现状、没有把公共设施的建设与普济的现实相结合而导致的失败,也是她对革命的艰苦性未能做出明确的研判、轻信龙庆棠而导致的失败。

犯类似错误的并非陆秀米一人,张季元基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革命、王观澄基于桃花源理想

①格非:《人面桃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193 页。

②鲁迅:《鲁迅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7 页。

③格非:《人面桃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246 页。

的花家舍、谭功达基于苏联农庄的社会主义建设等种种失败，没有一个不与实践主体对理想的片面化、简单化理解有关。再以谭功达为例，他把社会主义建设狭隘地理解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农庄，他在梅城的建设同样犯了“水土不服”的病症。谭功达盲目相信苏联模式，只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想象，只是想尽快把这一“空中楼阁”式的生活图景变成现实，但是他对梅城的现状却缺乏充分认识。譬如，财政是否紧缺、发电机组供货是否正常、村民们对待堤坝建设是否存在不满情绪、领导班子成员是否团结等问题，他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调研。尤其在普济水库的修建上，议案虽已提出，但“大会小会开过十多次，响应的人寥寥无几”。许多人都正式或侧面地提醒他，他却置若罔闻。主管水利的副县长赵焕章正面提出反对意见：“眼下连年饥荒，县财政入不敷出。刚刚上马的铜管厂、水泥厂都濒临倒闭，河道要疏浚，灾民要救济，军烈属要抚恤，学校要新建，教师要工资。这大坝一修，少不得要淹掉几个村庄，移民安置费从哪里来？”他的老战友钱大钧曾给予善意的暗示：“那不是一个便宜的买卖。伤筋动骨，吉凶难测，万一弄出个三长两短，只怕是不好收场。”他的老上级聂竹风也对这件事情“极感踌躇”，即使在答应支持之后，也不忘劝导他说“凡事可缓不可急”，并明确告知：“万一弄他个坝塌堤崩，水淹七军，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你可不能指望我再来帮你擦这烂屁股。”①所以，谭功达的乌托邦想象最终和普济水库一起崩溃了，崩溃得那么干脆，那么彻底。

在几位主人公中，谭端午似乎是一个特例。对谭端午的考察应同样放在 20 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那是一个重提启蒙、重视理性的时代，是一个在中国大地已经吹响实现四个现代化号角的时代，这一深刻的历史命题不仅凝聚了那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培养了他们对现代理性的亲切感，更形成了他们围绕现代理性去建构人生意义的认知方式，如“我长大了要当……”的豪言壮语，就是这一认知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体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经济形态，并连同其他相关经济关系也发生较大变化时，80 年代语境中的现代理性便开始受到种种质疑，尤其当市场经济也被解释为是现代理性的一部分时，那些曾以 80 年代思想为起点的人们如何能立即接受！谭端午从对市场经济的怀疑走向对理性精神的怀疑，他在情绪“完全失控”中和导师发生“激烈的争吵”正是这种怀疑的症候表现，而对理性精神的怀疑也让他最终走向了自我隔绝。谭端午与陆秀米、谭功达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失败之路，他们对理想的态度也不尽相同。陆秀米们对理想孜孜以求，谭端午则放逐理想否定理性，但他们在不同的失败路径中却似乎有着共同的根源。他们都没有追问其乌托邦思想产生的历史境遇，也没有把这特定历史境遇中产生的理论——包括它的历史有效性和局限性——置于当下的现实，没有让这种理论成为被“我”观照过和反思过的理论，没有让其重新历史化和对象化。

综上所述，从张季元、陆秀米到谭功达、谭端午，小说众多人物不同的失败中隐含着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虽然培养出了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现代意识、自我意识和责任意识，但也不可避免地遮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以至于他们无法掌握所借鉴理想的整体意蕴，也很少调研自己所处语境的现实情况，从而成为众多人物各种理想实践失败的认知因素。作者曾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反省，不光是社会、历史，还有我们自身的生活及其意义。”②对上述知识分子认知模式的考察，或许也是反思“我们自身的生活及其意义”的一部分内容吧。

①格非：《山河入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年，第 12、12、13、14 页。

②格非、张清华：《如何书写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当代——关于〈春尽江南〉的对话》，《南方文坛》2012 年第 2 期。

结语

江南的意蕴是丰富和多元的。它自古就是中国的富庶之乡,但与此同时,它还是承载着中国文明历史的文化之乡,还是当时代变迁之际,“文化意义上的‘地’使得此地之‘人’始终秉承着浓厚的优越感和历史记忆”①的记忆之乡。格非曾说,相较于“乌托邦三部曲”,他更愿意用“江南三部曲”的标题,恐怕正与江南这一名词自身所包含的深刻意蕴相关。《江南三部曲》是一部反思之作,它的思考是多元的:或者是江南百年的历史,或者是知识分子的百年命运,等等。借由人物的失败人生,思考百年来知识分子的认知局限虽不是新命题,但意义非凡。

考虑到近代中西文化交融渗透这一背景,知识分子新的认知结构并不容易建构。张季元、陆秀米和谭功达等人的种种实践,之所以会遭遇种种挫折,主要是因为:对外,他们未能认真研究西方现代思想以及其发生、发展的各种历史要素;对内,他们未能详细了解致使中国落后的各种历史之因与客观要素。谭端午所遭遇的精神困境表明,当代知识状况依然没有脱离这一脉络,所以,对认知结构的揭示不仅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发展问题的重新思考,同时也涉及到当代精神如何拯救的问题。以此来看《江南三部曲》,这或许是其另一价值所在!

Narration of Failures and Cognitive Structure of *Jiangnan Trilogy*

Ma Zhijun

(School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Abstract: *Jiangnan Trilogy* is Ge Fei's representative work after his change of writing style in the new century. The author turns back to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narrates the centenary history of a family in a Jiangnan waterside town with the blood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s as the link.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history, the novel regulates the plot not to develop into a "legend".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explicit plots of sex, violence and madness of lots of characters, the novel employs the narration of the implicit process to attract the readers to focus on the various failures of their ideal practices. There are no winners in the novel, and failures have almost become everyone's unavoidable historical destiny, but the contents are diverse: Despite of failure, Zhang Jiyuan, Lu Xiumi and Tan Gongda's attempts to modernization are the patriotic expression of China's advanced intellectuals; Wang Guancheng and Guo Congnian's ideal practices seem successful, but they eventually go to the opposite of the ideal itself; Tan Duanwu gets lost in the predica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spirit, but maintains a weak ideal with the attitude of "refusing to follow". The failure of the character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ir in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thoughts, but also to their unfamiliarity with China's reality. Theref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revelations is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piritual value depends upon both the intellectuals' concern for the reality and their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thoughts.

Key words: Ge fei; *Jiangnan Trilogy*; implicit process; cognitive structure; narration of failures

责任编辑:李宗刚

①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页。

从“文本阐释”到“自我阐释”
——王阳明经典阐释学思想的实践性品格*①

李春青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631)

摘要: 在儒学经典阐释学的历史上,“汉学”与“宋学”分别代表两种阐释模式。前者坚持“章句训诂”之路,称为传注或注疏之学,以“我注六经”为己任;后者则坚持“发明本心”门径,名曰心性之学,以“学作圣人”为鹄的。在“宋学”系统中又有两种不同的阐释方式:一者以程朱为代表,主张从文本阐释而达于自我阐释,所谓“格物致知”;一者以陆王为代表,主张以自我阐释统摄文本阐释,所谓“致良知”。王阳明关于“自我阐释”有系统阐述,在突破传统儒学思维方式、张扬个体主体精神方面起到了划时代作用。

关键词: 王阳明;经典阐释学;文本阐释;自我阐释;阐释的实践性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4-0048-12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05

引言:文本阐释与自我阐释之形成

儒学的基本言说方式是阐释,孔子的“述而不作”说已经为后世儒家作出了选择。先秦儒家通过阐释两周贵族的“王官之学”而建立儒学,两汉以后的儒家通过阐释经过先秦儒家整理和阐释过的“王官之学”建立经学,从而形成了被后世称为“汉学”的经典阐释传统,并且一直延绵不绝,直至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被后世称为“宋学”的新的阐释模式出现,这才有了“汉学”“宋学”两种阐释模式并驾齐驱的局面。②“汉学”“宋学”之所以成为两种不同的经典阐释模式,根本上乃是因为二者有着不同的阐释目的:“汉学”旨在追问经典文本之“真”,“宋学”旨在发明经典文本之“用”,可谓大异其趣。宋代儒者志向高、气魄大,一流人物都有成圣成贤的自我期许,原来那种“我注六经”式的“汉学”阐释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就有以探讨“心性义理”为基本旨趣的“宋学”应时而生了。如果章句训诂之学或云传注之学力求按照文本固有的语言逻辑复现经典意义,那么“发明本心”的心性之学则力求依据阐释者自身本自具足的心性逻辑重构经典意义,如果说前者可以称之为“文本阐释”,那么后者就可以称之为“自我阐释”。然而如果细加推敲,则所谓“文本阐释”并非真的完全“复现”文本固有意义,在这里依然存在阐释者的“创造性”理解因素。正因为如此,对同一部经典的传注,不同人就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果。我们只是

* **收稿日期:** 2020-06-11
作者简介: 李春青(1955—),男,北京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阐释学的中外话语资源、理论形态研究与文献整理”(19ZDA264)的阶段性成果。

②在清儒所谓“汉学”与“两汉经学”并非可以互换的概念。“两汉经学”是大一统政治格局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士人阶层和君主集团协商的产物,有着强烈的政治性与功用性;“汉学”则主要是指一种以章句训诂为基本手段的经典阐释方法。同样,“宋学”也不等于“宋代儒学”或“道学”“宋明理学”等。

就整体倾向与主观意愿上看,此种阐释是指向作者原意或文本本义的。“自我阐释”也并非不顾经典文本的任意言说,只是不那么严格地顺着文本给出的逻辑言说而更多地加进了自我理解而已。“文本阐释”是对文本已经说出来但由于年代久远或文字表述的原因还不够清晰明白的意义的阐释;“自我阐释”是对文本没有说出来,但根据阐释者所秉持的某种逻辑似乎有可能说出来的意义的阐释。因此,对于“自我阐释”来说,作为阐释对象的经典文本起到的是激发的作用——激发起阐释者之“本心”。

由北宋中叶至明末清初,“道学”或云“理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和地位与日俱增,最终成为主流。整体来看,无论是所谓“北宋五子”之学还是紫阳、湖湘之学,抑或是象山、阳明之学,其根本目的都是“学作圣人”——自己作圣人,也教别人作圣人。换言之,追问经典文本的本义或圣人原意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是要借助于古代经典来达到自我修养和自我提升的目的。但是,在“宋明理学”的内部又存在着不同的阐释路径,换言之,目的虽然一致,但实现目的的方式却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王阳明与朱熹之间得到了集中体现。简单说来,朱熹的“自我阐释”建立在“文本阐释”的基础上,借用余英时评价章学诚的话来说,叫作“‘尊德性’中的‘道问学’”①;王阳明的“自我阐释”则超越于“文本阐释”之上,是统摄了“道问学”的“尊德性”。在王阳明这里,无论是读书解经还是人伦日用,一概被纳之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自我阐释”之下,“知”即是“行”,“行”即是“知”,所谓体用不二,显微无间,了无间隔。

在儒家经典阐释史上,孟子是“自我阐释”的先驱者,王阳明是完成者。孟子的“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②之说开启了儒学“发明本心”“存心养性”之先河,陆象山的“心即理”、王阳明的“性即理”“致良知”之说则使“自我阐释”成为中国古代经典阐释学之最高形式。从孟子到王阳明,形成了儒学中最具有主体精神、最接近于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谓“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思想脉络。③

一、王阳明面临的问题及其经典阐释学思想之形成

在王阳明的时代,儒学已经发展演变了近两千年之久,其生命力之强举世罕有其匹,然其积弊之深亦为必然之事。就明代而言,在王阳明生活的弘治、正德年间,当年活力无限的程朱理学已经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和读书人猎取功名的工具,其原有的那种活泼泼的主体精神已然渺不可见了,呈现的是一个万马齐喑、了无生气、邪说横行、令人窒息的时代:

> 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④

>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

①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75页。

②《孟子·告子上》,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0页。

③[美]埃里希·弗洛姆在《精神分析与宗教》一书中提出“人道主义宗教”和“权威主义宗教”的区分;在《自为的人》一书中提出“人道主义伦理学”与“权威主义伦理学”之区分。“权威主义”带有强迫、硬性规定的意思;人道主义则是指自由自觉的自我选择。

④王守仁:《别三子序》,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尊经也乎！①

这一现象令王阳明痛心疾首，而如何重新为日益知识化、教条化的儒学注入生命力，打破人人说假话、空话的现状，就成为王阳明一生之追求。他所念兹在兹的问题就是如何打破这种“乱经”“侮经”“贼经”局面，他建立起来的阳明心学确实把儒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义理方面看是如此，从言说方式方面看同样是如此。他的经典阐释学思想也据此而形成。

就言说方式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儒学理解为一种“经典阐释学”，因为从孔子开始，对经典的阐释就是儒学建构自己意义系统的基本手段。而且，儒学除了传、说、论、注、笺、疏、章句、衍义等多种形式的经典阐释实践之外，还有极为丰富的阐释思想与成熟的阐释方法。从历史看，在儒家经典阐释学中，“文本阐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即使是在以“自我阐释”为主的“道学”出现之后，“文本阐释”也还是有着很大影响。程颐和朱熹所理解的“格物致知”之说就包含着对经典的文本阐释。在他们看来，阅读和阐释经典文本正是“格物致知”的重要方式。这种情况到了陆象山才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在他的思想中，“本心”成为核心概念，“格物致知”之说被摒弃，不仅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发明本心”，而且治学的手段也是“发明本心”。那么，什么是“本心”呢？

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②

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③

可见，陆象山所说的“本心”也就是孟子“求放心”之“心”，“心之官则思”之“心”，亦即仁义礼智之“四端”，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是世上一切善的本原。在孟子看来，一切学问都是为了把被物欲遮蔽的“心”找回来，这就是“求放心”，也就是“存心养性”。孟子这一思想在由秦汉及隋唐五代的 1000 多年中影响甚微，只是到了北宋中叶，理学兴起，才重新受到儒林普遍关注。但是，在“北宋五子”和朱熹那里，“心”固然重要，却始终有一个与之势均力敌的概念存在，这就是“理”或“天理”。尽管二程、朱熹都试图将“心”与“理”统一起来，但始终难以做到圆融无碍。程朱理学话语系统中的“心”是内在的，“理”是外在的，通过“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的工夫，人的内在之“心”可以把握万事万物外在之“理”，最终方可达到内外统一。陆象山把“心”与“理”的界限彻底消除。在他这里，“心”就是“理”，二者浑然一体，所谓“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④。“心即理”是个响亮的口号，标志着陆象山倡导的“心学”与程朱理学的根本分歧。基于此，他们对经典阐释也就有着不同的理解。象山云：

大抵读书，诂训既通之后，但平心读之，不必强加揣量，则无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励之功。或有未通晓处，姑缺之无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则自然日充日明，后日本原深厚，则向来未晓者将亦有涣然冰释者矣。⑤

这就是说，阅读和阐释经典的重点不在于通晓文本意义，而是为了涵泳自家心性，久而久之，能够发明本心，则文本中一切未明之义都自然明了。相反，如果像传统的传注之学那样，文本意义越是晦涩难明，就越是“强探力索”，那就是“徒耗其精神”的愚蠢之举了。

---

①王守仁：《稽山书院尊经阁记》，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235 页。

②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一），钟哲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9 页。

③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六），钟哲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487 页。

④陆九渊：《陆九渊集》（卷十六），钟哲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49 页。

⑤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七），钟哲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92 页。

王阳明是在陆象山的基础上来思考经典阐释问题的。他进一步强化了“心”的主宰作用,不仅把“道”“天理”“圣人”一概统摄于“心”之中,而且认为天地万物也都是心造之物;不仅接受了象山“心即理”思想,而且进一步提出“性即理”以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之说。因此对他来说,经典也就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 《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①

这段话看上去似乎是重复《庄子》“得鱼忘筌”之喻,其实不然。《庄子》那里是通过指出“道”的不可言说性和语言的局限性,从而说明“道”的神秘莫测、玄奥幽眇。而王阳明这里则是借助于这个比喻说明,无论是阅读经典还是阅读对于经典的阐释,要点都在于“得其心”,否则就会像把“鱼”和“筌”混为一谈那样愚蠢可笑。王阳明这一论说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他所面对的,一是汉唐以来的以章句训诂为基本手段的经典阐释传统,把追求经典文本之本义作为最高目标;二是宋明理学中的二元论和客观知识论倾向,认为《五经》之中包含着“道”“天理”,可以通过阐释经典得到。

这里实际上涉及“文”与“道”的关系这一中国文论史上的古老话题。一般来说,古代儒者普遍认为“文”是传道的工具,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是有代表性的。其他诸如“文以明道”“文以贯道”“文与道俱”“文道合一”等说法固然有内在差异,但总体观之都是坚持“道”可以通过“文”而得以传达。人们可以通过“文”的中介获得“道”。然而在王阳明这里,这种观点被超越了——“道”并不在“文”中,在“文”中求道就像在“筌”中求鱼一样可笑。请看下面的对话:

>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②

王阳明把“道”归为“心体”,否定了其为外在于人的自在之物的可能性,它只能存在于人的心体之中,是“心”的一种当下状态,因此只能靠在自家“心体”上用功才能得到它。所谓“得到”并不是像得到某个东西或道理那样占有它,而是自己成为它,也就是为其所占有。这是阳明学的关键之点。所谓“心体”也就是孟子“心之官则思”之“心”,他决定人的选择,是“先立其大者”的那个判断者和决定者,是能思之主体。用牟宗三的话说则是:“此本心如不为见闻(耳目之官)所拘蔽,自能体天下之物而不遗而为其体。此是一绝对普遍的本体。心即是体,故曰心体。此是主观地、存在地言之,由其体物不遗而见其为体。”③对于这个“心体”显然是无法在“文义”中寻觅的,只有当下体认方能使之呈现。因此,经典的意义并不在于“载”或“传”或“贯”那个“道”,而在于通过讲述具体事件或设置某种情境激发阅读者和阐释者在自家心里呈现出这个“道”。“道”就是那种纯一无伪的当下心体。如此一来,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甚至朱熹的“文道合一”说就被超越了。看上去王阳明此论确实有近于“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家思想,但深入体

①王守仁:《五经臆说序》,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765 页。

②王守仁:《传习录上》,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14 页。

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478 页。

察，则并不违背儒家宗旨。

按照王阳明的逻辑，包括“道”“天理”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一切存在物都无法离开“心”而存在，有“心”然后有世界，有万物。天之高是因为有“心”去“仰他高”；地之深是因为有“心”去“俯他深”①。如果把这个“心”理解为“意向性”之先验主体，我们肯定会觉得王阳明就是中国的胡塞尔。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王阳明与胡塞尔完全是在不同意义层面讨论问题的，尽管二者确实存在着深刻的一致性，但是他们赖以言说的问题域是截然不同的。简单言之，胡塞尔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讨论意向性与世界的关系的，要解决的是西方传统的“主客体对立模式”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王阳明是在价值论意义上讨论“心”与“物”的关系的，所要解决的是如何使儒学真正发挥其淑世作用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世上流行的说一套、做一套的“知”“行”分离的问题。对于二者的根本性差异，我们只要深入了解王阳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等观点的真正意义就很清楚了。

二、“致良知”与经典阐释

“良知”是孟子提出的概念，指“不学而知”的本能，但不是一般的本能，而是道德本能，具体说就是“四端”。孟子讲性善，认为“仁义礼智”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能力是人人具足且生而有之的。但这些“善端”很微妙、脆弱，很容易被物欲所遮蔽，即《大禹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因此需要人人自觉呵护，这便是“存其心，养其性”。孟子学说的全部逻辑均由此展开。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基本上就是在孟子的逻辑框架中展开的。从字面上看，“致良知”并没有什么深奥之处，就是“使自己达到良知状态”或者“使自己的良知呈现”的意思。牟宗三说：“故阳明之良知，以今语释之，可说即是那能够自己去形成一内在的道德决断之超越的、实体性的、本体论的‘智的觉情’。”②结合牟宗三上下文的论述来看，所谓“智的觉情”是指一种处于当下情感体验中的道德判断力。陈来认为王阳明的“良知”就是孟子的“四端”，并且特别突出其中的“是非之心”，差不多是把“良知”归结为“是非之心”了，因此在王阳明这里，“良知是每个人先验的是非准则”③。这都是很精辟的见解，确实把握住了王阳明“良知”概念的要点所在。王阳明通过对“良知”的重新标举和阐发，使日益知识化、教条化的儒学重新焕发朝气，而从经典阐释学的角度看，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也具有划时代意义。请看他对经典阐释的理解：

> 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④

王阳明的意思是经典阐释的意义乃在于启发人本有之良知，而不在于使人陷于文本逻辑而不能自拔。盖以往的经典阐释往往务求弄清楚经典文本之意义，阐释者致力于梳理文本的逻辑轨迹与意义线索，看其是否圆融自洽，是否有过于前人之见，而忘记了阐释目的之所在，在王阳明看来，这就是“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不独不能使“良知”呈现，反而成为其障蔽。这就与人们阅读经典的初衷南辕北辙了。这里王阳明的观点十分明确：经典阐释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弄清楚文本本义，也不在于挖掘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意义与关联，而是为了“发明本心”或“致良知”，因

①王守仁：《传习录下》，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117 页。

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54 页。

③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67 页。

④王守仁：《答季明德》，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197 页。

此,阐释的基本路径也就不是传注训诂,而是“自得”。他说:“大抵训释字义,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奥蕴,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语所能喻。后人多有泥文著相,专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从法华转也。”①文字训释只是经典阐释的入门而已,真正有意义的阐释则不假外求,全凭自得。“自得”一词也是出自《孟子》:“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离娄上》)意思是使自己心里固有的东西显现出来。那么,在经典阐释中如何才能做到“自得”呢?这就需要更具体的方法——体认和涵泳。换言之,“体认”和“涵泳”乃是“自得”即“发明本心”亦即“致良知”的基本方法。王阳明论“体认”云:

> 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切忌轻自表襮,引惹外人辩论,枉费酬应,分却向里工夫。②

由此可知,所谓“体认”就是“自己身心上理会”,是“向里工夫”。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自己全身心投入其中,使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熔于一炉。在王阳明看来,对于“良知”或者“天理”只有如此“体认”方能真正把握。这里的关键在于:不是自己认识到或理解了它,而是自己进入它之中,成为它,换言之,不是自己占有“天理”和“良知”,而是自己被“天理”和“良知”所占有:

> 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③

“圣人气象”或“孔颜乐处”是道学家一心向往的人格境界,道学所谓“作圣之功”,其归趣正在于此。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传统章句训诂式的读经解经最多只能使人知道圣人有这种境界,至于这种境界究竟如何,那是根本无法确知的,更不用说达到了。因此只有通过切记体认,让自己达到这一人格境界,使圣人气象成为自己的气象,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它。在这里,只有“达到”才能“了解”。因此对于“良知”的理解也就不能离开“体认”:

> 体认者,实有诸己之谓耳,非若世之想像讲说者之为也。近时同志,莫不知以良知为说,然亦未见有能实体认之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盖有谓良知不足以尽天下之理,而必假于穷索以增益之者。又以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于天理,须以良知讲求其所谓天理者,而执之以为一定之则,然后可以率由而无弊。是其为说,非实加体认之功,而真有以见夫良知者,则亦莫能辩其言之似是而非也。④

与“圣人气象”“孔颜乐处”一样,“良知”根本上也不是认知的对象,无法通过“想像讲说”来理解。“近时同志”的错误就在于试图通过推究义理、辨析同异来理解“良知”的含义,殊不知“良知”根本就不是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存在,站在外面看永远也不会真正知道它是什么,唯有“切记体认”,进入其中,达于其境,方能真正领略其奥妙。比“体认”更形象的说法是“涵泳”,这是宋明儒者常常挂在嘴边的词语。所谓“涵泳”,本义是深潜于水中游泳,引申的意义是全身心沉浸其中,切切实实、全方位地感受和体察。

综上所述,如果说程朱理学的经典阐释是指向“天理”的,那么阳明心学的经典阐释则是指向“良知”的;如果说“天理”还带有某种外在性,包含着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那么“良知”则全然是人的内在性存在,是人的本然天性。或许人们还是难免要进一步追问,此“良

①王守仁:《与黄勉之·二》,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80页。
②王守仁:《传习录下》,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26页。
③王守仁:《传习录中》,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56页。
④王守仁:《与马子莘》,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00-201页。

知”究为何物？它是不是等于或近于康德实践哲学中那个能够自我立法的“先验自我”？让我们来看看王阳明的说法：

>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工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问。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①

此“良知”并非见闻之知，倘若试图在见闻之知中寻觅“良知”，那是找不到的。但是，“良知”又并非离开人们日常见闻之知而存于别处的另一种“知”，而是就寓于见闻之知中。就其体言之，一切的知无非“良知”，此外别无他知；就其发用言之，则见闻之知均系之于某具体事物，千差万别，层出不穷，难以数计。这就是说，“良知”不是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而是“知”之“体”。“见闻之知”固然均为“良知”之发用，但却无法从“见闻之知”中寻找“良知”。在王阳明看来，传统的经典阐释，无论是经古文学的文字训释还是经今文学的发掘微言大义，都是在“专求之见闻之末”，与儒学“致良知”之旨背道而驰，均非“圣人教人第一义”之学问。那么，既然“良知”是“体”而非“用”，是否是一种老庄的“道”那样神妙莫测的东西呢？或者类似于西方古典哲学中“理念”“唯一实体”“绝对精神”之类的精神实体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王阳明的“良知”其实不过是人们在人伦日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常识与共识而已，或者说，就是人们后天习得，为社会认可的伦理准则。我们来看下面的对话：

>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②

王阳明这里的“真格物”与朱熹所理解的“格物”不同，不是对外在事物的了解与认知，而是对自家心理状态的监控与调整，即是“致良知”之义。③ 在王阳明看来，“格物”或“致良知”或“体认天理”等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在内心里恪守一个原则，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不偏不倚、中道而行。“致良知”不是一种独立的修行工夫，而是在具体的日常事物中时时处处践履。“良知”是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力，可以在临事时保持公正态度从而作出恰当判断。而“怒心”“喜心”“加意”“屈意”“随意”等皆为私心私欲，是人们作出正确判断和决定的障碍。因此，克服这些私心私欲公正断案，就是真正的“格物”，也就是“致良知”了。治狱断案是如此，其他任何事情无不如此。“良知”究竟从何而来？它不是什么神秘之物，只能是内化为潜意识的共识和公理，可以使

①王守仁：《传习录中》，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67-68 页。

②王守仁：《传习录下》，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89 页。

③例如，王阳明曾说：“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王守仁：《传习录中》，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79 页。

人不加思考地作出恰当的判断,并决定其行为方式。这些共识和公理并不是某个可以高度概括的抽象原则,而是无数个具体道德准则,人们长期浸润其中,久而久之,内化为某种类似于“心理定势”的潜意识,当人做事时,它就会自发发挥作用。人们需要做的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让私欲遮蔽这种内在化了的共识和公理,这也就是“致良知”。据说,冯友兰和熊十力关于何为“良知”曾经有过一次有趣的交锋。冯友兰说“良知”是一种“设定”,熊十力听后勃然大怒,说“良知”是“呈现”,怎能是“设定”!无论真假,这段简短的对话显示出中西哲学的某种根本性差异。把“良知”理解为“呈现”是真正弄懂了阳明心学的人才能够得出来的见解。“呈现”什么?当然不是什么“先验主体”,也不是什么有善无恶、纯一无伪的所谓“性”,只能是那种内在化为潜意识的共识和公理。因此,所谓“致良知”根本言之,也就是“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的意思①,也就是“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意思。②

儒学根本上就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到了明代中叶,这门学问已经传承两千年之久,其基本人伦准则早已深入人心,成为无需讨论的常识和公理,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之类的道德准则,即使不识字的农民、工匠也都耳熟能详并成为他们日常恪守的行为规范。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其实只是要人们时时刻刻遵循这些人人皆知的人伦规范做事而已。所以,他说:

> 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天地以位,万物以育,将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所入而弗自得也矣。③

显然,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必定在儒家伦理早已深入人心的历史语境中才是可能的。从学理上讲,阳明心学可谓至易至简,较之“北宋五子”那种“浑然与物同体”“民胞物与”的人格境界似乎远有未及,但是从实践角度来看,则阳明这种时时刻刻依据共识与公理做事的“致良知”的工夫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过去人们常常说宋儒“陈义过高”,实际上鲜有至之者,言之在理。那种“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的超迈境界和“于静中觉物皆有春意”的仁爱心怀都是“圣人气象”之流露,绝非为名缰利索束缚的芸芸众生所能梦见。此种人格高度或许只有少数“慧根”之人才能达到。王阳明有见于此,其“致良知”之说实际上是为一般人提出的,用老百姓最简单的日常用语来说,所谓“致良知”其实就是“凭良心做事”的意思。④ 可见,“致良知”并无高深的学理与复杂的修炼过程,只要当下自觉便可。因此,王阳明说:“凡工夫只是要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⑤

从经典阐释的角度看,王阳明的“致良知”可以说是最典型的“自我阐释”——解读经典文本不是为了寻找微言大义,而是为了使自己本自具足的“良知”得以呈现。因此,王阳明反对那种泥于文义的章句训诂式阐释方式:“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

①王守仁:《传习录下》,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

②王守仁:《传习录下》,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93页。

③王守仁:《书朱守乾卷》,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④阳明心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简易明了,根本上就是要求人们按照通行的道德准则做好人。他曾说,不仅《诗三百》可以概括为“思无邪”,而且《四书五经》都包含在这三个字之中了。

⑤王守仁:《寄安福诸同志》,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05页。

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①]显然，王阳明是为了打破儒学经典阐释传统中日益知识化、工具化倾向，重新激发起儒学原有的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阳明心学的确是儒学之正宗，实得思孟学派之嫡传。

三 “知行合一”的阐释学意义

从整体上看，阳明心学不是义理之学，即不是求知的学问，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求用之学。因此，作为其核心思想的“致良知”并不指向学理，而是指向行动。所谓“知行合一”，并非与“致良知”并列的另一种学说，而是“致良知”的另一种说法，或者准确地说，是“致良知”的另一面。我们还是来看看王阳明的说法：

>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②]

真正的“知”等于“行”，真正的“行”等于“知”，二者原本就是一件事，只是从不同角度看而已。王阳明崇尚易简之学，善于抓住关键和根本之点，有所谈论往往明快直接，一语中的。“知行合一”四个字高度概括了孔孟以降千百年儒学之要旨。儒学是为人世间立规矩的学问，也就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君如何做个君，臣如何做个臣，父如何做个父，子如何做个子。这就是孔子和荀子“正名”之说的主旨。在儒家看来，一旦这套规矩为包括君主在内的世人所接受，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汉以降，历代经学苦苦探寻字音字义、名物度数，讲师承，分门户，或以经典为文辞之材料，科举之工具，都严重背离了原始儒学之初衷。王阳明正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深恶痛绝，标举“知行合一”口号，以此来针砭时弊，挽救儒学。对于儒学来说，王阳明之功甚至堪比其先秦的那几位缔造者。“知行合一”的前提是这里的“知”必须是“德性之知”而非“闻见之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个“知”是道德论意义上的“知”而非认识论意义上的“知”。“知”意味着某种“呈现”，也就是“存在”。王阳明说：

>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③]

“一念发动”之所以便是“行”，是因为对于道德行为而言，动机或意图具有重要意义，它已经是“行”的组成部分了。从更深层次上说，“一念发动处”也就是“良知”之呈现处，不仅“知善知恶”，而且在“为善去恶”了。这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本之点，因此，“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牟宗三说：“阳明言‘致’字，直接地是‘向前推致’底意思，等于孟子所谓‘扩充’。‘致良知’是把良知之天理或良知所觉之是非善恶不让它为私欲所间隔而充分地把它呈现出来以使之见于行事，即成道德行为。”[④]可谓知言之论。

从经典阐释的角度来看，“知行合一”四个字可以看作是王阳明解读一切经典文本的基本原则。换言之，王阳明对经典文本的阐释总是以“知”与“行”的统一性为入手处的。让我们来分析

---

①王守仁：《五经臆说十三条》，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854 页。

②王守仁：《传习录中》，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40 页。

③王守仁：《传习录下》，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91 页。

④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 8 册），《牟宗三先生全集》，中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年，第 188-189 页。

下面这段对话: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①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是《论语·雍也》中的话,朱熹注云:“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又引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②朱熹和程颐的解释都是“随文解义”,应该是符合《论语》字面意思的。王阳明的阐释则不同,他把“礼”训为“理”,把“文”与“礼”的横向关系置换为“文”与“理”的纵向关系,如此“文”与“礼”便被统一起来了。在程朱那里,“文”是“文”,“礼”是“礼”,前者指经典文本,后者指礼仪形式,是不同的两件事。而在王阳明这里,此二者都成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具体表现了。这种阐释虽然与《论语》原文的字面意思不尽吻合,但逻辑上亦可贯通,并不相悖。王阳明从“知行合一”宗旨出发,对宋儒常常论及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说也有全新的阐释:

先生曰: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问致广大二句。曰:尽精微即所以致广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极高明也。盖心之本体自是广大底,人不能尽精微,则便为私欲所蔽,有不胜其小者矣。故能细微曲折,无所不尽,则私意不足以蔽之,自无许多障碍遮隔处,如何广大不致?又问:精微还是念虑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虑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③

“尊德性而道问学”出自《中庸》,原文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郑玄注云:“德性,谓性至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④朱熹注云:“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于天之正理。道,由也。温,犹燖温之温,谓故学之矣,复时习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⑤综合汉儒、宋儒之注可知,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就是说通过学习关于“道”或“诚”的知识而获致高尚品德的意思。⑥ 无论是汉儒还是宋儒,都把“道问学”与“尊德性”视为二事,前者是路径,后者是目的。但到了王阳明这里,在“知行合一”的阐释框架之下,二者被理解为一件事。仔细体会,王阳明的见解实为不刊之论。在道德修养或人格自我提升的意义上说,“道问学”与“尊德性”确实无法分拆,学即是修,修即是学,不

①王守仁:《传习录上》,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6页。
②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30页。
③王守仁:《传习录下》,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15页。
④孔颖达:《礼记正义》,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55-1456页。
⑤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51页。
⑥《中庸》中的“诚”即指“道”而言,所谓“诚者,天之道也”。

是先学了然后再去修。正如王阳明所言，知了就是行了，知而不能行，实际就是不知。恰如“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样，“好”与“见”实为一体，“恶”与“闻”不为二事，并非先看见了再生个心去“好”，先闻到了，再生个心去“恶”。① 在这里，并没有先后之别。“知行合一”作为阅读和阐释经典文本的一个重要原则，其价值就在于打破停留在“文义”层面的经典阐释传统，把阐释变为一种切切实实的实践行为，从而改变当时士林中言行不一、伪道学盛行的状况。

结语：王阳明经典阐释学思想的实践性品格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说所给出的经典阐释框架集中彰显了阐释的实践性问题。在西方，无论是古代的法律阐释学、语文阐释学还是 19 世纪出现的一般阐释学，就其自我理解而言，都是旨在解决如何避免误解而准确地理解文本原义的问题。也就是说，阐释属于“认识”范畴而不属于“实践”范畴。但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他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即存在论意义上考察阐释问题的，因此阐释本身的“应用”问题被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伽达默尔指出：

> 如果我们反复思考一下，我们将达到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理解中总是有某种这样的事情出现，即把要理解的文本应用于解释者的目前境况。这样，我们似乎不得不超出浪漫主义诠释学而向前迈出一步，我们不仅把理解和解释，而且也把应用认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的组成要素。②

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应用”的过程，而所谓“应用”就是把所理解的文本意义用之于阐释者的目前状况。伽达默尔分析了传统的法律阐释学和神学阐释学，结果发现：“理解在这里总已经是一种应用。”③不管是法律文本，还是福音布道文本，一旦它们被阐释，也就一方面被理解，一方面发挥着其特有的作用，从而使阐释过程成为一个包含着理解、解释和应用三种基本要素的事件。其他的一切文本阐释也都是如此，伽达默尔举例说：“如果不理解原文的本来意义，并且在自己的再现和解释中不表现这种意义，那么没有人能演一出戏剧、朗诵一首诗歌或演奏一曲音乐。”④意思是说，一个表演者既要理解其所要表演的文本意义，还要表现这种意义，而表现就意味着应用。简言之，应用不外在于或者后于阐释过程，而是就在这个过程之中，阐释不仅是“知”（理解）的过程，而且还是“行”（应用）的过程。由此可见，伽达默尔关于阐释学之“应用”的观点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经典阐释原则确实存在相近之处。

在中国，就其主流来说，两千多年的经学阐释传统也同样是要弄清楚经典文本究竟说了什么，有什么微言大义。至于阐释的“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属于阐释本身。在王阳明看来，这是把“知”和“行”分为两截了。离开了“行”的“知”和离开了“知”的“行”都是有悖于儒家真精神的，换言之，真正的儒学是无法将二者分开的。请看下面的对话：

> 门人问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学之，又说个笃行之，分明知行是两件。先生曰：博学只是事事学存此天理，笃行只是学之不已之意。又问：《易》学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学存此天理，则此心更无放失时，故曰学以聚之。然常常学存此天理，更无私欲间断，此即是此心不息处，故曰仁以行之。又问：孔子言知

①王守仁：《传习录上》，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年，第 3-4 页。
②[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35-436 页。
③[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37 页。
④[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439 页。

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两个了。先生曰:说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为私欲间断,便是仁不能守。①

这里门人的“问”不可谓不尖锐,王阳明的回答虽然看上去似乎有些牵强,未必完全符合先贤们的意思,但从儒学的基本精神言之,他坚持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对《中庸》和孔子的话予以重新阐释,在逻辑上完全是可以自洽的。对于真正的儒学来说,实践性始终是第一位的,对于恪守儒学真谛的经典阐释学来说,实践性也是第一位的。程朱理学是对日益教条化、知识化的儒学的反拨,为之注入生命活力;阳明心学则是对日益教条化、知识化的程朱理学的再反拨,同样也为之注入生命力。在这一对知识化倾向反拨再反驳的过程中,儒学的言说方式也呈现出不断从自我阐释到文本阐释,又从文本阐释回归自我阐释的循环过程。

From “Text Interpretation” to “Self Interpretation”

——Practicality of Wang Yangming's Classical Hermeneutics

Li Chunqing

(School of Art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hermeneutics of Confucianism, “Sinology” and “Song studies”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wo modes of interpretation. The former adheres to the road of “exegesis of chapters and sentences”, which is called the study of annotation or simply annotation, and takes “I annotate the six classics” as its own duty; the latter sticks to the path of “inventing the original mind”, which is called the study of mind and nature, and takes “learning to be a saint” as its goal. In the system of “Song studies”,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ways of interpretation: one is represented by Cheng and Zhu who advocate self interpretation from text interpretation, the so-called “seeking knowledge from things”; the other is represented by Lu and Wang who advocate self interpretation over text interpretation, the so-called ‘giving conscience”. Wang Yangming's systematic exposition of “self interpretation”played an epoch-making role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de of thinking and publicizing the spirit of individual subject.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classical hermeneutics; text interpretation; self interpretation; practicality of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孙昕光

①王守仁:《传习录下》,谢廷杰辑刊:《王阳明全集》(上),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

诠释学与作为本体论的文学阅读事件*①

李建盛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 哲学诠释学把阅读作为文学诠释活动的核心概念,把阅读活动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哲学诠释学影响下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以及阅读反应批评等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阅读理论的大合唱,并实现了文学阐释从作者中心论、作品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的理论转变。诠释学的阅读是一种理解者积极参与文学作品文本的主动行为和创造行为,诠释学的文学阅读和理解始终是一种鲜活的、动态的经验,文学作品的意义同样发生在作为本体论事件的阅读和理解事件中。

关键词: 诠释学;文学;阅读活动;理解事件;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0)04-0060-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06

传统的文学理论并非没有涉及读者和阅读的问题,但真正把文学阅读上升到文学活动本体论地位的理论是哲学诠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及以此为理论基础的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和阅读反应批评等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学阅读理论的大合唱,从而实现了文学阐释从作者中心论、作品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的理论转变。哲学诠释学认为,作为一种自律性存在的文学作品,其意义的实现必须有理解者的参与性理解,而阅读便是一种理解者积极参与文学作品文本的主动行为和创造行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在对本体论事件的阅读和理解中发生和实现的。因此,诠释学把作为文学接受活动和意义理解的阅读提升到了一种本体论的地位,而文学阅读的问题也由此成为文学诠释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一、阅读在当代文学阐释中的本体论地位

特里·伊格尔顿在谈到现代文学理论的转变时写道:"德国诠释学的最新发展被称为'接受美学'或'接受理论'……接受理论考察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因此是一种相当新颖的发展。实际上,人们可以把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全神贯注作者(浪漫主义和19世纪);完全关注文本(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明显关注读者的转向。奇怪的是,读者一直是这个三重奏中最弱势的,因为没有他或她,根本就没有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不是存在于书架上:它们是只有在阅读实践中才能实现的意义过程。因为文学要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重要。"②当代文学理论似乎相当一致地发现了传统文学理论中存在的这一严重问题,即忽视了读者或理解者在文学活动中的积极性和

* **收稿日期:**2020-06-11

作者简介:李建盛(1964—),男,湖南汝城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阐释学的中外话语资源、理论形态研究与文献整理"(19ZDA264)子课题"现代西方文学阐释学之演进"的阶段性成果。

②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6, p.65.

创造性。当代诠释学和阅读理论认为,阅读并不是外在于文学本身的活动,而是内在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本身的理解活动。用诠释学的话来说,阅读是文学作品存在的一种本体论方式。

首先,文学作品唯有通过读者和理解者的阅读活动才能转化为现实性的存在,才能把原来是物质性表现文本的文学语言构成转化成为富有生气的文学作品。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没有阅读,文学作品不过是白纸黑字而已。只有在阅读的时间性展开过程中,文学作品才能成为读者意识中的文学作品。正如让-保罗·萨特所说:"文学对象是一只奇怪的陀螺,它只存在于运动之中。为了使这个辩证关系能够出现,就需要一个人们称之为阅读的具体行为,而且这个辩证关系延续的时间相应于阅读延续的时间。除此之外,只剩下白纸上的黑字。"①如果文学作品不被阅读,人们又怎么知道它就是文学作品?遑论理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真理了!无论多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多么经典的杰作,不经过阅读这个具体化的过程,都只不过是白纸黑字而已。"阅读不仅使周围的物理性的客体包括我正在阅读的这本书消失了,而且它以大量的与我自己的意识紧密相关的精神客体替代了那些外在客体。"②正是阅读活动把那些原本是物理性的文字符号转化成了读者意识中的东西。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只有在接受者的阅读中文学作品的语言性存在才能转变为阅读中的生动语言,也就是说,只有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文学作品要在读者面前成为现实化和具体化的存在,必须经过阅读的中介。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任何东西都不像书写那样是纯粹的精神踪迹,但是也没有任何东西像文字那样依赖于理解的精神。在对文字的东西的解释和阐释中,产生了一种奇迹:某种陌生的和僵死的东西转变成了完全当下性和熟悉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像它那样能够从过去传递给我们。……而书写的传统一旦被解释和阅读,它们却如此明显地是纯粹的精神,以至于它们就如在当下向我们说话一样。这就是阅读的能力、理解书写的东西的能力像一种隐秘的艺术、甚至是像一种把我们释放而又联系起来的魔力一样的原因。在阅读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似乎被超越了。谁能够阅读书写传递下来的东西,谁就产生并获得过去的纯粹现时性。"③伽达默尔谈到这一点时更倾向于传统的文本,实际也同样适用当代的文学作品,因为它们都必须经由阅读这个中介才能与读者和接受者建立联系,才能把固化的、符号化的物理性的文本存在转变为读者心目中的鲜活语言,无论文学作品的主题、事件、人物形象或是整个文学作品的情感逻辑和情节结构,都唯有通过阅读才可能成为或转变为与读者同时存在的文学世界。"文学所服从的唯一条件就是它用语言传递下来并在阅读中被理解的东西。"④因此,只有通过理解者的阅读活动,文学作品才作为鲜活生动的语言现实性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其次,只有通过读者和理解者的阅读活动,文学作品的意义内涵和真理表现才能由接受者和理解者生动地呈现出来。没有阅读活动,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都只能是一种潜在的、隐含的存在,无论其意义多么深刻和价值多么丰富都不可能为读者理解者所把握。所有试图对文学作品有所理解的人,不论是一般的文学读者、分析文学作品价值的批评家,还是探讨文学发展历史的文学史学家,都不能没有阅读这个重要的环节。没有阅读,我们根本不知道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不知道其意义和价值为何物,也无法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和评价,甚至不知道我们阅读的

①[法]萨特:《萨特文论选》,施康强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②Geoges Poulet, "Criticism and the Experience of Interiority", Tompkins, Jane P., eds., *Reading-Response Criticism: From Formalist to Post-Structuralis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43.

③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p.163-164.

④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160.

是否为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存在是一种游戏，并且是那种为了使艺术作品得以具体化而必须被观赏者观赏的游戏。因此，对所有的文本真实性来说，也只有在理解的过程中，僵死的意义踪迹才能转换为富有活力的意义。”①这种阐释重心的转变无疑改变了作者意图论和形式结构论的文学理解观念。在作者意图论和方法论诠释学看来，文学作品的意义或者完全是由作者确定的，或者是作者审美体验的物态化，而对文学作品的意义理解就是揭示作者的意图或重构作者的创作心理；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者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于作品自身，即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形式结构中，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或是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所理解的那样，而文学的理解和解释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语言、形式和结构的构成与张力。按照诠释学的观点，这些理论实际上未能揭示读者和理解者的阅读活动在文学意义生产中所具有的作用。

哲学诠释学和当代阅读理论认为，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作品本身都不可能使意义自明地呈现出来，作者作为文学文本的创作者，他的作品一旦完成便已与作品分离，已经交付给了读者，而不再是作者所独有的东西。因此，如果不通过接受者和理解者的阅读活动，文学作品的潜在意义就不可能得到现实化。在哲学诠释学的影响下，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更加重视阅读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汉斯-罗伯特·耀斯认为，读者是文学接受活动不可忽视的重要活动或组成部分。“文学作品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对象，在每一个时期都为每一个读者提供相同的观点。它不是一座独白地揭示其永恒本质的纪念碑。它更像是一个管弦乐改编曲，在读者中产生新的共鸣，把文本从文字材料中解放出来，并使之成为当代性的存在。”②对于任何试图理解文学作品的人，要进入文学作品的世界就必须首先成为一个读者，只有经过理解性的阅读活动，他们才能进入文学作品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只有读者带着自己已有的前理解阅读文学作品才有可能获得意义和价值，并作出理解性的判断和批评。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阅读是所谓文学阐释过程中所必需的先决条件。”③因此，从诠释学的角度看，只要人们的兴趣焦点还集中在作者的意图和心理动机，或者集中在作品的结构方式上，就不可避免地忽视文学文本只有在阅读事件时才具有意义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阅读在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的突出地位，确实体现了当代文学理论某种范式转变，是文学作品的理解从传统中的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甚至把阅读活动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从而改变了文学理解和阐释的方式。正如朔贝尔所说：“接受首先是作为阅读问题，……这就必然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整个关系网络。”④确实，哲学诠释学从哲学理论高度、接受美学从阅读接受的维度和反应批评从读者能动性角度赋予阅读在文学活动中的本体论地位，充分体现了它们对阅读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构成部分的高度重视。把阅读提高到文学活动的本体论地位，不仅把阅读看作文学作品得以具体化和现实化的中介，而且把阅读视为文学意义实现的根本性过程。

二、文学阅读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

哲学诠释学和当代读者理论认为，在文学作品的接受和理解过程中，读者从来就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读者始终是具有参与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理解者，他始终带着自己的前理解进入文学

①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164.

②Hans Robert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21.

③[德]沃·伊瑟尔：《阅读行为》，金惠敏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年，第 24 页。

④[德]瑙曼等：《作品、文学史与读者》，范大灿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 年，第 241 页。

作品的审美世界中,并根据自我理解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和理解。在文学接受和意义理解中,阅读始终是一种创造性参与、生产和转换过程。哲学诠释学“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艺术作品对其观众的艺术经验产生影响的方式。伽达默尔的艺术理论是一种关于作品在创作之后的被表现、被展示或被阅读的效果或生产性历史的理论”①。但是,阅读这个重要的文学活动事实却被以往的文学理论严重忽视了。

当然,传统的诗学和文学理论并非完全没有注意到读者以及阅读的问题,但是哲学诠释学认为,它们只是把读者视为被动的接受者,西方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朗吉弩斯等都注意到文学对读者的作用,而不是读者对文学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也很看重文学对读者的作用,如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都看到了文学与读者的关系,然而,在传统文学理论中,读者却始终没有被视为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存在。查里斯·E·布里斯莱尔在谈到传统文学理论中的读者地位时写道:“从柏拉图时代到 19 世纪初英国文学中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这种被动读者的观点就一直存在。尽管许多评论家都承认文本确实对读者有影响,但批评主要关注文本。随着浪漫主义的出现,重点从文本转向了作者。作者现在成了一位天才,他能够发现普通民众不能认识或洞察到的真理。随着 19 世纪的发展,人们对作者的关注也在持续,文学批评强调作者的生命、时代和社会语境作为文本分析的主要辅助手段的重要性。”②作者是真理的发现者、意义的表达者、公众的教育者、精神的塑造者、灵魂的工程师,在这些崇高的称号和权威面前,读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不可能得到重视的;同样,主要关注作品文本的文学理解也并不重视作者在接受和阐释中的创造性地位和作用,而在于发现、分析和理解认为文学作品之为文学的独特形式和结构,即在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因此,读者和阅读在接受和理解中的地位同样不可能得到重视,更不用说突出读者和阅读的创造性作用。

哲学诠释学的文学阅读和理解否定作者意图论,但并不否定文学作品的自律性存在。在强调文学作品的自律性方面,哲学诠释学与形式结构论有某些相似之处,关键性的区别在于诠释学在强调这种自律性的同时,积极肯定和高度重视读者在文学接受和理解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在这里简要论述 20 世纪文学理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解,对于我们阐述诠释学的阅读本体论观点有重要的意义。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作为 20 世纪的重要文学理论,为反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上都把文学视为一种可以客观分析的自律形式和结构。

俄国形式主义者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本身,把文学性和语言性视为以陌生化语言感知和体验事物的方式,而不关心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和意义,但这种感受性和体验性是由作品的形式化自动实现的。因此,尽管俄国形式主义涉及理解的“感受性”问题,但认为“艺术”创作的目的是尽可能实现文本感受性的高度和力量。当然,感受性和体验这些概念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范畴,但在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中更多的是指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读者创造性的因素,而俄国形式主义则认为文学是一种“不及物”的存在,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存在就在作品所具有的文学性本身。可以说,这是一种排除了文学作品表现内容和读者理解以及接受作用的文本崇拜。

英美新批评更进一步把读者的感受性视为一种“情感谬误”,从根本上否定了读者的作用。文学作品的情感不是由读者赋予的,也不是由批评家发现的。在新批评家们看来,对文学作品的

①Rudolf A. Makkreel, *Orientation and Judgment in Hermeneu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39.

②Charles E. Bressler,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94, p.47.

理解越是接近于文学作品的文本存在，就越能对文学作品作出真正的理解，也就更能对文学作品作出恰当评价。当然，新批评也谈到了阅读的问题，韦勒克、沃伦认为阅读是重要的，但阅读是一种个人现象，阅读的研究不能代替“文学研究”。“尽管阅读的艺术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说文学研究仅仅是为了阅读艺术服务，那就误解了这门系统性知识的宗旨。广义的‘阅读’虽也可包括批评性的理解和感悟，但阅读艺术仍旧只是个人修养的目标。阅读艺术是人们极为需要的，而且也是普及文学修养的基础，但它不能代替文学研究，因为‘文学研究’(literary scholarship)这一观念已被认为是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①所谓“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便意味着必须求助于某种恒定不变的价值和标准，而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看，这些价值和标准无疑是具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理解者在文学阅读和理解中作出的判断。因此，仅仅从文学作品本身来理解和解释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说，没有看到读者的积极参与性和阅读的创造性在文学接受和理解中的作用。

结构主义根本就不重视读者和阅读在文学接受中的积极作用，它突出的是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语言结构和文本张力。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学作品中的所谓历史内容、伦理判断和审美价值等是人们强加给文学的，而非文学本身所固有的东西，文学以内在的语言力量为目标，而不以真善美等外在的任何东西为目标。当然，结构主义并非全然没有涉及阅读问题，例如乔纳森·卡勒论述和分析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诗学时，也谈到作品文本的效应问题以及读者在文学解读中的作用。他认为，把文本当作文学来读，决不是让人的头脑变成一张白纸。如果读者一点也不具备关于文学或虚构作品的知识，他就不理解一首诗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主要还是把读者的文学能力视为阅读文学的一种程式，是为了发现文学符号中不同于其他话语的属性、特质和差异等。在他看来，结构主义的首要原则就是“把文学当作一种符号体系来研究。句子本身就是一些语言符号：句子将依照包含它的由约定传统构成的文学语言环境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意义，这样，在文学体系内句子就成了一些能指或形式。这些能指或形式的意指就是它们在文学语言中所表示的特殊意义。”②因此，文学作品最重要的不是向人们说出了什么东西，即语言所指的东西，而在于语言的能指，而阅读也就是去发现作品的结构和结构何以发生功能的程序。也正是这种否定读者作用和阅读创造性的做法，使激进阅读理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把读者和理解者提升到无所不能的地位。斯坦利·费什彻底抛弃新批评的文本中心论的做法。“文本的客观性是一种‘幻觉’，是一种危险的幻觉；因为它是这样一种无可质疑的实体。这是一种具有自身自足性和完满性的幻觉。”③在他看来，能赋予一部文学作品具有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文学作品的文本本身，而是“读者的头脑”。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形式结构论的文学阐释忽视甚至否定读者的作用，但它们强调文学作品自身的结构分析和自律性研究，都有值得借鉴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自律论的文学本体论观点恰恰与文学诠释学的作品自律性，尤其是在反对作者意图论上具有相通之处。大卫·霍伊在谈到文学诠释学与结构主义的异同时写道：“应该指出，诠释学理论与结构主义理

①[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第 6 页。

②[美]乔纳森·卡勒：《文学中的结构主义》，伍蠡甫等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536 页。

③Stanley E. Fish, “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s”, Tompkins, Jane P., eds., *Reading-Response Criticism: From Formalist to Post-Structuralis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82.

论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尤其表现在针对文学理论的方法论假设这个层面上是如此。”①但哲学诠释学反对把文学作品视为一种“不及物”的自我封闭系统,不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抽象和结构,而是把文学艺术作品理解为一种意义和真理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意义和真理的实现有赖于文学作品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创造性理解事件。

与作者意图论试图重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体验不同,也迥异于形式结构论对文学性自身形式和结构的集中关注,哲学诠释学和当代阅读理论高度重视和肯定读者和阅读在文学接受和理解中的创造性作用。读者的阅读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也不是简单复述和重构作品内容,而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参与。正如文学是一种创造性和表现性事件一样,阅读同样也是具有表现性和创造性的事件。“所有艺术作品只有在其被‘表现’中才能现实化,因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学作品唯有在它被阅读时才能被现实化。”②没有读者的创造性阅读活动,文学的表现性就不可能转变为一种意义事件,也不可能为读者所理解。“所有理解性的阅读始终是一种再创造、表演和解释。……意义和意义的理解是如此密切地与语言的实体性相关联,因此理解也始终包含了一种内在的言说活动。”③在文学作品的语言转化为阅读者的语言的过程中,在把握和理解作品的意义时,读者和理解者总是带着自己已有的前理解进入文学作品的阅读中,并创造性地理解和解释文学作品。正如罗伯特·耀斯所说:“在作者、作品和公众这个三角关系中,读者并不是被动,也不是一连串的反应,而它本身就是历史能量的构成。没有读者的积极参与,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中介过程,作品才能进入一种持续性的不断变化的经验视域。”④沃·伊瑟尔认为:“读者的介入是完成文本的基础,因为在事实上,这种文本的完成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存在——它要求‘主体’(读者)将潜在的东西现实化。”⑤因此,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始终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过程,文学作品所具有潜在的意义必须经由读者的创造性阅读和理解才能得到实现,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始终是开放性和创造性的。

哲学诠释学把阅读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并把阅读作为文学诠释活动的核心概念,对于当代文学阐释理论的发展具有理论先导作用。“阅读被移到了诠释学和阐释的中心,二者都是为阅读服务的。阅读同时也是一种理解。在阅读关系到文学诠释学的地方,首先也与阅读有关。”“我必须坚持,是阅读而不复述,才是艺术作品的独特经验方式本身,这种经验界定了艺术作品本身。”⑥伽达默尔认为阅读是与艺术相遇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创造性和开放性的理解,因此,阅读是内在于文学活动的本体论事件,正是这种本体论事件开启了文学的意义世界。只有从作为此在历史性和时间性的诠释学处境出发,只有把阅读和理解作为本体论事件,在阅读和理解中,文学作品对我们来说才是现实性的存在。

三、作为一种本体论事件的阅读辩证法

诠释学认为,作为本体论事件的阅读和接受活动并不是由文本和读者单方面决定的,而是在

①David C.Hoy, *The Critical Circl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p.144.

②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164.

③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160.

④Jauss, Hans Robert,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19.

⑤[德]沃·伊瑟尔:《阅读行为》,金惠敏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85-86页。

⑥[德]伽达默尔:《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被阅读的对象与阅读主体相互作用的阅读事件中动态实现的。文学阅读不能脱离文学作品文本的存在，这与形式结构论有相似之处，但作品文本及其意义的具体化和现实化需要读者的创造性阅读活动，这与形式结构论又有根本差异。在阅读事件中，文学作品与读者构成了阅读活动的两极，阅读活动便是把这两极联结起来的中介。如何确定这个中介成为诠释学阅读理论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因为无论是阅读理论对文本规定性的理解，还是对读者阅读的规定性阐述，最终都体现为一种本体论事件的阅读辩证法。

首先，与作者中心论所认为阅读活动就是把握和理解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意图和对作者的创作心理进行重构性猜测不同，也与文本中心论所认为的阅读就是发现和分析客观存在于作品中的形式和结构不同，诠释学阅读理论认为，阅读作为一种文学事件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与交流。“书本的阅读仍然是一种其中的内容得以表现的事件。确实，文学和对文学的阅读具有最大的自由和灵活度。这可以从如下简单的事实中看到，即人们不必坐下来一口气把一本书读完，因此，如果人们想继续读它就必须接着往下读；这与听音乐或看绘画是不同的，然而，这表明它与‘文本’的整体性相关。”①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与文本都进入到阅读的表现事件中，读者与文本在这种事件中构成一种交流和对话，文本就像一个“你”那样向读者和理解者说话，同时也需要读者和理解者像对一个正在说话的“你”那样面对文本的提问并回答它提出的问题。在这种阅读事件中，理解者并不是要返回到文学文本所说的东西，如浪漫主义诠释学所认为的那样，阅读就是重构文学作品的意义。诠释学意义上的阅读，不是简单地辨认和重复文本表达的内容，而必须转换为一种对话与交流的事件。伽达默尔说文本“只是一个半成品，是交流事件的一个阶段”是很有道理的：“从诠释学的立场——即从每一个读者的立场出发，文本只是一种半成品（Zwischenprodukt），是理解事件中的一个阶段，并且必须包括一个确定的抽象，即在这个理解事件中包含着分离与具体化。”②所谓“半成品”，一方面指文学作品是具自律性的存在，文学作品是邀请读者和理解者进入阅读和理解事件的“请柬”；另一方面指文学作品的意义必须在阅读和理解事件中才能得到实现。换言之，文学阅读和理解活动既不能离开文本，也离不开读者和理解者，而阅读就是把两者动态联系起来的中介。

把文学阅读和接受理解为一种交流与对话的事件，在当代接受与反应理论那里得到了更突出的强调。罗伯特·耀斯认为，文学的阅读和接受活动是文学文本与接受主体二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文学作品与读者的持续不断的经验视域中，“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评性理解，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接受，从认识的审美标准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产的转换。文学的历史性及其交流性质是以作品、受众、新作品之间的对话性、过程性关系为前提的，而这种对话性、过程性关系可以根据信息与接受者、问题与回答的关系来构想”③。因此，正是由于读者和接受者与文学文本建立了这种创造性的对话关系，才开启了文学作品的意义世界，激活了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说罗伯特·耀斯更关注读者和接受者的积极作用，那么沃·伊瑟尔则更重视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的辩证分析。“阅读每一部文学作品，核心的问题是作品的结构与其接受者之间的相互作用。”④他认为文学作品本身既不能等同于文本，也不能等同于具体化，文学文本不只是某种指示经验存在的对象，读者和文本的关系也不是认识论上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作品的意义实现是

①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p.160-161.

②Hans-Georg Gadamer, *The Gadamer Reader: A Bouquet of the Later Writings*,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

③Hans Robert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19.

④[德]沃·伊瑟尔：《阅读行为》，金惠敏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年，第 25 页。

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创造性结果。

因此,诠释学的阅读理论既承认作品文本在阅读和接受中具有某种规定性作用,又重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的能动性,从而超越纯粹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文学阐释,超越作者意图论和形式结构论的文学理解方式,把阅读视为文学活动的本体论事件,寻求文学作品的自律性存在与创造性阅读和理解之间积极互动的辩证法。

其次,哲学诠释学从人类存在的此在时间性和历史性特征出发重新思考西方哲学史上的对话理论,从而揭示了对话性的诠释学辩证法结构,这对理解文学阅读经验的辩证法具有重要意义。伽达默尔指出,18 世纪的"你""我"关系,如休谟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对象的客观性与我的关系,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运用,它把对话看作是人文科学的工作程序,丧失了诠释学经验的本质。第二种"你""我"关系不是把对话理解为直接的关系,而理解为一种反思关系。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诠释学认为理解者能够比作者本人更好地理解作者,这种理解丧失了被理解者与理解者的直接关系。第三种"你""我"关系是"对传统具有开放性的效果历史意识",这是哲学诠释学所理解的"你""我"对话关系,这是一种直接的、彼此开放的提问与对话的交流关系,哲学诠释学把文学阅读和理解作为一种本体论事件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关系。辩证法就是提问与回答的对话艺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一种问答的对话关系。"构成对话特征的……显然是,存在于语言中的对话——在提问与回答、给予与获得、为不同目的而进行的争论与对他者观点的寻求过程中——表现了一种意义的交往,就文字书写的传统而言,这正是诠释学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这种对话是在提问和回答中得到实现的。"①同样,在阅读活动过程中,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被动的关系,而是一种由提问与应答关系构成的对话过程。因此,哲学诠释学被称为"对话的诠释学"是非常有道理的:"理解作为一种交流事件,提问和回答构成了基本的诠释学关系。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是一种对话的诠释学。"②根据这种问答辩证法,既然文学阅读与接受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和交流的活动,阅读和接受活动就同样具有对话"精神",也必然把文本当作一个自身向读者说话的"你"。既然文本与读者的关系是一种"你—我"关系,那么文本与读者之间也必然具有实际对话结构,是一种问与答的本体论事件。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把文本与读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种问与答的对话关系,显然与诠释学对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的独特理解相关。文学作品是一种具有自我表现的自律性文本。它总是向阅读它的人言说某种东西,由于文本具有自律性特征,这种言说就不是由已经脱离了文本的作者表达的,也不是由作品再现的某种客观的东西规定的,而是文学作品自身在言说,也就是文学作品自身向读者提出问题。因此,在文学阅读和接受中,文本是一种依靠自身的表现性向读者说话的存在,这就决定了文本具有谈话中的"你"的特征,就像实际谈话中的"你"一样用语言表达思想。进行阅读的读者和进行理解的阐释者,同样是一种语言性的存在,面对作品的语言讲述的东西和提出问题,也必须像对一个正在对你说话和提出问题的对话者一样进行回答和提问,必须在阅读中用自己的语言来回答文本所提出的问题。文学作品的意义就产生于这种不断进行的提问与回答的开放性动态关系结构中。

根据诠释学的问答辩证法,文学阅读和理解过程不是单方面的被动作用,而是文本与读者相

①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368.

②James, Risser, *Hermeneutics and the Voice of the Other: Re-reading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17.

互作用的问答辩证过程。文本向读者和理解者提出问题，读者和理解者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文本再向读者提出的问题做出反应，而读者再次回答文本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断往复的辩证对话活动，而文学作品的意义得以在这一活动中实现并不断丰富。诠释学现象本身“意味着对话的原始性与问答的结构。历史的文本成为解释的对象意味着它向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因此，解释总是包含着与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的关系。理解一个文本便意味着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正如我们所表明的，这依赖于我们所获得的诠释学视域才能发生。”①在阅读事件中，文学作品并不是某种中立的、客观的存在，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也不是简单对作品的复述和重构，而是在一种问答辩证关系中展开的对话与交流。

最后，阅读和接受活动中的文本与读者的问答逻辑体现了一种深刻的辩证法。阅读作为一种接受活动，是一种辩证运动。哲学诠释学认为，问题的本质意味着问题本身具有某种意义。诠释学的问题使被问的东西进入了某种特定的语境中，正是问题的提出开启了被问的东西的存在。“在诠释学经验结构中揭示的问与答的辩证法，现在允许我们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什么样的意识是效果历史意识。因为我们所论证的问答辩证法使理解表现为一种类似于谈话的相互关系。确实，文本并不以像一个‘你’那样的方式向我说话。我们这些试图理解的人必须通过我们让它说话。但是，我们发现这种‘使文本说话’的理解，并不是一种出于我们的任意做法，而是作为一个与对文本期待的回答相联系的问题。期待一个回答本身就预设了提问者属于传统的一部分，并把自己视为传统的回应者。这就是效果历史意识的真理。”②因此，作为不断往复变化的运动的文学阅读和理解，就是哲学诠释学所说的效果历史事件，文学的意义和真理在这种效果历史事件和视域融合中不断展开、丰富和深化。

我们看到，开放性对话中的阅读和接受，不像浪漫主义诠释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重构活动，也不像文本中心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作品形式和结构的分析，而始终是一种持续对话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活动。文学阅读和接受的对话辩证法是实现作品意义的一种根本精神。“一个试图理解一个文本的人会为文本对他讲述某种东西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一种受过诠释学训练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必须对文本的相异性保持敏感的原因。但这种敏感既不把内容视为‘中立性’的，也不需要视为一种自我消解，而是需要突显和同化理解者自己的前见解和偏见。重要的问题是必须意识到理解者自己偏见，从而使文本能够在其所有的他者性中表现自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文本自身的真理以反对理解者自己的前见解。”③因此，尽管所有阅读和接受都是一种从前理解出发作出的具有偏见的自我理解，但它并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理解。诠释学所理解的阅读也不像当代解构理论和激进阅读论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阅读和理解都是合法的、有效的，根本不存在误读的问题。哲学诠释学认为，误读是可能的，但是通过阅读活动的问答辩证法和效果历史意识能够修正我们对文本的误读和误解。

由此可见，诠释学的文学阅读活动是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在阅读、接受和理解过程中，我们不仅要肯定理解者的偏见在阅读和意义生产中的积极作用，也必须尊重文学作品自身在阅读和理解中的规定性，辩证地处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前理解的期待中会存在许多貌似可接受的东西，但在众多的意义期待中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是可能的。例如陈子昂的诗：“前

①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p.369-270.

②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377.

③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New York: Crossroad, 1989, p.269.

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带着理解的期待阅读这首诗,在这种期待中并非只有一种意义,而会有多种意义出现。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期待,可能筹划各种不同又似乎合理的意义,但是,这些意义并不一定都适合我们要理解的作品。至于哪种意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便需要不断地实现一种文本与理解之间的诠释学视域融合,即同时考虑到文本的事实性探究和我们的前理解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和理解这首诗时,必须首先善于倾听文本所说的内容,理解文本向我们诉说了什么,根据文本向我们讲述的内容调节性地修正我们曾经作出的误读和误判。诠释学阅读和理解在面向未来的意义筹划中不断开启理解的事件,我们总是在这种辩证事件中联系着文学文本和我们自己的理解,并在新的意义筹划和视域融合中丰富、深化和拓展文学作品的意义可能性。

总之,哲学诠释学的文学阅读和理解事件永远是一种鲜活的、动态的经验,阅读和理解事件中的意义也总是动态的和未完成的。“如果文学文本主要是作为一个答案,或者如果后来的读者主要是在寻求一个答案,这决不意味着作者本人在他的作品中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文本的回答性是文本结构的一种形式,它提供过去作品与后来作品之间的历史联系,从接受的角度来看,它已经是文本结构的一种形式;它不是作品本身的一种不变的价值。”①在这种本体论阅读和理解事件中,读者和理解者与文学文本都必须进入阅读事件中,读者与文本的生动辩证运动是文本意义和审美价值得以实现的诠释学动力。每一次新的阅读,每一次新的视域融合,都会带来某些不同的东西。或许,这也就是中国艺术理论所说的“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美学境界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意境界。可以说,这种“妙境”和“风流”正是在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的阅读活动和理解事件中实现的,从而不断开启一个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诠释学宇宙。

Hermeneutics and Literary Reading Events as Ontology

Li Jians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regards reading as the core concept of literary hermeneutic activities, and promotes reading activities onto the status of ont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reader response theory and 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 constitute the chorus of contemporary reading theories, and realize the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from author-centered theory and work-centered theory to reader-centered theory. Hermeneutic reading is a kind of active and creative behavior in which the reader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he text of literary works. Hermeneutic literary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is always a fresh and dynamic experience and the meaning of literary works also occurs in the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ontological events.

Key words: hermeneutics; literature; reading activity; understanding events; dialectics

责任编辑:孙昕光

①Hans Robert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69.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论纲*

王立胜　周　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成果,要求我们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提炼更具标识性的概念范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为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作出贡献。

关键词: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性;知识体系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4-0070-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07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现实的运动过程,也是理论的生成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新进展。历史和现实都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新的系统的理论概括,提炼更具标识性的概念范畴。因此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一、为何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也是“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从中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出生在德国,马克思的思想诞生在欧洲,马克思的事业在中国得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最闪亮的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证明共产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科学性、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富成果,要求和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诞生。

* **收稿日期:** 2020-06-25
作者简介: 王立胜(1963—),男,山东莒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丹(1985—),男,湖南石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

(一)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概念表达,强调的是“中国化”和“中国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中国”只是一个地域范畴。譬如,就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来说,1899 年 2 月马克思及其学说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最先引入中国。20 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把马克思主义持续引介到国内,但是发生的实际作用很有限。这些历史事实只表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来到了中国,并不能表明“中国化”,也就不具备“中国性”。在五四运动中,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学习运动和宣传运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寻找“救亡和启蒙”的一部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新曙光,人们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看到了另一种社会解放的可能性。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指受俄国十月革命感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实践探索,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思想体系的开端。①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作区分,关键在于是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段时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裂为所谓“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提出“政治淡出、学术凸显”,如此一来,就成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陆剑杰对此提出三点区分标准: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当作学术来研究,而不结合中国实践、中国问题,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结合中国自古代以来的优良哲学文化,不具有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性格,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不予置理,不对这一实践智慧进行理论升华,这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深湛哲学修养的领导人和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家持续合作,共同创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② 譬如,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内涵、邓小平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内涵、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早期传播、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论”、冯契的“智慧说”、李景源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提出中国梦、“四个自信”“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充满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

(二)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总概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为内容,构建知识化、系统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区别。汪信砚概括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种错误观点:一是“异端”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二是“复制”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正统的”

①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端问题,刘林元等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毛泽东哲学的产生为标志而诞生,以 1930 年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为开端,强调中国革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原理相结合。刘林元、尚庆飞、李江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思想结晶》,《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②陆剑杰:《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年,第 2-3 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制品”，是“非中国的”。[①] 对“异端”论和“复制”论的回应，就是要亮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身份，并且在学科的意义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示区分。

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譬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事物的矛盾运动、认识的能动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等等。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是称作“马克思主义”，而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具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甚至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相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性”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理论，是对中国实践的理论表征，是对中国问题的理论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思想场域是“西方的”，试图解决的是“西方的问题”，尽管它可能具有“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但显然不是从“中国”出发，以“中国”为归宿的。譬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哲学就难以解释中国城市不存在“贫民窟”的事实，因为它本身不以中国问题为真正的出发点，所以不能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对接中国现实。

（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当代发展形态看，唯独缺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中国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的具体表述是什么？这是欠缺的。同时，结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表述，为了使之一致、匹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可以表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概念表述的简洁性、流畅性和传播性来看，化繁就简，合并同类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适合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中国形态。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亟需概念化和体系化

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同时意味着要构建一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汤一介晚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构建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体系？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追求一种人生境界，而不是追求知识的体系化，这是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②] 没有明确的概念系统，没有体系化的知识，很难广泛、快速传播，也就很难普遍化地被人们掌握和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很多，然而缺少一个“标识性概念”，把它们统摄在一起，进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属于同语反复，作为概念是不严谨的。因此，我们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来统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表达，进而构建完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识体系。打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标识性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五）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现实需要

①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 年第 12 期。

②汤一介：《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4-5 页。

一方面,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看,历史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从理论大厦的构造看,没有系统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奠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不牢靠的,特别在哲学社会科学“西方化”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方向性错误。另一方面,从知识体系和“三大体系”的关系看:(1)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的前提。任何一门学科体系,都以拥有一套完备的知识体系为前提。与学科体系密不可分的教材体系同样如此,没有好的知识体系作支撑,想建设好的教材体系是不可能的。(2)知识体系是学术体系的载体。当前学术讨论、学术研究的种种乱象,譬如“西方化”“美国化”“个人化”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只有以规范化的知识体系为基础,规范化的学术体系才有可能建构。(3)知识体系为话语体系提供规范性内容。话语体系和话语传播,一是要“大声对外说”,二是要概念清晰、聚焦。知识体系具有系统性、稳定性、可复制性特点,能够为话语体系提供优质、有效、可反复传播的内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亟需且必要,它关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构建,关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关乎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二、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第一前提。要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是什么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是什么。陆剑杰在《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中把“中国的命运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表达方式,并且认为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问题”①。换言之,关于“中国的命运”的哲学思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围绕“中国的命运”展开,它是中国近现代实践中主客体关系的集中表现。正如冯契所说:“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②“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的学问的第一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求解这一问题,而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③汪信砚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以哲学的理论形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和认识,我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由此展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是实践的,而不是抽象思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如此,理论是否成立、是否成功,实践最有说服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抽象思辨的理论,它来自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客观反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新发展的理论表征。2019 年,中国 GDP 接近 100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GDP 增速保持 6.1%,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30%左右。步伐稳健,势态良好,未来已然可期。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统筹调度全国医疗资源,各地各部门协调联动,勠力同心,疫情防控

①陆剑杰:《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年,第 235 页。
②《冯契文集》(第 1 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 页。
③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哲学研究》2018 年第 1 期。

阻击战取得重大成果，书写了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斗争的中国篇章。无论是创造成绩还是应对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展现出无比强大的先进性、优越性。可以说，现实所展示的远比理论精彩，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发挥更有效更强大的理论作用。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理论创新尚不尽如人意，理论的有效供给尚显不足。也正因为如此，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尤为迫切和必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必须从哲学的高度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并且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阐述，系统回答“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些重大理论问题都作出了科学论断，提出了研究内容，指明了研究方向。譬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①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其深刻的哲学依据。再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六个得来”，即“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九十多年的实践中得来”；“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在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得来”；“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②

客观来讲，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思想、西方理论、西方概念大量涌入中国，对我们“开眼看世界”、增进文明交流互鉴是有帮助的。但是，一个不能回避、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这套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为本位的，“西方中心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反映尤为突出。在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之前，中国思想既没有被命名为“哲学”也没有被定位为“中国”。当前“中国哲学”的身份疑问是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造成的。回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以“西方”为标准削足适履，以“西方”解释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尚能提出：“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③数量庞大的中国学者群难道都缺乏这种理论勇气与信心吗？特别是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来说，“中国性”和“社会主义性”是理论属性，要以“我”为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三、如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关于如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式进行；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它所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框架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它所突出的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社会的背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式书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当前的主流形式。譬如，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5-26 页。
②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24-25 页。
③[日本]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第 130 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式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继承性、发展性,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种范式重“传统”而弱“中国性”,没有以系统化的“中国性”哲学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内涵,“没有把它当作中国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①。只有第一种范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没有第二种范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于全面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来说,是欠缺的、不完整的。当我们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去思考,突出对“中国问题”(如“中国向何处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以此书写“中国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何萍的观点,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按照上述逻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知识谱系也会有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陆剑杰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以“中国的命运”为主题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出如下划分:(1)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端:以李大钊为首倡、瞿秋白等为后继的“窃火”;(2)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孕育:以毛泽东为代表、鲁迅等参与的“探索”;(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以毛泽东为首席、与李达、艾思奇等合作的“创造”;(4)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由毛泽东发端、邓小平领率、众多哲学家参与的“革新”;(5)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体系:由冯契带头、一批哲学工作者继续其努力的“学理化”。② 与传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式不同,他侧重“中国性”的问题意识,故涵盖的内容和代表人物更广,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包容性。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譬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六个得来”的哲学阐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这必然涉及中华文明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渊源)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包括冯友兰、贺麟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也应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范畴并予以研究。一旦打开这个视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往的基础上将更加“豁然开朗”。

回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这一主题,理论和现实双重发问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且是“中国的”。就具体的研究而言,学术界理论界对“中国性”也是有自觉的。随着改革开放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中国日益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需要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实践活动以及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度把握,也需要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返本开新’,同时也需要与包括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学术思潮深入广泛的对话与融合。哲学范式转换与创新最为根本的目标和方向是建构中华民族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③。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科的意义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中、西、马”大融合为基础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这也正如任平所讲,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不同文明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之间三重对话的结果。④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与哲学史的纵向打开方式同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还可以从实践领域的横

①何萍:《如何书写1949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②陆剑杰:《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第一章“连续的哲学共同体——革命家与学术家一身二任与合作创造”,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

③孙正聿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1页。

④任平:《论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的坐标与原则》,《江海学刊》2018年第1期。

向打开方式切入。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①从部门哲学角度看,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价值)哲学、社会哲学、生态哲学等方兴未艾,正好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五大建设”一一对应。这不是巧合,恰好表明思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同构关系。因此,应立足新时代新实践,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等方面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

从部门哲学入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必须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表征”这一主题展开。我们不能抽象地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需要落实到具体实践和具体内容。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表征,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其他什么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一度很流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一度很有市场。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保持战略定力,运用唯物辩证法,避免陷入“非左即右”的两极思维,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特别是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而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的先进性、优越性。以此观之,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任重道远。同理,我们得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哲学表征,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不是其他什么“宪政民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价值)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哲学表征,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和价值观,不是其他什么“普世价值”;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表征,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不是其他什么“小政府大社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哲学表征,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不是其他什么生态模式;等等。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性”和“社会主义性”不仅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中,而且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部门哲学中。

四、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 100 多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已经 80 多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是一致的。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搞得好,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就能取得成功;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搞得糟,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抬头,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就可能走弯路。总的来看,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伟大成就,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功不可没,而且自身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概念体系。在新时代,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恰逢其时,意义重大。

第一,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筑牢理论基础。哲学是一切学问的最高概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离不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马克思主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1-22 页。

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离不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体系”。知识体系是“三大体系”的基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体系”,离不开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理论的基础,只有构建结构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中国理论才能行稳致远。

第二,科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和成功密码。理论必须与现实相符合,真实地反映现实。“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现实事物的表现就是现实事物本身。”①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到中国现实中去,给予系统性解答。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②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要全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性”和“社会主义性”,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原理”。

第三,澄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和思想边界,批判和纠正错误思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然而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高级黑”“低级红”的现象时有发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本身,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本身的研究不足,导致社会上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譬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在实际工作中流于形式,等等。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明确亮出观点、主张;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增强学理性、系统性,以理服人,激浊扬清,有利于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真正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

O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Wang Lisheng, Zhou D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There is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ich achievements of Marxist philoso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quire us to make a new theoretical overview and extract more iconic concept catego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is a philosophic toke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heoretical crystalliza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is conducive to systematically elaborating on the internal logic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ing the "three system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character; knowledge system

责任编辑:王盛辉

①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295 页。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21 页。

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与当代启示*①

张士海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下,中国革命以新的组织形态、理论观点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无论在思想指导、组织载体,还是在道路遵循、价值指向方面,中国革命都与十月革命的政治逻辑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中国革命,以其独创性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和深刻的当代启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深刻彰显着十月革命的当代价值与时代光辉。

关键词: 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列宁;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0)04-0078-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08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开创性价值和奠基性意义,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不仅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形态发展为实践形态,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动摇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根基,开辟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时代,"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②。正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深刻影响下,中国革命掀开了新篇章,开创了新局面。无论在思想指导、组织载体,还是在道路遵循、价值指向方面,中国革命都与十月革命的政治逻辑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是十月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立足于十月革命的政治逻辑与时代价值,深入探讨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关联与影响机理,有助于辩证考察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历史与现实内在关联、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依存以及当代与未来逻辑贯通等问题,从而为当前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正是立足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方向指引与路径遵循,中国革命以新的组织形态、理论观点和政治实践的互动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和发展方向。

* **收稿日期:**2020-06-29

作者简介:张士海(1975—),男,山东梁山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问题研究"(18BXSXJ12)的阶段性成果。

②《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第一,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鸦片战争失败后,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积极地向西方国家寻求富国强兵的思想武器。他们希望通过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把中国也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①。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各种陈旧思想甚嚣尘上、充斥于耳,中国的先进分子正苦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无法把握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创立以后,在相当长时期内,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十月革命以前的中国,仅有梁启超、朱执信等人曾经对马克思主义作过一些零星介绍,但是影响极其有限。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价值意义,引发了他们学习的愿望,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③。1918 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 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系统介绍,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此后,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陈独秀等人纷纷开始研究十月革命,学习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在中国迅速兴起了学习、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人们探索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

第二,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壮大,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组织载体。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残酷的侵略,中国的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曾试图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但最终都失败了。伴随着外国资本在华企业、早期官僚资本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中国无产阶级逐步成长起来。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无产阶级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进行积极的革命斗争。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的劳动运动,是在第一个阶段中发展,还脱不了旧行会和手艺组合的束缚。同时劳动阶级的奋斗还不过是为某种手艺或某工厂的特别状况的单独运动,并没有普遍性质的运动。工人的组织也不强固,组合的人数也不多"④。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愿望。正是看到俄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价值意义,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在领导十月革命中的伟大贡献,中国先进分子激发了学习十月革命、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热情。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李大钊明确指出:"各国的 C 派(指共产党人——笔者注)朋友……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 C 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 C 派的朋友相呼应呢?""中国……C 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⑤正是在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以及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在中国的先进

①《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0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1 页。

③仝华:《以十月革命的"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 年第 9 期。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著:《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150 页。

⑤《李大钊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44 页。

分子积极倡导、精心组织下，1921 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①从此以后，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组织载体，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其自身理论上的创新发展和实践上的开拓进取，谱写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篇章。

第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武装夺取政权方式的探索与明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道路遵循。近代以来，面对国家危亡，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形式多样的抗争。帝国主义列强决不会自动放弃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封建主义势力也决不会自动放弃自己控制的政权。只有革命，才是挽救国家危亡的唯一出路。但是，农民阶级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领导的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对武装夺取政权认识严重不足，革命的彻底性不够，是这些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教训时指出：“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质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②而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③。十月革命的成功告诉中国人民，只有采取直接行动、武装夺取政权，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近代中国与发生十月革命的俄国国情，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因而俄国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取得胜利的革命方式，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毛泽东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④，“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⑤。无产阶级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通常要采取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也是十月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正是在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下，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在中国先进分子心中得以落地生根。王雪楠指出：“当年轻的革命者将‘夺取政权’作为‘改造中国’的首要目标时，‘俄国革命’终于成为影响 20 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里程碑……这或许正是‘十月革命’对 20 年代中国的最重要‘参照’。”⑥武装夺取政权方式的探索与明晰，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道路遵循。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实践走上了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征程。

第四，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选择与确立，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向。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对国家未来出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最终都失败了。这些探索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能从社会制度层面思考国家未来的出路，因而没能把人民群众这个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真正动员起来。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阵线，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成功告诉中国人民，无产阶级政党带领人民群众完全可以建立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社会制度。正是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切向往；正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吸引力。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⑦，社会主义运动如同“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

①《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514 页。

②《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610 页。

③《列宁全集》（第 3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7 页。

④《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5-6 页。

⑤《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 页。

⑥王雪楠：《从“俄乱”到“俄式革命”——再论“十月革命”到中国的“参照”作用（1917—1921）》，《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第 12 期。

⑦《李大钊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573 页。

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思想界迅速产生了一批赞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想潮流。1921 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这是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明确提出了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设想。“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②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选择与确立,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向。从此以后,中国革命朝着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方向阔步前进。

二、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

作为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革命实践尽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征,但其正确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如何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以其独创性的经验和理论原则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性认识。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适应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永恒主题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贯穿于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末,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性矛盾。人类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向前发展,主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既不同于封建社会,也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蕴含着特殊的社会矛盾和革命要求。在近代中国诸多社会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就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是在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以及组织等相关因素合力下生成的时代产物。在本质上,它是中国无产阶级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的深重生存危机的现实境遇,针对挽救国家危亡、推动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时代课题,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下实现自身解放的革命化的积极回应。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深刻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创立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和主要杠杆。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意义,要放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演进中加以审视,要放在无产阶级解放面临的现实境遇的广阔视域中加以考量,要放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总体布局中加以把握。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项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在内的系统性工程,是一场十分复杂的整体性革命。“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③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首

①《李大钊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602-603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51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95 页。

先取决于是否取得了国家政权。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类型的新国家机器。需要指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既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又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实现彻底的决裂、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要同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中，政治革命是核心，经济革命是根本，思想革命是关键。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本质上，都是解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课题和阶段性任务。可以说，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的互动发展与良性运转，构成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体架构。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深刻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是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思想革命共同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巩固与进一步拓展问题，必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协同发展方面下功夫、做文章、求实效。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无产阶级政党的主体自觉，客观上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增强对革命规律的认识水平和遵循能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②我们说，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并不是似乎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这个革命就自然会发生了；这个革命是不是发生、能不能胜利，还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③，还必须要有革命的主观条件的成熟。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面对“使命担当”与“能力不足”之间的突出矛盾，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④正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从而提升了把握革命规律的能力，增强了遵循革命规律的过硬本领。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深刻表明：不断增强对革命规律的认识水平和遵循能力，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能够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之道，也是其能够领导革命成功、引领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提升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领导能力问题，要从理论层面加以系统说明，从战略高度加以科学定位，从未来发展加以整体规划，从而真正达成科学认识规律和自觉运用规律两个方面能力的有机衔接与内在统一。

第四，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起点，只有充分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为自己服务，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彰显自己的优越性与生命力。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文化成果，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必然代替”与“必然利用”的关系。十月革命后，列宁反复强调，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引进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充分利用外资，大胆利用外国专家等。他认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⑤。他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只有利用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才能建立起来。“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92页。

③沙健孙：《列宁论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年第4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57页。

⑤《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2页。

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进程中,曾经遭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着干”思维方式的严重冲击;痛定思痛,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面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处的新常态,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是内在统一的新思路,从而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中国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深刻表明:在“一球两制”的现实境遇中,社会主义国家要在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方面下功夫、出实招,这是事关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问题,要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去考察,要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中去理解,要放在维护社会主义安全的战略高度去认识,要放在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要求中去深化。

三、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中国革命的当代启示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中国革命实践,不仅以其独创性经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性认识,而且蕴含其中的关于推动社会革命的“内在规定性”也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必须坚持运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知道,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表现,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行动指南。当然,“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需要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需要在无产阶级斗争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否则,它就不会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在领导俄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是列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许多重要话语及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③,创立了列宁主义,成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行动指南。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新的实践。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引起了中国人的思想变化,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从根本上保障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发挥了先进战士的作用;正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路线,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如同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⑤。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是一项永恒的时代课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坚持,但不能僵化,要发展,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

①《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4页。
③俞良早:《十月革命后列宁创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话语和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

义理论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的精神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列宁明确强调："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一条通向胜利的康庄大道。"①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只有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才能由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自为的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集中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保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最终获得胜利。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深刻阐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价值意义。在毛泽东看来，"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②。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学说运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际，高度重视党的全面领导，积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有力地提升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精诚团结、浴血奋战、艰苦奋斗，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从而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要坚定走中国道路，把 14 亿人口凝聚成中国力量，焕发出中国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要继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化了党的领导，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同志在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后指出："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③

第三，必须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要争得自身解放，就必须坚持敢于斗争的精神，用暴力革命方式，武装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④。列宁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⑤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在《新纪元》一文中，李大钊明确强调："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

①《列宁全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57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357 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20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35 页。
⑤《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27 页。

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①]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毛泽东坚持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结合近代中国国情,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明确强调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要性。“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②]。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对于中国革命的价值意义,这是对十月革命精神的坚持;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点和突破口放在了农村,而不是城市,这是结合中国实际对十月革命精神的发展。“它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增添了新内容,使其关于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在中国获得新突破,开出了鲜艳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③]正是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形成了一整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理论和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艰苦卓绝、义无反顾的斗争,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条件支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既肩负着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又面临着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既需要抓住和利用好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需要应对一系列现实的重大风险考验。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坚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确保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确保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四,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我们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主旨和终极诉求。马克思指出:“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④]列宁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不仅在于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而且在于“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过程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全面发展”[⑤]。1917 年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产生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切向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最初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指出的,“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⑥]。面对当时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等各种思潮杂陈的境遇,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探求,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思想,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和主张。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就是人民群众的路线,群众观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此说,“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

①《李大钊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606-608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10 页。
③赵明义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348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75 页。
⑤《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34 页。
⑥《瞿秋白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6 页。

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正是选择和明确了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中国革命才有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中国革命才有了坚不可摧的强大后盾，中国革命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崭新变化。人民至上，就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造福人民。我们说，坚持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宗旨的时代彰显，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大逻辑。“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②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人民幸福作为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最终价值指向，促使人民拥有更充实的获得感、更有保障的幸福感、更可持续的安全感。

四、余论

我们说，无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成不变的万能模式可供“照抄”“照搬”，必然带有“地域性”“民族性”特点。无产阶级革命模式之所以具有多样性，是由各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具体条件决定的，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思想文化传统、革命动力的构成、革命方式的选择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程度等。这些条件在各个国家的差异性，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模式的多样性。中国革命实践活动所呈现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都是由其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时”“空”条件决定的，蕴含着具体的社会历史规定性。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深刻表明：革命运动的民族（区域）性与时代特性的深度融合，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共性；革命实践经验与革命运动理念的动态对接，构成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内在机理。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要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现实境遇的考量，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资源的挖掘，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从而真正实现科学理论与本国国情的现实对接与互动发展。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不断遭到诘难、歪曲和攻击。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进一步引发了关于十月革命的种种质疑。但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决不能遮蔽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不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开创了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模式”，“为各国劳动人民开创了如何依据本国国情探索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开创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大众化的新范例”。③ 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了十月革命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价值意义，才高高举起了十月革命的旗帜；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十月革命的伟大旗帜，才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大力弘扬十月革命精神，才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延续，也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深刻彰显着十月革命的当代价值与时代光辉。对此，吴恩远指出：“中国在苏东剧变情况下把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将会更加显示出来。单此一点，十月革命也功

①《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04 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0 页。

③高放：《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一国首胜》，《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 年第 6 期。

莫大焉。”[①]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出现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要大力弘扬十月革命秉持的勇于突破前人的创新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重在实效性的根本要求,从战略高度加以精心谋划,从理论上加以深入阐释,在实践中加以有效展开,通过获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理论、实践和方法资源,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从而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全面复兴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Contempoary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ctober Revolution

Zhang Shiha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ed by Lenin opened up a new era in human history, which i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as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political patter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 with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a new organizational form, theoretical views and political practice. Either in terms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arrier or in terms of road following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October Revolution have a high degree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has further enriched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ith its original practional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provided valuable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profou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profoundly demonstrat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glory of the age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Key words: October Revolution; Chinese Revolution; Lenin; scientific socialism

责任编辑:王盛辉

①吴恩远:《苏联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4 页。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及其完善和发展

——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为视角*

魏淑君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教学研究部,上海,201204)

摘要: 从香港回归之日起,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是“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核心。“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提出到付诸实践的经验升华和成就凝结。随着“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处理和应对这些新问题,维护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关键词: 宪法;基本法;“一国两制”制度体系;香港特区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4-0088-09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09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科学构想的提出及其生动的实践与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同步,贯穿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变迁中。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政治实践,邓小平对如何确保香港的顺利回归及1997年后如何管理香港,有着坚定的决心、明确的立场和具体可行的政策。他曾指出,“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习近平同志强调,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规定了在香港特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法律化、制度化,它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提供了法律保障。①“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优势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得到彰显,以宪法和基本法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也在“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一、“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之一,充分表明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 **收稿日期:** 2020-07-01

作者简介: 魏淑君(1970—),女,山东潍坊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教授,博士。

①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17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7年7月2日。

(一)为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提供最佳方案。“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1980 年 1 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经济建设,就是要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① 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重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实现国家统一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开始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1978 年下半年,邓小平主持以台湾问题为焦点的中美建交谈判,在参照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初步设想,形成后来被概括为“一国两制”的初步表述。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宣告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81 年 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邓小平在 1982 年初强调,九条方针的实质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虽然当时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战略构想,但是解决的条件并不成熟。于是,“一国两制”的实践首先用在了香港问题的解决上。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从 1982 年 9 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开始。当时,邓小平阐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他明确提出,中国会制定出到 1997 年 15 年中以及 15 年后继续保持香港繁荣、且能被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1984 年 12 月,他谈到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用和平方式就必须考虑到香港、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使三方面都能接受,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而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邓小平指出:“一九八一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两年前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提出‘一国两制’。”③因此,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回归,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他领导制定了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确定了“一国两制”的具体内容,并载入中英联合声明。1990 年香港基本法颁布后,“一国两制”的内容就是中国政府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实现了方针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2017 年 7 月,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④。当下的中国在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仍面临着国家完全统一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邓小平在 1987 年提出,香港基本法很重要,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因此,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以来,“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创新和丰富了国家治理模式。香港从回归之日起,就被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宪

①《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39-240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 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1-102 页。

④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17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2017 年 7 月 2 日。

法》序言和相关条文阐明了我国为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主权在中央，这是实行“一国两制”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中央对香港特区行使管治权的政治基础。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了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因此，“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规定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里中央对地方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与联邦制不同，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权力是本源性、全面性的，地方没有任何固有的权力，地方的权力来自于中央的授权，而且这种授权也仅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①。从宪法和基本法的具体规定可见，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既体现出中央对其所有的全部地方行政区域管理的共性，同时具有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管理的特殊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便是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特殊的管理方式。当然，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而是中央（全国人大）授权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因此，“一国两制”正是在坚持国家管理共性原则下，从我国国情以及香港历史与现实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造模式，形成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它丰富了我国地方行政区域的管理制度，是国家治理结构的重大理论创新。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模式上的创新，还体现在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和平共处提供制度空间。“一国两制”的鲜明特征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处于一个国家中。邓小平在 1987 年 4 月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要保持香港 50 年繁荣和稳定，50 年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基本法制定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两个不变”的问题，即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国两制”政策不变，保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他说：“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②他强调“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就行不通了。从哲学意义上讲，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充分体现了“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吸引、相互包容的一面”③。他找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双方在香港共存的条件基础：一是本着坚持和维护国家主权，保持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的目的而实行“一国两制”。这种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使各方面都能接受。二是仅在一个国家的局部地区搞资本主义，大陆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而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的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这是保证“一国两制”顺利实行的前提。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允许两种制度的存在，“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④。保持香港长期繁荣和稳定，就是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事业进入新时

①王禹：《论恢复行使主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74 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18 页。

③仪浩：《重温邓小平“一国两制”论述的哲学思想》，《港澳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④《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03、217 页。

代,习近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两个不变”的思想,他在2017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两个建设好”,也就是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一国两制”包含了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求大同、存大异。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阐释了“一国”之内两种制度长期融合共处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力量。

(三)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邓小平曾指出,中国政府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作为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会改变,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①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和“一国两制”的初衷。香港基本法序言开宗明义,实行“一国两制”方针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基本法为香港的长远发展和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回归以来,香港特区一直享有高度便利及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践行基本法规定的法治和司法独立,实行简单低税制、资金流动及进出自由,以及开放灵活的市场。这些制度优势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被众多的国际机构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使其自身特色和优势得以保持。中央政府为全力支持香港繁荣发展,在香港应对风险和挑战、巩固和提升自身竞争优势、加强与内地各领域合作等方面持续出台制度措施,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新动力。回归后,香港经济有显著增长。2019年的经济规模超过28000亿港元,以金额计算约为1997年回归前的两倍,本地生产总值期内平均每年实质增长3%,明显高于先进经济体2%的平均增幅。2019年香港人均名义本地生产总值达48700美元,高于德国、日本、英国。②

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中的独特地位,也助力祖国内地的发展。2018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发挥的六大作用,并强调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澳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③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9年2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目的是为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着眼于“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的结合点,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实现香港与内地共同繁荣,推动新时代“一国两制”发展的新实践。

二、“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在改革开放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制度的基本含义就是一种社会规范,是一种人们有目的建构的、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范或者行动准则。制度体系则是“若干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关系所组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个整体,其目的是为了更加全面和有效地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④。从国家层面看,国家制度体系应是一个国家治理本国事务所依据的一系列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总和。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国家的制度体系随着事业发展和情况的变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8页。

②张建宗:《香港特区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成就非凡》,紫荆网,hk.zijing.org/2020/0628/822395.shtml。

③习近平:《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的讲话》(2018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3日。

④丁志刚、于泽慧:《论制度、制度化、制度体系与国家治理》,《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1期。

化需要积极地推进和构建，使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习近平同志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就“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而言，其应是围绕“一国两制”方针的目的，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从保持港澳台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宗旨出发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和实现这些制度目标的机制体制的总和。随着“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处理和应对这些新挑战，“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也会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核心。习近平同志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①。对于香港来讲，依法治理，首要的就是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中，宪法和基本法具有特殊的地位，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法律渊源。基本法是全国人大依据宪法制定的国家基本法律，其效力高于特别行政区的其他法律法规，它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等根本问题作了规定，从宪制层面确保了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从法理而言，宪法在整个国家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国两制”在国家法治上的最高体现，而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国家宪法制定的，“是‘一国两制’在国家法治上的集中体现”②。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切行政、立法、司法行为都必须符合宪法和基本法，以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为最高准则。

（二）回归后香港特区建立新的法律体系，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这是基于香港特区法律体系的视角来论述，澳门特区法律体系同样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和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有效实施需要相关制度和机制的保障。回归后，香港在继续适用普通法的前提下，法律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建立了新的法律体系。按照基本法第 8 条的规定，香港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等原有法律，除同基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区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第 160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为同基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区法律，如以后发现有法律同基本法相抵触，可依照基本法规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基本法第 18 条也明确规定了在香港特区实行的法律，具体包括：一是基本法；二是基本法第 8 条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三是回归后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此外，还包括基本法附件三作出明文规定的部分全国性法律，它们自回归之日起由香港特区在当地公布或立法实施。因此，在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新的宪制秩序下，回归后的香港逐步建立起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以国家有关立法和特区法律为主要依据的新的宪制秩序和法律体系，构成“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

（三）“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首先，在香港回归以来，从司法实践看，普通法下的释法制度得以充分实施。作为裁决的主要法律依据，基本法在法院审理案件中被频繁适用，从而使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香港社会秩序得到维护。透过特区法院的诉讼案例，可见基本法在普通法制度下得到充实和发展，充分展示了它的生命力。其次，与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中央对香港依法管治的体制机制逐渐健全。如在香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424 页。

②栗战书：《坚定不移走“一国两制”成功道路 确保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 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 年 12 月 3 日），《人民日报》2019 年 12 月 4 日。

港特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方面,已经确立了由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同意、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的“五步曲”法律程序。按照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和监督基本法实施的职责。香港基本法实施 23 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作出五次释法,就基本法中的具体条款阐明立法原意,使之得以正确贯彻执行,从而更好地维护了香港基本法的权威。23 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有关程序和工作机制得以建立,并且与特区法院的释法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责,既是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重要方式,也使与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不断完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度创新,更是“一国两制”制度创新的重点。在当前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创新大湾区合作发展机制、破解合作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新契机。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建设好大湾区,关键在制度创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推动解决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不适应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法规制度约束,把国家所需和港澳所长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粤港澳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制度创新,既是在新时代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背景下“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也是推动“一国两制”深入发展新实践的需要,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丰富和发展的具体体现。

三、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提高特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到,党领导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有两次中央全会是划时代的。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它开启了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一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因为它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和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同过去相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因为现在的改革面对更多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它对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而新时代的改革建章立制构建制度体系的任务也就更重。① 应该说,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香港在发展中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回归 23 年来,“一国两制”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随着“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充分暴露出香港特区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了从战略上来完善香港的治理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完善依法治港制度体系,既符合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要求,也有利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顺利实践,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不断健全和完善依法治港制度体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是“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 20 余年的基本经验。“全面准确”的应有之义,就是依法治港,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这是治港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随着“一国两制”实践不断发展,香港基本法的实施不断深入,“中央和特别行政区都有责任在全面检视宪法和基本法实施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该制定的法律要制定,该修改的法律要修改,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48-49 页。

该废除的法律要废除，该补充的制度要补充，该配套的机制要配套”①，使治港更加于法有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全局的高度，从健全中央依宪依法对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制度的层面，提出了包括完善中央对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健全特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等 6 项任务，对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出了重大部署。其中提到“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②的要求。众所周知，香港回归 20 多年来，一直没有完成基本法第 23 条规定的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本地立法，而在香港当下的本地法律中对维护国家安全起到一定作用的《刑事罪行条例》和《公安条例》的法律有效性和实际作用又具有不确定性，使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和短板”③。2019 年爆发的修例风波清晰地凸显出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习近平同志在 2017 年 7 月 1 日讲话中强调，“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④。2020 年 6 月 3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并于当天作出决定，将刚通过的这部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明确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如今法律已经生效施行，它将有效地防范、制止和惩治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从国家层面来推进和完善维护国家安全制度机制建设，堵塞香港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制度漏洞。这部法律的颁行，贯彻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表明了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加注重治港制度的顶层设计，这对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保香港长治久安，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这是对治理香港主体提出的要求。按照“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治理香港的主体包括中央和特区。1997 年回归以后中央如何治理香港，谁来治理香港，邓小平对此有明确的思路。在特区层面，首先，“港人治港”中的“港人”是指“香港的中国人”，这是在“一个国家”主权原则之下对治理香港主体的特殊性制度安排。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就坚决否定了英方提出的想用主权换治权、在 1997 年后继续管治香港的企图，他多次谈到对香港的中国人能够治理好香港有信心。他的信心来自于香港人都有的民族自豪感，以及香港过去的繁荣都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事实。因此，在香港回归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由熟悉情况的香港当地人自己来管理事务。北京也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⑤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特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主席以及立法会百分之八十以上议员、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都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⑥ 其次，“港人治港”有明确的界限和标准，那就是邓小平强调的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邓小平在多个场合回答了怎样才是“爱国者”，用“爱祖国、爱香港”来界定治港者主体的基本政

①张晓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人民日报》2019 年 12 月 11 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37 页。

③刘兆佳：《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港澳研究》2020 年第 1 期。

④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17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2017 年 7 月 2 日。

⑤《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58 页。

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四章“政治体制”的相关规定。

治要求,并且提出了三条具体标准: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以上三条都是爱国者,并不要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后,“港人治港”不等于中央不管。1987 年 4 月 16 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讲到,“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①。还讲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香港基本法第 104 条明确规定了特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② 2016 年 11 月 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上述第 104 条作出解释,阐明了该条规定的立法原意,为其正确实施提供了保证。由此可见,宪法和基本法对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管治团队来治理特区,确立了规范依据。习近平同志在 2017 年 7 月 1 日讲话中指出,从中央来说只要爱国爱港,诚心诚意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论持什么政见或主张,我们都愿意与之沟通。他重申了在香港特区为维护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政治性要求。

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团队是一个整体,依据基本法的授权管理特区,维护“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共同履行“一国两制”的主体责任。其中,行政长官的地位尤为重要。基于宪法对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基本法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和香港实际情况出发,确立了特区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长官作为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双首长”,除了对特区负责之外,必须对中央政府负责,是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所以对行政长官爱国爱港必须有更高的要求,必须符合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香港社会认同等标准。③

(三)提高特区依法治理能力和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一国两制”在深入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在尊重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同时,突出强调中央与港澳特区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均承担着相应的责任。2014 年 6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指出,中央对香港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习近平同志在 2017 年 7 月 1 日讲话中强调,在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时,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中央对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是基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主权层面的问题,中央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是主权具体行使层面的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中央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也是中央对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体现,二者内在一致,不可分离。刚颁布实施的香港国安法就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对与香港特区有关的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香港特区对维护国家安全负宪制责任,也承担主要责任,凸显了从中央和特区两个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责任与权力相互对应。判断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一国两制”实施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应当是宪法和基本法中规定的中央与港澳特区所享有的权力。从中央层面看,宪法和基本法很明确地规定了属于中央管治的各项权力,中央权力不限于通常所讲的外交权和防务权,还有决定特别行政

①《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61、221 页。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104 条。

③本书编写组编著:《〈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346 页。

区的设立、制定基本法、规定在港澳实行的制度;对行政长官与主要官员的任命权;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对基本法的修改权;对港澳政制发展的主导权和最终决定权;对港澳本地立法的备案审查权;增减在港澳适用的全国性法律;决定对港澳追加授权;宣布港澳进入战争状态或紧急状态;对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2014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指出,中央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对香港特区直接行使的权力,亦包括授予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而对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则享有监督权。对中央依法履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全面管治权和宪制责任作了全面总结。中央运用管治权依法履行职责,就是确保"一国两制"在特区的实践不出现偏差。在特别行政区层面,依据基本法规定,其享有高度自治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在这些权力事项范围内,特区承担着主体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港治澳的一个重要理念,便是让中央管治权的行使过程"走向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增加其透明度、合理性和可预测性"①。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因此,在依法治港治澳理念的指导下,中央与特区均要依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明确自己在治理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并依法行使。

Superiority of the System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Its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ei Shujun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Pudong, Shanghai, 201204)

Abstract: Since the day on which Hong Kong returned to Chinese sovereignty,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have been the 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the embodiment of the legisl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and the core of the system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remarkable superiority of the system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the sublimation of experience and condensation of achievements of the great concept of the System from its proposition to implementation. With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put into further practice, the System will meet with new situations and issues, and will confront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deal with these new issues, to maintain the long-term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o ensure the function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the System is also under constant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Constitution; the Basic Law; the system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责任编辑:王盛辉

①刘兆佳:《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的磨合与发展——兼论近期香港事态的变迁》,《港澳研究》2016 年第 4 期。

傅斯年与山东龙山文化研发关系述论*①

马亮宽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252059)

摘要: 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山东龙山城子崖、日照两城镇等相继开展发掘。通过对这些遗址发掘所获古器物,尤其是出土的大量黑陶器的研究证实,黑陶器物所代表的山东龙山文化与中原西部以彩陶等器物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是中国上古时代两个独立的系统。傅斯年经过研究得出结论:东西两个系统,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两系统东西对峙,相争相灭,便形成了中国的三代史。山东龙山文化从中国上古文化源流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同时为傅斯年研究中国上古史、构建夷夏东西学说理论提供了史实证据。

关键词: 傅斯年;吴金鼎;城子崖遗址;两城镇遗址;山东古迹研究会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4-0097-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10

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山东龙山镇城子崖及日照两城镇等遗址相继开展发掘。在河南殷墟发掘时因与地方政府及民间保守势力关系处理失当,发掘一度受阻。之后,傅斯年等人在对山东城子崖、两城镇发掘时,吸取了殷墟发掘的教训,充分利用山东地方文化学术人脉关系,组建"山东古迹研究会",妥善处理与地方各界的关系,使发掘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丰硕成果。关于古遗址考察、发掘及其成果的学术价值,数十年来研究论著虽然众多,但由于"史语所"1949年迁至台湾后,档案资料随迁未能及时公布,其中有些问题的研究尚待深入。笔者曾多次赴台湾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收集和查阅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及"国史馆"档案资料。在对档案资料梳理、考释的基础上,对傅斯年与城子崖、两城镇遗址发掘,以及发掘成果对其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影响进行探析,拟对以前相关研究有所补充和校正。

一、城子崖遗址发掘决策及准备过程

城子崖遗址地属山东济南历城区龙山镇,古时称东平陵。《汉书·地理志》记载:"东平陵有工官、铁官……济南郡县十四,首列东平陵。"据《齐乘》记载:"扶风有平陵,故此加东。"意即汉都城扶风郡有平陵地名,故在此"平陵"加"东",以示区别。西汉末年王莽家族祖籍即是东平陵。自春秋战国,经两汉直至唐代,东平陵一直是山东济南地区的繁华大都,至唐元和十年(815年),并入历城县后逐渐衰落废弃。而该地区是齐鲁大地的古城遗址,历代史籍有明确记载。至20世

* **收稿日期:** 2020-05-08
作者简介: 马亮宽(1959—),男,山东菏泽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现代中国学术体制的建构研究"(11BZS002)的阶段性成果。

纪 20 年代，经青年考古学者吴金鼎探寻发现，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山东安丘人，早年就学于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1926 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李济学习人类学、考古学专业。1928 年，吴金鼎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肄业，受聘于齐鲁大学，工作之余致力于济南东部平陵古城地区的考察。1928 年 3 月至 10 月，吴金鼎先后六次对平陵城子崖地区古遗址进行细密考察，撰成《平陵访古记》一文，“确切认定此遗址包含层所蕴含之重大意义”，文中依据城子崖所蕴含的不同文化层，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一、遗址及孙家庄南崖之灰土层为龙山文化之最古层。

二、镇东河岸大道沟两崖，及东北大道沟北崖（即与遗址北端相对之处）所有包含层之年代，皆较遗址为晚。平陵城及镇北大沟两崖所有包含层，其年代亦较晚。

三、由镇西直至西河皆系较晚之文化区域，其年代去今不远。但不得为近二百年来之遗物。

四、镇北大沟所包含之文化层，其年代较镇西为早。①

在初步确定城子崖古文化遗址后，吴金鼎向其研究生导师、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汇报了在山东历城城子崖地区的考古发现，引起了李济的高度关注，并在第一时间向所长傅斯年作了汇报。

傅斯年作为一代学人，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对家乡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一直给予关注。这从他给好友王献唐的信中即可看出：“古迹之系统调查，乡人著作之搜集等，非群力不能为功。弟受省费资助留学六年有余，义应有心报之，而回国之后，尽在外省，此志期诸异日耳！”②信中充分表达了他想为山东文化、学术进步作贡献的心愿。当傅斯年收到吴金鼎提供的龙山城子崖遗址调查的相关信息后，十分重视，决定利用在山东的人脉关系和学术影响，通过团结合作的方式，实现促进山东历史文化研究的初衷。傅斯年经过思考和策划，决定“史语所”与山东地方政府合组一个机构，领导和协调对山东古代文明的考察和研究，尤其是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实现此种设想，他与同窗好友何思源、杨振声、王献唐等人积极联络，交流意见。傅斯年与何思源、杨振声三人是北京大学同学，曾同是新潮社会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并肩战斗，1919 年三人毕业后同期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生，何思源留学归国后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杨振声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王献唐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隶属于省教育厅。王献唐在任期间，对山东省的图书典籍收集整理，对历史文化深入研究，与学术界代表人士联系广泛。

1928 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隶属于大学院；1929 年改隶于教育部，聘傅斯年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③ 要求有关省份设立分会，以便对各地古物进行保护。故此，1930 年 8 月，傅斯年就成立山东古物保管分会一事致函王献唐，在信中说：“古物保管会分会事，弟今拟给仙槎（何思源字，作者注）一书，乞一看。如兄同意，乞便交之，得其同意，便请示知。弟虑直寄给他，或压住也。此事最关键，在山东能出月数百元之经费，盖所谓总会，亦有月千元之收入（中央）也。”④在致王献唐信的第四天，傅斯年致电何思源，要求到鲁东临淄一带考察历史古迹，其中说：“何仙槎兄，敝所前拟调查临淄一带古迹事，现可续进行否？电复。”⑤在得到何思源

①吴金鼎：《平陵访古记》，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 年第一本第四分，第 484 页。

②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92 页。

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 196—1（未刊）。

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88-89 页。

⑤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 170—1（未刊）。

的同意后,“史语所”派于道泉、吴金鼎赴临淄一带进行考察。一个月后,傅斯年决定亲赴山东,与山东省有关方面商谈合作发掘城子崖等相关事宜。10月6日,傅斯年又致电何思源,告知他和李济到济南的时间,电文内容为:“济南教育厅何仙槎兄,月中弟赴济,兄何日离省,盼电示,免相左。”①同时,致信于道泉、吴金鼎,希望二人多与山东文化界人士接触、联系。② 傅斯年原计划与李济同行到济南、临淄,但因患病无法成行,李济于10月14日先行到达。在吴金鼎的陪同下,李济考察了临淄、龙山城子崖等古遗址后,决定选择城子崖作为山东考古发掘的第一个工作地点。后来李济在“发掘城子崖的理由”中阐述说:

(1)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当然选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一个起发点;这个时期,大部分的学者都承认在秦汉以前的夏商周三个朝代。

(2)……近数年来,中国考古界对于中国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已有很重要的贡献。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均作过些极有系统的发掘。这类的研究,不但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并且已得到世界考古学者的充分注意。……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它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样的贵重陶器。③

10月25日,傅斯年到达济南,与何思源经过反复协商,在推动研究山东古文化的基础上,分别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和山东省教育厅拟定出具体的合作办法。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的名义致函山东省政府,并由何思源提请山东省政务会议通过,合作组建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具体内容为: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设置本所以来,对于中国考古学稍有所贡献,颇引起若干极重要之古代文化史问题。夙知贵省富于古代遗迹,目下调查所知,已知临淄县齐故墟及历城县平陵故墟,颇出异样之陶片等,兹由敝所傅所长前来贵省,与贵厅何厅长当面接洽一切,佥以为若借此时中央研究院专门人才之力量,作山东考古学之研究,必于中国史学有甚大之贡献。特拟定办法八条,敢烦贵厅提出贵省政府政务会议通过,敝所当再呈请国立中央研究院备案。事关中国学术之成就,想当乐于合作也。④

国立中央研究院、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

一、兹经国立中央研究院之提议,由国立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各聘委员二至五人组织山东古迹研究会。

二、国立中央研究院所聘委员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推荐之。山东省政府所聘委员由山东省政府教育厅推荐之。

三、本会设委员长一人,工作主任一人,秘书一人,由委员互选之。

四、本会工作暂分调查、发掘、研究三步,其科学的指导之责由国立中央研究院任之,其保护之责由山东省政府任之。

五、本会会址设于济南,并于发掘地点设立办事处。

六、本会工作费由国立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分任之,遇必要时由国立中央研究院独

①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70—2(未刊)。

②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70—3(未刊)。

③张光直主编:《李济文集》(卷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3-204页。

④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67-3(未刊)。

任之。

七、发掘所得之物均存置本会内以便研究，惟因研究之方便，得由本会通过，提出一部分在他处研究，但须于一定期内交还本会。

八、现在发掘工作暂以龙山及临淄为试办区。①

10 月 30 日，山东省政府第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何思源提交的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并于当日以训令的形式公布，内容为：“为令行事，查本府第十一次政务会议，何委员思源提议由本府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请公决施行一案，经决议照案通过，并以杨振声、王献唐、刘次箫、张敦讷四人为委员等因，除分别函达外，合行令该厅知照。”②

在傅斯年、何思源等人的积极努力和联络下，“山东古迹研究会”于 1930 年 11 月 4 日正式成立。该研究会的成立，使得“史语所”在山东进行的古迹调查和考古发掘得到山东省政府的许可与支持，保证了山东城子崖等古遗址发掘工作顺利进行。为慎重起见，傅斯年、何思源二人又以公函的形式报请中央研究院备案，“史语所”所藏档案存有公函原件，其内容如下：

敬启者，敝会组织情形，业经函达在案，兹于本月四日，假济南正觉寺街青岛大学办事处，开成立大会。当依据敝会组织办法，互选傅斯年为委员长，李济为工作主任，王献唐为秘书，业已开始办公。并由青岛大学办事处，拨借房屋数所，为敝会办公地址。所有成立情形，相应函请贵所转呈国立中央研究院，准予备案，实为公便。

此致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国立中央研究院、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③

山东古迹研究会成立后，为使工作有规可依、有章可循，特拟定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办事章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组织。本会根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组织之。

二、委员会。本会设委员会由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组织之筹画议决，一切研究进行，计划开会以全体委员过半数为法定人数。

三、职员。本会委员长为委员会主席，召集一切会议并执行一切议决案件，工作主任负责组织一切调查发掘及研究工作，秘书处理一切常务，任期均为一年。

四、顾问及研究员。本会因工作需要得聘顾问及研究员。

五、工作进行。本会于每预算年始将一年工作计画，每预算年终将一年工作成绩分别报告于中央研究院以及山东省政府以备查核。

六、章程修改。本章程如有未尽事宜，经委员会之议决得随时修改。

附委员名单：

傅斯年　委员长

李济　工作主任

王献唐　秘书

杨振声、刘次箫、张敦讷、郭宝钧、董作宾。④

①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 169—3（未刊）。

②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 167—3（未刊）。

③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 169—1（未刊）。

④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 169—6b（未刊）。

山东古迹研究会是以中央研究院和山东省政府名义合组的,具体执行者则是“史语所”和山东省教育厅,其合作办法和办事章程的制定与公布,为龙山城子崖等古遗址考古发掘的顺利进行、以及山东其他地区的古迹调查和保护奠定了基础。

二、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发掘与文物整理

傅斯年担任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长,是城子崖遗址发掘的实际负责人,李济具体主持发掘事宜。1930 年 11 月 6 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决议在济南召开城子崖遗址发掘发布会。会议由何思源主持,李济作主题发言,向山东学术、教育、新闻等各界人士系统地通报了山东考古的意图和发掘城子崖的缘由。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尤其是山东各界公布了进行城子崖考古发掘的各种信息。发布会结束后,李济又主持召开了山东古迹研究会第一次会议,就城子崖古遗址的具体发掘工作进行了分工和安排。内容大致如下:在赴田野发掘时,古迹研究会会员全体参加,合力工作。联络地方、调动人力物力、配合各方面工作主要由何思源、杨振声等人负责;另外,省方委员杨振声、王献唐、刘次箫、张敦讷等人,除参加发掘现场的工作外,还要分管有关各方的联络、出土古物的保管和后勤服务工作。

工作安排就绪后,城子崖发掘于 1930 年 11 月 7 日正式开始,至 12 月 11 日完成第一次发掘,所获物品以残破陶片为主,以及兽骨、蚌壳和石器等,共装 89 箱。按照事先约定,考古发掘器物存留山东古迹研究会保管、整理。具体由吴金鼎负责。

12 月 14 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召开第二次常务会议,由秘书王献唐代理委员长傅斯年主持,工作主任报告工作经过,并说明此次发掘城子崖理由及所得成绩之重要性。发掘活动结束后,根据《国立中央研究院 山东省政府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公函》所预定的计划,所有器物全部运往济南青岛大学古迹会办公场所,由吴金鼎、郭宝钧、王湘保管、整理、撰写发掘报告。

在发掘器物整理期间,山东古迹研究会研究场所两次出现危机,经傅斯年多方斡旋,最后得以保留。1930 年底,山东鲁豫清乡督办公署成立,机关在青岛大学校舍挂牌办公,欲占用古迹会存放整理城子崖出土器物的房屋。吴金鼎闻知后立即致信傅斯年报告此事,并请傅斯年向青岛大学积极争取保留存放古器物房屋,信中说:

> 孟真先生,鲁豫清乡督办公署,拟设青大前院。我们现用之前一排房子,当然亦在被用之列。惟四角亭一院,当然还可以用,惟看青大方面之意,似要我们搬走,因为他们很有须要。前电请所中商之杨校长保留该院,几月间整理之成绩籍以保存,如办不到,只好另想他法。①

傅斯年对古迹研究会办公场地事以及城子崖发掘器物的整理研究相当重视,接信后即刻致信何思源、王献唐,希望二人能设法保留在青岛大学的办公场所,为发掘物品整理、发掘报告撰写提供保障。信中说:“闻清乡署借青大,务请两兄设法为古迹会保留大礼堂全院,俾可继续工作,秋季当更积极进行。盼复。”②在何、王等人的积极斡旋下,青岛大学古迹会办公场所得以保留。1931 年 8 月 10 日,傅斯年致信李济、董作宾时,告知“古迹会原有地盘只失去四角亭,此外前后全无恙。此次据云,孟君分解甚出力。但以后总是夜长梦多”,并嘱托二人:“暑假后你们几位工

①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 168—1b(未刊)。

②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 168—3(未刊)。

作的计画似乎此时即可决定，以免天气清凉时不失其时。”①从傅斯年的信函内容可以看出，此次古迹会办公场所问题虽然得以解决，但之后是否还有变故，仍令人担忧。

1931 年 10 月 8 日，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对城子崖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至 10 月 31 日结束，掘获物品约分陶、骨、蚌、石四项，共装 60 木箱。11 月 1 日运至济南，存放于古迹会内。此次发掘，除物品数量增加外，新发现制陶品窑三所，其结构形式及筑造年代得以确定。对于所发现城墙的方位、形式、建造年代也得到判定。至此，城子崖发掘工作全部完成，其后工作重点转为对城子崖遗址两次发掘物品的整理。古迹会决定，由吴金鼎常驻济南青岛大学会址，整理物品、撰写发掘报告。

1932 年 4 月，古迹会办公场所再次出现危机。4 月 11 日，山东省建设厅厅长张鸿烈致信傅斯年，因该厅为培养专门技术人员，扩充练习班，欲使用青岛大学提供给古迹会的 11 间房屋，并向傅斯年建议古迹会搬迁新址，信中说：“查山东古迹研究会现借用青大房舍十一间，拟请暂为腾让，以资应用，研究会则移入省立图书馆或民众教育馆办公……”②傅斯年颇感为难，4 月 12 日复信中表示：“弟等正筹赴鲁积极进行，闻贵厅拟借其所用之房舍，殊感困难，恐致停顿。”③并希望张鸿烈能利用在济南地利之便，另在他处寻找合适场所，开设学习班。同时，傅斯年致信何思源、王献唐二人，希望能设法保留古迹会现用场所，以便发掘物品整理工作顺利开展。信中说：“古迹研究会房舍乞力维持，并盼与幼山兄切商之，至感。”考虑到问题比较复杂，14 日傅斯年再次写长函致张鸿烈，阐述古迹会目前正在对城子崖发掘物品进行编目、登记造册，办公场所尤为重要，信中说：“无如山东古迹研究会恐正无处可移，省立图书馆自身已感房舍不足，否则古迹会设立时，当已置其中矣。”至于张鸿烈所提议使用民众教育馆房屋一事，傅斯年因对其不了解，也不能有所判断，便提到“民众教育馆肯否借房，所借之房能否适用，弟在此均不能悬揣，已托王献唐先生就近与我兄接洽，惟无论如何，务盼贵厅于古迹会得一完善办法之先，无遽用此”④。信中还将古迹会目前工作计划向张鸿烈作出了具体说明。同日，傅斯年致信李济、董作宾，信中说：“张函谈及具体办法，弟须先知民众馆不适用之理由，然后可以切切言其不可。已托献唐就近想法，待其回信到后再给张幼山一信也。总之，吾等无人在彼，又无工作，早晚是问题也。”⑤并且随信附上了 11 日张致傅信以及 12 日傅致何思源、王近信、张鸿烈信函的抄件。据“史语所”档案记述，这次争取古迹研究会办公场所颇费周折。最后，由何思源协调才得以解决。何在复傅信中叙述了解决方案：“山东图书馆旧楼划出一部拨归山东古迹研究会一节，现已据图书馆呈到厅，当参（如）嘱批准，完此公事上之手续。”⑥通过山东古迹研究会办公地点一事，可以看出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工作虽进展顺利，但是其后续整理工作却颇有曲折。而在此期间，傅斯年对城子崖发掘

①傅斯年致李济、董作宾（1931 年 8 月 10 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年，第 374 页。

②张鸿烈致傅斯年（抄件）（1932 年 4 月 11 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年，第 401—402 页。

③傅斯年致张鸿烈（抄电）（1932 年 4 月 12 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年，第 403 页。

④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 168—13；傅斯年致张鸿烈（抄电）（1932 年 4 月 14 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年，第 402 页。

⑤傅斯年致李济、董作宾（1932 年 4 月 14 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年，第 401 页。

⑥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 168—22b（未刊）。

器物整理工作的开展一直密切关注、多方联络,以求得城子崖发掘器物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傅斯年为古迹会争取办公场所期间,吴金鼎等人积极进行城子崖发掘物品的整理及撰写发掘报告等工作。6月16日,傅斯年以"山东古迹研究会"名义通知古迹会工作人员,计划将城子崖遗址中所出土器物部分运抵北平进行"精致照相"、绘图,以便将资料装订成册,便于保存。通知称:"查龙山城子崖发掘两次出土器物,业经整理研究就绪,所有论文报告正编印中,惟陶帛石器等多种须有精致照相绘图以便装版,此项工作以在北平本所最便利,现以检选各器物装箱运平,并开具清单以备存查,一俟摄绘完后,当即送还,相应函请查照办理,并希转函教育厅发给护照,以便起运。"①傅斯年在城子崖古遗址发掘和整理过程中的一系列举措,不仅凸显了城子崖遗址发掘的重要性,而且也初步显示出发掘器物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价值。

三、鲁东滨海地区考古调查与两城镇遗址发掘

城子崖遗址发掘结束不久,傅斯年按照对山东地区古遗址进行全面考察的设想,决定对鲁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古迹调查。他在《城子崖·序》中叙及鲁东滨海地区考古调查及发掘的动机:"先在城子崖作考古发掘,本是想藉此地为发掘临淄琅琊及其他海滨地带之初步尝试,已而此一发掘所得者,使我们遵循海滨工作之兴趣更炽盛。"②1934年春,"史语所"考古组成员王湘、祁延霈等人对山东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考古调查,在日照境内发现了包括两城镇③、丹土、尧王城在内的九处龙山文化遗址。关于王湘等人在日照等地的考察情况,王献唐友人李林在信中有所记叙:

> 王子湘先生于四月廿二日到县,廿三日到弟处,廿四日弟即随同出发,在大洼、两城得到石器甚多,业经装箱,由祁先生带济。王先生因鹤缘谏阻,仍留县调查,其他情形当有祁先生报告一切也。④

此次调查所获得的石器、陶器等器物运抵济南后,经古迹会研究人员初步整理研究,引起傅斯年等人的重视。1936年1月,傅斯年致信山东古迹研究会,要求将"鲁东调查所获陶片、石器"运往南京"史语所"进行进一步整理研究。其信中说:

> 查二十三年度鲁东调查所获陶片石器等器物,曾装五箱存会,现拟起运来京,以便整理,依□分类研究,附送箱号、清单一份,以备存查,一俟整理研究完毕,当即送还,相应函达,即希查照办理为荷!……二十三年度鲁东调查所得五箱陶片、石器。五箱箱号清单:39、42、43、44、45。⑤

傅斯年等人对鲁东调查结果梳理后,决定对两城镇遗址进行发掘。1936年,"史语所"考古组研究员梁思永、伊达(刘燿)、祁延霈等人赴日照两城镇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由伊达负责撰写发掘报告。1937年,发掘报告"已成十分之九",但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止,未能出版。但是,"史语所"考古学者对于日照等地古文化遗址调查所获器物及两城镇发掘成果进行综合研究,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结论,即日照两城镇等古遗址在学术上是与城子崖遗址具有同等价值的另

---

①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69—16(未刊)。

②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

③两城镇,地名,1934年"史语所"考古组在日照县发现九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瓦屋村和大孤堆两处属两城镇管辖,1936年对此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命名为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

④转引方辉:《王献唐与两城镇》,《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年第3期。

⑤历史语言研究所档案,档号:元169—21(未刊)。

一处龙山文化遗存。“史语所”考古学者石璋如曾记述说：“民国二十三年，中央研究院派员在山东沿海一带调查，在日照、诸城一带发现遗址多处，计有刘家楼、瓦屋村、大孤堆、大洼村、丹土村、安家岭、石臼所等。并于二十五年曾在瓦屋村、大孤堆两处发掘，所得陶石器物甚为丰富，由济南向东愈至海岸则所得黑陶尤为纯粹。”①

城子崖及日照两城镇等古遗址的发掘，确立了山东龙山文化是山东地区上古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时段，为齐鲁文化源流研究奠定了基础，曾有专题研究者评论说：“从西周以来在‘万世一系皆源于黄帝’的思想影响下……东夷及其文化‘落后论’的帽子一直戴了几千年。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山东城子崖、两城镇龙山文化的发现，人们才开始对上述认识产生了怀疑。”②而随着考古新资料不断面世，山东史前文化是中华古文明重要源头的历史地位逐步得以确定。

四、考古发掘成果对傅斯年史学研究的影响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进入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折时代，尤其是对中国上古史中华民族的成分和形成过程研究逐步展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个单一民族、中国文化起源“单一中心”学说理论开始受到质疑。同时，中华民族西来说也开始传播并产生影响，其中代表人物是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Andersson，Johan Gunnar）。安特生在中国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了著名的仰韶文化，随后又在西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出版了著名的《中华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和《甘肃考古记》（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安特生首先肯定了仰韶文化乃汉族遗迹，并采用英国学者郝伯森（ Hobson）的看法，在比较了仰韶彩陶和安诺（Anau）、特里波列（ Tripolye）彩陶的纹饰后，得出了它们同出一源的结论。另一位考古学家阿恩（Arne）则根据仰韶彩陶的器形与苏萨（Susa）和安诺所出陶器比较，认为二者相似，并得出结论说：“安特生博士所发现，不啻消除东西文化之独立，而确定李希霍芬氏中华民族西来之旧说也。”③安特生的学术观点曾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中国考古学科的进步和科学发掘范围的扩大，西方输入说被否定。④ 对于中华民族自古是单一民族的传统理论提出质疑，进而探寻古史的真实面象，主要代表人士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徐中舒等人，他们开始运用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寻求新资料对中国上古史进行研究，试图探寻出科学、真实的历史。其中，王国维、傅斯年、徐中舒等人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学说理论的代表人物。

傅斯年自欧洲留学回国开始，从事中国上古史研究，计划在几年内写成一部专著《民族与中国古代史》。他在叙述研究思路和目的时曾说，用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和传统文字资料相结合，“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并且强调这一中心思想“是我十余年前的见解”⑤。傅斯年研究中国上古史是要否定中华民族千古一系的传统观念，证实中国史前及夏商周三代是东西两个主要族群体系斗争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1928 年 7 月，“史语所”成立，傅斯年被任命为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一方面组织考古组赴河南安阳殷墟和城子崖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一方面在史学组对中国上古史进行专

①转引方辉：《王献唐与两城镇》，《山东图书馆学刊》2009 年第 3 期。

②逄振镐：《东夷及其史前文化试论》，《历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③陈力：《徐中舒先生与夏文化研究》，载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上），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 年，第 320 页。

④刘春强：《“以考古经世”：唯物史观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⑤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81 页。

题研究。

城子崖遗址经过 1930 年、1931 年两次发掘,1934 年整理发掘成果形成了《城子崖》发掘报告。傅斯年、李济分别为《城子崖》发掘报告写了序言,都肯定了城子崖发掘成果为中国上古民族多元发展提供了证据。李济在《城子崖》序言中以考古学专家和直接参与者的身份,对发掘的成果在中国上古史研究方面的价值等进行了评价。他说:

> 史语所考古组成立后,其中最紧要的成绩,要算是城子崖的工作。这是考古组同人们认为五六年来对于历史研究上的最重要的贡献。
>
> 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
>
> 黑陶的遗址既散布在山东及河南的东部,中心地点大约总在山东一带。它与西北部及北部的彩陶文化对峙到若何程度,尚无从知悉。但他们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在各地方的发展有早晚的不同,却是很清楚的。①

李济得出结论,城子崖所代表的文化时代是中国夏商时代,其主要区域是以山东为中心,与仰韶文化所代表的河南以西地区虽属同一时代,但却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傅斯年在《城子崖》序中着重介绍了城子崖遗址发掘的动机、收获以及对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价值和影响:"到山东去作考古发掘,本是假定山东一带当有不同于陕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已而发现很别致的黑陶,众多之情形使工作者不能不设定黑陶为一种文化系之代表,其作用一如采陶之在黄河上游。到殷墟以东作考古发掘,本是想看看殷代文化系之向东分配情形,已而在城子崖发现甚多物件,足与殷墟出土品比较连贯。"②城子崖发掘成果为傅斯年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史实依据,傅斯年在撰写《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过程中,先后将主要章节分别以《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移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论所谓五等爵》等为题目发表。

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前言中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其完成时间是 1934 年 10 月,也就是城子崖挖掘报告已经完成的时间。他在论文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上古时期族群发展和融合的脉络:"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③傅斯年认为:山东地区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东夷文化与殷商文化混合而形成了东部文化体系;中国上古夏商周三代历史,其主体就是夷商东系与夏周西系的斗争和融合发展史。他论述说:"我们可以说夷与殷显然属于东系,夏与周显然属于西系。……这样的东西二元局势,自非混合不可,于是起于东者,逆流压迫西方。起于西者,顺流压迫东方。东西对峙,而相争相灭,便是中国的三代史。在夏之夷夏之争,夷东而夏西。在商之夏商之争,商东而夏西,在周之建业,商奄东而周人西。"④

---

①李济:《安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412、414 页。

②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38 页。

③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3—4 页。

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28 页。

傅斯年关于中国上古及夏商周三代时期东西两大族群对峙发展理论得到学术界的逐步认可，王献唐、徐中舒、王玉哲等学者将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得出了与傅斯年相同的结论。仅举一例，王献唐从考证山东滕县出土的周代邾国彝器铭文入手，运用古音韵学、古文字学、古地理学和民族学的知识和方法，详细考证历史文献资料，撰写了《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论证了夏以前的山东居民为东夷族，发展成为殷商族群，在东部地区文化发展中具有广泛的贡献。

美籍华裔学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对傅斯年夷夏东西两个族群构建中国上古民族体系评价说："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① 2002 年，傅斯年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对这些论文进行了系统整理，以傅斯年生前所定书名出版面世。何兹全在前言中指出，可以作为傅斯年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并对构成该书的几篇论文评价说："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独到的见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②傅斯年在其他几篇论著《新获卜辞写本后记》《东北史纲》中对所持理念从不同视角进行了阐述。

结　语

城子崖、两城镇考古遗存否定了西方学者安特生等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结论。安特生等人研究仰韶彩陶文化的结论是证明中国文化西来说，而城子崖遗址和两城镇遗址出土的黑陶文化早于仰韶彩陶文化，反证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不能成立。城子崖考古发掘成果与两城镇考古发掘成果经对比研究是一个文化体系，是中国东部夷人和殷商人融合形成的文化圈，"综合其区域所包括，西至今河南之中心，东尽东海，北达济水，南则所谓淮夷徐舒者皆是。这个分布在东南的一大片部族，和分布在偏于西方的一大片部族名诸夏者，恰恰成对峙的形势"③。傅斯年在评论城子崖发掘成果时曾说："谈到这一个发掘工作所获取，本书之众位作者或不免'求仁得仁'之喜。"④事实确实如此，城子崖、两城镇遗址发掘成果，为傅斯年研究中国上古史，构建夷夏东西两个族群斗争融合发展学说体系提供了史实支撑。

城子崖、两城镇考古发掘与地方合作获得了成功经验。傅斯年在《城子崖》序最后谈到他与城子崖遗址发掘的关系时说："我与这件工作之关系，半在内而半在外。虽然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东去考古，也多少因为我是山东人，才作了'向导'。"⑤傅斯年自称是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的向导，既含有谦虚的成分，又可看作是准确的自我定位。山东城子崖遗址从发现遗址到两次顺利发掘，日照地区古遗址考察和两城镇遗址考古发掘等取得圆满成功，相比于其他地方的考古发掘，尤其是与安阳殷墟前期发掘遭遇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的阻挠破坏相比，占尽了地利与人和之宜，其中傅斯年等人在发掘前积极主动与山东省政府及地方各界人士密切交流，共组山东古迹研究会，制定合作规程，切实形成合作互利的工作局面是分不开的。同时，这种合作发掘和研究模式为以后考古发掘树立了榜样。在成立山东古迹

①何兹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前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9 页。
②何兹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前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4 页。
③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25 页。
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38 页。
⑤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38 页。

研究会合作发掘城子崖遗址不久,“史语所”与河南省政府通过商谈,仿照山东合作模式组建了河南古迹研究会。傅斯年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河南与敝所合作办法因贵省人士之催促,已于上月成立,大致如山东办法。……昔之争执,今成一家。”①傅斯年特别强调“昔之争执,今成一家”,其意即团结合作、互利互惠,使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得以顺利进行。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 Sinian and Shandong Longshan Cul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 Liangkuan

(Institute of the Canal Studie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Abstract: In the 1930s, Fu Sinian led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in excavating Chengziya and Rizhao's Liangchengzhen in Shandong Provinc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artifacts, especially a large number of black pottery unearthed from these sites,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Longshan culture represented by black pottery and the Yangshao culture represented by painted pottery in the west of the central plains are two independent systems in the early ancient China. Fu Sinian concluded that the two systems, in which Yi and Shang belong to the eastern system, and Xia and Zhou belong to the western system, confronted, fought and eradicated each other, resulting in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dynasties. The Longshan culture of Shandong Province negates the eastern system in the origin of the early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nd provides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Fu Sinian's study of the early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doctrines of Yi Xia.

Key words: Fu Sinian; Wu Jinding; Chengziya Site; Liangchengzhen Site; Shandong Society of Historical Sites

责任编辑:张登德

①傅斯年致张鸿烈抄件(1932 年 4 月 14 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一卷),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 年,第 403 页。

童年期儿童同情与同伴侵害:应对策略的中介效应*①

董会芹[1]　张文新[2]

(1.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2.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以934名3—6年级儿童为被试,运用同情量表、应对策略问卷和多维同伴侵害量表进行测量,考察儿童同情的一般特征以及应对策略在儿童同情与同伴侵害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女生同情显著高于男生,且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男生同情发展相对稳定;(2)儿童同情显著负向预测外化策略;(3)儿童同情通过外化策略的中介间接作用于同伴侵害。这表明小学阶段,女生同情显著高于男生,同情通过外化策略的中介间接影响同伴侵害。

关键词: 儿童同情;同伴侵害;应对策略;攻击性行为;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B8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4-0108-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11

引言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②这里的恻隐之心即对他人不幸或灾祸产生的同情(Sympathy)。在当前人类的品德结构中,同情是道德情感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类亲社会行为的基础。从演化发展的视角来看,相互关爱、同情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形成的优秀品质,扎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经过岁月的沉淀并最终成为人类道德文明的一部分。社会学、教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各界学者均从相应学术领域对人类同情进行研究。关于同情的含义,国内辞典《辞海》解释为"对于他人的遭遇或行为在感情上发生共鸣"③。西方心理学界多用Eisenberg等(2014)的界定,认为同情是指分担他人的忧虑悲伤情绪,并经常关注他人的特定反应④,目前国内心理学界多使用这一界定。需注意的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要与另外一个道德领域的术语——移情(empathy)作区分,以免混淆。尽管有学者把同情与移情两个概念等同使用,或者把同情作为移情的一个亚类型⑤,但

*收稿日期:2020-04-21

作者简介:董会芹(1971—),女,山东沂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张文新(1962—),男,山东青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乡结合部社区儿童问题行为的成因及干预研究"(20CJYJ1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预防和治理中小学校园欺凌对策研究"(17JZD058)的阶段性成果。

②金良年撰:《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③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887页。

④N. Eisenberg, T. Spinrad, and A. Morris, "Empathy-Related Responding in Children", in M. Killen and J. Smetana, 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2014, pp. 184-207.

⑤颜志强、苏金龙、苏彦捷:《共情与同情:词源、概念和测量》,《心理与行为研究》2018年第4期。

仔细探究同情与移情的内涵,会发现两个概念具有细微差异,移情只是体验他人的情绪,并没有出现关注他人的结果。① 因此,同情比移情增加了关注他人的具体行动。有同情心的儿童不仅能够体谅他人的情绪,还能够关心他人。

在个体发展历程中,同情发生较早。根据艾森伯格、霍夫曼等人的情绪理论以及当前的诸多研究结论,同情的雏形——消极情感共鸣——出现在儿童出生后的第一年②③④,即同情在个体身上发生的时间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同情出现后,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如何,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目前有研究发现,从儿童期至青少年早期,同情随年龄增长而增加。⑤⑥ 近期追踪研究发现,6 岁至 9 岁这一发展阶段,同情发展变化的规律存在不同的亚类型,有三条发展路径:持续增长(47%)、持续高水平(43%)、持续低水平(10%)⑦,但总体平均水平是逐渐下降的⑧。有学者用多方法测评,考察同情发展变化的规律,结果发现儿童同情的发展规律受研究方法的影响:根据教师报告,5 至 7 岁儿童的同情发展比较稳定;但根据儿童和照顾者的报告,同情却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⑨。

关于同情水平的性别差异,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即女孩比男孩更关注他人的情绪状态,其同情水平高于男孩⑩⑪⑫⑬,但在发展规律上的性别差异,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例如,Lam 等人使用儿童自我报告法探讨了 7—14 岁儿童同情发展的规律,结果显示女孩的同情发展呈非线性增长趋势,男孩发展则比较平稳,变化不大。⑭ 但也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女孩的同情水平在青少年早中期一直比较稳定,男孩早期持续下降,青少年晚期发生反弹,出现增长趋势。⑮ 根据既有研究文献,同情在总体水平上存在性别差异,这一点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但在发展规律上是否

---

①N. Eisenberg, T. L. Spinrad, and A. Knafo-Noam, "Prosocial Development", in M. E. Lamb and R. M. Lerner,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Developmental Science*, New York, NY: Wiley, 2015, pp. 610-656.

②N. Eisenberg,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51, No.1, 2000, pp. 665-697.

③M. L. Hoffman,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aring and Justic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98.

④M. Davidov, C. Zahn-Waxler, R. Roth-Hanania, and A. Knafo, "Concern for Others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Theory, Evidence, and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Vol. 7, No. 2, 2013, pp. 126-131.

⑤N. Eisenberg, T. L. Spinrad, and A. Knafo-Noam, "Prosocial Development", in M. E. Lamb and R. M. Lerner,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Developmental Science*, New York, NY: Wiley, 2015, pp. 610-656.

⑥C. Zahn-Waxler, K. Schiro, J. L. Robinson, R. N. Emde, and S. Schmitz, "Empathy and Prosocial Patterns in Young MZ and DZ Twins: Development and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in R. N. Emde and J. K. Hewitt, eds., *Infancy to Early Childhood: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Developmental Chang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1-162.

⑦T. Malti, N. Eisenberg, H. Kim, and M. Buchmann,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Sympathy, Moral Emotion Attributions, and Moral Reasoning: The role of Parental Support", *Social Development*, Vol. 22, No. 4, 2013, pp. 773-793.

⑧A. Zuffianò, T. Colasante, M. Buchmann, and T. Malti, "The Co-Development of Sympathy and Overt Aggression from Middle Childhood to Early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54, No. 1, 2018, pp. 98-110.

⑨J. Kienbaum, "The Development of Sympathy from 5 to 7 Years: Increase, Decline or Stabil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No. 5, 2014, p. 468.

⑩G. Carlo, "The Development and Correlates of Prosocial Behavior", in M. Killen and J. Smetana, 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NY: Psychology Press, 2014, pp. 208-234.

⑪G. Carlo, L. M. Padilla-Walker and M. G. Nielson, "Longitudinal Bidirec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Adolescents' Sy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51, No. 12, 2015, pp.1771-1777.

⑫李幼穗、韩印红:《幼儿同情心发展特点的调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

⑬胡金生:《儿童同情心的结构及发展特点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04 年。

⑭C. B. Lam, A. R. Solmeyer, and S. M. McHale,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Empathy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41, No.12, 2012, pp. 1657-1670.

⑮D. D. Vachon, D. R. Lynam, and J. A. Johnson, "The (Non) rel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Aggression: Surprising Results from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40, No. 3, 2014, pp. 751-773.

存在性别差异，以及男女两性各自发展变化规律如何，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需进一步探究。

由于同情的核心成分是关注他人情绪体验，可以预计在同伴矛盾冲突中，同情心强的儿童更可能采取妥协让步的策略，故而要比移情更可能引发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减少自私自利的行为。[①②] 过去几十年来，研究攻击与同伴侵害领域的学者们一直围绕同情—认知—行为这一关系模式开展研究。许多学者指出，同情通常暗含能够理解体谅他人的情绪情感，这种能力使儿童能够预估出攻击行为的后果。因此，同情水平高的儿童攻击行为相对较少，或者攻击行为的严重程度相对较低。[③④] 干预研究发现，提高儿童的同情能力，会减少儿童攻击行为[⑤⑥]，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上述关系路径的存在。作为与攻击相伴产生的现象，同伴侵害（peer victimization 也译为受欺负[⑦]）是个体遭受同伴的身体、言语、财物以及人际关系方面的攻击经历[⑧⑨]，在学龄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⑩] 不无遗憾的是，学者们在考察同情—认知—行为关系时，没有考虑同情与攻击的另一面——同伴侵害可能存在的关联模式。

随着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⑪]兴起，探讨儿童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受此影响，在攻击与同伴侵害研究领域，研究者在探讨引发儿童同伴侵害危险因素的同时，试图从儿童积极发展视角揭示减少或制止儿童同伴侵害的保护因素，并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如有研究发现，亲子依恋类型与儿童同伴侵害有关，依恋安全程度越高，儿童同伴侵害程度越低。[⑫] 同情作为道德情感的核心要素，虽然不属于“积极心理”的范畴，却总是与儿童积极品质——亲社会动机和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⑬⑭] 我们预计，受侵害儿童面对同伴攻击时更可能善

---

①N. Eisenberg, T. Spinrad, and A. Morris, “Empathy-Related Responding in Children”, in M. Killen and J. Smetana, 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2014, pp. 184-207.

②M. R. Jordan, D. Amir, and P. Bloom, “Are Empathy and Concern Psychologically Distinct?” *Emotion*, Vol. 16, No. 8, 2016, pp. 1107-1116.

③T. E. Waasdorp, W. J. Monopoli, Z. Horowitz-Johnson, and S. Leff, “Peer Sympathy for Bullied Youth: Individual and Classroom Considerations”, *School Psychology Review*, Vol. 48, No. 3, 2019, pp. 193-206.

④T. H. van Noorden, G. J. Haselager, A. H. Cillessen, and W. M. Bukowski, “Empathy and Involvement in Bully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44, No. 3, 2015, pp. 637-657.

⑤J. A. Durlak, R. P. Weissberg, A. B. Dymnicki, R. D. Taylor, and K. B. Schellinger, “The Impact of Enhancing Student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A Meta-Analysis of School-Based Universal Interventions”, *Child Development*, Vol. 82, No. 1, 2011, pp. 405-432.

⑥T. Malti, M. P. Chaparro, A. Zuffianò, and T. Colasante, “Evidence Based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Empathy-Related Respond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Vol. 45, No. 6, 2016, pp. 718-731.

⑦任跃强、高峰强、韩磊：《羞怯与受欺负：社交回避与被他人容纳的多重中介效应》，《心理学探新》2018 年第 2 期。

⑧董会芹、张文新：《童年中晚期同伴侵害与情绪适应：归因的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2017 年第 5 期。

⑨T. N. Beran and C. Violto, “A Model of Childhood Perceived Peer Harassment: Analysis of the Canadi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Children and Youth Data”,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138, No. 2, 2004, pp. 129-147.

⑩J. Snyder et al., “Observed Peer Victimization During Early Elementary School: Continuity, Growth, and Relation to Risk for Child Antisocial and Depressive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Vol. 74, No. 6, 2003, pp. 1881-1898.

⑪M. E. P. Seligman and M. Csikszentmihalyi,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5, No. 1, 2000, pp. 5-14.

⑫A. B. Klomek et al., “Victimization by Bullying and Attachment to Parents and Teachers Among Student Who Report Learning Disorders and/or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Learning Disability Quarterly*, Vol. 39, No. 3, 2016, pp. 182-190.

⑬T. Malti, M. Gummerum, M. Keller, and M. Buchmann, “Children’s Moral Motivation, Sy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Vol. 80, No. 2, 2009, pp. 442-460.

⑭王阳、王才康、温忠麟、肖婉婷：《共情和同情量表在中国幼儿教师样本中的效度和信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 年第 6 期。

意地理解对方,因而会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避免引发对方进一步的攻击行为,从而减少随后受攻击的概率。换言之,同情不仅与同伴侵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同时还可能通过应对策略的中介间接影响同伴侵害。

因此,许多学者从压力-应对理论出发,把关注的焦点投向儿童应对同伴侵害的策略。应对是个体面对特定压力情境时,有意识、有目的地调整自己的情绪、行为与认知,改变自我与压力的关系,以达到自我与环境和谐关系的进程(Compas, et al., 2001①)。个体面对压力情境时,通常采用两种应对策略:积极应对策略和消极应对策略。积极应对策略包括问题解决策略和寻求支持策略,前者指个体独自想出有效方法并付诸行动以应对压力情境的方法,后者指向家人、教师、同伴等求助的策略。消极应对策略包括回避策略、内化策略和外化策略三种,回避策略指采取逃跑、躲避、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等方法逃避现实,内化策略指个体采取忧虑、自责、发疯、哭泣等情绪指向内部的策略,外化策略指通过发脾气、报复他人等应对压力情境。对受侵害儿童来说,同伴攻击是重大压力事件,他们必定会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既有研究发现,儿童应对同伴侵害的策略类型同一般应对策略的类型相似,也包括积极应对(寻求支持和问题解决)和消极应对(回避、外化和内化策略)两种类型②③④⑤,即儿童应对同伴侵害策略与一般应对策略在类型或具体表现形式上具有相似之处。

揭示了儿童应对同伴侵害策略类型后,许多学者基于积极发展的研究视角,围绕压力-应对的过程模型,试图探讨哪些应对策略能够有效减少同伴的攻击行为?哪些应对策略不利于受侵害身份的改变?压力与应对方面的研究发现,那些直面压力、积极寻求解决当前困境的策略,要比回避策略更可能得到积极结果。⑥ 遵循同样的研究思路,攻击与同伴侵害方面的研究也表明,儿童采取认知回避⑦、行为回避⑧的应对方式,无法改变自己目前的境遇,不能有效解决同伴侵害问题;儿童若采取报复策略,随后成为同伴攻击靶子的频率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有所增加⑨⑩。也就是说,上述这些应对策略为无效策略,不仅难以让儿童摆脱同伴侵害,甚至还会让情况更糟

①B. E. Compas, J. K. Connor-Smith, H. Saltzman, A. H. Thomsen, and M. E. Wadsworth, "Coping with Stress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roblems, Progress, and Potential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127, No. 1, 2001, pp. 87-127.

②B. Kochenderfer-Ladd and K. Skinner, "Children's Coping Strategies: Moderators of the Effects of Peer Victimizatio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38, No. 2, 2002, pp. 267-278.

③B. Kochenderfer-Ladd, "Peer Victimization: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Coping", *Social Development*, Vol. 13, No. 3, 2004, pp. 329-349.

④董会芹、张文新:《消极情绪在幼儿同伴侵害与应对策略选择关系中的作用》,《学前教育研究》2011 年第 10 期。

⑤M. A. Dirks, T. A. Treat, and V. R. Weersing, "The Latent Structure of Youth Responses to Peer Provocation", *Journal of Psychopathology and Behavioral Assessment*, Vol. 33, No. 1, 2011, pp. 58-68.

⑥C. S. Carver, M. F. Scheier, and J. K. Weintraub, "Assessing Coping Strategies: A Theoretically 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6, No. 2, 1989, pp. 267-283.

⑦B. Kochenderfer and G. Ladd, "Victimized Children's Responses to Peers' Aggression: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Versus Continued Victim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Vol. 9, No. 1, 1997, pp. 59-73.

⑧K. J. Visconti and W. Troop-Gordon, "Prospective Relations Between Children's Responses to Peer Victimization and Their Socioemotion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31, No. 4, 2010, pp. 261-272.

⑨B. Kochenderfer-Ladd, "Peer victimization: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Coping", *Social Development*, Vol. 13, No. 3, 2004, pp. 329-349.

⑩S. A. Erath, A. K. Kaeppler, and K. M. Tu, "Coping with Peer Victimization Predicts Peer Outcomes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Middle School", *Social Development*, Vol. 28, No.1, 2018, pp. 22-40.

糕。相反，儿童若向朋友和成人求助[①②]，或采取问题解决策略（如试图理解遭受同伴攻击的原因并努力制止）[③]，则同伴侵害频率降低，即这些策略为良好的适应性策略，能够减少儿童未来成为攻击对象的概率。由此可见，积极应对策略对受侵害儿童具有保护作用。

概言之，目前学术界已证实积极应对策略有利于减少同伴侵害的发生率，消极应对策略则可能起到相反作用。但是，为什么有些儿童习惯使用积极应对策略，而有些儿童习惯使用消极应对策略？儿童同情是否起到了某种作用？已有研究尚不能作出回答。根据 Stanton 等（1994）提出的压力-应对的过程模型[④]，应对进程由情绪引发，发生在情绪表现或情绪体验之后，这与同情-认知-行为模型的思路一致。因此，根据压力-应对的过程模型，结合基于同情-认知-行为模型的相关研究结论，我们推测，在攻击情景中，儿童必然采取某种应对措施，不同的应对策略必然影响以后同伴侵害的发生率，而采取何种策略则受其情绪之一——同情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拟考察童年期儿童同情的发展特点，以及同情与应对策略、同伴侵害的关系，揭示应对策略在同情与同伴侵害间可能起到的影响作用。我们预计：（1）女生同情水平高于男生；（2）同情显著正向预测积极应对策略、显著负向预测消极应对策略；（3）同情通过应对策略的中介间接影响同伴侵害。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被试为济南市两所公立小学的 1140 名 3—6 年级儿童，剔除作答不完整的数据后有效问卷 934 份。被试中 3 年级儿童 220 名（男生 125 人，女生 95 人），平均年龄 8.84 岁（SD = 0.40）；4 年级儿童 256 名（男生 128 人，女生 128 人），平均年龄 9.75 岁（SD = 0.35）；5 年级儿童 219 名（男生 117 人，女生 102 人），平均年龄 10.92 岁（SD = 0.47）；6 年级儿童 239 名（男生 124 人，女生 115 人），平均年龄 11.90 岁（SD = 0.56）。

（二）研究工具

1.同情

采用 Zhou、Valiente 和 Eisenberg（2003）编制的《儿童自我报告同情量表》（Child-Report Sympathy Scale），由 6 个题目组成，全部正向记分。[⑤] 问卷使用 3 点记分法，1 表示“完全不符合”，2 表示“有点符合”，3 表示“完全符合”，分数越高，同情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2。

2.应对策略

①D. Shelley and W. M. Craig, “Attributions and Coping Styles in Reducing Victimiz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School Psychology*, Vol. 25, No. 1, 2010, pp. 84-100.

②B. Kochenderfer and G. Ladd, “Victimized Children's Responses to Peers' Aggression: Behavior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Versus Continued Victimizatio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Vol. 9, No. 1, 1997, pp. 59-73.

③B. Kochenderfer-Ladd, “Peer Victimization: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Coping”, *Social Development*, Vol. 13, No. 3, 2004, pp. 329-349.

④A. L. Stanton, S. Danoff-Burg, C. L. Cameron, and A. P. Ellis, “Coping Through Emotional Approach: Problems of Conceptualization and Confoun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6, No. 2, 1994, pp. 350-362.

⑤Q. Zhou, C. Valiente, and N. Eisenberg, “Empathy and Its Measurement”, in S. J. Lopez and C. R. Snyder, ed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 Handbook of Models and Measur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3, pp. 269-284.

使用 Causey 和 Dubow(1992)编制、Kristensen 和 Smith(2003)修订的自我报告应对策略(The Self-Report Coping Measure,简称 SRCM)问卷测评儿童应对同伴侵害的策略,由儿童报告。①② 问卷共 20 个项目,分为寻求社会支持(seeking social support)、自立或问题解决(self-reliance / problem solving)、回避(distancing)、内化(internalizing)和外化(externalizing)五个维度,每个维度均包括 4 个项目。问卷采用 5 点记分,从"从不这样"到"经常这样",分别记 0—4 分,分数越高表明儿童使用该策略越多。Kristensen 和 Smith(2003)发现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指标。③

本研究对该问卷进行修订。首先由研究者本人和一名外语学院的老师把该问卷译成中文,然后再由另外一名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的博士和一名外语学院的教师把中文版译成英文。经过多次反复,确保翻译的准确性。然后对该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X^2 = 496.03$, $df = 160$, $CFI = 0.92$, $TLI = 0.91$, $SRMR = 0.05$, $RMSEA = 0.04$。本研究中,问卷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71 至 0.86 之间。

3.同伴侵害

采用 Mynard 和 Joseph 编制④、张文新等修订⑤的多维同伴侵害量表考察儿童的同伴侵害,共 11 个项目,其中受身体侵害维度含 3 个项目,受关系侵害维度含 8 个项目。4 点记分法,0 代表"未发生过",1 代表"很少发生",2 代表"有时发生",3 代表"经常发生"。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中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3 和 0.86。

(三)施测程序

严格培训担任主试的研究生,使之熟悉问卷和量表的内容、掌握测评的程序与要求。在征得学校和学生家长同意后,把上述所有测评问卷、量表装订在一起,以班级为单位集体发放并回收问卷。整个施测过程中,老师不在现场,由经过培训的主试主持完成,每班两名主试,施测时长约 20 分钟。采用 SPSS20.0 和 MPLUS7.0 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处理。

二、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儿童自我报告法,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在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过程中采取了程序控制方法,如将不同问卷分开编排、向被试强调数据资料的保密性原则等。同时,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⑥ 假定三个

①D. L. Causey and E. F. Dubow, "Development of a Self-Report Coping Measure fo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Vol. 21, No. 1, 1992, pp. 47-59.

②S. M. Kristensen and P. K. Smith, "The Use of Coping Strategies by Danish Children Classed as Bullies, Victims, Bully/Victims, and not Involved,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Hypothetical) Types of Bully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44, No. 5, 2003, pp. 479-488.

③S. M. Kristensen and P. K. Smith, "The Use of Coping Strategies by Danish Children Classed as Bullies, Victims, Bully/victims, and not Involved, in Response to Different (Hypothetical) Types of Bully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44, No. 5, 2003, pp. 479-488.

④H. Mynard and S. Joseph, "Development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eer-Victimization Scale", *Aggressive Behavior*, Vol. 26, No. 2, 2000, pp. 169-178.

⑤张文新、陈亮、纪林芹、张玲玲、陈光辉、王姝琼:《童年中期身体侵害、关系侵害与儿童的情绪适应》,《心理学报》2009 年第 5 期。

⑥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2004 年第 6 期。

量表的所有题目属于一个因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单因子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都很差：$\chi^2 = 1842.77$，$df = 209$，$CFI = 0.69$，$TLI = 0.66$，$RMSEA = 0.10$，$SRMR = 0.09$，说明各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同源偏差。

（二）儿童同情、应对策略与同伴侵害的描述性分析

1.儿童同情、应对策略与同伴侵害的性别差异

儿童同情、应对策略与同伴侵害的平均数与标准差见表 1。独立样本的 t 检验表明，儿童同情的性别差异显著，男生显著低于女生（见表 1）。关于同情与年龄的关系，相关分析发现总体上儿童同情与年龄显著负相关，即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同情水平越来越低（见表 2）。进一步分析发现，儿童同情与年龄的关系受性别的影响，男孩同情与年龄的关系不显著（$r = -0.08$，$p > 0.05$），女孩同情与年龄关系显著负相关（$r = -0.20$，$p < 0.001$），表明在小学阶段，男生同情变化不大，而女孩同情则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下降。

表 1　儿童同情、同伴侵害与应对策略的平均数与标准差

	男生		女生		总体		
	M	SD	M	SD	M	SD	T
同情	2.31	0.38	2.38	0.37	2.34	0.38	−2.83**
身体侵害	0.91	0.73	0.65	0.63	0.79	0.70	5.71***
关系侵害	0.60	0.58	0.57	0.55	0.59	0.57	0.80
寻求支持	1.16	0.80	1.12	0.76	1.14	0.78	0.72
问题解决	1.76	0.95	1.76	0.89	1.76	0.92	−0.03
回避	1.25	0.88	1.25	0.86	1.25	0.87	−0.05
内化	0.89	0.77	0.88	0.72	0.89	0.74	0.10
外化	0.44	0.63	0.28	0.44	0.37	0.56	4.38***

注：* $p < 0.05$，** $p < 0.01$，*** $p < 0.001$，以下均同。

应对策略与同伴侵害方面，独立样本的 t 检验表明，儿童身体侵害和外化策略上性别差异显著，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关系侵害、寻求支持、问题解决、回避以及内化等策略上性别差异不显著（见表 1）。

2. 儿童同情、应对策略与同伴侵害的积差相关

积差相关分析显示，身体侵害与关系侵害显著正相关，儿童同情与身体侵害、关系侵害、外化策略显著负相关，与寻求支持、问题解决、回避等应对策略显著正相关，与内化策略无关；同伴侵害与寻求支持、回避、内化、外化等应对策略显著正相关，与问题解决策略相关不显著；五种应对策略之间，除了问题解决策略与外化策略相关不显著外，其他两两均显著正相关；儿童年龄与问题解决、回避、内化、外化策略显著正相关，与同伴侵害、寻求支持策略相关不显著（见表 2）。

（三）测量模型检验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模要求，本研究首先建测量模型。同情、应对策略和同伴侵害三个核心变量均为潜变量，同情是单维测验，由 6 个具体观测指标构成；应对策略包括寻求支持策略、问题解决策略、回避策略、内化策略和外化策略五个维度，每一维度均为潜变量；同伴侵害由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两个维度组成，两个维度均为潜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的儿童年龄和性别均为观测变量。如此，测量模型包含 8 个潜变量。采用协方差结构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测量模型进行

分析,得到的拟合指数如下:$\chi^2 = 1317.26$,$df = 601$,$CFI = 0.92$,$TLI = 0.91$,$SRMR = 0.036$,$RMSEA = 0.041$,测量模型拟合指数良好。

表 2　儿童同情、应对策略与同伴侵害的相关关系

	1	2	3	4	5	6	7	8
1 同情	1							
2 身体侵害	−0.10**	1						
3 关系侵害	−0.13***	0.62***	1					
4 寻求支持	0.08*	0.11**	0.20***	1				
5 问题解决	0.21***	0.05	0.05	0.43***	1			
6 回避	0.09**	0.18***	0.18***	0.26***	0.39***	1		
7 内化	−0.01	0.32***	0.41***	0.31***	0.19***	0.41***	1	
8 外化	−0.23***	0.31***	0.44***	0.25***	0.02	0.16***	0.42***	1
9 年龄	−0.13***	0.06	0.04	0.03	0.13***	0.07*	0.08*	0.08*

(四)应对策略在同情与同伴侵害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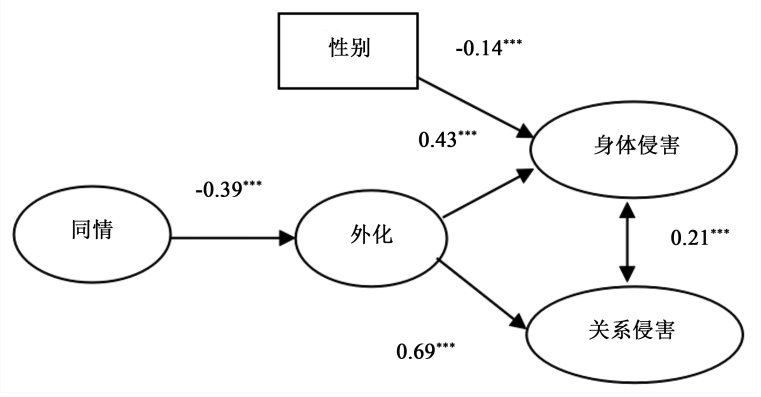


图 1　应对策略在同情与同伴侵害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首先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应对策略在同情与儿童身体侵害、关系侵害间的中介作用。儿童同情、同伴侵害和五种应对策略(寻求支持、问题解决、回避、内化和外化策略)均为潜变量。由于同情、应对策略、同伴侵害等与儿童性别、年龄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模型中把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因素,得到饱和模型。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各项拟合指数如下:$\chi^2 = 1549.75$,$df = 671$,$CFI = 0.91$,$TLI = 0.90$,$SRMR = 0.038$,$RMSEA = 0.044$。由于该模型中部分路径系数不显著,矫正偏差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检验发现,寻求支持、问题解决、回避策略和内化策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路径系数的上限与下限之间包含 0,故将其删除,得到简洁模型(见图 1)。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同样良好,各项拟合指数如下:$\chi^2 = 673.73$,$df = 221$,$CFI = 0.91$,$TLI = 0.90$,$SRMR = 0.047$,$RMSEA = 0.048$。由图 1 可知,同情显著负向预测外化策略,外化策略均显著正向预测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同情对身体侵害($r = 0.12$,$p > 0.05$)和关系侵害($r = 0.10$,$p > 0.05$)的路径系数均不显著,可见同情通过外化策略的中介间接影响同伴侵害(完全中介效用)。

矫正偏差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检验发现,外化策略在儿童同情与关系侵害、儿童同情与关系侵害间均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路径系数的上限与下限之间不包含 0。同情—外化—关系侵害路径 95%的置信区间上限为−0.20,下限为−0.05,标准化的间接效应估计为 17%;同情—外化—

关系侵害路径 95%的置信区间上限为-0.25，下限为-0.08，标准化的间接效应估计为 27%。可见，同情通过外化策略的中介间接影响儿童身体侵害和关系侵害。

三、讨论

（一）儿童同情的一般特征

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感受到女性较男性有更多的温情，更容易关爱与理解他人，这种直观感受得到了学术研究的支持。本研究发现童年期儿童同情水平的性别差异显著，女生的同情水平显著高于男生，与国内外众多研究结论一致。①②③④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研究，女性因长期照顾弱小子女，形成了情绪控制能力强、感情细腻等心理特征⑤，这可能是女生较男生同情水平高的主要原因。另外，以往研究发现，男孩同情与父亲同情相关，女孩同情与母亲同情相关。⑥ 由于女性同情高于男性，受母亲影响的女生较男生同情水平高亦在情理之中。

本研究特别关注童年中晚期儿童同情的发展变化规律，以及这种发展变化规律是否受儿童性别的影响。根据情绪理论，儿童同情发展受认知水平的影响，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儿童观点采择能力、心理理论水平得到提高，理解他人情绪与行为的能力越来越强。⑦⑧ 与此同时，随着年龄增长和同伴交往增多，儿童社会情绪能力不断提高，年长儿童较年幼儿童更容易站在他人角度体验其难处或困境。⑨ 由此可推断，儿童同情随年龄增长会出现上升的趋势，但研究结果并未支持这一推论。关于同情与年龄的关系，我们发现总体上呈现同情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与 Zuffianò 等⑩追踪研究的结论相同，表明作为道德情感之一的同情，其发展变化规律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这一研究结果同时提醒我们，同情并非随着儿童认知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同时也支持了 Kienbaum 的研究发现及其观点⑪，即不同测评方法所得出的同情发展规律存在较大差异。

值得关注的是，本研究发现男生与女生同情发展的规律不同，这一点与本领域研究结论达成

---

①G. Carlo, "The Development and Correlates of Prosocial Behavior", in M. Killen and J. Smetana, 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NY: Psychology Press, 2014, pp. 208-234.

②G. Carlo, L. M. Padilla-Walker, and M. G. Nielson, "Longitudinal Bidirec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Adolescents' Sy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51, No. 12, 2015, pp. 1771-1777.

③李幼穗、韩印红：《幼儿同情心发展特点的调查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

④胡金生：《儿童同情心的结构及发展特点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04 年。

⑤D. F. Bjorklund and A. D. Pellegrini, *The Origins of Human Nature: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Washington/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 2002, pp. 219-260.

⑥N. Eisenberg et al., "The Relations of Children's Dispositional Prosocial Behavior to Emotionality, Regul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ing", *Child Development*, Vol. 67, No. 3, 1996, pp. 974-992.

⑦N. Eisenberg, "Emotion, Regulation,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51, No.1, 2000, pp. 665-697.

⑧M. L. Hoffman, *Empathy and Mor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Caring and Justic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98.

⑨K. H. Rubin, W. M. Bukowski, and B. Laursen, *Handbook of Peer Interactions, Relationships, and Groups*.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2011, pp. 162-179.

⑩A. Zuffianò, T. Colasante, M. Buchmann, and T. Malti, "The Co-Development of Sympathy and Overt Aggression from Middle Childhood to Early Adolesc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54, No. 1, 2018, pp. 98-110.

⑪J. Kienbaum, "The Development of Sympathy from 5 to 7 Years: Increase, Decline or Stabil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No. 5, 2014, p. 468.

了共识[①②],但在发展变化的模式上与已有结论存在某些差异。本研究发现童年期男孩的同情水平相对稳定,随年龄发生的变化不显著,这与 Lam 等(2012)的研究结论一致[③];但与前人研究结论不同,本研究发现女生的同情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可见儿童同情发展变化规律非常复杂。我们知道,儿童同情的发展变化除了受儿童认知、儿童气质等自身因素影响外,还受父母教养方式、亲子依恋类型、父母榜样等诸多因素影响。[④]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通过某些复杂的机制作用于儿童同情的发展,其内在机制尚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儿童同情与同伴侵害、应对策略的关系

情绪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现象之一。作为心理与行为的动态系统,情绪起到了建立、维持或破坏个体与其内外环境关系的功能。[⑤] 根据应对的双进程模型,个体面对压力时会作出自动反应和应对策略两种行为模式。前者是对压力情境作出的迅速自动性反应,后者是通过意志努力作出的有目的反应。情绪则属于自动反应进程,自动反应与应对策略相互影响。[⑥] 受情绪与压力理论观点影响,在攻击与同伴侵害研究领域,一些学者探讨了情绪情感与儿童同伴侵害、应对策略的影响,发现悲伤、愤怒等消极情绪与消极应对策略存在正相关关系。[⑦⑧] 虽然未见积极情绪与儿童应对同伴侵害策略有关联的文献,但根据压力-应对理论可以推知,积极情绪——同情则可能与积极应对策略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策略显著负相关。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研究预期,本研究发现儿童与寻求支持、问题解决以及回避策略显著正相关,与外化策略显著负相关,即儿童同情水平越高,越可能使用积极应对策略,而使用消极策略的可能性越小。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面对社交冲突儿童作出反应之前需先后经历四个阶段:注意并解释环境中的线索、寻找脚本并进行演练、对脚本进行评估、行为反应的实施并评估。[⑨] 上述四个阶段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情绪情感不仅直接影响行为反应,也通过线索解释、脚本评估等间接影响行为反应。因此,面对同伴攻击,受侵害儿童采取何种应对策略必定受本人的情绪情感影响。具体来讲,儿童会思考为什么同伴这样对待自己,然后根据自己的评价和思考作出相应的解释,并据此提出合适的应对策略。同情心较强的儿童,容易产生帮助他人、减轻他人痛苦的动机,故而对他人情绪比较敏感,容易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对同伴攻击采取积极应对策略,较少使用攻击、报复等消极的应对策略,而这样的应对行为有助于减少再次遭受同伴攻击的可能性。同情通过外化策略的

---

①C. B. Lam, A. R. Solmeyer, and S. M. McHale,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Empathy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41, No.12, 2012, pp. 1657-1670.

②J. Van der Graaff et al., "Perspective Taking and Empathic Concern in Adolescence: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al Chang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50, No. 3, 2014, pp. 881-888.

③C. B. Lam, A. R. Solmeyer, and S. M. McHale,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Empathy Across the Transition to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Vol. 41, No.12, 2012, pp. 1657-1670.

④辛晓莲:《西方对影响儿童同情心发展因素的研究述评》,《社会心理科学》2004 年第 6 期。

⑤J. J. Campos, C. B. Frankel, and L. Camras, "On the Nature of Emotion Regulation", *Child Development*, Vol. 75, No. 2, 2004, pp. 377-394.

⑥N. Eisenberg, R. A. Fabes, and I. K. Guthrie, "Coping with Stress: The Roles of 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 A. Wolchik and I. N. Sandler, eds., *Handbook of Children's Coping: Linking Theory and Intervention*, New York: Plenum, 1997, pp. 41-70.

⑦B. Kochenderfer-Ladd, "Peer Victimization: The Role of Emotions in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Coping", *Social Development*, Vol. 13, No. 3, 2004, pp. 329-349.

⑧董会芹、张文新:《消极情绪在幼儿同伴侵害与应对策略选择关系中的作用》,《学前教育研究》2011 年第 10 期。

⑨L. R. Huesmann,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Vol. 14, No. 1, 1988, pp. 13-24.

中介间接影响同伴侵害的路径表明，同伴侵害干预应从儿童情绪入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儿童的同情水平。同情水平提高后，儿童在处理各类同伴冲突时会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策略，而较少使用消极应对策略，从而减少以后陷入同伴冲突、遭受同伴攻击的不良循环之中。

本研究采用横断设计方案探讨了童年中晚期儿童同情的一般特征以及与同伴侵害、应对策略的关系模式。使用自我报告法对儿童同情进行测评，所得结论与前人使用教师评价、主要照顾者评价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未来研究需使用多方法测评技术，多视角呈现儿童同情的特征，以期对儿童同情有更为科学、系统的了解，同时也最大可能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关于同情对同伴侵害的影响机制，从理论以及数据资料可得出，同情对同伴侵害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同时通过外化策略间接影响儿童同伴侵害。但儿童同情对同伴侵害的影响还可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儿童气质类型、归因方式、自我效能感等，未来研究需进一步考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深入探讨同情对同伴侵害影响的复杂机制，为儿童攻击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所得结论主要是：

（一）女生同情显著高于男生，且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男生同情的发展相对稳定；

（二）儿童同情显著正向预测寻求支持、问题解决和回避策略，显著负向预测外化策略；

（三）儿童同情通过外化策略的中介作用于同伴侵害。

Children's Sympathy and Peer Aggression: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rategy

Dong Huiqin[1], Zhang Wenxin[2]

(1.Faculty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2.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sympathy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The participants were 934 children graded 3 to 6 from two primary schools, and three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Child-Report Sympathy Scale, The Self-Report Coping Measure, and Multidimensional Peer Victimization Scale (revised Chinese ver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d: (1) Girls had higher levels of sympathy than boys. The level of girls' sympathy decreased with ages while that of the boys' sympathy was relatively stable. (2) Children's sympathy had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externalizing. (3) Children's sympathy had indirect effect on peer victimization through externalizing. This Shows that Girls had higher levels of sympathy than boys in primary schools. Sympathy had indirect effect on peer victimization through externalizing.

Key words: children's sympathy; peer victimization; coping strategy; aggressive behavior; mediating effect

责任编辑：王盛辉

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与对策
——来自山东的实践经验*①

曲顺兰
(山东财经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 知识产权在促进、保护创新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制度供给。新旧动能转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期的国家重要战略工程,其实施对知识产权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更好地探究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从新旧动能转换对知识产权的新需求出发,探讨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知识产权作用的新理念,结合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先行先试的实践经验,提出完善知识产权支撑新旧动能转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知识产权;新旧动能转换;山东经验;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 F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73(2020)04-0119-10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12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林毅夫,2019)。②2015—2016年间,中央与地方各级领导多次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旧动能"这一概念。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创新管理优化服务 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 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明确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制度地位,并指出:"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支持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搭建科技成果转换平台"等方式方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知识产权是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都是以知识产权为重要支撑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而知识产权在保护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与扩散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激发内生动力的重要制度供给。

在政策层面,2020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要"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除此之外,还提出要"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理论层面,创新相对于科技进步与发展的概念更加宏观与概括,知识产权为创新活动进行产权界定并提供激励机制,为创新产业进行资源配置并提供市场交易,为创新成果进行产权保护并提供市场规范机制,通过高质量的创新发展体现旧动能向

* **收稿日期:** 2020-05-11
作者简介: 曲顺兰(1964—),女,山东栖霞人,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税收促进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政策效应和路径选择研究"(18BJL068)的阶段性成果。
②林毅夫:《从70年发展看经济学理论创新》,《中国中小企业》2019年第12期。

新动能的转换(夏秀丽,2013)。[①] 知识产权对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主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来实现,比如以版权为基础的文化创意产业、对专利高度依赖的各类高端科技产业、以区域品牌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精品旅游产业。知识产权对新旧动能转换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新旧动能转换的新时代也对知识产权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原则,这就要求知识产权发挥作用时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对策,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服务与保障。

山东省作为经济大省,经济结构与全国相似度高,典型示范性强,2019 年 GDP 总量位居全国第三,理应走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最前沿。自“新旧动能转换”的概念提出后,山东省积极申报作为综合试验区开展新旧动能转换先行试点,并向国务院提交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2018 年 1 月,《国务院关于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确立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先行先试地位。《批复》中明确指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为发展经济的着力点,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积极探索新旧动能转换模式,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促进全国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积极贡献。”作为全国目前唯一的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山东的实践经验对于研究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来说,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与重要的现实意义。依据创新路径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未来全国全面开展新旧动能转换工作提供了决策依据。

一、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基本路径

(一)知识产权开发持续创造新动能

知识产权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机遇,知识产权日益成为激励创新的保障,知识产权的开发可以持续创造新动能。新动能是具有创新性和领先性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可以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知识产权在开发新技术、创造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创新扩散和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实现内生发展的重要制度供给。以知识产权为基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产业等是新兴新动能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动能产业中创新活力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知识产权的开发。自主创新能力是持续创造并壮大新动能的重要体现,创新驱动下的新动能创造与知识产权开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知识产权开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持续创造新动能,促使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因此,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服务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知识产权开发政策并采取相应的举措。

(二)知识产权运用加速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

旧动能是以低效率、高能耗等为特征的传统产业和传统经济模式。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培育新动能,形成新的产业形态,而且需要转换旧动能,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依靠新技术、新管理和新模式改造传统产业,使其更新、重生,形成新动能。而旧动能向新动能的转换依靠的是各类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核心是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创新成果需要通过知识产权的运用进行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发展,最终形成现实生产力,获得经济价值。知识产权问题贯穿于新动能科技成果市场化的全过程,新动能科技成果的市场化运用不能离开知识产权而开展,若

①夏秀丽:《“创新驱动”助推经济转型的要素与动态机制研究》,《当代经济》2013 年第 17 期。

是脱离了知识产权,新动能科技成果市场化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创新首先源于新科技成果的诞生,随后由市场通过知识产权的运用,让科技成果具体落地到产品设计、生产与销售环节。这个完整的知识产权运用过程涉及知识产权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承担、知识产权的权益归属以及利益分配、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及后续产品的权利归属等一系列特殊且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地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知识产权通过对创新成果的保护激励,为创新的可持续提供源动力(田力普,2015)①;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桥梁和纽带作用,促使创新成果能够顺利实现向现实生产力的转换,加速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

(三)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为新旧动能转换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畅通和可持续,提高新旧动能转换效率和产权人持续创造创新成果的动力。一方面,营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吸引外商、激励私人对于新动能产业的投资。另一方面,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通过降低创新成本增加新业态下的创新活动,通过企业的优胜劣汰推动旧动能的淘汰,促使新动能的发展。

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知识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知识产权管理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从创新主体的角度来看,知识产权的产权界定和产权保护可以维护创新者的垄断性收益,激励持续创新的积极性、核心技术转移转化和更多创新投入的信心,为知识产权的开发提供持续性动力。从整个创新市场的角度来看,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类资源和要素频繁流动。良好的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环境有利于吸引外部新动能创新成果,同时也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进而带来整体新动能产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而这些依赖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的新动能资源和投资也可以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完成旧动能向新动能的自发过渡。

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式经济的发展、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际化战略等都加速了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步伐。知识产权制度本身虽然由国内法律规定,但却是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制度,在发展新动能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对国际形势的关注、对国际规则的遵守。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产权推动下的新旧动能转换,要从长远视角谋求区域之间尤其是邻近区域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的作用,让知识产权能够推动新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新动能下新模式、新业态的形成。

二、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知识产权作用的新理念

(一)明确知识产权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支撑作用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创新支撑能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提供了专利这个技术成果保护机制,既保护了创新科研成果,防止科研成果的流失,同时,又保证了其在全球经济市场中的商业价值(李晶尧等,2019)。② 从知识产权权利自身来看,知识产权是新动能聚集度与区域创新水平的重要体现,是构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是实现旧动能向新动能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从知识产权的外部性来看,其有利于吸引各类资源,实现新产业聚集,从而形成规模化效应;从知识产权制度来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维持当地创新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创新资源的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

①田力普:《以知识产权驱动创新》,《中国科技产业》2015 年第 7 期。

②李晶尧、陈鹏、马全亮、李也:《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19 年第 6 期。

率，激励创新的投入；同时，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还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吸引外部新动能投资和其他各类外部资源。

另外，知识产权本身还是一项政策工具。政府通过实施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政策，将其与税收政策、产业发展政策、科学技术政策、贸易政策等进行有效结合，可以有效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激发全社会科技创新主动性，加快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达到新动能的市场引导和市场调控效果。

（二）明确市场在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主体地位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指出："我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市场化改革。"因此，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时，知识产权必须始终明确市场的主体地位。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产权界定提出了要求，而知识产权满足了市场经济在科技成果方面的产权界定需求。知识产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此其作用的发挥必须要以市场规则为基础。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保护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和持续创新的动力。因此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加强政策供给，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创新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同时，面向国际，合作共赢。在多个层面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同时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向国外输出技术，加强与经贸相关的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吸收国外适合我国情况的经验，提升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的整体知识产权能力。

（三）明确政府在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服务定位

在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体系下，地方政府在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是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政策的重要主体，也是制定和实施本地知识产权政策的重要主体，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推动知识产权与经济深度融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有效发挥知识产权作为战略性资源的作用，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同时，政府要主动适应新动能加速成长和传统动能转型升级对知识产权开发运用、管理和保护的新要求，转变角色定位和传统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变管理为服务，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实现由控制者、管理者向组织者和服务者的身份转变，政府定位为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者以及市场环境的维护者，尽快构建和完善能够适应、激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机制，满足新旧动能转换需要的知识产权法律政策和制度，优化服务平台和服务流程，必须坚持有限干预，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弱化对微观经济活动干涉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四）明确创新主体在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基础性作用

创新主体是创新产出和运用知识产权的主体，也是知识产权创造主体，是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的基础。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发展和市场化竞争对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各类创新主体强化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代表的专有权是其获得市场成功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各类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和意识不断提高，对知识产权政策提出了新要求，以更好地利用知识产权实现创新营利。

一方面，大学和科研机构等非直接市场参与者要注重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此为基础促进创新成果的转换和市场应用。另一方面，企业是市场的直接参与主体，企业创新成果相对于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更容易进行市场化运用。当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参与国际化经营

也越发频繁,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运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崔日明等,2019)。①

三、山东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践经验

2018 年,山东省知识产权局正式印发《知识产权创新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的工作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施》共十条,围绕以"四新"促"四化",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创新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作用,让知识产权成为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和推动力,着力强化知识产权对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这一中心工作和重要任务的引导、支撑和保障,为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一)知识产权引领新动能发展

专利是知识产权中能够体现技术进步的重要部分,也是引领新动能发展的主要载体。截至 2020 年 3 月,山东省结合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要求,依托重点企业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培育,遴选出第三批山东省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专利群)16 项,累计共遴选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 46 项。其中,新入选的"无氯含氟聚氨酯化学发泡剂"专利技术,创造了山东省专利许可费 5.2 亿元的最高纪录。山东省持续加大新动能下的科技供给,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点产业专利库吸储收纳国内外高价值专利 2.6 万件,并从中选取推荐 95 个专利项目参加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评选,据评审结果公示,山东省获得金奖项目 6 个、银奖项目 5 个。②

(二)政策引导与扶持促进知识产权开发与运用

山东省建立了以政府扶持为导向,以银行信贷投入为基础,以保险、担保等服务机构为保障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模式,进一步完善风险补偿政策,将风险补偿质物范围拓宽至商标、专利,贴息补助范围扩大至中小微企业。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是公共产品的内容,建设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是政府职能的体现。广义的公共服务平台可以理解为"一种中介服务组织",主要起到桥梁作用(梁春梅等,2011)。③ 山东充分利用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优势,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易系统,加快推进知识产权转移转换,探索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加大科技成果转换授权力度,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以各种形式建立各类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或联盟,充分激发高校、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转移转换成果的积极性。④

(三)资源整合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效率

以青岛为试点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从世界范围来看,实施知识产权制度的国家一般采取专利、商标和版权集中的"三合一"管理机制,或者专利和商标一体、版权另行分设的相对集中"二合一"管理模式(易继明,2015)。⑤ 考虑到不同知识产权类型的相同属性,采取集中管理制度有利于更好地配置政府资源,以保障创新发展。从我国来看,一方面,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政府管理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对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机构进行合并,科学划分、合理界定政府各部门职能,有利于权责统

①崔日明、张玉兰、耿景珠:《知识产权保护对新兴经济体贸易的影响——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经济与管理评论》2019 年第 3 期。

②张召旭:《山东知识产权助力新旧动能转换》,《齐鲁晚报》2020 年 4 月 27 日。

③梁春梅、肖卫东:《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研究述评及其引申》,《山东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0 期。

④刘佩、邓承月:《基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激励的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构建》,《求索》2016 年第 2 期。

⑤易继明:《"三合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科技与法律》2015 年第 3 期。

一、提高整体效能(余浩,2013)。[①] 另一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管理职能曾长期分布在原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版权局)、农业部、林业局、海关总署、文化部、科技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或机构,分散式的管理降低了知识产权治理的效率,不利于各部门间的衔接和协调,也增加了知识产权运用的成本。2016 年 12 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并于 2017 年 1 月 12 日正式实施,强调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制。2017 年 8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包括山东省青岛市在内的 6 个地区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第一批试点区域,在市级层面试点开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

(四)健全机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知识产权是破除旧动能开发新动能的重要驱动力。面临知识产权遭受侵权时,越来越多的权利人选择通过诉讼来保护自身利益(许可等,2020)。[②] 在行政保护层面,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工作格局,积极开展专利、商标、著作权、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在司法保护层面,积极推进司法审判三合一改革。2018 年,山东省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工作,建立健全各项工作机制。经最高法院批准,指定青岛市南区法院等 21 个基层法院跨区域管辖知识产权案件,并实行"三合一"审判,优化全省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布局。[③] 同时,山东省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创新,指导济南、青岛、德州等中院设立知识产权异地巡回审判庭,建立技术查明制度机制,坚持诉调结合、开发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四、提升知识产权对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力的对策建议

不同地区知识产权的发展情况存在各自的优势,也同样存在诸多问题。为了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创造新动能以及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各地应当找准知识产权发展中的薄弱点,对症下药,重点突破。同时,也应当保持"冷静"的心态,知识产权对新旧动能的推动并非一蹴而就,对地区创新发展的贡献也非立竿见影,应该戒骄戒躁,精准踏实,可持续地发挥知识产权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重要作用。为此,从政府、法律、创新主体三个层面,就如何有效提升知识产权对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力提出如下对策建议(见图 1)。

(一)完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

第一,完善顶层设计与领导机制。知识产权工作需要稳步推进和动态调整。在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过程中,完善知识产权工作实施统筹协调机制,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推进计划》的政策指导下,按照山东省政府制定的知识产权战略的要求,统筹协调全省与新旧动能转换相关的知识产权工作,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第二,统筹兼顾,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构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下的知识产权大方略,必须着眼全局,统筹规划,整体推进。思想认识要统一,要明确统筹好各级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定位、政策标准、目标任务和工作责任,进一步排除干扰,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下达科学的政策指标,考虑知识产权工作的成效不仅仅依靠指标,在下达任务指标时既要考虑上情(上级要求),也

①余浩:《科学发展视阈下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庆行政(公共论坛)》2013 年第 3 期。

②许可、贺宁馨、肖冰:《基于专利诉讼的中国企业专利决策行为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0 年第 1 期。

③刘金旺:《山东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审判"三合一"》,www.iprchn.com/Index_NewsContent.aspx? NewsId=115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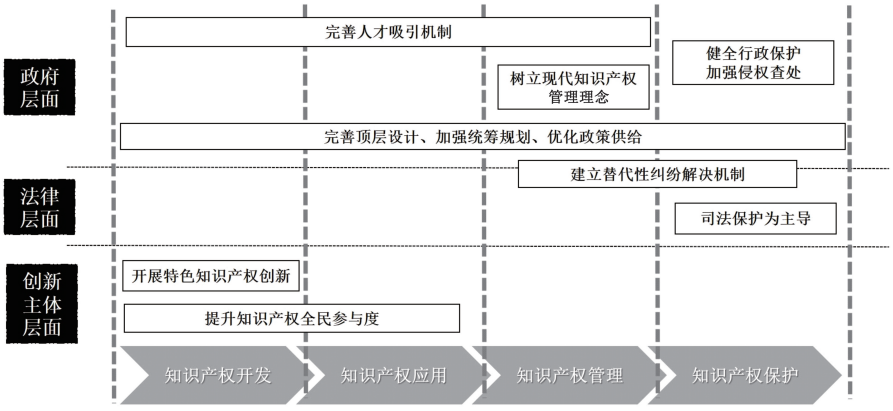


图 1　提升知识产权对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力示意图

要考虑下情(基层实情),避免脱离实际的简单递增,切实提高任务指标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指导性。

(二)优化管理模式与政策供给

第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需要树立现代行政理念,创新服务和管理模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善于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行电子政务,优化管理流程,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使行政管理富有成效。目前全国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初具规模,并将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不同区域和行业的立体化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培训体系。

第二,研究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知识产权的政策供给体系。有效的政策供给是激励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与保护的重要保障,也是对市场机制的重要补充,要围绕知识产权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主战场开展工作,从强调与国际接轨向符合国际惯例并强化中国特色转变,形成以“深化知识产权制度运用,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纲领性政策文件、涵盖全国知识产权战略深入实施所需的财税、金融、科技、产业、贸易等各方面配套的政策框架体系,并加强体系内各政策的协同。

加大财政资金对研发与知识产权的投入,以发挥其带动和引领作用。推动各级政府把研发与知识产权投入作为预算保障的重点,体现法定增长的要求,使财政资金真正突出创造新动能的产业政策导向。优化财政研发、知识产权投入结构,财政知识产权投入重点支持知识产权执法保护、激励开发运用和公共服务,重点解决当地创造新动能和转换旧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知识产权问题,也可通过财政补贴和政府采购的方式,如技术转移机构补贴、购买知识产权服务等,使具有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尽快进行产业化,形成新产品或新业态。强化知识产权税收激励政策。在现有政策优惠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激励企业、单位和个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转移转化及服务的税收优惠力度,比如对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阶段和中试产品及产业化等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中试产品销售和知识产权服务业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优惠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以及研发人员收入分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等,精准确定优惠政策的着力点、实施方向和具体落实,使优惠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优化知识产权金融支持政策。加强知识产权金融创新,大力推进知识产权交易份额化创新,

继续推进专利保险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①、贷款贴息及融资担保等。出台相关政策发展和完善政府科技贷款市场和金融借贷市场，大力发展风险资本，鼓励社会资本对知识产权产业化的支持。同时，能够提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的行业，本身就属于新动能产业中的“现代金融服务”，组成了知识产权与新产业的创新闭环，形成了良性循环。

（三）因地制宜开展特色知识产权创新

继续实施“春笋行动”，有针对性地发展知识产权，促进旧动能向新动能转换，围绕本地区资源、经济等方面的特色，打造有地区特色的知识产权发展对象。既要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也不能一味地“攀比”；既要从科技发展中追求知识产权的发展，也要从绿水青山中发掘知识产权。因地制宜地发挥“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的综合效益。

第一，发挥地域特色，挖掘特色新动能。不同地区不能一味模仿其他地区发展模式，应当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发展目标等找准自身的着力点，因地制宜地发挥知识产权的效益。例如，青岛市作为国家海洋经济产业发展的前沿，有着良好的发展机遇，可以大力发展与现代海洋产业、船舶等相关的特色知识产权，以进行新产业的开发，形成新动能；再如，胜利油田作为我国重要的油田基地，可以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端化工产业等相关的特色知识产权。

第二，发挥轻型知识产权的优势。知识产权并不是一味追求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也可以是模式的创新、业态的创新、文化的创新、服务的创新等。刘海波等（2014）②就提出了轻型知识产权的概念，他认为轻型知识产权是指为各类知识、设计、资源的商业化开发利用等提供直接、有效保护的知识产权，在知识产权权利形态上，主要表现为外观设计专利权、商标权（包括集体商标权和证明商标权）、著作权（包括服务流程、管理模式）以及商业秘密（包含知识积累）、经营模式等。之所以称其为轻型知识产权，是因为这类知识产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以技术为主要对象的知识产权形态。知识产权是区域、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但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的知识产权需求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注重技术的企业和地区势必将专利作为最主要的知识产权手段，而服务型的企业、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注重绿色发展，就必须关注知识、服务、商标、地理标识、版权等轻型知识产权的培育（Zongzhen Jin 等，2016）。③ 因此，可以将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服务产业、精品旅游产业等新动能业态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产生地。

（四）完善考核与人才吸引机制

第一，将知识产权纳入常规考核体系。可以探索统计“知识产权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贡献度”指标，积极、深入和权威性地研究和说明知识产权对新旧动能转换创新增长的贡献。建立与新动能创新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知识产权综合统计核算指标体系，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发布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的方式对知识产权的发展进行监测，促进知识产权的管理和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正确引导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同时，将知识产权工作的情况纳入职工职务聘任、职称评定、职级晋升等考核内容。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情况纳入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考核内容，充分调动各类知识产权创造主体的积极性。

第二，加大人才的吸引力度并强化现有人才培养与培训。可以对相关特殊需求领域的毕业生提高待遇，并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同改进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设置，有针对性地培育对知

①谢黎伟：《美国的知识产权融资机制及其启示》，《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 年第 24 期。

②刘海波、靳宗振、张亚峰：《探索轻型知识产权支撑绿色崛起之路报告》，北京 2014 年（未刊）。

③Jin Zongzhen，Liu Haibo：《Invention Patents Are Not for Everyone：Developing Less Industrialized Regions in China with ’Light’ Intellectual Property》，*Economic Impact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Conditioned Government Incentives* 2016。

识产权贡献率大的人才。完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和管理体制,构建有利于激发人才活力、促进人才成长、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依托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建立知识产权培训基地,提高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人才的专业水平。尤其是针对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的重点企业,开展订单式的知识产权人才培育,有针对性地提高这类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的知识产权水平。加强知识产权各层次人才的培养,完善知识产权技术职称评定机制,重点培育一批熟悉国际事务与规则、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为新旧动能转换添砖加瓦。

(五)提升知识产权全民参与度

诚然,知识产权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无人了解、重视、参与知识产权相关工作,那无疑会大大削弱知识产权对新动能的贡献度。因此,推广宣传是提升知识产权参与度的有效方式。

第一,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普及活动。结合每年的世界知识产权日、中国专利周等,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举办知识产权知识竞赛、发送知识产权宣传短信、在主流报纸页面刊登专栏专版、在电视栏目中播放知识产权宣传片、在公交车厢视频宣传知识产权知识、在出租车内张贴知识产权宣传标语等,营造宣传、普及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不断增强社会公众创造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对全民开展知识产权教育培训,了解并掌握知识产权基本知识,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自觉参与保护,与各种侵权行为作斗争。

第二,面向企业举办知识产权教育培训活动。组织开展进企业、进机关活动,面向机关与企业的包括知识产权管理人员在内的各类人员,开展知识产权相关专题培训,设立知识产权高级研修项目,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

第三,推动知识产权普及与学历教育。可以试点的方式在中小学校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性教育,高校与科研机构可开设知识产权与创新管理、科技成果转化等必修或选修课程。

(六)继续深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的司法与行政保护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出现,行政与司法活动必须通过适当的途径与方式克服法律的滞后性,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变化(肖冰等,2019)。①

第一,切实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应当适时开展《山东省专利条例》修订工作,加强民事、行政、刑事审判功能整合,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机制,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同时,继续加大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力度,依法为知识产权权利人提供救济。

第二,健全完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机制。努力简化专利、商标授权确权救济程序,充分考虑新业态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新格局,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保护。借助已有的各类平台,充分调动各类资源为企业提供咨询和问题解决方案(张亚峰等,2015)。② 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为企业获取知识产权和应对知识产权风险提供援助,一方面加强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调查(吴离离,2011)③,另一方面为本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援助。同时,以侵权纠纷检验鉴定技术支撑体系为

①肖冰、肖尤丹、许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的互动机制研究——基于专利侵权诉讼的分析》,《科研管理》2019年12期。

②张亚峰、刘海波:《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知识产权政策对比与借鉴》,《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9期。

③吴离离:《浅析我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知识产权》2011年第6期。

依托，建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第三，根据新旧动能转换的现实推进情况，从战略高度研究设立知识产权案件特别上诉审理机制，实现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案件审理专门化、集中化，提升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知识产权法院对简单一审民事、行政案件主审法官独任审理进行区域试点，促进繁简分流。① 可以在总结推广已有的全国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相关经验与加强济南、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建设的基础上，适时在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增设知识产权法院，以更好地满足新旧动能转换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需求。

Paths and Recommendation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Promote the Replacement of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Experience from Shandong Province

Qu Shunlan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50014)

Abstrac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innovation, and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supply to stimulate endogenous power. The project of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ROGDNO)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project of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oses new requirement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order to better explore the pa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promote ROGDNO, it is recommended to start from the new demand of ROGDNO, dig out the new concept of playing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ROGDNO, integrate the good practical experience first obtained in the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zone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promote ROGDNO.

Key word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place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ROGDNO); experience from Shandong Province; path analysis

责任编辑：张登德

①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情况的报告》，《人民法院报》2017 年 9 月 2 日。

我国语言产业研究现状分析(1993—2019)
——基于文献计量学视角*①

彭　爽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摘要: 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基于CNKI数据库,对1993年至2019年我国语言产业领域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的相关文献进行筛选统计,从文献增长规律、研究机构分布、高被引作者、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语言产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产业,我国语言产业的研究经历了从长期萌芽到快速发展的过程,研究的主要机构是高等院校,核心研究者群体已基本形成,但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目前,已形成语言经济学统帅下,语言资源、语言产业、商务英语、语言规划、语言服务、"一带一路"等为热点的研究圈。语言产业研究焦点内容包括:语言产业概念要素分析、产业定位、语言的价值及资源利用、地区案例分析、政策研究、个别业态分析和人才培养计划。

关键词: 语言产业;文献计量分析;文献增长;发文机构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0)04-0129-14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13

语言产业研究是在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细化出来的新兴产业研究。一般认为,我国的语言产业研究始于20世纪末,也是从语言经济学发端、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语言产业以其自身特有的优势在新世纪广受关注,国内关于语言产业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研究的需要和促进新时代语言产业的发展,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1993年以来语言产业研究文献增长、文献分布、作者群体现状、研究热点等方面进行描述性分析,以期能在对前人研究进行一定程度的总结的基础上,为未来语言产业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向,为相关研究者以及从业者把握语言产业最新学术动态及研究现状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为了全面反映出国内语言产业的研究情况,我们采取一种较为复杂的数据选取方式: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平台上,将文献来源库选定为"学术期刊"和"硕博",在"高级检索"中进行"主题"检索,检索词19个,分别是"语言产业",其上位概念"语言经济学",分属的十个业态"语言翻译产业""语言推广产业""语言类书籍出版业""语言康复产业""语言创意产业""语言会展业""语言艺术业""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产业""语言培训产业""语言能力测评产业",以及相关概念"语言资源"。由于语言产业最早可追溯到1993年,本文文献检索的时间起止点为1993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10日,检索得到文献2044篇。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检索条件,

* **收稿日期:**2020-05-25
作者简介:彭爽(1973—),男,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SWOT分析的语言产业安全问题研究"(14AYY007)的阶段性成果。

下文列出高级检索界面截图(见图 1)。



图 1

根据与研究对象“语言产业”及其相关概念的相关度,我们对搜索得到的 2044 篇文献进行筛选,并剔除了征稿须知、通告、新闻稿等非学术文章,最终共得到有效文献 831 篇,文献的实际跨度年份为 1993 年至 2019 年,以此作为本文定量分析的样本。然后借助 Excel 工具,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 CiteSpace 软件,以量化、动态的方式对我国语言产业研究文献增长规律、期刊分布、研究机构分布、高被引作者、研究热点等进行描述性分析,直观而清晰地呈现出文献数据信息内部的现象和规律。利用 Citespace 寻找语言产业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当前的研究前沿,及其对应的知识基础。

二、1993 年至 2019 年我国语言产业文献增长与发文分布

下面对我国语言产业研究的论文进行文献数量、文献所在期刊分布、文献发文机构分布情况方面的统计与分析。

(一)文献数量分析及阶段划分

科研论文的数量是衡量其所属领域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语言产业领域发表论文的数量与时间变化关系,能够揭示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发展速度,并预测其发展趋势。由于我们的搜索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0 日,因此 2019 年这一不足年的数据不呈现在与年度相关的图 2、图 3 中,但我们会对已统计的 2019 年的所得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明。

发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该学科的发展程度,数量与年份共现可以看出某一领域研究的各阶段分布情况。图 2 呈现的是 1993 年至 2018 年我国语言产业研究的发文数量。如图所示,1993 年至 2018 年我国语言产业研究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即使偶有下降,降幅也在 20 篇左右,并未出现较大的降幅。1993 年至 2007 年这一阶段语言产业的发文态势整体呈现较平稳的增长,但其发文数量均不超过 20 篇,且在语言产业的初始时期出现多年的断层;2007 年以后各年发文数量有了明显的增长,语言产业作为新兴产业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2016、2017 年两年的发文量均超过 100 篇,是 1993 年至 2018 年这 25 年中的两大高峰期。截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这不足 4 个月的时间里,语言产业的研究文献仅有 8 篇,按照这一发展趋势,2019 年语言产业的发文量预计将很难超越 80 篇,很可能会延续 2018 年以来回落趋势。目前语言产业的研究仍未达到成熟,此时呈现下滑趋势的原因或许与 2012、2013 年的下落原因相似,又或许是其他原因,有待深究。但我们相信,语言产业研究的至高点远不是目前所呈现的那样,未来语言产业一定会有较大发展。

“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是判定文献数量处于哪个发展阶段的两个重要参照指标。所谓“文献累积数”,是指当年及以前文献数量的简单累加,标志着当年能够查询到的文献总数,可以反映研究规模的大小;“文献累积率”是当年发文量与上一年度文献累积数的比率,可以反映某一年度发文量增长的幅度(是否出现爆发式增长),可依此判断该领域研究热点是否形成。① 图 3 是 1993 年至 2018 年语言产业研究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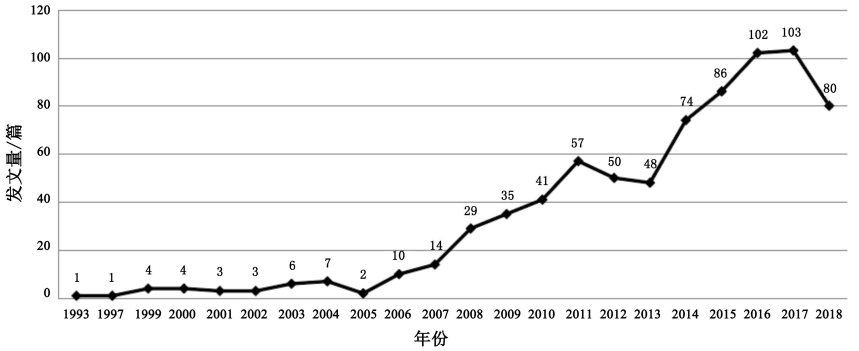


图 2　1993—2018 年我国语言产业研究发文量统计

表 1　1993—2018 年我国语言产业研究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统计

刊文年度	刊文数量	文献累积数	文献累积率%
1993	1	1	–
1997	1	2	100.0
1999	4	6	200.0
2000	4	10	66.7
2001	3	13	30.0
2002	3	16	23.1
2003	6	22	37.5
2004	7	29	31.8
2005	2	31	6.9
2006	10	41	32.3
2007	14	55	34.1
2008	29	84	52.7
2009	35	119	41.7
2010	41	160	34.5
2011	57	217	35.6
2012	50	267	23.0
2013	48	315	18.0
2014	74	389	23.5
2015	86	475	22.1
2016	102	577	21.5
2017	103	680	17.9
2018	80	760	11.8

总的来说,我国语言产业研究在 1993 年至 2018 年经历了从长期萌芽到快速发展的过程。如表 1 所示,1993 年至 2007 年的文献累积率波动幅度较大,文献累积数最大值不足 60 篇,说明这 10 多年是语言产业研究从漫长萌芽期逐步进入发展期的研究初始阶段;2008 年至 2018 年的文献累积率波动幅度相比前一段较为平稳,发文量的增长势头明显。到 2018 年,文献累积数已超过 700 篇,说明语言产业研究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语言产业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

(二)文献所在期刊分布

文献资料是否足够、完整、全面,是否有代表性,是做好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了解某一领域的文献期刊分布情况,知道去哪里找文献,对于研究者而言是重要且必要的。表 2 是语言产业领域研究文献数量居前 10 名期刊的统计情况。

①陈新忠、张亮:《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的轨迹、现状及热点——基于 1986-2016 年 CNKI 期刊的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现代教育管理》2018 年第 6 期。

表 2　我国语言产业研究文献数量居前 10 名期刊的统计情况

排名	期刊名称	发文量/篇
1	语言文字应用	37
2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
3	语言战略研究	15
4	海外英语	12
5	制度经济学研究	10
6	贵州民族研究	6
7	语文建设	6
8	中国社会语言学	6
9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6
10	语言教学与研究	5

从上表可知,《语言文字应用》作为发文量最大的期刊,其发文数量也只有 37 篇,前 10 名中发文数量不足 10 篇的有 5 家。这基本与语言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实际状况相符合,虽然语言产业近年来已经有了较大发展,但总体而言其相关研究仍然不多。《语言文字应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语言战略研究》《海外英语》和《制度经济学研究》是我国语言产业研究的文献的主要所在地,研究者在查找相关文献时可以有所侧重。

表 3　我国语言产业研究居前 10 位机构的发文量统计

排名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1	北京语言大学	10
2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8
3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6
4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5
5	滁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5
6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5
7	南开大学	5
8	哈尔滨商业大学外语学院	4
9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4
10	扬州大学文学院	4

(三)文献发文机构分布

文献发文机构的分布能够反映已有研究中的主力分布情况,从而为语言产业的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角度。对于多人合作文章,我们只计算第一作者所属单位,并统计出发文量排名前 10 名的机构,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到,居前 10 位的发文机构中绝大部分是高等院校,还有 2 个与语言文字相关的国家级单位,说明我国目前对语言产业研究的主要阵地是高等院校。高等院校一直是科研重地,拥有有利的科研政策、专业的科研人才、高昂的科研热情。因此,可以预见,高等院校未来也将是语言产业的科研阵地。

三、1993 年至 2019 年我国语言产业研究文献作者分析

一般来说,有着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的作者会在其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这体现在促进该领域的研究和为后人研究提供借鉴方面,领域内代表性研究者的研究内容自然也受到广泛认同和关注,是应该重点研究和借鉴的。下面从作者共现以及合作关系、作者发文量、被引用文献等方面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对语言产业领域的代表性学者进行理据性总结。

(一)文献作者共现及合作图谱分析

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 5.3.R4 版本对所得文献进行作者情况分析,需要在此处对一些必要参数进行说明。进入软件 GO 界面并选择合适格式的文件后,需要将 Time Slicing 设置为研究起始点 1993 年至 2019 年,Years Per Slice 值设为 1,Node Types 一栏勾选“Author”,其他设置维持默认,运行进入可视化界面后得到由 63 个点、13 条线组成的图谱,进行微调之后呈现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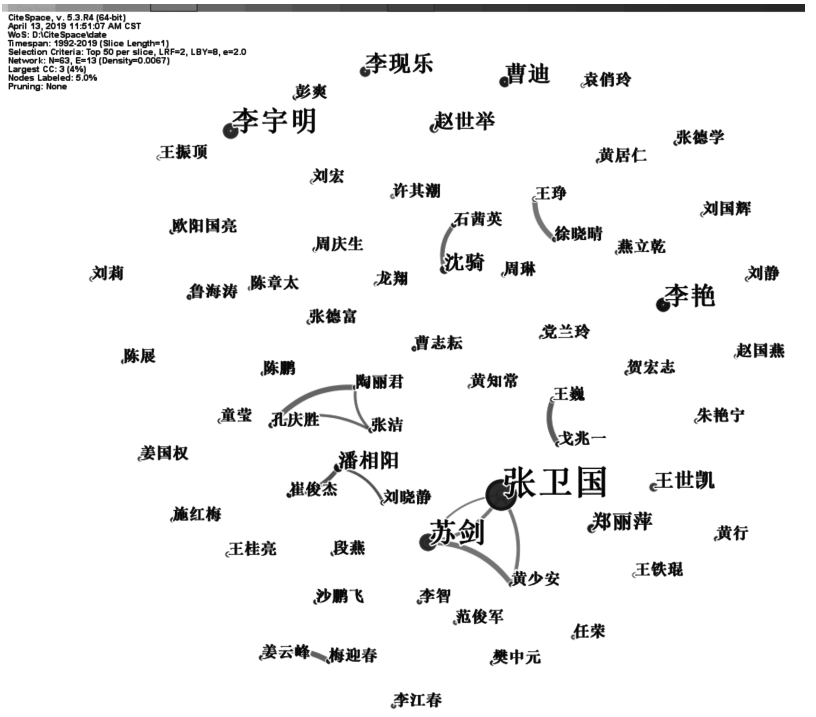


图 3

图谱中聚类节点的大小表示出现频率,出现频率越高,节点越大;聚类节点的数量表示程序算法所得的作者数量;偶有出现的线条表示各节点之间的关联性。图谱显示,语言产业研究领域的文献作者数量虽然不太少,但他们的研究整体来看大都比较分散,少有合作交流。因此,语言产业领域的既有研究还留有广阔空间,未来应继续在语言产业领域进行耕耘。同时,学者们应该有意识地开展合作研究,各机构和高校亦应支持和鼓励合作研究,群策群力,合作共赢,或许能为语言产业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推动语言产业研究向更广更深处发展,促进我国语言产业研究趋近成熟。

(二)文献作者发文量统计分析

对作者发文量进行统计是了解一个领域内文献作者情况的途径之一。一定时期内作者在研究领域内公开发表的文献数量,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本人在该领域的代表性。我们选择 1993 年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这一时段,对语言产业领域内发文作者的发文量进行统计,选择发文量排名前 20 的数据,得到表 4。可以看到,张卫国是发文量最大的作者,发文数量为 11 篇;李宇明和苏剑的发文量排名次之,这与图 3 聚类节点大小呈现规律相符。

“根据普赖斯理论,论文发表数为 m 篇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m=0.749(\eta max)^{1/2}$”。① 样

①韩笑:《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合作学习研究的进展及趋势——基于 CiteSpace 工具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当代教育科学》2018 年第 4 期。

本中 ηmax（作者最大发文量）为 11（第一作者），计算可得 m = 2.47，因此，语言产业研究领域核心作者应该是发文量达 3 篇及以上的人。观察 CiteSpace 导出的作者发文量表，共有 11 位作者：张卫国、李宇明、苏剑、李艳、曹迪、李现乐、赵世举、沈骑、潘相阳、郑丽萍和王世凯。他们构成了目前语言产业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

表 4　作者发文量统计

排名	作者	发文量/篇	百分比	排名	作者	发文量/篇	百分比
1	张卫国	11	0.07	11	王世凯	3	0.02
2	李宇明	6	0.04	12	姜云峰	2	0.01
3	苏剑	6	0.04	13	黄少安	2	0.01
4	李艳	5	0.03	14	孔庆胜	2	0.01
5	曹迪	4	0.03	15	周庆生	2	0.01
6	李现乐	4	0.03	16	袁俏玲	2	0.01
7	赵世举	3	0.02	17	燕立乾	2	0.01
8	沈骑	3	0.02	18	陈鹏	2	0.01
9	潘相阳	3	0.02	19	王铁琨	2	0.01
10	郑丽萍	3	0.02	20	黄行	2	0.01

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来反映该文献以及文献作者在特定领域的影响力；文献的下载频次也应该是类似的影响力测度标准之一。基于此，本文以语言产业领域文献的被引频次为基准对该领域内文献的作者进行排序，同时辅以总发文量和文献被下载次数两个数据作为参照，选取前 20 位的作者进行分析，探究在已有语言产业研究中被引频次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作者，结果呈现为表 5。

表 5 中的 20 位学者的文章的被引频次较高，说明他们的这些文章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学术性。其中，张先刚文章的引用远高于其他作者的文章，许其潮、张卫国、陈章太、李宇明、汪丁丁和赵世举等学者的文章被引次数均大于 100。此外，表 5 中呈现的作者文献被引频次与其文献下载次数内部的相关关系比较复杂，被引频次高的不一定下载次数多，被引次数少的也不一定下载次数少；这两个数据与发文量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缠绕关系。但整体而言，文献的被引频次与下载次数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文献被引频次和下载频率只是参考数据，我们有必要对被引频次高的文献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 5　被引用次数居前 20 位作者统计

排名	作者	被引频次	下载次数	发文量/篇	排名	作者	被引频次	下载次数	发文量/篇
1	张先刚	218	4,144	1	11	徐大明	63	1,547	2
2	许其潮	152	2,107	2	12	李现乐	54	1,902	4
3	张卫国	147	3,725	11	13	任荣	53	1,602	2
4	陈章太	131	1,815	2	14	蔡辉	50	2,445	2
5	李宇明	119	2,619	6	15	张忻	42	1,971	2
6	汪丁丁	118	2,540	1	16	黄少安	37	1,156	1
7	赵世举	113	5,679	3	17	陈瑜敏	31	2,102	2
8	刘念	81	2,477	2	18	田兰	24	2,585	2
9	莫再树	80	3,631	2	19	杨晓华	18	1,603	2
10	戴曼纯	71	3,280	2	20	苏剑	11	2,360	6

（三）被引文献分析

被引频次是指文献发表后被其他论文作为参考文献引证过的频次，被引量的多少可以判断

文献质量高低和引起专业领域反响的程度。[①] 同时,领域内的高频次被引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的研究情况,具体到语言产业而言,就是这一数据很有可能反映了语言产业内 10 个业态的分布和研究情况等。我们对 1993 年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这一时段内高频次被引文献进行统计,得到了被引排名前 20 位文献的数据情况,具体见表 6。

表 6　被引频次前 20 名文献统计

序号	篇名	作者	刊名	被引频次	发表时间
1	评价理论对语篇翻译的启示	张先刚	外语教学	218	2007.11.06
2	语言经济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	许其潮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152	1999.08.20
3	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张卫国	经济研究	147	2008.02.20
4	论语言资源	陈章太	语言文字应用	131	2008.02.15
5	语言也是“硬实力”	李宇明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19	2011.09.27
6	语言的经济学分析	汪丁丁	社会学研究	118	2001.11.20
7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	赵世举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3	2015.07.15
8	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	张日培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93	2015.07.15
9	从语言经济学角度看我国的外语教育	许其潮	外语与外语教学	85	1999.08.20
10	网络流行语的语言经济学原则	刘念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81	2004.06.25
11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商务英语教育研究	莫再树	外语界	80	2008.04.25
12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	李宇明	南开语言学刊	79	2011.09.30
13	当今人类三大语言话题	李宇明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78	2008.07.15
14	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	李宇明	中国语文	74	2012.07.10
15	国家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与国家安全	戴曼纯	语言文字应用	71	2011.11.15
16	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	陈章太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9	2009.07.15
17	有关语言经济的七个问题	徐大明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7	2010.09.15
18	语言的经济学分析:一个综述	张卫国	经济评论	64	2011.07.15
19	语言资源管理规划及语言资源议题	徐大明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3	2008.01.25
20	语言资源与语言经济研究	李现乐	经济问题	54	2010.09.15

表 6 显示,张先刚的《评价理论对语篇翻译的启示》被引次数最高,达 218 次;许其潮的《语言经济学: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被引 152 次;张卫国的《作为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语言: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被引 147 次;陈章太的《论语言资源》被引 131 次;李宇明的《论语言资源》被引 119 次;汪丁丁的《语言的经济学分析》被引 118 次;赵世举的《“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被引 113 次,这 6 篇文章是被引次数过百的,其他 14 篇文章的具体情况及其被引次数详见表 6。

被引次数最高的前 20 篇文献中,李宇明有 4 篇文章,是最高频次被引作者,总被引次数 350 次。作为原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颇为关注语言产业相关事项,并且他的文章和著作也经常被引用,这与研究结果相符;许其潮有 2 篇文章,总被引次数 237 次;张卫国有 2 篇文章,总被引次数 211 次;陈章太有 2 篇文章,总被引次数 200 次;徐大明有 2 篇,总被引次数 130 次。由此可见,作者的影响力与其所发文章的影响力大致呈正相关关系。此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被引次数高的文章很多发表在高校学报上。其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有 5 篇文章入选,这与前文关于文献研究机构和出现期刊的结果也是一致

①王耀文、刘永胜:《专题文献著者群评价——一种“标准化”方法的探讨》,《图书情报工作》2007 年第 4 期。

的;这些文章多数都发表在 2007 年之后,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语言产业发展的时间阶段脉络;从文章内容来看,这些文章多涉及语言经济学和语言资源,符合语言产业发展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语言产业研究不能脱离语言经济学研究和语言资源研究,毕竟语言产业研究发端于语言经济学研究,最终的落脚点也是使语言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语言资源研究必将是其中的核心力量。

四、1993 年至 2019 年我国语言产业文献的研究热点

CNKI 数据库中的主题检索,实际上是将篇名、关键词、文摘字段合在一起的大范围检索,可以保证覆盖范围。主题可以反映文献的研究领域,关键词则反映文献内容中的重点部分。因此,对文献主题进行统计分析,既可以保证覆盖范围,亦能包含热点研究;进一步对关键词展开统计分析,则能对文献所涉及的领域热点内容有所了解。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进入软件 GO 界面,将 Node Types 设置为 Keyword,Pruning 选择除 MST 之外的其他三个选项,其他条件与之前进行作者共现研究时相同。运行软件并适当调图之后,得到含有 137 个节点,161 条线的关键词共现图,即图 4。

可以看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比较强。根据节点大小选择关键节点,可得到最大节点“语言经济学”,并且其在图谱中呈现的比例远超其他。“语言资源”“语言产业”是第二、第三位的节点词,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语言产业是语言经济学的下位概念,是从语言经济学总发展而来的,其起步晚,发展规模还未壮大;语言资源是语言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概念,其出现的时间亦早于明确产业化的语言产业概念。语言产业的研究几乎全部会涉及到这两个概念,所以图谱的呈现是符合研究实际情况的。

(二)文献主题反映下的研究热点

在上述图谱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得到 10 个聚类词。将其按照与语言产业的相关性进行分类,可以分出三个类别:第一类包括 “产业化”,代表性文献 12 篇;“问题”,代表性文献 20 篇;“语言”,代表性文献 21 篇。第二类包括“语言经济学”,代表性文献 48 篇;“语言生活”,代表性文献 10 篇,“语言规划”,代表性文献 27 篇。第三类包括“语言产业”,代表性文献 22 篇;“语言服务”,代表性文献 27 篇;“语言资源”,代表性文献 19 篇;“商务英语”,代表性文献 19 篇。这些都是语言产业领域的热点主题,只是语言产业的关系亲疏远近有所不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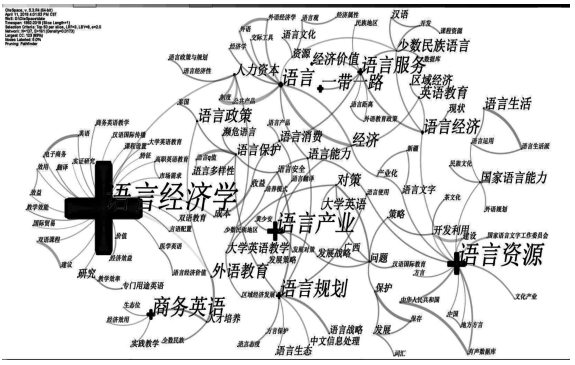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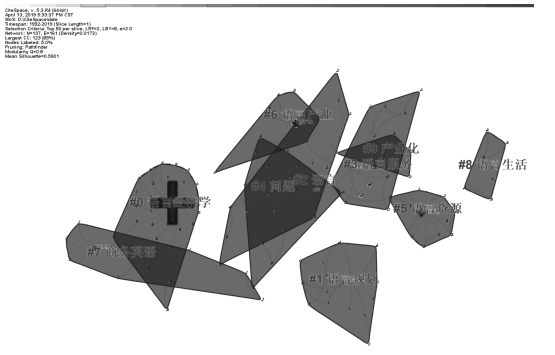


图 5

(三)文献关键词反映出的研究热点

从 CiteSpace 关键词共现可视化界面中的 Export 选项下的 Net work summary table 功能,输出表格数据,以此研究语言产业领域文献的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和中心性。在对 1993 年至 2019 年 4 月 10 日与语言产业相关的 831 篇文献的关键词词频进行计量统计后发现:从关键词的出现频次上看,语言经济学居第一位,且其出现频次达 333 次,远远超过其他关键词;语言资源、语言产业、商务英语、语言规划、语言、语言服务、“一带一路”等关键词位居前 20 位,详见表 7。

除上述频次关键词外,CiteSpace 运行关键词分析之后还会产生突现关键词。图 6 即是此次分析的突现关键词表,它清晰地显示了语言产业领域这一阶段的突现词、突现强度和起止时间。“突现”词可以展现知识领域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由图可知:语言经济学产生最早,语言产业产生较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图中语言产业的持续时段最短,说明语言产业起步晚,还未成为一个完备的产业类型。

表 7　1993—2019 年我国语言产业期刊论文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1	语言经济学	333	0.73	11	语言政策	15	0.18
2	语言资源	93	0.48	12	经济	15	0.18
3	语言产业	67	0.14	13	英语教育	11	0.05
4	商务英语	44	0.08	14	少数民族语言	11	0.15
5	语言规划	34	0.28	15	对策	11	0.14
6	语言	31	0.45	16	语言生活	10	0
7	语言服务	30	0.22	17	经济价值	10	0
8	一带一路	23	0	18	国家语言能力	9	0.13
9	外语教育	18	0.27	19	大学英语	9	0
10	语言经济	18	0.21	20	人力资本	9	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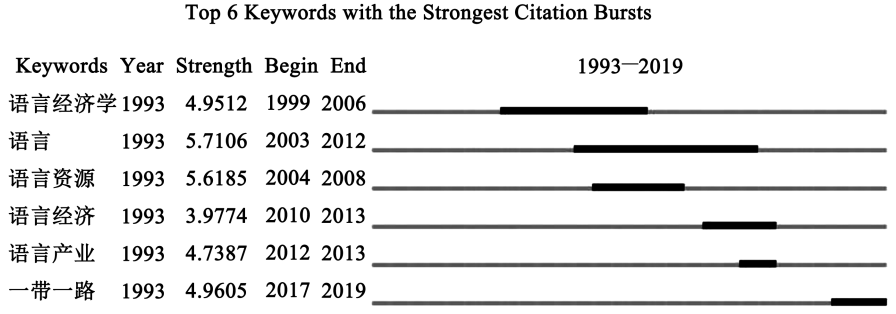


图 6

五、语言产业研究评析

语言产业研究在我国的发展状况,通过上面的文献统计可以看出,不管是语言经济学研究还是语言产业研究,最早都是由语言学界和外语学界发起的。从改革开放开始,受到国外语言学理论与研究的影响,我国的语言学者认识到语言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于是在对国外研究角度介绍和研究理论引进的基础上,逐步展开我国与世界语言愈加密切的交流合作和我国作为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实况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较早的有贾那布尔、国玉经从民族语言学习和汉语普通话推广角度分析语言学习在现代化建设和商品经济环境下的重要作用;伴随着出国热浪潮,外语

学习成为国民个人发展新需求，刘绍忠、廖凤荣、谢之君从理论与语言需求角度研究语言的经济价值和外语学习投资对个人发展的长远影响；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关定华、张家录以及宋为群基于计算机语言研究的语法、语音结构分析和语言的现代化发展方向讨论，补充了之前语言研究中语言本身问题研究的空缺；值得一提的是，何自然的语用学分析、外语学习研究和对格林的语言经济学理论的引入与分析引导着语言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随着语言产业研究的深入，可以将语言产业研究大致分为六类，分别为语言产业概念要素分析、产业定位、语言的价值及资源利用、地区案例分析、政策研究、个别业态分析和人才培养计划。

（一）语言产业概念及要素分析

学界对语言产业的概念分析比较早，但大都沿用黄少安和贺宏志的定义。山东大学黄少安等学者从语言经济学角度尝试对语言产业进行概述："语言产业是这样一种生产和服务活动，他主要采取市场化的经营方式生产语言类产品或语言服务，满足国家或个人对各种语言类产品或语言服务的多层次的需求。"①随后，贺宏志等在《语言产业导论》一书中将语言产业定义为："语言产业是以语言文字作为生产的原料和内容（语言本体），或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加工处理的对象（以语言为工具），生产各种语言产品或提供各种语言服务的产业。"②贺宏志等人对语言产业的定义，明确了语言产业的内容、对象以及服务的性质，比较完整地反映语言产业基本内涵。但我们认为，语言的社会服务职能是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因而语言产业的研究定义需结合产业的基本属性和特点。李悦教授主编的《产业经济学》将产业定义为："产业是指从事国民经济中同一性质的生产或其他社会、经济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总和，即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国民经济各部门。"③显然，语言产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类型，在这里把语言产业作为一个统称，涵盖了与语言相关的产业、服务和活动，包括语言类书籍出版、语言培训、语言康复等。

（二）语言产业的定位

语言产业最先研究的是语言产业与科技、网络关系。宣晶首先在搜索引擎中发现语言产业的作用和未来发展潜力："在 Internet 上语言产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形形色色的网点，用户可以查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材料和资源。"④随着"语言产业"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提出，学界也根据语言与产业的特性，对语言产业进行界定与定位："语言产业是以语言文字作为生产的原料和内容（语言本体），或是以语言文字作为加工处理的对象（以语言为工具），生产各种语言产品或提供各种语言服务的产业。"⑤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后，语言的服务功能在全球化中被催化，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屈哨兵主编的《语言服务引论》深入介绍了语言服务的内涵和发展前景。而李宇明、黄少安、张卫国、刘国辉等人更重视语言产业的产业性质和语言产业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张卫国、刘国辉强调学习外国语言政策、尽量落实语言带来的经济利益；黄少安倾向于研究语言投资的长效作用，力证语言能力的提升对于劳动力个体和社会的作用；李宇明用量化的方法结合大量产业数据，从宏观角度证明语言产业在我国的优势与挑战。贺宏志、陈鹏、刘国宁等介绍了语言产业的结构、外延的方方面面，提出有针对性的语言产业发展建议。此外，还有语言产业与教育、科技、文化联合发展研究，例如甄小锁、李勇等。总的来说，虽然语言产业

①黄少安、苏剑、张卫国：《语言经济学与中国的语言产业战略》，《光明日报》2012 年 3 月 2 日。

②贺宏志、陈鹏：《语言产业引论》，北京：语文出版社，2012 年，第 13 页。

③李悦：《产业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4 页。

④宣晶：《语言产业与因特网》，《外语电化教学》1997 年第 3 期。

⑤贺宏志、陈鹏：《语言产业引论》，北京：语文出版社，2012 年，第 13 页。

的发展刚刚开始,但发展迅速,所以学者们对于语言产业定位各有见解,研究方向差异也较大。但语言产业的发展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是有无限可能的,所以研究越广而宽越有利于开发出语言产业的新方向,这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学界对语言产业这一新型朝阳产业的研究,不能只看到未来的可能性,同时也要反思,如何去利用和保护我们如此珍贵又丰富的汉语言资源,为将来可能出现的资源危机未雨绸缪。

(三)语言产业价值与资源利用分析

语言资源是语言产业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众所周知,我国具有巨大的语言资源宝库,但我国的语言资源开发与保护却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语言产业的发展。"首先,在语言资源的概念上,陈章太将语言资源区分为广义、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本体及其社会、文化等价值;狭义的'语言资源'是指语言信息处理用的各种语料库、语言数据库以及各种语言词典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对我国的经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①李宇明认为语言是一种资源,因为每种语言都是一种特殊的语言样品,具有其他语言无法代替的语言学上的认识价值。自然语言资源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汉语及其方言,同时也包括汉字;第二种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第三类是外国语言文字。② 王铁琨从语言与产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语言资源的价值。语言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它不仅可以孕育新的产业,还能转化为国家的生产力。邱质朴则认为引进任何科学技术都要以熟练掌握一门语言为前提。语言作为信息交换的一种手段,成为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语言资源具有多重属性。首先是政治属性。范俊军等认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语言资源都有着各自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国家意识。"语言资源为特定民族和族群所专有,语言资源不能人为地占有,它的价值变化、开发与利用、增长与损耗,往往取决于特定民族和族群的集体意志。"③这就更加证明了语言资源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安全当然离不开语言的安全。中国民族众多,语言资源又极为复杂,如果对语言资源问题不能恰当地处理,很有可能上升为国家问题。其次是经济属性。语言资源是一种特殊的资源,有其利用和开发的价值,能够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如果一个国家的语言经济实力上升,也就意味着整体国民经济的提升。许多国家越来越重视语言资源在经济中的贡献度,是否能够将这一特殊资源合理利用,关系到整个国家语言产业、语言经济的良好发展。

还有一类是我国语言资源开发现状分析。"我国语言资源有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丰富性;二是濒危性。"④语言资源的种类十分丰富,我国拥有多种少数民族的语言,但由于一些语言的应用者减少导致语言使用率降低,很多少数民族的语言处在濒临消失的状态中。因此,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极为紧迫。同时,还要发挥语言资源在文化艺术传承上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以保留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文化的传承。⑤ 在过去的几年里,政府为我国语言资源的保护工作作出了很多努力。《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总结了我国年度语言的生活状况。2015 年,中国语言文字工作以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为宗旨,以科学规划"十三五"事业发展为核心,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积极推进

①魏晖:《文化强国视角的国家语言战略探讨》,《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李宇明:《语言也是"硬实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

③范俊军、肖自辉:《语言资源论纲》,《语言学研究》2008 年第 4 期。

④曹志耘:《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定位、目标与任务》,《语言文字应用》2015 年第 4 期。

⑤王树瑛:《加强福建语言生态建设,合理开发语言资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

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努力建设和谐语言生活，全面提升国家语言能力。

（四）个别业态分析与人才培养

学界对语言产业的研究分析仍处在摸索阶段，不管从学科建立角度还是专业的产业分析角度来说，语言产业的大部分研究都较为宏观甚至表面。这是一个新型产业研究不可避免的阶段，但是语言产业的业态研究可以缩小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使研究者对单一业态研究更加深入和深刻，为整个语言产业研究提供更为深入的角度和方向。

业态研究最为成熟的是翻译业研究。早在 2001 年，翻译产业还被广泛称为翻译行业的时候，傅众就提出“翻译协会产业化的思考”。2006 年，以首届中国国际翻译产业论坛为背景的“中国翻译产业上海宣言”提出：“翻译产业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升翻译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翻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翻译产业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加强行业自律和管理，恪守职业道德，诚实守信，规范经营，坚持专业化、现代化的企业文化理念，造就高素质翻译专业人才队伍，是实现翻译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宣言激发了译者的翻译热情、促进了翻译产业的和谐发展、为我国的对外交流事业发挥了铺路搭桥作用。目前翻译业研究越来越深入、广泛，结合我国翻译市场特点进行翻译产业的发展与对策研究，是翻译业研究的主要方向。互联网时代为翻译产业创造了许多契机，同时也对翻译产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区域翻译产业市场分析、翻译行业的规范问题需要学者的分析与指导，朱琳提出“新兴的翻译众包产业”问题，任东升、高玉霞提出“翻译市场化和市场化翻译”问题；张东旭、张伟提出翻译技术化问题，随着现在信息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翻译也会出现新的发展问题与机遇，需要学者与行业共同合作，抓住发展机遇，解决发展问题，实现翻译产业体系的成熟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已成为新时代中国顶层决策设计，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①，我国“一带一路”项目的稳步推进，促使翻译产业与“一带一路”相互促进关系成为越来越热门的话题；银杉、胡梦诗、陈海英等就“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翻译产业发展困境和转型升级问题提出看法，分析我国“一带一路”政策中翻译产业的发展机遇和未来翻译产业转型方向。

（五）地区个案分析

学界在对语言产业研究时注意到，语言产业是社会生产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社会环境的不同导致语言产业在地区间的发展各有特色。语言的产业性质决定了要深入了解语言产业就须结合具体的地区情况，进行企业发展个案分析。对于地区个案分析的研究是从 2013 年末开始的，首先被关注的地区是广西。广西是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语言有粤语、西南官话、客家语、平话、湘语、闽语。语言资源的丰富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让广西较早地重视语言资源的作用。总的来说，广西地区语言产业的各个业态都有发展，较好的是语言培训、翻译、语言测评、语言出版、语言推广等，东盟的建立为广西地区语言产业提供了契机。学者对广西地区的研究也主要是讨论在东盟影响下广西地区语言产业的发展机遇，以及如何利用这种机遇快速发展的问题。陈玉莲讨论了在国外语言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的原因，以及我国语言产业如何把握东盟和全球化机遇，大力推广汉语传播，发展语言产业的问题。② 孙瑞、李丽虹分析了广西语言产业的三大特征：“一是广西语言产业具有涉外性和涉少数民族性”；“二是广西语言产业整体水平不高，但潜力巨大”；“三

①李师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能力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

②陈玉莲：《中国—东盟合作环境下广西语言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

是语言资源保护在语言产业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①

在语言产业发展迅速进步阶段,分析地区特色性语言产业发展的桎梏和策略,为其后语言产业在地区发展提供建议,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但是综上学者的研究,主要都集中在东盟与广西的研究,偶有河南、浙江地区的研究。语言产业的区域发展研究,应是语言产业发展研究的重点,已有研究缺乏全国性地区语言产业的宏观研究,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北上广”这种国际性大城市应该如何融合地区内的外来语言资源,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语言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城市该如何发展语言产业;西藏、云南等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但语言产业资源匮乏,如何进行语言产业和语言人才支援等。

总之,随着“政产学研”各界对语言产业的重视,对语言产业的研究不断深入,且研究方法上逐渐由单一专业研究走向结合经济产业学角度的专业性综合性研究。但是,科学研究是在不断地发现、改革的社会实践中探索而来的,所以对语言产业的研究要紧紧贴近国民语言产业发展情况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规划方向。在十三五规划中,社会主义科学发展需求对语言产业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主要目标提到“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全社会法制意识不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语言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相关产业,其发展规模、发展结构、可见经济效益远不能达到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要求。这要求学者们进一步深入审视每一个语言产业业态,了解其发展的优劣势态,提出改革建议;进一步加大语言资源的开发,并将我国丰富的语言资源转化成社会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探究其产业特性,提出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完善、实现长远发展的措施。在不断重视语言产业经济潜力的同时,语言安全问题也逐步得到重视。国家十三五规划在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方面指出:“推动政府合作和民间交流互促共进,增进文化互信和人文交流。推动国际汉学交流。鼓励文化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推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努力开拓国际文化市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维护国家语言安全,语言的工具性与民族性决定了语言必然会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虽然汉语已成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但是汉语、汉字的自身属性导致汉语并不是世界语言中比较好学的语言,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语言环境中,学者对汉语发展以及语言产业需保持危机意识。

在已有的研究中,语言产业安全研究十分稀少。王建勤在 2011 年以美国为例,探讨美国语言政策对国家政治经济民族发展的影响,并对我国的外语培养提出建议;戴曼纯提出语言规划的安全意义,将国家安全与语言安全结合,提出提高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议;黄德宽进一步讨论民族语言学习与国家安全问题,正视语言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影响力,“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指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当前存在的问题,对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加强我国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议”②。语言安全问题研究对提高国民安全意识、合理规划语言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现在针对国家语言安全的研究存在过于宏观的问题,没有落实到具体产业业态发展问题,也不能够提出具体的语言规划建议。因此,学界亟须加强对以往研究中忽视的语言产业安全领域进行针对性研究。

①孙瑞、李丽虹:《民族地区语言产业发展探索——以广西为例》,《开放导报》2016 年第 1 期。

②戴曼纯:《语言与国家安全:以苏联语言政策为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5 年第 1 期。

六、结语

通过对 1993 年至 2019 年 CNKI 数据库中语言产业领域的文献研究成果进行筛选，我们得到 831 篇有效文献，并以此作为数据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经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文献年度变化趋势看，语言产业虽萌发于 20 世纪末，但直到 2008 年才开始进入较快速发展期，它经历了漫长的初始萌芽期，即使是进入较快速发展阶段，其发展势头也仍不稳定，语言产业研究仍任重道远；第二，从文献期刊分布看，《语言文字应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语言战略研究》《海外英语》和《制度经济学研究》是我国语言产业研究文献的主要所在地；第三，从发文机构角度看，语言产业研究的主力是高等院校，尤其是师范类高等院校；第四，从文献作者及其合作情况看，语言产业的研究者数量并不算少，但其合作情况不甚乐观，有待继续加强；第五，从被引情况看，张卫国、李宇明、陈章太、许其潮等作为发文量较高的作者，其文章的被引率也都比较高；第六，从研究热点情况看，语言经济学作为语言产业的上位概念，在整个研究领域内的热度最高，语言资源、语言服务、商务英语、语言规划等是产业内的研究热点。第七，语言产业研究焦点内容包括：语言产业概念要素分析、产业定位、语言的价值及资源利用、地区案例分析、政策研究、个别业态分析和人才培养计划。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dustry Research（1993—2019）

——Based on Bibliometrics

Peng Shu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24）

Abstract：Using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and based on the CNKI databas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CSSCI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industry in China from 1993 to 2019 was screened and counted，and the growth law of literatur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stitutions, highly cited authors and research hot-spo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language industry is an emerging industry in China.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language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long-term sprouting to rapid development. The main institutions of research ar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the core researcher groups have basically been formed, but among researchers the cooperation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t present, under the command of language economics, language resources, language industry, business English,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services, and the Belt and Road are hot research circles.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industry includes: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elements of language industry, orientation of the industry, value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the language, analysis of regional cases, policy research, analysis of individual business forms and talent training plans.

Key words：language industry; bibliometric analysis; literature growth;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责任编辑：孙昕光

地名发展、移民变迁与乡愁记忆传承
——基于山东省自然村地名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①

宋全成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摘要: 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村名作为一种符号已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以山东省自然村地名数据为依据,运用Stata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地名发展、移民迁移与乡愁记忆传承的历史与现状。数据显示:姓氏和自然地理特征是村庄命名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同时期的得名村庄数量呈"倒U型"分布,明朝得名的村庄数量最多;迁移村庄中跨省迁移村庄数量最多;村民主要来源于山东、山西、河北、云南、四川五省,来源于不同省份的村庄得名原因分化明显。在此基础上,探究移民迁移、地名发展与乡愁记忆传承的内在作用机制,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背景下地名发展与乡愁记忆传承面临的新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愁记忆传承的建议。

关键词: 移民变迁;地名发展;乡愁记忆传承;村庄地名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20)04-0143-14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20.04.014

引言

地名作为一种象征符号,不仅能够生动直接地标记地理空间、概括当地自然人文景观,而且也是地区历史演变与人口迁移动态过程的重要见证。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村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蕴含着丰富自然与人文信息的村庄地名因失去依托而消失。住建部发布的《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显示,我国自然村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17年自然村数量缩减为244.9万个,较2011年下降8.24%,平均每年减少约3.67万个村庄。②加之随意更改村名的现象屡有发生,村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历史上屡经战乱和自然灾害侵袭的山东省是重要的国内移民集散地,人口迁移活动在山东省的村庄地名中打下了深刻烙印。研究移民变迁与地名发展的内在机制意义重大,一方面,移民迁移对地名发展和乡愁记忆传承影响深远,村名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口迁移信息。知史以明鉴,查古以知今。探究山东省移民与地名发展史是实现经验资料与符号理论、移民文化适应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对话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地名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嬗变,也承载了人们饮水思源、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

* **收稿日期:**2020-05-20
作者简介:宋全成(1964—),男,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移民研究所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山东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项目"移民变迁、地名发展与乡愁记忆传承"的阶段性成果。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7》,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98980119_473133。

背景下，本文以山东省自然村地名普查数据获得的 83，292 个村庄为依据，运用 Stata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地名发展、移民变迁和乡愁记忆传承的内在机制，探索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背景下地名发展、乡愁记忆传承面临的挑战，为自然村地名文化遗产及乡愁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提出建议。这对于贯彻习近平同志 2018 年 10 月关于“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广东考察的讲话精神和 2017 年 4 月在广西考察时强调的“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讲话精神，对目前地名命名、乡愁记忆传承等相关政策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述评

地名研究源远流长，地名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先秦时期便受到政府与学者的高度重视。相关古籍卷帙浩繁，《山海经》《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地理志和地方志书中都收录了大量地名。尽管古代地名研究多停留在地名收录与渊源解释层面，但这些文献仍是我国地名研究的宝贵史料。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地名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学界注重区域地名研究，重点关注某一城市、某一聚落等的地名内涵、空间分布特征、命名规律，但探究移民迁移对地名命名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向学春、黄权生重点关注川渝地区移民地名，认为移民地名是川渝移民史的重要缩影，移民动因、迁移过程、移民定居①、移民后的社会变迁、经济文化整合②等均在地名中有所体现。第二，在研究学科上，地名研究已呈现出多学科的特征，多集中在历史学、语言学和文化学等学科。在历史学方面，杨国勋着眼于许昌地名考证，通过梳理相关史料，系统地探讨了许昌地名发展、分布和命名规律。③ 在语言学方面，初志伟对部分富有特色的烟台地名用字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其在语音、语义、修辞方面的特点，梳理了方言的词汇特点和演变轨迹。④ 在文化学方面，罗常培从地名语词语源、历史变迁、命名心理等多个方面对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并分析了民族迁徙对地名及其文化的影响。⑤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学界使用的文献研究法依然是当前地名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采用定量分析等其他方法的文章为数不多。刘泽玲采用文化比较、统计分析等方法，从地名的音、形、义等方面对临汾地名进行研究，概括出该地地名的命名特征，并阐述了地名与地理、历史、政治、社会环境等之间的关系。⑥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运用 GIS 等地理信息技术来辅助地名研究⑦，以求更直观地展现地名分布特征。

总体来看，我国地名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在研究内容上，多集中在对地名本身内涵的探讨，对人口迁移与村庄地名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①向学春：《四川地名与移民文化初探》，《文教资料》2015 年第 13 期。

②黄权生：《重庆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

③杨国勋：《许昌地名史话》，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

④初志伟：《烟台地名的方言特色》，《山东档案》2017 年第 6 期。

⑤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 年。

⑥刘泽玲：《临汾地名的语言与文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2013 年。

⑦王海燕、李庆雷、王涛、李云涛、廉成：《基于 GIS 的陆良县地名文化景观特征及空间分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第二,在研究学科上,现有研究多立足历史学、语言学、文化学学科,对地名历史渊源、命名规律、语音修辞特征等进行探讨,而从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探讨人口迁移与地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少见;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文献研究法是当前地名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而运用社会统计学研究方法对移民变迁与地名发展与分布及其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尚未发现;第四,从山东省地名研究现状来看,现有关于山东省地名的研究多聚焦于一个地级市或区县开展研究①,尚未有论文和专著对整个山东省所有的自然村地名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人口社会学与移民社会学的双重视角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定量研究方法,以山东省自然村信息数据库为依据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地名发展、移民变迁和乡愁记忆传承的内在机制及存在的问题,为自然村地名文化遗产及乡愁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提出建议。

二、社会统计学视角下的山东省村庄迁移和地名发展的基本特征

通过对山东省村庄信息库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对村庄得名原因类型、得名时间、迁移范围、来源省份等变量进行分类,清理缺失值并删除重复变量,最终得到山东省村庄数据共计 83,292 条。在对村庄得名与迁移情况进行简单描述统计的基础上,以村庄得名原因类型为核心变量,交叉统计村庄得名时间、迁移范围、来源省份等变量与其相关关系,并通过卡方检验判断相关显著性。数据中各变量缺失值数量及其在个案间的分布情况不尽相同,因此,在简单描述统计分析部分,为精准计算百分比,对缺失值、村庄迁移状况未知值和来源省份不详值进行删除。在交叉描述统计分析部分,若统一删除缺失值,则会出现大量仅有 1 个变量缺失的个案被删除的情况,为避免不必要的变量损失,故在此部分保留缺失值。另外,交叉描述统计分析部分的列联表统一显示列百分比或行百分比,所得比值为同时等于行列变量所对应的变量值的个案数量在该列或该行个案总数中所占比例,故此部分比例值与简单描述统计分析中所得比例值不同。

(一)山东省村庄迁移及得名情况简单描述统计分析②

1.山东省各地级市村庄数量分布不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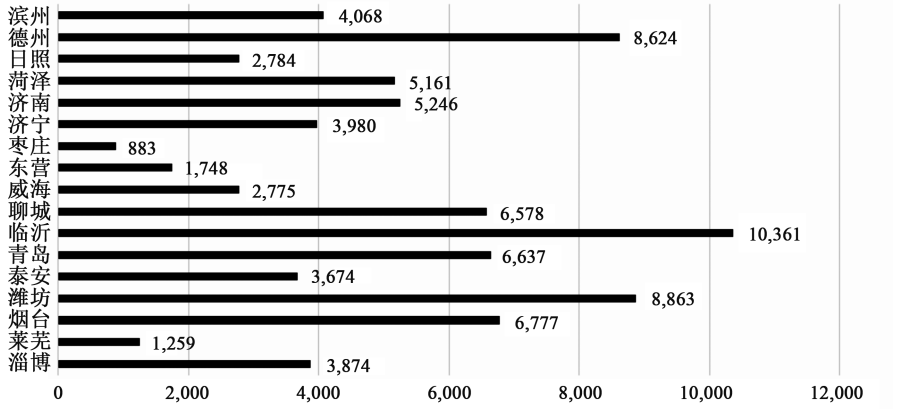


图 1　山东省各地级市村庄数量分布

山东省各地级市之间村庄数量分布不均。村庄数量均值为 4,900,不同地级市之间村庄数量差异大,村庄最多的地级市为临沂市,数量多达 10,361 个,而村庄数量最少的枣庄市仅有 883

①范为菊、邵明武:《山东省沂南县砖埠镇阳字地名文化探析》,《中国地名》2018 年第 3 期。

②此部分图表均不含缺失值。

个。各地级市村庄数量差异受到地级市面积大小、区位分布等地理空间特征，人口数量、耕地面积等社会经济特征，以及文化发展、历史渊源等人文特征多种因素的影响。

2.姓氏和自然地理特征是山东省村庄命名的主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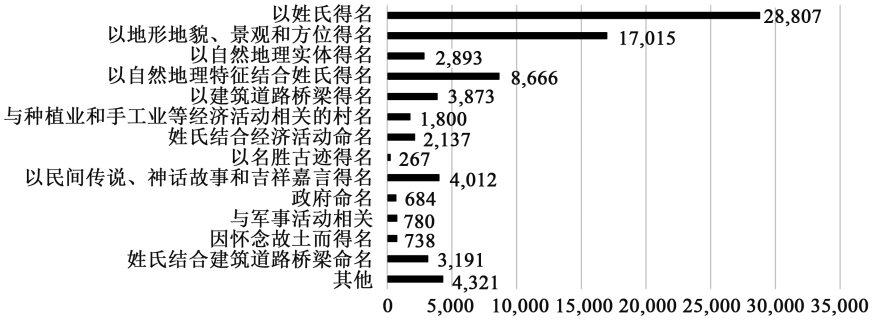


图 2　山东省村庄得名原因类型分布

历史上山东省村庄命名的一般原则主要是与自然实体有关的地名命名和与人文社会有关的地名命名两大类。其中，与自然地理实体有关的地名命名主要以地形地貌、景观、方位命名和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等；与人文社会有关的地名命名主要以姓氏、经济活动、名胜古迹、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吉祥嘉言命名等类型。① 以此为依据，对山东省村庄信息库数据进行归纳整合发现，村庄得名原因可以进一步分为以姓氏得名、以自然地理实体得名、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得名等 14 个类别，如图 2 所示。全省共有 4,108 个村庄得名原因信息缺失，具有得名原因有效值的 79,184个村庄中，以姓氏得名和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的村庄数量最多，分别为28,807个和17,015个，所占比例分别为 36.38%和 21.49%。与此同时，村名中含有姓氏和自然地理特征因素的村庄数量为42,801个和28,574个（两者均含有“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而名”一类），所占比例分别高达 54.05%和 36.09%，由此来看，姓氏与自然地理特征是村庄命名的两个主要因素。② 姓氏体现了村民们的氏族意识和家族归属感；自然地理特征是村民们在村名中描摹风物的体现，这不仅是对村庄位置和山水风貌等的简单描述，更是村民对于自我与村庄相对位置的建构。③ 此外，村名中含有建筑、道路、桥梁因素的村庄数量共计7,064个，所占比例共计 8.92%，村名是反映村民生活状况、心理状态的重要符号，以建筑道路桥梁为村庄命名侧面反映出了建筑、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改善村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另外，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得名的村庄数量共计4,012个，所占比例为 5.07%，反映了村民们祈求祥瑞、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

3.不同时期得名村庄数量呈“倒 U 型”分布，明清两朝新建村庄大量涌现

山东省共有16,578个村庄得名时间信息缺失，对具有得名时间有效值的66,714个村庄统计分析发现，从春秋战国到当下这一跨越近 30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山东地区始终有新的村庄产生。纵观各个历史时期，得名村庄数量总体呈“倒 U 型”分布，元朝以前村庄增长速度始终较为缓慢，

①山东省地名研究所：《山东省地名志》，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 年。

②含有姓氏因素的得名原因类型包括以姓氏得名、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得名、姓氏结合经济活动命名、姓氏结合建筑道路桥梁命名四类；含有自然地理特征因素的得名原因类型包括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以自然地理实体得名，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命名三类。

③刘云生：《岭南地名文化解码》，《深圳特区报》2019 年 5 月 2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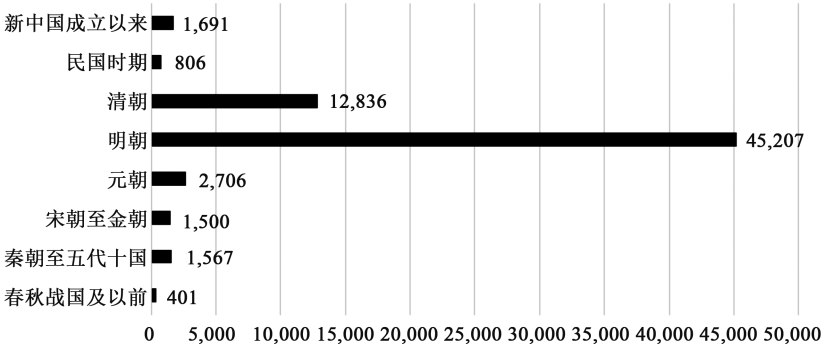


图 3　山东省村庄得名时间分布

春秋战国及以前、秦朝至五代十国、宋朝至金朝分别仅新增村庄 401 个、1,567个和1,500个,所占比例分别为 0.60%、2.35%和 2.25%。元朝村庄增长速度加快,共新增村庄2,706个,所占比例为4.06%。明朝是山东省村庄数量指数增长的时期,各地级市村庄大量涌现,新建村庄数量达到峰值,共计45,207个,所占比例为 67.76%,这与明初统治者推行的"远徙降卒"方针与移民屯田政策相关。清朝得名的村庄数量次之,为12,836个,所占比例为 19.24%。民国以来村庄增长速度放缓,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分别仅有新得名村庄 806 个和1,691个,所占比例分别为 1.21%和 2.53%。

4.迁移村庄在山东省村庄中占主体,其中跨省迁移村庄数量最多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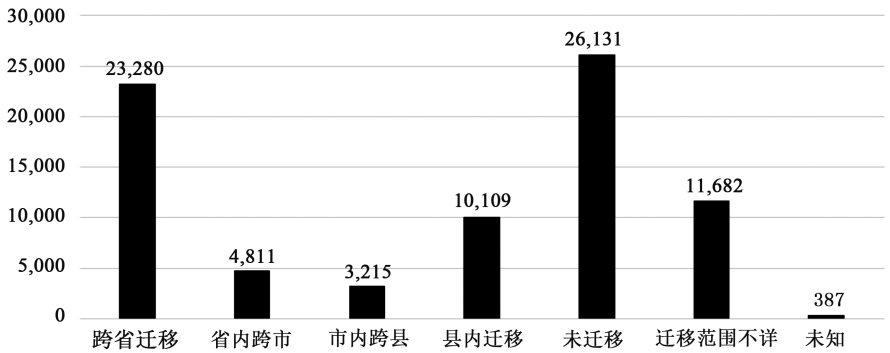


图 4　山东省村庄迁移范围分布

山东省有3,677个村庄迁移范围缺失,另有 387 个村庄迁移状况未知。在迁移状况已知的79,228个村庄中,大部分村庄经历了迁移过程,迁移村庄共计 53,097 个,占 67.02%,迁移范围以跨省迁移居多,数量为23,280个,占迁移村庄总数的 43.84%。未迁移村庄共计26,131个,占迁移状况已知村庄总数的 32.98%。因数据文本结构问题,在统计村庄迁移范围时,仅能判断出一些村庄的村民是从其他地区迁移而来,但无法甄别其迁移范围,将这类村庄定义为"迁移范围不详"。统计发现,这类村庄数量为11,682个,所占比例为 14.74%。此外,省内跨市、市内跨县、县内迁移的村庄数量都相对较少,分别为4,811个、3,215个、10,109个,所占比例分别仅为 6.07%、4.06%、12.76%。

5.山东省村民来源省份集中在山东、山西、河北、云南、四川五省

①本研究将经历了迁移过程的村庄定义为"迁移村庄",指代由他处迁移而来的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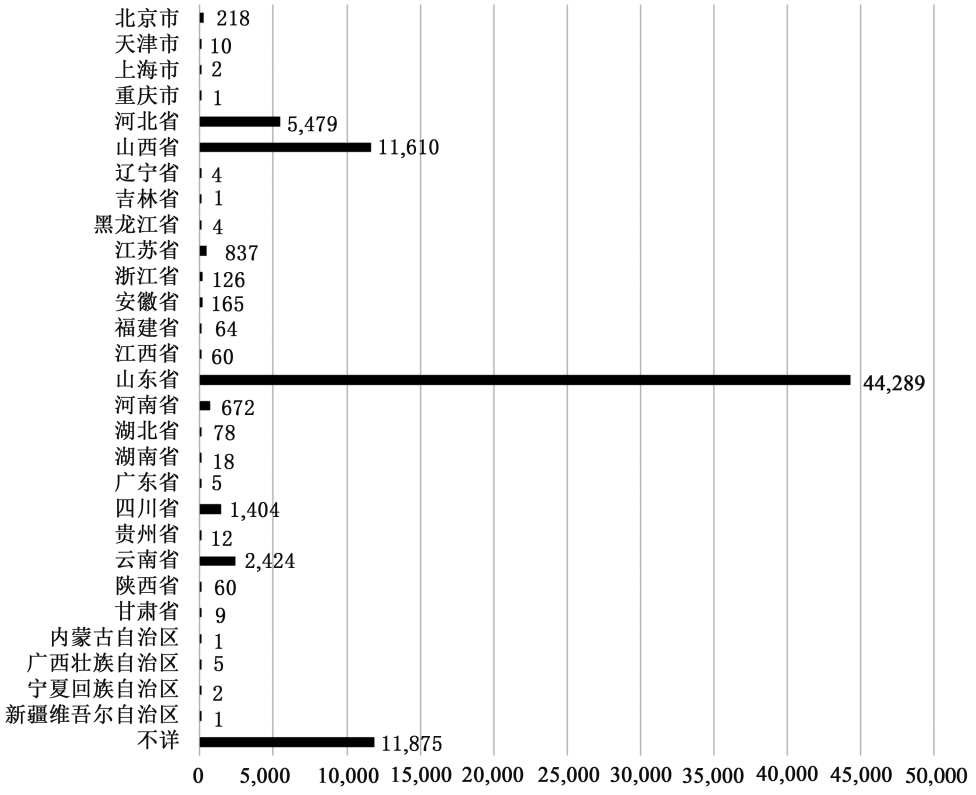


图 5　山东省村庄来源省份分布

山东省共有3,856个村庄来源省份信息缺失，来源省份不详的村庄数量也相对较多，共计11,875个。在来源省份已知的67,561个村庄中，村民来源省份分布广泛，囊括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的 28 个省份。其中，山东省内迁移和未迁移村庄数量最多，为44,289个，所占比例为 65.55%。除此之外，来源省份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云南、四川四个省份，村庄数量分别为11,610个、5,479个、2,424个和1,404个，所占比例分别为 17.18%、8.11%、3.59%、2.08%。同时，江苏、河南等邻近省份也有少量村庄迁入，分别为 837 个和 672 个，所占比例分别为 1.24%、0.99%。

（二）山东省村庄迁移及得名情况交叉描述统计分析

为探析村庄得名原因是否在得名时间、迁移范围、来源省份不同的村庄之间存在差异，分别作出相应列联表，并运用卡方检验验证以上变量与村庄得名原因类型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1.以姓氏得名和以自然地理特征得名的村庄随时间推移，其变动趋势呈现出“倒 U 型”的特征

通过卡方检验发现，得名时间不同的村庄，得名原因存在显著差异。各个时期的村庄得名原因均集中在以姓氏得名和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两种类型上，姓氏和自然地理特征是大部分村名命名的两个主要因素。具体来看，不同时期村庄得名原因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宋朝以前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比例相对较低，而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命名的村庄比例明显高于宋朝及以后；第二，纵观各个时期，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所占比例大致呈“倒 U 型”分布，明朝以前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比例不断提高，明朝时达到峰值，这一时期有 40.76%的村庄以姓氏得名，清朝以后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比例降低，民国以来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比例仅有 12.86%；第三，随时间推移，

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命名的村庄所占比例与以姓氏得名的村庄所占比例变化趋势相反,总体呈“U 型”分布,明朝以此得名的村庄所占比例最低,为 18.74%,明朝前后以此得名的村庄比例均较高;第四,民国以来以建筑、道路、桥梁命名的村庄比例较之前明显提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国以来山东省建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发展的现实情况。

表 1　山东省村庄得名原因类型与得名时间情况

得名原因类型	宋朝以前	宋朝至元朝	明朝	清朝	民国以来	缺失	卡方值
以姓氏得名	20.63	33.40	40.76	32.30	12.86	24.74	
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	22.97	22.68	18.74	26.53	25.23	18.71	
以自然地理实体得名	3.51	3.21	2.60	5.30	2.96	4.58	
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得名	6.61	9.53	11.94	10.74	4.25	7.55	
以建筑道路桥梁得名	7.27	5.85	3.88	4.06	13.42	5.27	
与种植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	2.95	2.95	2.06	2.26	3.56	1.86	
姓氏结合经济活动命名	2.24	2.40	3.23	1.96	1.08	1.53	
以名胜古迹得名	0.86	0.33	0.31	0.18	0.08	0.42	23,000***
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得名	16.01	6.59	3.59	5.17	7.93	5.63	
政府命名	0.66	0.52	0.32	0.44	13.90	0.62	
与军事活动相关	5.69	2.19	0.77	0.51	0.44	0.92	
因怀念故土而得名	0.46	0.57	0.73	1.36	4.65	0.52	
姓氏结合建筑道路桥梁命名	3.00	2.78	5.03	3.30	0.96	1.77	
其他	6.40	6.16	5.20	5.31	8.29	4.21	
缺失	0.76	0.83	0.84	0.59	0.40	21.67	

注:1.表格中除卡方值外,其余数值均为百分比。2.显著性水平:* p<0.05, ** p<0.01, *** p<0.001。

2.迁移村庄多以姓氏得名,未迁移村庄多以自然地理特征得名

表 2　山东省村庄得名原因类型与迁移范围情况

得名原因类型	跨省迁移	省内跨市	市内跨县	县内迁移	未迁移	迁移范围不详	未知	缺失	卡方值
以姓氏得名	46.10	46.73	36.11	31.43	24.63	42.25	27.65	0.30	
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	13.62	14.18	24.20	27.23	29.04	16.84	18.60	0.11	
以自然地理实体得名	1.85	1.95	2.67	3.03	6.47	2.36	1.81	0.05	
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得名	13.03	10.33	12.01	11.97	8.62	10.81	5.94	0.05	
以建筑道路桥梁得名	3.22	2.54	3.14	4.08	8.11	2.90	7.49	0.08	
与种植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	1.73	2.16	2.46	2.01	2.96	2.00	0.78	0.05	
姓氏结合经济活动命名	4.04	3.85	2.30	1.76	1.51	3.02	3.10	0.00	
以名胜古迹得名	0.27	0.21	0.25	0.18	0.36	0.62	0.00	0.03	82,000***
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得名	2.99	2.72	3.02	4.36	8.01	4.57	4.65	0.03	
政府命名	0.31	1.14	1.18	0.73	1.44	0.59	0.00	0.00	
与军事活动相关	0.61	0.54	0.81	0.64	1.54	0.97	1.29	0.00	
因怀念故土而得名	0.58	1.79	2.64	3.05	0.14	0.74	0.78	0.00	
姓氏结合建筑道路桥梁命名	6.18	5.05	3.08	3.23	2.25	4.08	4.91	0.00	
其他	4.70	5.70	5.07	5.35	4.84	7.72	20.16	0.05	
缺失	0.77	1.12	1.06	0.95	0.09	0.51	2.84	99.24	

注:1.表格中除卡方值外,其余数值均为百分比。2.显著性水平:* p<0.05, ** p<0.01, *** p<0.001。

通过卡方检验发现,迁移范围不同的村庄,得名原因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以姓氏得名和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为山东省村庄主要得名原因,在各个迁移范围的村庄中比例都较高;第二,与未迁移村庄相比,迁移村庄命名中以“姓氏”因素命名的比例较高,其中跨省迁移的村庄以姓氏命名的比例高出未迁移村庄 21.47 个百分点,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命名的村庄比例高出未迁移村庄 4.41 个百分点;第三,与未迁移村庄相比,迁移村庄命名中以自然地理特征因素命名的比例较低。第四,与跨省迁移的村庄相比,省内迁移的村庄更倾向于因怀念故土而以原名或以与原名相关村名为新的迁移村庄命名。通过文本分析发现,这些村

庄多为因修建水库等原因而进行短距离整村搬迁的村庄。

3.来源于不同省份的村庄得名原因分化明显，来自山西、河北等北方省份的村庄以姓氏得名的比例较高

表 3　山东省村庄得名原因类型与来源省份情况

得名原因类型	山东	山西	河北	云南	四川	其他	不详	缺失	卡方值
以姓氏得名	29.42	48.11	53.48	30.61	38.46	39.07	42.00	1.84	
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	26.66	10.15	11.24	27.19	19.16	19.32	16.98	0.41	
以自然地理实体得名	4.92	0.84	1.06	5.45	5.63	2.72	2.36	0.08	
以自然地理特征结合姓氏得名	9.82	13.07	10.84	16.75	14.67	13.08	10.67	0.49	
以建筑道路桥梁得名	6.22	3.07	3.29	3.67	4.42	2.59	3.01	0.36	
与种植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	2.62	1.65	1.66	2.60	1.92	1.23	1.99	0.10	
姓氏结合经济活动命名	1.88	4.36	5.22	1.73	1.57	3.57	3.00	0.23	
以名胜古迹得名	0.29	0.28	0.20	0.33	0.43	0.21	0.62	0.03	77,000***
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得名	6.24	2.49	4.12	2.60	4.20	2.68	4.52	0.29	
政府命名	1.22	0.35	0.31	0.17	0.14	0.34	0.59	0.00	
与军事活动相关	1.17	0.55	0.46	0.83	0.85	0.93	0.95	0.10	
因怀念故土而得名	1.17	0.62	0.35	0.45	0.36	1.15	0.72	0.05	
姓氏结合建筑道路桥梁命名	2.83	8.31	4.87	1.69	3.63	4.88	4.07	0.36	
其他	5.07	4.97	2.70	5.86	4.56	6.92	8.01	0.80	
缺失	0.47	1.17	0.20	0.08	0.00	1.32	0.51	94.84	

注：1.表格中除卡方值外，其余数值均为百分比。2.显著性水平：*p<0.05，**p<0.01，***p<0.001。

通过卡方检验发现，来源省份不同的村庄得名原因存在显著差异。第一，来源省份为山西、河北、云南、四川及其他省份的村庄以姓氏命名的比例明显高于山东省内迁移及未迁移村庄，特别是来自河北和山西两个省份的村庄以姓氏命名的比例分别高达 53.48%和 48.11%，而来自云南和四川两个省份的村庄以姓氏命名的比例为 30.61%和 38.46%，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来源于河北、山西等北方省份的村民通常具有更为强烈的氏族观念；第二，相对于其他省份，来源于山东省和云南省的村庄以地形地貌、景观和方位得名和以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比例更高，村庄命名的自然地理特征更为显著；第三，山东省内迁移及未迁移村庄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和吉祥嘉言得名的比例较高，而来自其他省份的村庄以这一方式命名的比例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山东本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吉祥嘉言对外省移民的影响远不及对山东省内村民的影响深刻。

三、移民迁移、地名发展与乡愁记忆传承的内在机制

（一）移民迁移对地名发展的影响

齐鲁大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与生产生活环境使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人口最为密集的省份之一，并积淀形成了扎根齐鲁、辐射全国的深厚的儒家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省不仅是人口大省，更是移民大省，古往今来，纷繁复杂的人口迁移活动为山东省村名数量变化及命名特征都打上了鲜明的移民烙印。

1.因明朝军事移民涌入而出现大量与军事活动相关的村名

明朝初年，大量因战争以及沿海卫所建立形成的军事移民涌入山东。明太祖朱元璋派军征讨占领四川的明玉珍势力与退守云南的前朝残余势力，获胜后俘虏川滇地区军士①，因“若留诸

①陈世松：《明初胶东半岛川滇移民由来考》，《历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

降将,布列旧地,所谓养虎遗患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上),故实施远徙降卒政策,命俘虏长途迁徙,派驻设立在山东沿海胶东、莱州一带的卫所对抗倭寇。降兵叛卒经历收编入卫、异地从征与就地留守过程,最终在山东境内定居,由此山东境内出现了大规模军籍移民。据《青岛地区明代云南移民初考》记载,明代初期,青岛地区出现大量来自云南的移民,这些移民多为受朱元璋派遣出征云南的汉族军士及其家属。另据新编《即墨县志》记载,仅明代因建立卫所和军屯而迁来的军户就达 7 万余人。① 这些军事移民在为新村庄命名时,多使用“屯”“营”“堡”“所”等字,例如青岛市郝家营村、罗家营村、南屯村、北屯村等均因曾在此地安营屯兵而得名。

2.元明清时期大规模政策性移民的涌入使得山东新增大量村名

元末明初战乱频繁,加之水旱灾害多发,山东、河南、河北等省份田地荒芜、颗粒难收,“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但山西却风调雨顺、人丁兴盛,明太祖“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 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三)。自此,大批山西籍移民在政府组织下进入山东境内。相关史书记载,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 到永乐十五年(1417)近 50 年的时间里,共计从山西迁出人口 18 次。这些移民多迁入山东省中西部地区,也有少量迁入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他们在流入地新建村庄,凭借减免赋税徭役的优势,短期内便立足定居,使得村庄数量在短时间内井喷式增长。因平原地区村庄命名时常常缺少典型的地理参照物,于是这些移民多以房屋作为地理标识,常用“楼”“屋”等字,结合姓氏为村庄命名,如“孙家楼”“韩家屋子”,等等;此外,东营等地曾有大规模移民集中迁入,出现了大量以数字编号命名的村庄,例如明洪武二年,东营市利津县盐窝镇由直隶枣强迁入大量人口,出现了东一村、东二村、东三村等一系列以数字编号命名的村名。

3.明清时期手工业与商业移民增加而出现大量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手工业开始发达,商品经济日渐活跃。晋商等自发性商业移民也出现在齐鲁大地,这些从事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安居立业,由此产生了大批与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② 例如滨州市豆腐店村,为明永乐年间由今河北省武邑、枣强一带迁此的张姓移民建立,在东三府(登、莱、青州)通往京津的官道旁开设客店,饭菜中尤以豆腐制品为佳,故得村名豆腐店。这一时期与手工业和工商业等经济活动相关的村名不胜枚举,瓦刀赵、皂户赵、油坊许等村名均以此命名。这是山东地区工商业发展的生动写照,也反映出了传统封建宗族观念与安土重迁思想的松动,促使为获取经济效益而自发迁移的移民规模逐渐扩大。

4.“闯关东”的外迁移民潮使得大量村名“平移”至东北地区

清朝至民国时期,黄河下游水旱灾害不断,加之战乱频繁,局势动荡,山东、直隶等地的灾民大量涌入东北地区。这一跨越近 300 年的山海关内民众大规模出关的移民运动被称为“闯关东”。《吉林地志》记载,闯关东民众“十之八、九均系由关内各省自由移入者。其始不过一、二或一、二户,继则呼亲唤友,而成聚落,俗谓之‘开荒斩草’,并称其首先移居者‘座山户’”③。闯关东民众浓厚的乡土情结及紧密的地缘关系使得他们来到东北地区后也聚族而居,许多新建村庄沿用了原本的村

①侯文程:《青岛地区云南移民初考》,青岛市情网,http://qdsq.qingdao.gov.cn/n15752132/n20546576/n20714478/n20714546/151215192947263736.html。

②安宏:《试谈人口迁移对山东地名命名的影响》,《中国地名》2001 年第 2 期。

③李澍田主编:《吉林地志 鸡林旧闻录 吉林乡土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第 285 页。

名，“平度村”“莱阳庄”等带有山东地域特色的村名大量出现。① 由此可见，“闯关东”移民运动使得一些山东村名伴随着村民迁移而“平移”至东北地区，这些作为重要文化符号的村名并未随着人口的流失而消亡，而是在东北地区重新焕发光彩，成为宝贵的地名文化遗产。

5.大量村名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大潮中消失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村庄地名淹没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大潮中。第一，合村并居使得大量村名消失。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集约土地发展经济，山东省许多地市的城市郊区推行合村并居政策，一些相近的独立自然村合并成规模较大的联合村庄。村庄实体虽仍存在，但因村庄合并，原本独立的村庄变为联合居民区，并多以街道编制命名②，原有乡村文化底蕴深厚的村名被联合村庄的村名所取代。第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许多村庄的耕地被征用为工业用地和城市建设用地，大量村庄被夷为平地，地名随之淹没在城市化大潮中而成为历史的尘埃，这一过程中对村庄迅速且未经评估的盲目拆除是对村庄地名文化遗产的严重破坏。第三，村庄地名同质化严重，地名文化价值淡化。近年来，许多富有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属性的地名要素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现代城市特色、却无村庄传统文化积淀的同质化地名的社区。由此导致部分村名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走向趋同，其地名文化价值被淡化。

（二）移民迁移对乡愁记忆形成与传承的影响

1.封建朝代大规模移民通过村庄命名而推进了乡愁记忆的形成与传承

从山东省的移民情况来看，无论是元、明、清时期大量军事移民和政策性移民的迁入，还是清朝至民国时期的“闯关东”移民运动中大量移民的自发性迁出，在封建小农经济背景下，这些移民均可以被看作“乡—乡移民”。从地方依恋理论来看，因为迁入地与原居住地生产生活环境较为相似，这些移民可以相对容易地将功能性依恋的载体从原居住地转变为现居住地，而伴随着记忆与温情的情感性依恋则通常需要重新构建，乡愁记忆由此形成。③ 在物质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封建时代，以村名来承载情感性依恋通常成为移民铭刻并传承乡愁记忆的重要途径：第一，一些移民直接用原村名为新建村庄命名，以此表达对故土的思念和乡愁记忆的传承；第二，一些移民以姓氏为村庄命名，以增强共同迁移而来的家族成员或同乡之间的家族认同感与氏族凝聚力。此外，封建时期的移民还经常通过在村名中融合原居住地与流入地自然、人文特征以实现乡愁记忆的长久传承。山东省境内许多迁移村庄来自千里之外的川滇地区，或是文化相差较大的晋南地区，移民们在村名中不仅保留了姓氏等宗族信息，还结合了新居住地文化内涵，如青岛市刁家烟霞村村民便是由云南移徙而来，起初结合移民姓氏与流入地自然实体特征，将新建村庄命名为“刁家崖下”，随着与青岛方言的逐渐融合，又将村名雅化为“刁家烟霞”。在村庄命名中将姓氏与新居住地的自然、文化环境相结合，并随着移民社会融入程度的提高，对村名进行调整，这是以构建移民认同的村名符号的方式实现乡愁记忆长久传承的重要表现。

2.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口乡城转移使得乡愁记忆形成与传承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大量村庄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原有农业生产生活环境也随之被现代化城市生产生活环境所取代，承载乡愁记忆的物理载体和环境不复存在，乡愁记忆文化面临重要冲击。以济南市

①张妹：《闯关东精神的丰富内涵及价值支撑研究》，《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9 年第 1 期。

②刘溢海：《地名的融合、消失与迁移》，《中国地名》2005 年第 3 期。

③邓秀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地方依恋研究：影响因素与实证》，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农林大学，2017 年。

郭店街道办事处为例,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背景下,为实现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郭店街道办事处对其下辖的 15 个村庄进行拆迁改造。伴随着村庄的拆除,村内的庙宇、桥梁、大院、胡同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也被夷为平地,承载着村民珍贵乡愁记忆的物质载体——村庄在城市化力量的驱使下迅速大面积地消失,这是导致乡愁记忆断裂,阻滞乡愁记忆传承的重要因素。

第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得农业人口数量不断减少,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乡愁记忆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弱化甚至断代。近几年来,党中央始终将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抓好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工作。这一举措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获得更为公平的生存与发展机会,推动城市化,但是在具体落实中稍有不慎则容易阻断乡愁记忆的代际传递过程。一方面,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保留着浓厚乡愁记忆的老年人留守农村,而农村中的年轻人多到城市中求学务工,新老人口的空间分离使得乡愁记忆的代际传递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新生代与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在沟通过程中,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激烈碰撞持续不断。不同代际的农业转移人口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冲突。新生代乡城转移人口大多更认同现代化生活方式,缺少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依恋,常常难以形成乡愁记忆,他们往往忽视乡愁记忆的重要价值,接受祖辈传承下来的乡愁记忆时也缺乏应有的积极性,乡愁记忆的传承主体不断弱化。以上两方面原因使得乡愁记忆传承面临新的挑战,书写着特定地域历史的乡愁文化面临断代风险。

四、地名保护与乡愁记忆传承的建议

(一)地名保护的政策建议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地名委员会、地名研究所等地名管理和研究机构的先后成立,《地名管理条例》和《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地名管理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以及《民政部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全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等规范性文件的编制与发布,表明我国对于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同时地名文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我国地名文化保护工作有待加强。一方面,无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工作均相对滞后,尚未建立起系统的地名保护名录体系;另一方面,健全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也仍未形成。[①] 因此,针对当前地名管理和保护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1.加快进行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建设

开展地名文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要重视法律法规的建设,制定和完善山东省地名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将山东省地名文化遗产管理与保护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不仅能为地名管理与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同时也使地名保护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 1998 年山东省政府发布的《山东省地名管理办法(修正)》中,作出了对于地名管理工作的相关规定,但截至目前,就地名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仍未出台明确的更详细的法律法规,这导致实际保护工作缺乏应有的最新法律依据。因此,依据国家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及相关政策文件,并结合山东省当下的实际情况,制定地名保护相关地方性法律法规至关重要。地名保护相关法规的制定,不仅要针对地名文化遗产的调查、保护与传承作出规定,而且要明确不同部门及机构应承担的责任,同

①南剑飞:《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回顾、经验及启示》,《中国地名》2017 年第 8 期。

时对于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的地名要予以重点保护，在法律法规的指导下，为地名保护工作提供切实依据，保证地名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2.推动地名普查规范化和地名文化资源信息化建设

地名普查是地名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基础性工作。为了让地名文化得到全面保护，应深入开展地名文化资源调查，推动地名普查的规范化。首先，应全面查清本地区地名文化遗产情况，详细收集地名拼写、读音、位置以及历史沿革、来历含义等文化属性信息，系统掌握地名文化遗产资源数量、分布、现状和存在问题。① 其次，在调查现有地名的同时，要注重调查已消失不用的地名，保护珍贵的历史地名。此外，在调查过程中，如遇书写、含义较为复杂的地名或以方言命名的地名时，应避免地名的错写和错译，以免造成地名文化的丢失。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积极利用普查资料建立地名数据库，整合地名文化资源，提升地名管理信息化水平，这样，不仅有利于地名信息的系统化管理和长久保存，而且也便于相关学术研究的广泛开展。

3.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建设

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进程中，名录制度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地名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对于地名文化保护工作的开展尤为重要。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建设，要结合山东省的实际情况完善地名文化遗产评价、鉴定、确认的标准和程序，逐步健全地名文化遗产普查登记、申报调研、鉴定确认、记录公示、跟踪监管等一系列保护机制，对于列入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的地名必须予以重点保护。同时，建立地名文化遗产名录的跟踪监管机制，动态跟踪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情况，及时发现地名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保证地名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与此同时，注重地名文化遗产层级保护制度的建设，引导省内各市、县加快建立本地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及相关保护机制，形成上下联动、合力推动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度建设的良好格局。②

4.加强对地名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弘扬

针对具有鲜明文化特色和突出传承价值的地名文化遗产，在采取措施加以保护的同时，应积极组织专家和学者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工作，深入挖掘其所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探究其独特的地域文化价值，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促进地名文化的弘扬与开发利用。在充分了解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当地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如举办展览、出版地名文化书籍、拍摄地名文化视频或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渠道进行宣传，普及地名文化知识，不断扩大地名文化遗产的影响力，提升社会各界对地名文化遗产和地名保护工作的认知度，从而增强公众对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促进人们自觉保护地名文化遗产。

（二）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村民与村庄是乡愁记忆的两个主要载体，但政府是实现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主体。为实现对乡愁记忆的有效保护与传承，现提出如下建议。

1.健全乡愁记忆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规范化

乡愁记忆作为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适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为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国人大于 2011 年 2 月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国务院办公厅推出了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在内的行政法规。但目前针对保护及传承乡愁记忆更详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16 年 12 月 30 日）。

②张福文、宁常郁、蓝春柳：《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研究》，《中国地名》2017 年第 8 期。

策措施尚未完备,各级政府应因地制宜,充分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及乡愁记忆传承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并执行相应的乡愁记忆保护办法,实现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2.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形成乡愁记忆保护合力

乡愁记忆不仅是村民们对于村庄的精神依恋,其中还蕴含着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礼俗文化等诸多优秀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乡愁记忆应该做到对乡村文化遗产的全方位保护。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应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以此作为制度依据,应从以下三方面开展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工作:第一,方言不仅是乡愁记忆的重要内容,更是传承乡愁记忆的重要载体,在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应做好方言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保护我国传统方言的多样性,让乡愁记忆有借以传承的重要方言载体;第二,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拥有乡愁记忆的人口数量逐步减少,应及时推进乡愁记忆的收集整理工作,从乡愁记忆中提炼题材,完善相关图书、影音资料整理与出版工作,以优秀的文化作品扩大乡愁记忆的传播范围;第三,整合村庄内外部力量,形成以村民为主体,由政府主导、专家介入、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长效保护机制,凝聚乡愁文化保护合力,使乡愁记忆代代传承下去。①

3.妥善保护村庄历史文化遗存,保留乡愁记忆的重要依托

村庄历史文化遗存中蕴含着丰富的乡愁记忆,保护村庄历史文化遗存是保护乡愁记忆的基础性工作。② 第一,对现有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有效保护与修缮。伴随着农村空壳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包括古建筑、古桥梁等在内的历史文化遗存有些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有关部门应积极统计、评估并及时对辖区内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全面有效地修缮、整治及保护;第二,对即将整村拆除的村庄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及时有效的评估并保护。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农业用地被征集为城市用地,村庄被整体迁入社区,众多村庄因此迅速消失,承载着村民们世世代代乡村记忆的历史文化遗存在短时间内惨遭毁损,附着在村庄上的丰富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随之灰飞烟灭。各级政府应对即将整村拆除村庄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科学评估,及时抢救并妥善保护有文化价值、有历史意义的文化遗存,为村民们保留乡愁记忆的重要依托。

4.政府有关部门应着力增强公众对乡愁记忆的保护意识

村民是乡愁记忆的创造者和拥有者。增强村民们对于乡愁记忆的保护意识,对于保护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乡愁记忆凝结了村民们对于村庄自然风貌、传统建筑风貌、传统农业生活生产方式、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礼俗文化等多方面的珍贵记忆,是村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人们充分意识到乡愁记忆的丰富文化内涵,为村民们提供疏解乡愁、铭刻记忆的有效途径,着力增强村民们的文化自信,提高其保护乡愁记忆的自觉性,是推进乡愁记忆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举措。各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应积极承担增强公众乡愁记忆保护意识的社会责任,与各级政府、基层文化工作者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推进乡愁记忆保护工作。③

5.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利用数字技术让乡愁记忆重现光彩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乡愁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创造了便利条件。城中村改造、合村并居等政策的推行也使得村民在城市社区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尽管原有的农村生活环境不复存在,但储

①崔瑾:《乡村振兴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农业经济》2019 年第 6 期。

②刘正阳:《乡村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人民论坛》2018 年第 21 期。

③崔瑾:《乡村振兴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农业经济》2019 年第 6 期。

藏着珍贵乡愁记忆的历史文化遗存不应随之消逝。为了使乡愁记忆重现光彩，应有效利用 AR 等现代数字技术，在艺术科技的帮助下让乡愁记忆活化，三维复原并重现村民传统居住环境、传统农业生产生活模式、节庆习俗等原有生活场景，以数字化的方式为村民重新构筑起民俗符号，帮助他们保护有关原有共同生活场景的珍贵记忆。① 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复原传统农业生产生活场景，也能够扩大乡愁记忆的传播范围。另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以乡愁记忆为核心的乡村文化旅游也是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该论文得到了山东省地名研究所副主任郭晓琳研究员和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刘星延副研究员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别致谢！）

Development of Place Names, Immigration Change and Nostalgic Memory Inheritanc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ensus Data of Place Names of Natur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Song Quanch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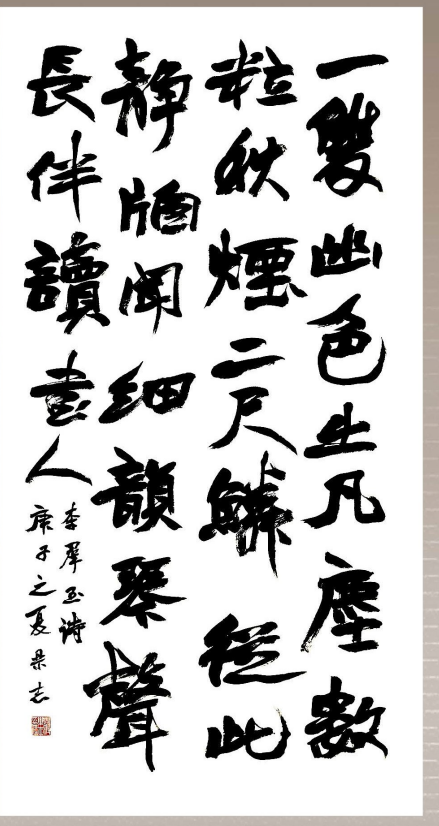
(Institute of Migratio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village name as a symbol has become a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se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based on the data of natural village names in Shandong Province, uses Stata13.0 software a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 to study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lace names, migration and nostalgia memory inheritance. The data show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ly, surnames and natural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main determinants in village naming. Secondly, the number of named villa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ime is distributed in an inverted U shape, and the number of named villages in Ming Dynasty is the most. Thirdly, the number of villages which moved across provinces is the largest among the moved villages. Lastly, the villagers mainly came from Shandong, Shanxi, Hebei,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village name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are obviously divers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migration, place name development and nostalgia memory inheritance, and analyzes the new challenges of place name development and nostalgia memory inherit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place names and nostalgia memory inheritance.

Key words: immigration change; development of place name; nostalgic memory inheritance; place names of villages

责任编辑：张登德

①曲佩宇、罗翊祯：《记得住乡愁：乡愁记忆视域下传统古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思考》，《区域治理》2019 年第 42 期。



蒋乐志 书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65卷 第4期(总第291期)
1956年创刊(双月刊)

主 管 单 位　山东省教育厅
主　　办　山东师范大学
编辑出版发行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中国济南文化东路88号　邮编 250014)
国 外 总 发 行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北京782信箱)
印　　刷　山东金邮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Vol.65 No.4(Serial No.291)
Since 1956 (Bimonthly)

Institution in Charge:Shandong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ponsor: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ed,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Editorial Department,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88 East Wenhua Road,Jinan 250014,China
Overseas Distributor: China National Publishing Foreign Trading Corporation
(P.O.Box 782,Beijing, China)
Printer: Shandong Jinyou Printing Co., Ltd.

ISSN 1001-5973
9 771001 597202 08

电话 (0531)86180064
网址 www.jstu.sdnu.edu.cn

刊号：ISSN 1001-5973 / CN 37-1066/C

定价:15.00元